

《现代》的“商业化”外衣与“现代主义”内质

刘忠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凭借对现代主义的译介和倡导引领当时的小说、诗歌创作,推动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发展。《现代》的成功源自它在市场和艺术之间的游移,公众与同人之间的平衡。《现代》是市场与艺术、同人与公众的复合体,市场和艺术的巧妙配置让它成为20世纪30年代期刊界的一种特殊样态——市场的外衣、艺术的内质。《现代》就像它的名字那样,丰富而开放,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现代》。

关键词:《现代》;商业化;外衣;现代主义;内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01-09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杂志(1932年5月—1935年5月)有着重要地位,因之命名的流派就有“新感觉派”“现代诗派”“海派文学”,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公共空间等标签更是被学者们熟练地贴在它身上,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热词。无论是现代主义实验,还是文学市场运作,甚至是公共空间言说,《现代》的成功源自它在市场和艺术之间的游移,公众与同人之间的平衡。

一、市场的外衣——商业化追求

新文学进入第二个十年,社团化、多元化格局因为政党斗争的介入而发生很大变化,“自然自足式”生长逐渐为“政党促进式”发展所取代,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争夺加快了社团和期刊的分化、整合,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在《洪水》《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拓荒者》《萌芽》《北斗》《流沙》《戈壁》等助阵下,在大众化、工农化方面取得显著成绩,部分地改变了新文学“化大众”不足的局限。马克思主义文艺在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艺的多次较量中凸显出它在社会动员、危机解决方面的优势,成为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场话语权争夺战中,国民党政府不甘示弱,通过书报

审查制度、政策干预、密令等手段强化对文化市场尤其是“普罗文艺”的查禁,针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潘公展、朱应鹏、范争波、傅彦长、黄震遐等国民党御用文人组建“中国文艺社”“六一社”“前锋社”“开展社”,发行《前锋周报》《前锋月报》《文艺月刊》等,提出突破“新文艺的危机”,鼓吹民族主义文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虽然收效甚微,但对左翼文学形成了牵制。据统计,从民国十八年(1929)至二十五年(1936),国民党政府查禁文艺书籍458种,其中包括普罗文艺书籍149种。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文,一举查禁25家书店,涉及上海出版的28位作家的149种文艺图书^{[1]172}。

密令、审查、管制等行为严重制约了新文学书刊的出版发行,书店、出版商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用更换社名、改头换面、化整为零、偷梁换柱等办法与国民党当局周旋。社会学家布厄迪曾说:“文学场和权力场、社会场在整体上是同源同构的,大部分文学策略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很多‘选择’都是双重行为,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的,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2]248}这种选择的双重性或多重性,让介于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的一批自由主义作家摇摆不定,在左右都面临风险的情况下,只能远离政治纷

收稿日期:2017-05-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同人期刊研究”(10YJA751048)

作者简介:刘忠(1971—),男,河南固始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争,把专注点移至艺术本身,为艺术而艺术,沉醉于“自我”“尊严”“幽默”等纯文学写作。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废名、梁实秋、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等人或以一种半同人的状态自办刊物,争取狭小的写作空间;或者依托出版公司,在市场与艺术的中间地带追寻。此一时期,“泛同人”刊物在上海出版界相当普遍,如《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新月》《奔流》《现代》《七月》,其中,《现代》堪称“泛同人化”的标本,它在看重市场的同时,也不忘艺术自身魅力,在市场效应的外衣下跳动着一颗审美的心灵。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经济迅猛发展,西方近现代思潮加速涌进国内,刺激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市民阶层的出现和扩大为作家、艺术家们提供了自食其力的谋生空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书局、光明书局、良友出版公司等门下刊物众多,市场化、泛同人化在给书局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作家的生存提供了物质保障,这是30年代上海一下子涌入那么多自由撰稿人的主要原因。仅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就有《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英语周刊》《儿童世界》《儿童画报》《自然界》“十大期刊”,中华书局有《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八大刊物”,其他如世界书局、光明书局、泰东书局也都拥有自己的刊物。在这样一个文学生态场中,同人刊物前赴后继,竞争十分激烈。

《现代》创刊的最初动因就是为了“抢占商机”,获取商业利润。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和部分厂房在战火中遭到摧毁,《小说月报》被迫停刊。三个月后,吴淞停战协议的签署,现代书局果断地聘请施蛰存创办《现代》杂志,决心在出版萧条期抢占商机,取代《小说月报》的位置。出资方之一张静庐回忆,他离开光华、加盟现代书局之时,“正值淞沪战争后十余天,战争之后出版业异常萧条,所有商店都关着门”,多年的出版经验告诉他,“此时正是大展身手的好时机,何不创办一种能替代因战争而停刊的《小说月报》的文学杂志”,既能为战争恐惧中的民众提供精神寄托,又能为现代书局寻得商机,走出困局,可谓一举多得^[3]¹²⁵。20世纪20年代末,政党文学适逢其时,现代书局紧跟潮流,先是创办“左翼”杂志《拓荒者》《大众文艺》,遭到国民党当局查封;而后又屈从政府压力,创办《前锋周报》《前锋月刊》,受到进步作家唾弃。左右不定的办刊方针让现代书局陷入“两

头不落好”的尴尬境地,在张静庐的主张下,书局决定创办一个没有政治倾向的刊物,这就是《现代》。《现代》的广告效应把“现代书局的声誉也连带提高了”,从一批小书店中脱颖而出^[4]。

与大多数海派作家一样,疏远政治、顺应市场是“为文”和“办刊”的常用法则,有过“卖文为生”和办刊经历的施蛰存自然懂得此中机巧。不过,选择总是艰难的,政治、艺术、市场如何协调,十分艰难;党派、同人、读者之间怎么平衡,同样困难。这些复杂关系困扰着施蛰存,也考验着新文学第二个十年众多的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如果说二十年代新文学期刊多为同人性,思想和艺术的关联度较高;那么三十年代新文学刊物的同人属性在淡化,商业气息在增加,市场动向更为作家、编辑们所倚重。协调艺术和市场,党派与同人之间的关系,既没有捷径也没有法则,先前的办刊经验磨砺了施蛰存的市场敏感性,提高了他对期刊商业化的认识。

实际情形是,施蛰存没有辜负出资方现代书局高层的寄望,很好地执行了张静庐“不出左翼刊物”“不出国民党御用刊物”的主张。施蛰存回忆,“我开始筹编《现代》,首先考虑编辑方向。鉴于以往文艺刊物出版情况,既不敢左,亦不敢右,又不欲取咎左右,故采取中间路线,尽量避免政治干预”^[5]²¹³。既是“采取中间路线”,自然就不能办成同人杂志,只有足够宽泛的作家群和读者群作保障,才有可能提升订阅量,为刊物和书局盈利。这是施蛰存优先考虑的问题,在以订阅量和经济效益为王道的上海出版界,有鲜明社团和流派风格的同人刊物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在这一点上,施蛰存非常清楚,在创刊号发刊词中,他说:“本杂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杂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杂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本身价值方面的……”^[6]

对刊物非同人性的坚持,就是要求作者的非同人性,就是要多样化,排斥单一化。文中,施蛰存反复说明“不是同人杂志”,无非是想把《现代》与“圈子化”同人刊物区别开来,在一个多向度的平台上与作家、读者对话,容纳更多的文学流派和团体,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出版界打开市场。

从《现代》的作者人员构成来看,既有左翼作

家、批评家周扬、茅盾、胡风、冯雪峰、瞿秋白、丁玲、张天翼、夏衍、洪深、沙汀、艾芜、叶紫等人，也有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叶灵凤等创造社成员，还有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京派作家，以及“第三种人”苏汶、“自由人”胡秋原、“中间派”韩侍桁等，能够让这些思想观点各异、创作取向不同的作家兼容在一起，施蛰存的宽容度、亲和力和策略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有不同观点和声音的交汇，不同风格、流派的碰撞，《现代》才成为此一时期文学刊物的市场赢家，创刊号再版两次，销售6000余册，创当时文艺刊物发行量的新纪录，第2卷第1号发行突破1万册，之后又不断攀升。

刊物一旦生成，就具有自己的生命。作为一种功能化和价值化的文化产品，刊物不仅体现主办方和编辑的理念，还受制于一定的商业运营逻辑。张静庐曾在泰东书局当过襄理，与好友合办过光华书局，拥有丰富的出版经验；施蛰存亦有过创办刊物、书店经历，深谙读者心理和市场特点。一个经营方，一个执行者，两者联手，推出一系列措施，使得《现代》从一开始就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首先，张静庐和施蛰存都秉承“刊物质量优先”原则。张静庐认为，“办杂志最重要的是不使读者过于失望。为了这，所以未出版之前千万不要自己过于夸耀，或者不必要写上一大批特约撰述的名单。在预告的时候，读者因为过于夸耀幻想成一种理想的读物，以为一定是百分之百的配他脾胃的，待到读过之后，觉得距离他的理想很远很远，于是起了反应，感觉失望。这是顶可怕，也是办杂志的朋友和出版社应该避免的地方”^{[3]102}。主办方这样希望，施蛰存也是这么做的，在《编辑座谈》中，他说：“对于以前的我国的文学杂志，我常常有一点不满意。我觉得它们不是态度太趋于极端，便是趣味太低级。前者的弊病是容易把杂志对于读者的地位，从伴侣升到师傅。杂志的编者往往容易拘于自己的一种狭隘的文艺观，而无意之间把杂志的气氛表现得很庄严，于是他们的读者便只是他们的学生了；后者的弊病，足以使新文学本身趋于崩溃的命运，只要一看现在礼拜六势力之复活，就可以知道了……我将依照我曾在创刊宣言中所说的态度，把本杂志编成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7]低调、不事张扬、质量优先的编辑态度在创刊号上就表现出来了。

施蛰存撰写的《创刊宣言》直白地告诉读者刊物的性质、编辑方针，封面编辑仅署施蛰存一人名字，与《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罗列诸多名家以造

声威的做派截然不同。细数《现代》发表的文学经典也可见出其宣传低调、作品质优的特点，茅盾的《春蚕》、郁达夫的《迟桂花》、张天翼的《仇恨》、彭家煌的《喜讯》、沙汀的《土饼》、艾芜的《南国之夜》、杜衡的《人与女人》、穆时英的《公墓》、《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老舍的《猫城记》以及戴望舒、李金发、穆木天等人的诗歌都没有提前预告，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评论。把刊物质量放在首位，这是《现代》成功的法宝，也是文学史家把它誉为“新感觉派的阵地”“现代主义文学的摇篮”的原因所在。

其次，参与热点话题讨论，巧用论争吸引读者。低调、重质的同时，施蛰存调动各种市场运行策略，让《现代》走入读者的接受视野，既避免启蒙教化，也不曲意迎合，而是以兼收并蓄的姿态与作家、读者对话。无论是定期的《编辑座谈》、不定期的读者征文，还是面向名家的集中邀约、适时推出的“专号”“增大号”“特大号”“狂大号”，目标似乎只有一个——提供优质的作品，做读者的朋友。例如，第1卷第5期，施蛰存策划“夏之一周征文”，一次编发了九位作家的文章：周作人的《苦雨斋之一周》、老舍的《夏之一周间》、巴金的《我底夏天》、沈从文的《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抄》、郁达夫的《在热波里喘息》、废名的《今年的暑假》、茅盾的《冷与热》、叶圣陶的《夏》、赵景深的《书生的一周间》，从不同角度向读者展现了他们的生活情形和切身感受，趣味盎然，深受读者喜欢。不失时机地利用论争来为《现代》造势，也是施蛰存常用的营销策略。无论双方观点相差几何，《现代》在编发各方文章时，尽可能保持“中间”立场，不作是非判断，静待读者跟风效应。

论争之一是“第三种人”。1931年12月，胡秋原在《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阿狗文艺论》，宣扬艺术至上主义，“声称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冒渎”^[8]。不久，他又在《勿侵略文艺》中，以“自由人”自居，认为艺术只能表现生活，不能对生活发生任何作用，政治“破坏”艺术，“是使人烦厌的”^[9]。胡秋原的“自由人”理论引发左联同人的不满，瞿秋白、冯雪峰分别著文，指出所谓“艺术至上”“勿侵略文艺”不过是“自由人”攻击无产阶级文艺的手段^[10]，以“自由的智识阶级”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11]。争论本来与《现代》没有什么瓜葛，不料，1932年7月，苏汶的一篇《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章，意外地把《现代》推向了前台。文

中,苏汶声援胡秋原的艺术至上观点,批评左翼作家“只看目前的需要”、不要真理;在他们的“霸占”下,“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了煽动家”^[12]。之后,苏汶连续发文《“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认为“以纯政治的立场来指导文学,是会损坏文学对真实的把握的”。

“第三种人”论调一经抛出,立即遭到左翼同人的批驳,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开头就援引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揭露资产阶级文艺自由面目说过的话,“这种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罢了”^[13]。周扬在《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中,反驳苏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要真理”的谬论,说“无产阶级是站在历史的发展的最前线,它的主观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行程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于现实愈取无产阶级的、党派的态度,则我们愈近于客观的真理”。无产阶级的政治不但不会破坏文学去反映生活的真实,还会帮助作家正确地认识生活^[14]。

鲁迅的《论“第三种人”》具有总结的性质,他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15]生动的比喻阐明了一个看似复杂实则简单的道理:在一个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社会里,不仅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也不会有“第三种”文学。

在这场持续一年之久的论争中,《现代》坚持走开放、自由的中间路线,发表论争双方胡秋原、苏汶和瞿秋白、周扬、鲁迅等人的文章,既不介入论争,也不选边站队。表面上看,论争双方剑拔弩张,攻讦不断。事实上,许多文章事先都经对方看过,然后才由施蛰存编辑刊发。

论争之初,鲁迅并没有公开发表意见,后来写作总结性文章《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先交给苏汶,再由苏汶转给施蛰存发表。“社中日记”栏目中,施蛰存夫子自道,“虽则对于文艺的见解是完全与苏汶先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歧义的,但我实在并不认为苏汶先生的文艺观即是《现代》杂志选录创作的标准”,竭力避免使《现代》变成“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16]。后来他也回忆说:“论辩文章,都经过我的手,由我逐篇三校付印。我在校样的时候,就发

觉有此现象,但我决不介入这场论辩,故始终缄默无言。对于‘第三种人’问题的论辩,我一开头就决心不介入。一则是由于我不懂文艺理论,从来没写理论文章。二则是由于我如果介入,《现代》就成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在整个论辩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编者的立场,并不自己认为也属于‘第三种人’——作家之群。”^[17]³²⁻³³应当说,施蛰存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家,中立的路线避免了《现代》沦为个体或群体的传声筒,进而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与同时期其他文学杂志相比,《现代》几乎看不到鲜明的政治派别,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同台竞争,异彩纷呈。

论争之二是“京海之争”。与“第三种人”论争如出一辙,1933年至1934年的京海之争的主战场并不是《现代》,而是《大公报·文艺副刊》和《申报·自由谈》,但《现代》适时地利用这次争论,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不仅赚取了经济效应,也把论争引向了深入,为学者们提供广阔的观照视野。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著文《论文学家的态度》,借讨论“文学家身份”之机,曲折地批评上海作家浮躁喧哗、追逐功名,“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毫无帮助”^[18]。同年12月,苏汶在《现代》上发表《文人在上海》,予以反驳,他先是坦诚商品经济对上海文人生计的影响,接着对沈从文把海派文人诠释为“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低劣,人格卑下”的指责进行驳斥,辩解说:“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能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地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19]言语中流露出对京派作家“优越感”的嘲讽和对工业文明“先锋性”的坦然接受。

苏汶的反驳引来沈从文的进一步回应。1934年1月,《论“海派”》一文中,沈从文一改之前的隐曲批评,代之以恶意斥责,“‘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种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在完成“名士才情”

和“商业竞卖”相结合的定性之后,沈从文连续罗列了海派文人的种种“罪状”:“投机取巧”“见风转舵”“附庸风雅”“邀功请赏”“招摇过市”“沆瀣一气”等^[20]。客观上看,沈从文对海派文人的针砭部分地切中时弊,但也有偏激之词,把文坛普遍的积习一股脑儿地归结为海派“独有”特点,既不公平,也欠厚道。

沈从文对海派文人的定性、定量分析,引发曹聚仁、徐懋庸等人的强烈不满。1934年1月17日,曹聚仁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说“‘京派’和‘海派’本来是中国戏剧上的名词,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落伍”;“海派文人无一不是,固也。然而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街头往来,在市场往来,在公园往来,她们总是社会的,和社会接触的。那些裹着小脚,躲在深闺的小姐,不当对之有愧色吗?”^[21]曹聚仁的辩解迂回、理性,不失公允,恰到好处地揭示了京派、海派的各自特点。

1月20日,徐懋庸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称“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么我以为‘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海派文人,多半以稿费为第一目的,故‘投机取巧’‘见风转舵’等丑态,诚不能免。京派文人,则或为大学教授,或兼政府官职,凭借官僚机关而生活,基础巩固,薪金丰厚,自不至如海派文人那样穷形极相,故亦不必投机、看风”^[22]。徐懋庸的反驳机智而巧妙,凸显了京派文人的“犬儒”本性。

此后,加入争论的文章不断增多,沈从文的《关于“海派”》、曹聚仁的《续谈“海派”》、青农的《谁是“海派”?》、毅君的《怎样清除“海派”?》、师陀的《“京派”与“海派”》、胡风的《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韩侍桁的《论海派文学家》、姚雪垠的《京派与魔道》等都对京派、海派进行不同解读,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大体可以归入美化、丑化两大阵营,少有公允、理性之论。

1934年2月3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

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23]。“官的帮闲”“商的帮忙”可谓浓缩了京派、海派的本质特点,活画出各自的本来面目,至今仍为学人们引用。

置于30年代文坛上看,当时京派、海派之争堪称激烈,参与人员可谓众多,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师陀、苏汶、韩侍桁、曹聚仁、徐懋庸、鲁迅等,不一而足,交锋双方由于立足点不同,观点和看法大多偏颇极端,如鲁迅这般客观、公允的着实不多。大多类同盲人摸象,各执一端,不了了之。不过,京海之争见证了文坛的分化、作家的分歧,直接促成了文学史上两个重要流派的形成。在看似阵营分明、观点偏激的论争背后,虽有文学中心南移、新旧思想冲突带来的文学观念之别,有作家个体对乡土和都市、现实与理想的不同理解,但也不可否认,争鸣双方从市场角度达成的默契,使《大公报·文艺副刊》《现代》成为了最终赢家,知名度和美誉度双双大增。事实上,施蛰存、苏汶与沈从文是很好的朋友,经常相互约稿;施蛰存和鲁迅、曹聚仁也同居一城,相互熟悉,话语交锋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私人之情,论争变相地为两份报刊做了广告。对于1932年5月创刊的《现代》和1933年9月沈从文接任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来说,制造热点、利用论争以刺激读者都是亟需的,毕竟优良的质地并不排斥华丽的外衣。

二、艺术的内质——现代主义文学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谈及《现代》的编辑方针,施蛰存说得最多的几句话,就是“本杂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并不预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26],生怕别人误会,将《现代》与“同人”“主义”“流派”联系在一起。事与愿违,不仅当时就有人给《现代》赠送了诸多头衔:“新感觉派”大本营、“现代诗派”阵地、“海派文学”发源地,而且现在大多数文学史文本都是把“《现代》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一章来讲授。这种不群不党、不左不右的编辑方针很容易让研究者将其与“自由主义”联系起来。

但在实际运行中,“自由主义”很难一以贯之。作为一个主观性很高的职业,杂志主编的经验、兴趣、爱好会自觉不自觉地带入到工作中,影响对作家作品的判断和选择,甚至形成短时间并不明显、长时段却显著的思潮和流派;而且从绝对意义上说,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是很难做到的。更何况“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主义——“客观主义”。在创刊号《编

辑座谈》中,施蛰存开宗明义说:“这个月刊既然名为《现代》,则在外国文学之介绍这一方面,我想也努力使它名副其实。我希望每一期的杂志能给读者介绍一些外国现代作家的作品。”^[7]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每期杂志都刊登相当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第5卷第6期,更是组织30多位翻译人员,历时三个多月,编成“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内容覆盖美国现代小说、戏剧、诗歌、文艺批评、文坛动态等多个领域。“专号导言”中,施蛰存介绍美国文学兴盛原因的时候,掩饰不住自己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向往之情,“美国文学各种倾向的理论,各种倾向的作品同时并存着;他们一方面是自由的辩难,另一方面又各自自由地发展着。他们之中任何一种都没有得到统治的势力,而企图把文坛包办了去,他们任何一种也都没有用政治的或社会的势力来压制敌对或不同的倾向……在我们看到美国现代文坛上那种活泼的青春气象时,饮水思源,我们便不得不把作为一切发展之基础的自由主义的精神特别提供出来”^[24]。这种自由主义倾向在出资方看来就是市场的多元化,而在施蛰存的眼里就是作品的“去政治化”,避免外界力量的介入,自由地选择作家、编辑作品、发行刊物。“自由主义”编辑理念给《现代》带来很大成功,不仅刊物发行量大增,而且逐渐形成自己的办刊特色——多元、差异。

不过,这种多元、差异的特色一旦形成,也伴随着种种争议。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于《现代》的文学史评价,学者们多持质疑、批判态度,认为走“中间路线”,貌似中立,实则“右倾”。80年代以后,《现代》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大多数文学史家的追捧,认为其维系了那个年代难得的公共话语空间,持守文学的纯洁性。由此形成一种简单而又无偏颇的思维定势:如果一种文学期刊能够提供多元话语舞台,它一定是去政治化的,也是审美的,至今,这种纯艺术/审美的文学观仍很有市场。

自由主义倾向之外,《现代》为学者们称道最多的还是对现代主义的钟爱,以及受此影响形成的两个文学流派——新感觉派和现代诗派。

《现代》的“现代主义”首先表现在对外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上。《现代》前两卷各期封面都在显著位置标注“现代”一词的法语“les contemporains”,不仅暗示了编者的法语教育背景,也宣告与外国现代文学同步的先锋取向。从《现代》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来看,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日本六个国家,译介对象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19世纪以前的文学

现象基本不提及。在当时的文学期刊中,开辟专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现象十分普遍,但像《现代》这样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同步、并以专栏形式大规模译介的极为少见。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凸显并形成自己的“现代”特点。施蛰存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几近十年以前的《小说月报》曾出了《俄国文学研究》和《法国文学研究》,而替19世纪以前的两个最丰富的文学,整个儿的作了最有益的启蒙性的说明,那种功绩,是我们至今都感谢着的。不幸的是,许多年的时间过去,便简直看不见有继起的令人满意的尝试;即使有,也似乎始终没有超越当时《小说月报》的那个阶段。……这一种对国外文学的认识的永久的停顿,实际上是每一个自信还能负起一点文化工作的使命来的人,都应该觉得汗颜无地的。于是,我们觉得各国现代文学专号的出刊,决不是我们的‘兴之所至’,而是成为我们的责任。”^[24]此番表白道出施蛰存内心深处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热爱,这也许就是他多次提到的“个人的理想”——“现代书局要筹办一个供给大多数文学嗜好的朋友阅读的杂志,遂把编辑的责任委托给我。我因为试想实现我个人的理想,于是毅然负起这个《现代》主编者的重荷来了”^[7]。

其次,表现在对现代主义作品的发表上,形成了新感觉派和现代诗派。新文学之初,鲁迅、郭沫若、冯至等人的作品借鉴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手法,多停留在个体模仿层面,更不要说形成思潮、现象。《现代》与《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不同的地方在于大量介绍日本新感觉小说和西方唯美主义,表现了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推崇,为当时文坛上的先锋作家提供了一个先锋实验的平台。这个平台上,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们将笔下的人物根植于上海的病态都市文明中,运用象征、感觉等手法,表现人们极度膨胀的物欲生活和困顿苦闷的内心世界,快捷的叙述节奏配合着漂浮不定的意识、心理描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新奇敏锐和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中的人生境况。《公墓》《街景》《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鸠摩罗什》《梅雨之夕》等一经面世,立即在文坛引起轰动,许多作家竞相模仿,逐渐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感觉派,极大地丰富了新文学图志。

《现代》的“现代主义”另一成就是现代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现代》集聚了一大批优秀诗人:戴望舒、施蛰存、杜衡、李金发、冯至、穆木天、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徐迟、路易士等,形成了一

个由因《现代》杂志而命名的新诗派——现代诗派。从审美意象上看,现代诗派的诗美建构是对初期象征诗派象征品格的继承与超越,借助感性对应物,在主客融会、双向同化的过程中超越外在表象世界,传达个体内心世界微妙的情感。从内容上看,现代诗派重在表现诗人的内在情感而不是表现现实世界,彷徨和失落是它最重要的两大主题。诗歌技巧上,现代派延续了初期象征派对纯诗的强调,将西方的象征主义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融合起来,构成诗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虽然《现代》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主张,也没有成立诗歌社团,但在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等人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建构新的诗学原则的努力。在《又关于本刊的诗》中,施蛰存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25]施蛰存的概括触及到现实诗派的三个重要命题:一是纯然的诗,二是现代人情绪,三是现代词藻和诗形,“审美”“意象”“形式”三者合一就是现代诗派的“现代性”。

在《望舒诗论》中,戴望舒对意象和形式进行了细化,他说:“新诗要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新的诗情在“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所以“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他们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26]。现代诗派对古典意象的重视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新诗走出模仿、移植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提供了路径,加快了新诗的本土化。就如何在象征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找到结合点,实现诗行的现代化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讨。从新诗发展史上看,现代诗派的出现堪称一次诗界革命,使诗坛出现了与当时流行的新格律诗风格迥异的诗歌,实现了新诗的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的融汇、格律与自由的统一。

作为新感觉派和现代诗派的大本营,《现代》凭借对现代主义的译介和倡导引领了当时的小说、诗歌创作,推动了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发展,与新感觉派、现代诗派、海派文学一起驻留在新文学史上。面对《现代》,我们可以有若干不同解读,自由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公共空间的、市场营销的……但相信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现代》是一个面向“现代”的文学杂志,“《现代》这个刊物带异域风的法文标题,Les contemporains 显然是相当精英化的,同时也带着点先锋派意味:它是施蛰存这个团体的集体自我意象,这些人自觉很‘现代’,并声称自己是世界文

学的‘同代人’——关注世界各地最新、最先锋的文学动态的人”^[27]¹⁵²。正是这样一批自觉很“现代”的人,让现代主义在《现代》中生长发展,为新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三、内心深处的矛盾——游走在“同人”与“非同人”之间

从1932年5月创刊到1935年5月停刊,《现代》共出版34期。第一、二卷施蛰存独立主编;第三卷到第六卷第一期,与杜衡(苏汶)联名主编;第六卷第二期主编改为汪馥泉,《现代》由文学杂志变成综合性文化杂志,只出三期就停刊了。一般来说,我们言说《现代》,是指施蛰存和杜衡主编的前31期,“同人”“非同人”“现代主义”之说指向的也是这一时段。

新文学之初,同人杂志一枝独秀,在社会思想、文化、文学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兼具社会团体的动员与组织功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由于同人社团与主义千丝万缕的关系,杂志“思想化”渐成趋势,《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语丝》《创造季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等就是它们中的代表。施蛰存也曾经走过这样一条政治化道路,但《无轨列车》《新文艺》的失败让他再次走向办刊这条道路的时候,选择了对“政治”敬而远之的态度,主编《现代》的时候,更是多次发表“非同人”“不思潮”“不主义”“不政党”声明,执意要在文学与政治、杂志与同人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自觉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在个体、市场的边缘之处追寻,在市场、艺术之间徘徊、游移。应当说,“同人”的一元性很容易与政党政治走到一起,卷入派别斗争漩涡而不能自拔,施蛰存对此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也与现代书局管理层的意见相一致。不过,施蛰存和张静庐理解的“政治”还是有所区别的。张静庐排斥同人、政党的出发点是现实政治的凶险和市场竞争的残酷;施蛰存对同人、政党的戒备虽然也有政治风险的考虑,但主要是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一元化倾向,希望《现代》能够走一条多元化方向的办刊之路。

翻阅《现代》各期文章,我们确实有这样一种感受,仿佛置身一个作家、诗人、批评家、翻译家的大家庭——这里有早已成名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郁达夫、叶绍均、欧阳予倩、洪深等人;也有当时文坛的中间人士:老舍、巴金、沈从文、丁玲、李金发、穆木天、周扬、冯雪峰、瞿秋白、夏衍等;还有刚刚崭露头角、势头正健的戴望舒、施蛰存等、杜衡、韩侍桁、徐迟、许钦文、彭家煌、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

黎锦明、黑婴、宋清如、金克木、章靳以、姚蓬子,以及专事翻译的高明、赵家璧等人,汇聚了新文学主要社团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等主要作家。这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任何一个同人期刊所无法企及的,政治思想的不同、文艺观点的差异丝毫不影响他们在《现代》上的自由言说与交锋。如郭沫若的《夜半》《牧歌》、郁达夫的《东梓关》《迟桂花》,茅盾的《春蚕》《徐志摩论》,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李金发的《夜雨孤坐听乐》等都发表在《现代》上。不惟作家众多,作品多样,而且流派纷呈,以戴望舒、李金发、穆木天、林庚为代表的现代诗派,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以茅盾、沙汀、王鲁彦、魏金枝、黎锦明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等都在新文学史上留下几多精彩。很多年后,施蛰存回忆主编《现代》的人生经历,赋诗一首,用“儒墨何妨共一堂,殊途未必不同行”^{[5]201}来描述《现代》的开放和多元。

不过,话也说回来,虽然施蛰存极力向“不同人”“不思潮”“不主义”方向迈进,但是《现代》留下了很深的同人印痕,在众多的作家背后有着一个相对稳定的作家群体,其核心成员除了施蛰存,还有大学同学杜衡、戴望舒、刘呐鸥,以及朋友穆时英、叶灵凤等,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构成了《现代》的基本风格。工作安排上,施蛰存主持全面事务,身兼主编、作者、译者三重角色;杜衡(即苏汶)负责“一部分小说、散文审稿工作”;戴望舒负责“选编新诗来稿,并主持法国和南欧文学的编辑事务”,三人参与《现代》除后三期之外的所有编务。同学之谊、相近的文学观念让他们配合默契,“现代”意识不仅表现在译介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上,还体现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上,甚至影响到对来稿的选择评价上。这也是今天我们谈到《现代》杂志,必言说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诗派的重要原因。

为了规避这种潜在的“同人”倾向,施蛰存千方百计地否认文学思想、流派,编发“第三种人”论争双方文章,与任何一方都保持友好关系,但不介入,不站队。参与“京海”之争,尽最大可能中立观战,渔翁得利,对新感觉派、心理分析小说等称谓总是存在一种疑虑和恐惧,除了“现代”之外,不希望《现代》与任何一派结缘在一起。在主编《现代》的过程中,施蛰存发表了《鸠摩罗什》《石秀》《将军的头》等历史小说和一些意象抒情诗之后,许多作者揣摩编者的喜好,寄来大量“历史题材小说”和“意象派诗歌”,施蛰存非但没有引以为荣,加以鼓励;反而表明不希望模仿、重复的态度,“我不能要求读者不

要受我的影响,但我确实不想放任这些作品在《现代》上形成流派”^{[17]34}。我们丝毫不怀疑施蛰存“要《现代》成为中国作家的大集合”的初衷和动因,但是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形成是不以编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有时是不自觉、自发的,有时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实际存在的,有时是种种因素合力促成的,不管你正视与否,它都在那里。

事实上,施蛰存将《现代》办成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似的非同人刊物的实践仅仅维持了一年时间,从第三卷开始,现代书局老板张静庐授意施蛰存和杜衡合编《现代》,《现代》正式走向了“同人”刊物之路。杜衡和施蛰存虽是很好的朋友,文学观念也很相近,但两人编辑刊物的理念并不一致,起初《现代》还能做到作者和稿子的多元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政治太敏感的杜衡逐渐把《现代》办成“第三种人”的大本营,同人趋势愈发明显,刊物的性质也悄然发生变化,由纯文学刊物向政治思想类杂志转化。1934年初,《现代》与出资方现代书局矛盾激化,杂志社从现代书局独立出来,2月1日,《现代》第4卷第4期上刊出《现代杂志社同人启事》,声称杂志社同人辞去现代书局编辑部一切职务,只致力于《现代》的编辑,署名:施蛰存、杜衡、叶灵凤。至此,作为策略的“同人”标签还是与《现代》捆绑在了一起,以至许多学者忽略过程,直奔主题,认定《现代》一直就是同人期刊。有学者还对此进行了补充,认为“作为这一个文艺社团的干部人物,除施蛰存与杜衡之外,尚有戴望舒、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徐霞村、路易士、高明、林希隽等人,他们虽没有什么形式上的组织,但对于文艺的见解及旨趣,则大抵是共同的”^{[28]298}。

于此,我们说,《现代》就像它的名字那样,丰富而开放,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现代》,不同的视野照见不同的《现代》。

参考文献:

- [1]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C].上海:上海书店,2003.
- [2][法]皮埃尔·布厄迪.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3]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自传[M].上海:上海书店,1983.
- [4]施蛰存.我和现代书局[J].出版史料,1984(4).
- [5]施蛰存.浮生杂咏[M]//沙上的足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 [6]施蛰存.创刊宣言[J].现代,1932,1(1).
- [7]施蛰存.编辑座谈[J].现代,1932,1(6).

- [8] 胡秋原. 阿狗文艺论[J]. 文化评论, 1931(1).
- [9] 胡秋原. 勿侵略文艺[J]. 文化评论, 1932(4).
- [10] 洛扬(冯雪峰). 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J]. 文艺新闻, 1932(58).
- [11] 瞿秋白. “自由人”的文化运动[J]. 文艺新闻, 1932(56).
- [12] 苏汶. 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J]. 现代, 1932, 1(3).
- [13] 易嘉(瞿秋白). 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J]. 现代, 1932, 1(6).
- [14] 周扬. 到底谁不要真理, 不要文艺? [J]. 现代, 1932, 1(6).
- [15] 鲁迅. 论第三种人[J]. 现代, 1932, 2(1).
- [16] 施蛰存. 社中日记[J]. 现代, 1932, 2(5).
- [17] 施蛰存. 《现代》杂忆[M]//沙上的足迹.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 [18] 沈从文. 论文学者的态度[N]. 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3-10-18.
- [19] 苏汶. 文人在上海[J]. 现代, 1933, 4(2).
- [20] 沈从文. 论“海派”[N]. 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4-01-07.
- [21] 曹聚仁. 京派与海派[N]. 申报·自由谈, 1934-01-17.
- [22] 徐懋庸. “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N]. 申报·自由谈, 1934-01-20.
- [23] 鲁迅. “京派”与“海派”[N]. 申报·自由谈, 1934-02-03.
- [24] 施蛰存. 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J]. 现代, 1934, 5(6).
- [25] 施蛰存. 又关于本刊的诗[J]. 现代, 1933, 4(1).
- [26] 戴望舒. 望舒诗论[J]. 现代, 1932, 2(1).
- [27] [美] 李欧梵. 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 毛尖,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28] 杨之华. 文坛史料[C]. 上海: 中华日报社, 194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Modernism in *Modern Magazine*

LIU Zh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Modern Magazine* has an unusual position since it has led the creation of novels and poetries, as well 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by translation and advocacy of modernism. The success of *Modern Magazine* stems from its cruising between market and art and its balance the public and the people. As a complex of market and art along with the public and the people, the ingenious configuration of market and art make it a special kind of periodical in the 1930s—the surface of market and the nature of art. *Modern Magazine*, rich and open just as its name implies, is interpreted diversely in the eyes of different readers an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Key words: *Modern Magazine*; commercialization; surface; modernism; nature

一种情感关系:不可能的可能

——论马丁·瓦尔泽的《第十三章》

方向真

(上海 自由撰稿人,上海 200000)

摘要:德国当代作家马丁·瓦尔泽的长篇小说《第十三章》,从一种爱情关系——不可能的可能,探察到一种人性的姿态。小说里,既是思想盛宴又是文字盛宴的男女主人公的通信,体现了理性与诗意的完美融合。作者越过传统的屏障,用现代意识刷新了的目光重新考量爱情,为爱情文学增添了美丽、真实、丰富的篇章。

关键词:马丁·瓦尔泽;《第十三章》;爱情;不可能的可能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10-05

德国当红作家马丁·瓦尔泽的长篇小说《第十三章》所写的爱情,与之前很多作家所描述的爱情不同,他笔下的主人公明知道面对的是不可能的无果的爱,却又倾心倾情为之,创造着一种别样的爱情关系——“不可能的可能”。

在进入《第十三章》的爱情故事之前,我们先分享一下作家本人精彩的生活片段,这有助于理解他作品中人物的精神气质。

著作等身、获得了包括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在内的30多个奖项的马丁·瓦尔泽,被誉为德国文坛的“老马”,他连续在德国权威的政治学杂志《西塞罗》颁布的知识分子影响力排行榜上名列前茅。2016年,89岁的他“仍然自己开车,车速极快,弯道通过能力堪称一流……夏天他下博登湖游泳,一气畅游五十分钟”^{[1]-2}。在世界各地的文化活动中频繁出镜的他,2016年第三次来中国,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他在大学演讲、座谈、签名售书、接受记者专访等,他的每一天都被与书相关的活动排满了。可是,你居然在他脸上捕捉不到一丝的疲倦……

“缺了不可能的事物,我就不可能生活。如果

生活被可能的事情层层包围,生命之火就会熄灭。”^{[1]229}(以下未标注引文均出自《第十三章》)《第十三章》里的主人公巴西尔·施鲁普对心仪的女神学家玛雅信中的倾诉,也正是作家自己的心理诉求和人生意向。

倾心于这种不可能性的,不仅仅是马丁·瓦尔泽及其笔下的人物,在世界文学的谱系里,我们不难见到这类小说人物。如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2]中的主人公,即是满怀热望将目光投向远方的青年;司汤达《红与黑》^[3]里的于连,就是翻云覆雨地逾越门第的限制,为求得看似不可能的爱情,尽管他得而复失,弄丢了性命;已逝的中国作家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公们,不也一直在向不可能的未来奋进着纠结着?

此类文学案例数不胜数。

但是,马丁·瓦尔泽笔下的爱情——不可能的可能,远非心灵鸡汤式的现代人臆想中的情欲满足,远非欲求而不得的焦灼绝望或交换中的算计,他的主人公追求的是明知不可能而为的爱情。如《第十三章》里的男作家与女神学家,他和她隔岸观火地觉知着自身莫名迸发的激情,欣赏着他们自导自演的柏拉图式爱情。不可能的可能,这一理性/智力与

收稿日期:2017-03-20

作者简介:方向真(1957—),女,河南南阳人,文艺评论家,现居上海,自由撰稿人。

诗意融合的奇特精神现象，贯穿着马丁·瓦尔泽所有的爱情故事——诸多个关于爱情的故事版本。人到老年的马丁·瓦尔泽说，爱情不能是一个名词，它无法描述，爱只有是动词，不断去叙说。

二

现在，让我们进入《第十三章》。

总统府的美景宫里，总统正为生物学家科比尼安·施内林设办祝寿宴会。宴会上，著名作家巴西尔·施鲁普与科比尼安夫妇同席。席间，巴西尔被科比尼安的妻子玛雅·施内林的美貌与特别的气质所打动，尽管他当时装作一视同人，一副平静无畏的样子。宴会结束后，他想办法从总统秘书那里索到施内林家的地址，他给玛雅发出的第一封信这样写道——

尊敬的教授女士：

我拿到你的通讯地址，要归功于总统私人秘书。我第二天就给他拨通电话，谎称晚宴主角的事迹让我思绪万千，我不得不跟他写信，向他描述他让一个作家如何浮想联翩。您是神学家，对您就得说：撒谎在我这里，更多地是一个语言学而非道德难题。所以我拿着您的地址已经两个星期了，我每天给您写信，这些不得不写的信从未寄出……

一种自美景宫的晚宴以来一天强过一天的情感体验：您使我保存在抽屉里的所有信件自动贬值。过去两周里，我天天都在重读这些信件。多年来一直让我觉得充满友谊、友爱或者激情的信件，现在它们毫无价值。那些初次阅后让我爱不释手的信件也不例外……

您的形象。您的声音。您的脸。您的头。您的昂首姿态令人赞叹！……您的嘴，时刻准备用沉默代替言说。还有您的头发。发色和发型都拒绝任何造型。但依然显出轰动效果。还有您，您好像无所不知。又一无所知。您是能够相处的最狡猾的单纯。也是能够出现的最天真无邪的诡计多端。而且司空见惯。而且不像虚张声势的压顶乌云从我这里穿过……^{[1]18-27}

马丁·瓦尔泽笔下的作家巴西尔，为了求取令自己怦然心动的人的地址，所做的迂回小计，因了率真的吐露，俨然是天真顽童的小小心机了。

玛雅女士接信即复——

在您这里可以长个见识：人可以无缘无故地去做一件事情……

我发现我坐在一个聊天高手旁边。他知道自己保留节目会出现什么效果……

又及，

……为自己竟然把这些事情向您和盘托出而感到奇怪。^{[1]25-30}

频繁的或长达数页或寥寥数语的通信，就这么开始了。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彼此都不了解的人竟有这么多知心话要说！”

信中的交谈，在巴西尔和玛雅，是心照不宣的秘密。他们将通信这一行为及他们热切地向对方倾诉（而且还端出了各自婚姻里的爱人的秘密），自嘲为“背叛”。双方悉心领会回应着对方的讯息，就像儿童将自己珍爱的玩具和宝贝出示给小朋友，像少女羞涩地向钟情的异性告白。他们的通信就像是一场坦白的竞赛，初恋情人般地热烈聚焦。也许人人都有倾诉的愿望和冲动，只要适时打开心灵的闸门。在总统府美景宫的宴会上相识的他和她，自然属于同一阶层，巴西尔——知名作家，玛雅——神学教授、诺贝尔奖生化奖得主的妻子。珍重声名的他们，谁都无需轻薄地拿对方来炫耀自己，他们彼此给对方以安全感。

一年多的频繁通信，他与她用他们建立起的字母桥索，跨越着现实的鸿沟。二人安居在各自婚姻的堡垒里，同时又在字母桥索通达的另一个时空完成臆想中的交融。原来，爱情也能进入第五维空间——全新的智慧之能、心灵之能、情感之能的世界去遨游！

某一天，巴西尔预感玛雅遭遇了不测，但他仍然给玛雅写信，向不再可能回信的她吐露心迹：“你给我的信，来自不可能的深渊……在你给我写信的日子里，我有一种价值，你不再写信，我就不再有这种价值。我生活的意义、价值有多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的交流！”是的，一个男作家与一个女神学教授，因为爱欲的浸染，他们对世界对人生的思维路径，也撒上了美丽的光晕。曾经，他们共谋、践行着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

不可能的可能——基于这样一种情感关系的探索，马丁·瓦尔泽写作出版了《爱情的彼岸》《一个恋爱中的男人》《一个寻死的男人》《第十三章》等多部长篇，它们以各色人物心理及人物各自的生命轨迹，为作家的这一发现衍生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的版

本。

受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他倡导人们在对希望不报希望的情形下,去信仰未知的神)的启发,马丁·瓦尔泽非常欣赏一种“不可能的可能”的情感关系,即终极的悲观(失望、不可能)及当下的乐观(明知不可能而为之)。或者说,他洞察、捕捉到了这种情感关系的多彩的呈现姿态。这又回到了马丁·瓦尔泽所言的悖论:“不幸的、不成功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只要是成功的爱情都是一种交易。”他的意思是否是:没有完成(结婚?)的、或者说没有完满结局的爱情,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爱情——纯粹的爱情?也许在他看来,圆满的结局即是均衡——成功的交易。

回到《第十三章》。玛雅2011年7月10日在查普曼湖给巴西尔发了一封信,因为它的重要及无意识的暗示,这里全文摘录——

亲爱的朋友:

你说没说过,我们和不可能的事情调过情?

自我骑车越过荒野,我就知道这话有道理。现在下雨了。土路变成了肥皂,又湿又滑,几公里停一次,好把挡泥板上的泥巴刮下来。帐篷的拉锁再也修不好。我们从地下爬进爬出。墨蚊进了帐篷,贪婪地骚扰我们。灭蚊剂对它们毫无影响。松鼠咬断了拖斗的皮带。风刮得很猛,而且总是逆风。没完没了地爬坡。很短的下坡路段。即便扛住了,也不能说这种情况可以忍受。

尽管科比尼安现在很健康,我感觉他所经历痛苦也在我们之间制造了隔阂。就像他和另外一个女人有过一段绯闻。而我又不得不担心他依然在想那个女人。手术三天之后他说:我有了怀孕的经历。我肚子里面曾孕育着死亡。我堕了胎。现在我知道女人堕胎之后是什么感觉。现在他好了。他天天向我展示他如何健康。但是那段绯闻……没有什么区别比病人和健康人之间的区别更可怕。

如果继续这么下雨,我们永远无法到达鹰原。如果那样,是否很可惜?我们越接近鹰原,不可能性,我们的不可能性就越真实。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跟它调一次情。昨天夜里我梦见科比尼安送我的生日

礼物不是由三十九朵玫瑰组成的花束,而是有毒的花朵。忘记它!

晚安,我了如指掌的朋友。

玛雅^{[1]220-221}

十五天后,玛雅又给巴西尔写了一封信,此后,玛雅永久消失。玛雅在这最后的两封信里隐约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她的丈夫科比尼安因为癌症的身心折磨,旅途中出现一系列从未有过的乖戾言行;她被自己的丈夫拖进他设计好的自杀之旅——骑自行车奔赴野熊出没的荒凉北极之旅,共赴死亡。虽然她没有明晰猜想丈夫的意图。每次科比尼安认真询问,问她是否想跟他在一起,她都坚定回答:科比尼安,永远。潜意识里,她应该明白这是她生命里的最后一场骑行。

那个始终没有发声的科比尼安·施内林(他的一切只是由玛雅给巴西尔的信来描述)几乎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事业辉煌,生活富足,他美丽的妻子——神学家教授玛雅,深爱着他。他的强大存在更验证着巴西尔与玛雅之间不可能的爱情。同时,他自己不为人知的痛苦体验,也在印证着一种不可能的可能。科比尼安·施内林年轻时就获奖无数,被同行视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后来他用自己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创办起一家企业,专门生产定制药物。从此名扬四海,财源滚滚。但是,几乎无所不能的科比尼安从来不满于既得的一切。沿着学术道路走向斯德哥尔摩,始终是他的情结。他自责是“堕落的天使”,懊恼自己离开了学术殿堂。

从玛雅给巴西尔的信中吐露可分析得知:科比尼安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或者说,他是尚未出轨的同性恋者。科比尼安一直被内心的一份隐情所折磨。他依恋的印刷商路德维希·弗罗突然与他中断友情(路德维希与其妻子悄无声息地与他断交。因此,路德维希就成了科比尼安与妻子玛雅谈话的禁忌),后来路德维希出版的《鸿鹄之志》又毫不留情地调侃科比尼安夫妇,致使科比尼安担心此书伤害到妻子玛雅。直到临近设计的旅途的终点,科比尼安才对玛雅讲了他的担忧及他对路德维希的感情。这之前,玛雅给巴西尔写信感叹:“我们对于最亲近人的最隐秘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但如果痛苦不可以分担,什么东西可以分担?”

这个无所不能的痛苦着的男人科比尼安,在癌症手术后,成功地将妻子拖进他安排的死亡之旅中,如同他的爱需要回应。

《第十三章》中的叙述和描述,不乏预兆和隐喻

的意味——处处潜伏着不可能的可能，每个人物都有着自身性格与情感的逻辑，人们的命运、人际之间的关系隐藏着多种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它们也昭示着故事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似乎看不出作家本人的设局。这就是马丁·瓦尔泽描画人物及故事的魅力所在。

作为读者，我们更关心玛雅后来怎么样了，她与巴西尔的通信最终是什么结果？让我们看看《第十三章》的结局吧。

巴西尔在玛雅失踪多天之后，收到罗德里希——科比尼安的忠实司机的信，信中写道：“玛雅·施内林对我说：如果熊把我吃了，你就讲给巴西尔·施鲁普听”。

罗德里希还附上了科比尼安给他的信——

亲爱的罗德里希：

医生给我留的时间快到了。玛雅说，她想跟我在一起，所以我把她带上。后事你来处理。一切准备就绪。

你的一直服从你的上司向你问好！

科比尼安·施内林^{[1]234-235}

即便事件的结果真相大白了，你又怎么可能知道、确认当事人的内心感受和认知的过程？它们皆处于不可能的可能中。

在接到玛雅最后一封信的第二十三天，巴西尔在他的几封信件再无应答后产生了强烈的不祥之感。他给玛雅写信——

最亲爱的朋友：

告诉那边的人，你不行了！路途遥远，路途遥远！北极圈。打道回府。回到文明社会。你们的处境很危险。我必须救你。让人救你。我来救。你像是被绑架了！你被绑架了？！

你的朋友^{[1]230}

巴西尔曾经写信给玛雅，称她的信“来自深渊”。从此，永无回应的这一份期盼的爱也将指向深渊——揪心的下坠、绝望、无终止的黑暗……

三

《第十三章》的书名，蕴含着几重寓意。“第十三章”，与“十三”对应的德文是：Verrat, verraten；与中文对应的是：泄露、背叛、出卖。不难发现，书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激情者、破坏者。他们没有想过要伤害谁、背叛谁，他们只不过依着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情感逻辑。他们——不管是笼罩着光环的成

功者还是失败的自杀者，不管是拥有爱情者还是爱的缺失者，身上都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十三”之嫌，诸如：

巴西尔与玛雅的婚姻之外的恋情——秘密通信，彼此欣赏到无话不谈，不经意吐露各自配偶的隐私。

科比尼安，因患上绝症而设计了自杀之旅，却要自己的妻子玛雅陪同自己走上此旅。虽然途中他几次探问玛雅是否愿意与他在一起，玛雅都坚定回答：“永远。”

路德维希——成功的印刷商，在他讲述自己一路凯歌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的《鸿鹄之志》一书中，放肆调侃他的同学、朋友们（虽然用了化名），甚至披露了科比尼安和玛雅的性交习惯。这部令媒体欢呼雀跃的真实、诙谐、大胆而放肆的书，伤害着将他视为好友的科比尼安及妻子玛雅。

伊莉丝一直还爱着她的前男友——因绝症而坐上轮椅的已经享誉世界的建筑师（当年他告诉伊莉丝，他将以自己的构想征服世界：性别建筑），每个月至少一次推他散步回来，她就用沉默对丈夫巴西尔宣布无语日。

北极途中与玛雅相遇的那个甘愿做她仆人的教授，爱自己的女校长而不得，转而诋毁与女校长有恋情的另一数学教授。

罗德里希——科比尼安最信任的司机，在处理完信赖他的主人交代的后事之后，应聘到了让科比尼安始终不能释怀的路德维希手下开车。

如果用传统道德的高标，他们所有人是否都难以摆脱“十三”的干系？

故事的结尾是：伊莉丝的前男友贝亚图斯·尼德拉尔在一个酒吧自杀了。那里是伊莉丝推着他的轮椅散步的最远端。伊莉丝沮丧地坐在自家阳台上，一页一页烧着什么。巴西尔明知故问：烧的什么？伊莉丝回答：第十三章（她悄悄写作的小说稿）。巴西尔说：把书名送给我？伊莉丝回答：很乐意。然后把双手放在巴西尔的膝盖上。

当然，这是颇有隐喻意味的结尾。它很有弹性，不把故事讲完。

书信体的《第十三章》是文字的盛宴、思想的盛宴——智慧、轻快、调皮、引人入胜，但文字背后，依然是无所不在的痛苦阴影。也许，与深度的爱及爱的不可能性如影相随的必然是痛苦。无数个男男女女终其一生都纠结于理想之爱的希冀、追求与它的不可得之间。只不过，已到中年的男女们无奈地

理智地承认了这个现实,无论内心有多么痛苦,他们都能淡定从容波澜不惊地接受这一现实。作者曾在接受网易读书专访时说,人生注定无法摆脱真正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即便通过写作。自言“缺了不可能的事物就不能生活”的瓦尔泽,他笔下人物的故事自然也揭示了他的体悟。

对不可能的可能这么一种爱情关系的揭示,可见马丁·瓦尔泽探察现代人情爱的一种姿态。马丁·瓦尔泽用现代性的目光来重新考量爱情,让他的主人公以字母游戏的方式开启未知的新奇经验——探察理性下的激情倾诉及讲述,也指向各自的深层意识,指向与人性相关的一切。作者博大悲悯的情怀使他越过传统道德的屏障,再度触及到人性的新维度。他的《第十三章》为爱情文学增添了美丽、真实、丰富的一章——让现代人心灵为之震颤的一章。

快要写完这篇文章时,我再次回看《第十三章》,令我吃惊的是,这本书居然像是第一次摆放在我的面前,巴西尔、玛雅的信里那么多智慧迷人的语

句触动着我的神经!《第十三章》之于我,如同一座神秘的山林或者一座迷宫,我仅在它边地的某一个路段走了走,或者仅仅在外围领略到它不寻常的轮廓线条,它繁复奇妙的肌理及它独一无二的存在姿态,我尚未探察明白。此刻想起黑格尔对爱情的定义:在对方身上发现自我。其实阅读何尝不是发现自我的旅程!是否可以,如同瓦尔泽笔下的爱情关系,读者与高妙的文本之间也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

参考文献:

- [1] 马丁·瓦尔泽. 第十三章:译者序[M]. 黄燎宇,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2015.
- [2] [捷克]米兰·昆德拉. 生活在别处[M]. 袁筱一,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3] [法]马汤达. 红与黑[M]. 郝运,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Love Affairs: From Impossibility to Possibility

——On Martin Walser's *The Thirteenth Chapter*

FANG Xiang - zhen

(Shanghai, Free - lance Writer, Shanghai 200000, China)

Abstract: *The Thirteenth Chapter*, created by German contemporary writer Martin Walser, attempts to explore humanity in terms of love affairs—from impossibility to possibility. Th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 hero and the heroine in the novel, which are filled with the feat of thought and expression, embodies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of reason and poetry. By traversing traditional barriers, the writer aims to reevaluate lo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consciousness, adding beauty, reality and richness to the love literature.

Key words: Martin Walser; *The Thirteenth Chapter*; love; from impossibility to possibility

跨文体与碎片化:《寐语》的叙事艺术

化红丹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寐语》是一部难以归类的作品,跨文体和碎片化是它的两个主要艺术特征,跨文体主要表现在小说与散文、诗歌的巧妙结合;碎片化不仅表现在小说的结构和情节上,而且文中处处可以找到碎片的痕迹,这种独特的叙事形式在张鲜明的小说《寐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张鲜明的小说进行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挖掘作者独特的写作风格,更好地把握其小说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寐语》;跨文体;碎片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15-04

一、《寐语》的跨文体写作特征

所谓“跨文体写作”,是指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打破传统的写作范式,将各类文学样式甚至是非文学样式进行融合,形成新的文学样式,以使某一类文体同时具有其他文体的美学面貌和文体特征。学者陶东风指出:“文体变易的一个常见途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体之间的交叉、渗透,并进而产生一种新的文体。”“这种交叉、渗透实际上是多种结构规范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妥协和相互征服。”^{[1]15-16}可以说,陶东风从内在机制上剖析了文体的变易过程和特征,他从文体内部看到了文体之间的交叉和渗透,这种文体的变易,贴切地阐释了跨文体写作形成的过程和特点。

福科说:“写作就像一场游戏一样,不断超越自己的规则,又违反它的界限并展示自身。”^{[2]288}

张鲜明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文体越界的现象,可以称作跨文体写作。其小说《寐语》将散文文体和诗歌文体嵌入到小说文体当中,并且将小说文体和这两种文体进行融合,突破了传统小说文体的规范和限制,不同文体之间的“结合”与带给读者另类的阅读感受,在其变换多样的文体形式背后,积蓄着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冲击力。

(一)小说与散文的融合

《寐语》作为一部特殊的小说,“它甚至把小说叙事带到了文体的边缘”^[3]。可以说,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传统小说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故事中的人物并不那么鲜明,事件也并不那么清晰,作者想传达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混沌的感性存在状态,其行文具有明显的散文化气息。

首先,《寐语》中的每篇小说结构上都比较散,几乎每篇作品都没有一个明晰的线索。文章的开头常常是随意的一个场景,文章的结尾也可能“无疾而终”。例如:在《天上的冰峰》中,开头写:“我和一些人站在一个地方紧张地张望。我知道出大事了。是什么事呢?不知道。”小说开头没有交代这个地方是哪里,而且后文也没有说明,文中“我”的身份是什么?我为什么来到这里?读者全然不知,知道的只是文中“我”面对一座冰峰的恐惧和无奈的情绪状态。

再者,小说作为一种叙述故事的文体,其语言特点通常是叙述,突出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但在张鲜明的小说《寐语》中,叙述语言与散文体的抒情语言并存,文中优美的文字、深邃的意境,使小说体与散文体完美结合。如《它想到天上去》中,“它苦撑着,努力保持鸟的架势。它的翅膀在空中漂浮着,

收稿日期:2017-02-20

作者简介:化红丹(1993—),女,河南商水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5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河南当代小说。

做出羽翼丰满的样子。可是,我知道,它只是一张照片。由于像素太低,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张透明的棉纸,软塌塌地挂在天上”。《蛇的表演》中,“一望无际的荒草,像洪水一样掀起连天的浪涛,朝我涌来……”《拯救黑暗》中,“这地方像是山顶,又像是高空。我的脚下,远远的,有一片深渊,像大海一样汹涌着、鼓荡着,隐隐传来轰隆轰隆的水声”。小说中这些带有抒情意味的比喻句,为全文奠定了抒情的基调,文中“我”的内心状态不是通过其他人的视角得以展现,而是通过这些景物的刻画和描摹于无形之中抵达最真实的感受。

(二) 小说与诗歌的融合

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其表现出的特点是语言简洁利落,语句短小精悍,在精简的语言中表达深刻的思想,重在意境的阐发。张鲜明的小说《寐语》,明显有诗歌的味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小说中穿插诗歌文本,诗歌与小说相结合。如《在脚窝里尖叫》中,小说中间插入现代诗歌语句:“我的脚窝很深/我在我的脚窝里/尖叫。”用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表达了文中“我”面对自己脚窝时那种惊奇的心情,无法用一般的语言来描述“我”当时内心的惊讶,惟有借助诗歌来抒发内心的情感。

再如《划着划着》中:“一个梯子,直直地通向天空,就像一条投射在虚空中的影子/我沿着梯子一步一步往上去/蹬着,蹬着,突然,梯子跑了/我悬在半空中/举目四望,一片苍茫……”这篇小说可看作是一首现代诗歌,采用分行的写法,用诗歌的形式来叙述我的经历,这样的叙述形式给读者一种新鲜感,同时把“我”失去梯子悬在半空中的心境通过诗意的方式表达出来。

二是小说中融合了现代诗歌的思维方式。现代诗歌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跳跃性的、抽象化的、充满张力的、具有想象力的,现代诗歌的思维方式对小说文体的渗透使得小说表现出意念化、抽象化、意象性抒情和意象性情境的营造等文体特征。

《寐语》在抽象化和荒诞色彩的描述中,蕴含着强大的思想张力;在其陌生化的情境叙述下,流淌着人们熟悉的生命感觉。例如,《在世界的边缘》中,“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身边有一棵大树。我知道,这树不是树,而是世界。我此行的任务是,找到世界的边缘。”“一只很大的蚂蚁,慌慌张张地跑过来,以十分夸张的动作往树上爬。它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很深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它并不是为了上树,而是在点化我……”

文中描述的这种“这树不是树,而是世界”的神秘心境,或许每个人在孩提时代都有过类似的感觉。褪去成人时代的理性,回归到儿童时代的内心世界,“蚂蚁很深的看我一眼”及对我开口说话,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上述充满想象力及诗性的语句,让我们看到了《寐语》与其他小说的不同之处:在这些跳跃的、充满张力的语言叙述下,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感受到作者思想的辽阔和自由。

二、《寐语》的碎片化叙事特征

“碎片化”作为一个美学概念,主要表现为多样性、颠覆性、差异性和非中心的审美特征。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文化批评家詹姆逊,对“碎片化”的论述始于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他指出:后现代主义具有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碎片化”“零散化”“非连续化”,给人一种拼贴感,于此相应的是历史感的消失,以及内在和外在、本质和现象、隐义和显义、真实性和非真实性等模式的消失。在他看来,“温和地戏仿一切现有的风格,和把时间切割成一系列重复不止的现在时,是后现代作家常用的两大策略”^{[4]25}。同时,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也指出:“后现代社会里关于时间的概念,和以往的时代大不相同,这一现象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时间体验,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已经崩溃了,新的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5]40}

此外,荷兰文艺理论家佛克马在表述后现代主义文学时也曾提到,后现代主义打破传统文学分开头、中间、结尾三个部分来创作小说的叙事模式。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但却是对“碎片化”叙事方式的一种隐含表述。在他们的推动下,西方的叙事理论家在小说和戏剧等领域纷纷展开对碎片化叙事的探讨。

碎片化叙事作为《寐语》突出的叙事特征,是我们深入文本的又一个关键点。其中结构的碎片化和情节的碎片化是我们进行阐释的两个重要突破口。

(一) 结构的碎片化

就结构的碎片化来说,首先小说整体格局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寐语》中共包括120个小故事,故事与故事之间并无联系,每个小故事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每个故事的长短不一。

长的有几千字,例如《命运呈现》和《死刑》等,一般都是讲述与自己相关的奇特经历。如在《死刑》中,“我”因为考试作弊被判处了“死刑”,在“我”被执行死刑之前,“我”来到了家中,见到了

“我”的母亲和去世多年的父亲，然后又见到了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弟弟。就告别的场景，作者用了很长一段叙述。告别完后，“我”又开始琢磨怎么逃跑的事情，途中遇到和“我”一起舞弊的朋友，于是开始愤怒为什么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在不解中，文中的“我”终于来到了开头所说的被判处死刑的刑场。

文中最短的篇幅只有寥寥百八十字，例如《头盔与雕像》《卡住了》《谁赢了》等，往往是抽象地描写“我”与一个“物”的状态，透露出荒诞感，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空间。

如在《头盔与雕像》中，只有85个字，开头这样描述：“桌上放着一尊石雕头像，是北魏风格的，只有我知道，这是我的头颅。”接着就是结尾：“为了不让人认出是我的头颅，我在这石雕头像前放了一顶茶色玻璃头盔。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认为他是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就不会想到是我了。”此时，“我”与石雕头像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石头雕像是“我”的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又如《卡住了》，文中开头描写了“我”在空中漂浮着，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盘子，它卡在“我”腰间，“我”想把它带回去，但是又害怕吓到我的同事们，于是我只好在空中漂浮着。这时，“我”与“盘子”是互相吸引的关系，为了得到盘子，“我”宁愿保持漂浮在空中的状态。

再者，《寐语》中的每篇小说几乎都缺乏一个能够将整个文本联接起来的线索或者中心，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往往迷失在作者的梦境般的叙事片段中，甚至不知道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例如，在《赴宴的队伍》中，作者描写了“他”跟着一群人，每人拿着请柬去赴宴，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队伍停了下来，原来是有人发现请柬上并没有注明宴会的地点，谁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推测，作者将继续谈论寻找宴会地点的事情，但是作者笔锋一转，开始描写赴宴的队伍围在一起转起圈来，文中这样描写：“这样转着也不是个事儿啊，究竟要到哪里去？我很想站出来提醒大家，可是，激动了半天，啥也没有说。”“于是，我保持沉默，紧跟着前头那个人，专心致志地在广场上转圈。”

类似这样的故事段落随处可见，彼此之间缺少联系，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逻辑关系。这些碎片化的段落描写，如作者意识的流动，正所谓“兴之所至，笔之所至”。这让读者阅读起来困难重重，但却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思考和想象空间。

（二）情节的碎片化

就情节的碎片化来说，表现为情节的非流动性

和非顺序性。

首先，《寐语》选取“梦”作为叙事的场景，梦本身带有真实与不真实的交错感，梦中的故事带有片段性，作者讲述故事的方式不是线性叙述，而是梦幻的拼凑相接。这种叙事的非连续性，时空的跳跃和倒错，都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再者，梦境中的时间顺序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顺序是不同的。

就《寐语》的情节来说，不再是传统小说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不再按时间顺序的流动，也不再是事件与事件的接连发生；而是由散乱的“碎片”组成，情节的碎片化破坏了叙事的时间逻辑，在不同碎片之间建立起空间化的网状联系。而空间化的网状联系主要是由文中的意识流手法所建构起来的，意识流写作强调自由联想等意识的跳跃与无序，青睐于对各种瞬间印象和感觉的描绘。可以说意识流叙事将情节表现为一幅幅随意组合的画面，而非动作之间的连续性和因果关联。

例如，在《突与围》中，小说开头这样写到：“前方有一座房子，石头的。我看见我的身体是一个透明的长方体，正在朝那个石头房子冲过去。”这开头很具有现代主义意味，充满想象力和荒诞感。接着作者又这样描写：“这个透明体其实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我的精神体，它是柔软的，有水的质感，却又能以一种形体的方式独立存在。它朝石头房子冲击的时候，就像一根正在移动的巨大桁梁，很有力度。”此刻，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画面，精神拥有了形态和质感，变得可以直观化。

又如，在《不知道往哪里去》中，小说开头这样描述：“在一个地方吃过饭，回去的时候，发现我的皮包忘在饭店里了。我回去拿的时候，忘记了刚才吃饭的房间号。我乘坐电梯向上去，却不知道要在哪个楼层停下来。”

故事的开始充满不确定性、迷茫、彷徨。这样的开头给小说定下了一个基调，即寻找的基调。然而小说中的“我”到了丢失皮包的楼层，看到了一只花猫，文中这样描述：“它看着我，我知道，我一伸手就能把它打死。于是我用一个像书本那样的东西朝它扇过去。猫飞起来，像个慢镜头，撞到墙上，死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打死它，就感到有些悔意。”接着“我”又开始了迷茫的寻找历程，但到最后我连自己身在何处都不知道，只是四顾茫茫地站着。这些片段性的故事和感觉，都是文中情节碎片化的一种展现，是现代主义对现实的发现和凸显，这种面对现实的方式是属于心灵的、精神的和感觉的。

最后，通过碎片化的叙述，作者想为人类寻求一

种突破现实压抑的方法,在阅读的过程中使读者产生震撼。小说结构及情节的突兀性、荒诞性,能够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充满好奇和惊讶的感觉。因此,现代主义小说虽然没有再现现实生活中惊心动魄的事件,但依然发挥着让人震撼的功效。

三、结论

跨文体和碎片化作为张鲜明小说《寐语》的叙事特征,体现了作家本人娴熟运用各种叙事技巧的能力。

跨文体作为一种文体的创新,并非是单个文体类别的堆砌,而是各个文体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小说《寐语》中的散文气息和诗化意境,不是我们能够随意进行剥离的,而是意境、诗性与小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它们不再是单个的味道,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佳品。

小说中碎片化的叙述方式体现了作家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观察与感悟,呈现着作者丰富的多重的精神世界。作为一种艺术方式,碎片化叙事和跨文体写作也并非只是形式问题,形式毕竟是内容的形式,

因此,对张鲜明小说形式的探讨也是对其内容的探讨,内容的变化势必造成形式的变化。张鲜明对其小说进行形式的多样变形,无非是要服务于文本内容的阐发,这为其个人化的表达建立了一个特色的通道。

参考文献:

- [1]陶东风. 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 [2][法]米歇尔·福柯. 什么是作者[C]//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王岳川,尚水,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3]耿占春. 小说与负面经验·主持人语[J]. 大家,2016(4).
- [4]刘建华. 危机与探索:后现代美国小说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5][美]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唐小兵,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cross Genres and Fragmentation: Narrative Art of *Dreamspell*

HUA Hong – d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Dreamspell* is a difficulty to categorize, across genres and fragmentation are its two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art. Across genres mainly embodies in a clever union of novel, poetry and prose; Fragmentation not only reflects in the novel structure and plot, but also the pieces of fragments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in this paper, so this is the unique narrative form in Zhang Xianming's novel *Dreamspell*. Studies on these two aspects of Zhang Xianming's novel can help to dig the author's unique writing style and grasp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novel better.

Key words: *Dreamspell*; across genres; fragmentation

《寐语》:叙事的意象化与碎片化

乔德敏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河南作家张鲜明的小说新作《寐语》,以梦境叙事为基本结构框架,在小说形式上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因果叙事和线性叙事。小说通过意象化的空间营造以及碎片化的叙事,传达了知识分子个体在都市生存的认知焦虑及身份危机。而意象化的空间营造多由身体意象所搭建,一些反复出现的身体意象具备了符号化的观照意义。诸多意象的非理性、荒诞性特征对应了现代人丰富驳杂的心理流动。

关键词:意象;身体;碎片化;身份焦虑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0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19-03

一、叙事的碎片化与个体的内心世界

2016年,生活在中原多年的诗人张鲜明,开始了跨界写作,他的小说《寐语》在《大家》2016年第4期小说栏目头条刊出后,引发了不少反响。

对于成熟的作家而言,由一种文体转向另一种文体,不仅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重新分配,更是对艺术传统的超越,包含着表达个人意识的诉求。既成的语言秩序与身份标识对作家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及作品本身的生成性都易构成遮蔽,使其陶醉其中,难以自拔。而对自觉性与现代性有着特殊诉求的作家,会努力挣脱传统与定势,直面创造与更新,“跨界”无疑成为他们抗争“宿命之路”的艺术抉择。

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广为影响,个人无意识与创作活动在现代文学谱系中被紧密地联系起来。个人无意识是沉淀在个体内心最深处的经验,在日常现实中被意识和理性所压制,而梦境恰是个人无意识获得释放的出口。在意识流小说家的笔下,跳跃性的意识流动成了作家们努力捕捉和呈现的内容,而在侧重心理分析的小说文本中,作家往往以梦境的楔入作为勘察个人无意识的路径。

在《寐语》中,梦境内容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基本

框架,梦境的片断性、非逻辑性、去情节化,得到了集中的呈现。比如,小说开篇写卖器官一事:“灯,依次亮起来,我看见两边的墙壁上钉着一个一个的人体。”“一个大胖子迎面走来,他顺手在墙上一个人的胸口处抓了一把,是一块血。他捧着颤动的血块,像吃巧克力那样吃起来。”^[1]

这种非现实的场景描写透出非理性和荒诞的色彩,类似这样的场景细节,在小说文本中随处可见。这场景虽然令人惊悚,但却符合梦境叙事的逻辑,非日常经验击碎理性链条,恰恰符合个人无意识流动的特性。真实与虚幻,现实与梦境,看似两个世界,却有一个媒介,那就是人的内心。日常状态下,人的思维从未停止流动,人的梦境属于潜意识层面,潜意识蕴含着内心的隐秘性真实,它的活跃度不亚于理智活动。如同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无意识构成了“精神活动的真正实际”。不论是医学、生物学还是心理学,对于梦的探索和解释都层出不穷,梦作为人睡眠中大脑活动的印记也好,入睡前的情绪也罢,其实我们记录、分析梦的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人自身的关注。

《寐语》中,尽管存在着个别意象的重复出现,但更多的则是梦境之间的陌生化。张鲜明以实录的

收稿日期:2017-02-25

作者简介:乔德敏(1991—),女,河南商丘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5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方式记录了这些梦境内容,如同在一个平面上立起的形状各不相同的实体。每一个梦境对应了一个叙事的碎片,连缀这些碎片的则是个人无意识的隐秘逻辑。碎片化叙事的推进方式,将一个个梦境的棱角准确地呈现出来。诸多梦境内容对应着人性中难以用道德意识加以命名的内容,它们触及到人性的黑暗区域,攻击性、占有欲、破坏欲、本能性恐惧等等个人无意识中的深层内容得以传达。如同斑驳的镜面,一方面照射出人性深处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将现代个体的认知焦虑和身份危机感充分表现出来。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论述,在现代性中,主体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充满了风险,现代生活和个体决策所经历的转换的每一个片段都倾向于变成一种认同危机。这种危机常常伴随焦虑——由于与客体世界的建构性特征相关的自我认知变得模糊不清,这种焦虑感会影响自我的认知。

二、身体意象的符号化

进入消费文化的语境之后,身体文化和身体研究成为文学书写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人作为体验这个世界的敏感主体,其身体被赋予更多的含义。被道德意识遮蔽的身体开始在小说世界里充分苏醒,身体不仅是肉体,它更是有灵魂和尊严的主客体的统一。

最初发端于《周易》的身体符号系统,无疑是区别于意识哲学的,具体地连结着人的生命。中国哲学中,用“身”“体”“形”等不同的术语来指称身体——一种活生生的、感觉灵敏的、积极活跃并且富有意图的身体。^{[2]10}“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基本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的身體哲学,融身心于一体,人与文于一体。在哲学家看来,身体作为人的存在而存在,与灵魂独立并列;文学家眼中的身体是一种符号的表达;在社会学家那里,身体蕴含了更多身份、秩序、伦理和精神……由此打开了从身体的缺席到身体全面觉醒的时代。文学中对于身体意象的书写,不仅仅是身体的复归,更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

小说《寐语》中,作家将肉身以扭曲变形的方式加以充分地符号化。在梦里,灵魂摆脱了束缚,灵魂赋予身体各个部分以生命。如《跟绳子一起尖叫》中,绳子之所以大声喘息和杀猪般的尖叫,原来它是一个人的灵魂。柏格森在他的生命哲学中,把生命冲动看作是世界的本质、万物的根源。抛开《寐语》的具体内容不谈,仅从一个个小题目,如《脑袋压得身体哇哇大哭》《用脑袋照亮世界》《脸的穿越》《灵魂说:我要回家》等,都可以看出:人的器官是作为

被肢解和分离的个体独立存在的。《生活在〈红楼梦〉里》中,城是由七个器官组成的,肠子便是街道,它们都具有了自己的行动力和思想,宛如一个个生命体的真实存在。

在20世纪以来的身体美学中,“身心一体观”认为,人的手脚、脾胃、肝脏,四肢和五脏六腑也应有它的灵魂,我们应给予其重视和关注。

“身体意象”这一概念,是1935年澳大利亚神经学者保尔·谢尔德(Paul Schilder)在其著作《人体的意象与外貌》中首次提出来的。他认为,身体意象是个体对其身体的知觉、观念和感受,是一种受到个人因素、生物特质、过去经验、文化与社会价值的影响而改变的主观经验。^[3]在人们无意识的心像来源中,有些很重要的材料来源,就是孩提时期的经验和近期生活事件。

张鲜明在创作谈中说:“在梦中,我亲眼看见了自己的灵魂……在梦中,我总是逃跑,总是那样的惶恐和悲伤,我知道这是我小时候那个被吓掉的魂儿在逃跑、在惶恐、在悲伤。”^[4]这应该是对梦的由来最真实最有力的说明。灵魂冲破了理性的束缚,创造和演绎另一种人生。作者也说,《寐语》略等于纪实,梦境乃人生的曲折反映。无须过多揣摩它的内容与真实,也无须划分它的题材和风格,或者探讨它的象征与意味。作为一部记录梦的作品,《寐语》有着独特的形式意味,或者说“有意味的形式”。不仅是视觉冲击,心灵震撼,作品中大量超乎正常的意象的出现和排列组合,显然也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在《寐语》中,梦的想象力空前张扬,“看到清湛湛的水,我心头一爽,突然冒出一些诗句:我的心是丝线,河流是鱼,我在钓鱼”。这句话让人惊叹,难怪叶芝曾言:“我们似睡似醒的时刻,那是创造的时刻,它用迷人的单调使我们安睡,同时又用变化使我们保持清醒。使我们处于也许是真正入迷的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从意志的压力下释放出心灵。”^{[5]189}普列斯纳也说:“人意欲着和期望着,思考着和想象着,感觉着和信仰着,为自己的生命担忧着,在这些活动中,他不断认识自身的完美性与达到它的可能性之间的距离。”^{[5]189}

在作者张鲜明的笔下,小镇、土墙、土坷垃并非是作者全然陌生的事物,对包子店的寻找,对教室的寻找,以及对房间的寻找中,到处弥漫着慌张与无奈,“我”不是一个释梦者,况且梦是属于个人的独特呈现。在《我是如来佛左脚前头排行第二的弟子》中,尽管到处是寒冰、戈壁和高山,“我”就要饿死了、累死了,感到无限恐惧,仍然往前走,去寻找自

己的座位。这也是所谓“愿望的达成”。

在中国古代文化意象中,物象总是联结着心象的,物不单单是一个物体,它还承担着文化符号表征的功能。《寐语》中出现了一系列高频词汇,如房子、石头、影子、门、灵魂、意志、路、水等,即使是在梦里,它们也绝非是一个词汇、一个意象那么简单;尽管作者笔下的情节是非常态的片段,但仍然可以由这些系列物象的营造来观照作者的内心诉求。比如,山脚下那个没有房顶的石头垒成的房子,乡下遍地的土坷垃,走在镇上的小路上寻找自己要去的地方,要找的东西,所有这些又是那么真实;村里的玩伴、工作中的同事、某处场所,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再比如,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梦到自己考试不及格或者奔赴考场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在张鲜明的《考试》中,“钟表显示,此时离规定的入场时间晚了整整十分钟!”“跑到考场门外,我突然想起来,忘了带考试必备的东西:2B 铅笔,还有演草纸等等。天啊,我什么都没有,怎么考试?!”同样是有关迟到的情节也出现在《找不到教室》中,“八点钟上课,现在已经过点了!”“学校就在前头那个山包上……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往上爬”,“这时候,我突然停了下来:我的教室在几楼?是哪个教室?”

这些熟悉而又不可思议的事件,该怎样解释呢?这里的意象,绝不是凭空产生的。

在原型理论的奠基者荣格看来,原型是人们生活的遗迹,是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意象中蕴含着生命事实,可以说它们都像一个个代码一样有着自己远古时代赋予的意义。

前面已经提到高频词汇之一的“门”,《投胎》中的玻璃房子,没有墙壁没有房顶,“我”看见一个门框,门楣上写着庄重的字,含义是“天堂”。《挤压》中,“我”站在门框前,另一扇门扑上来把“我”挤压在两扇门中间。《进不去的门》中,“这是我小时候见过的生产队那个磨坊的门。没有门扇,只有门框。……我要进去。可是走到门口,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向外推。……明明是个门洞,怎么就进不去呢?我后退一步,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往门里冲”。

而“门”这个简单的语词,作为一个意象,在中国文学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从时间意义上说,自然的物象要比文明的物象久远得多,但文明物象也同自然物象一样随着人类的历史循环往复,积淀于人类的心灵世界……。”^{[6]226}

学者傅道彬在《晚唐钟声》里,有对“门”的探讨,门是家园,是防卫和守护,是一种地位和身份,当然也有拒绝和介入之意。有关“门”的意象,积淀下

来的文化母题有:倚门而望——等待的呼唤;长门怨——爱情的呼唤;空门——解脱的呼唤;闭门——逃避世俗与人群、追求诗意的闲适等。

虽然我们无法科学地精确地掌握人类的意识活动足迹,无法解释无意识的内涵,但却必须承认无意识下具有的意识流动。每一个意象都不是天然生成的,在时间的长河中它们传达出了人们的意愿和诉求。这种无意识,大量沉淀于意象中,又被意识化作符号来传达某种象征。

三、内在关怀

《寐语》从个体无意识经验出发,通过一系列身体意象的书写,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极大关注,彰显了作者的内在关怀。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占据主导地位,在日益紧张和快速的节奏下,人们变得焦虑不安。这种焦虑不安源自精神家园的丧失;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的精神无所归依。迷茫和焦虑中的现代人需要寻找自我,以摆脱现代都市生活中个体的身份危机。

张鲜明的小说不从现实出发,而是着眼于日常生活的另一极——梦境,在荒诞的书写中,表现对生命的别一种观照。梦境、荒诞、意识流,恰恰能反映人内心的深层次领域。在《我与“我”》中,“我”站在“我”面前,他们从形象、地位和为人处事方面都极为不同,这让梦里的两个不同主体之间产生了差异和疑问。现实中我们是很少审视自己的,也许在梦里才会见到让自己感到陌生的另一个自己。

在人的灵魂深处存在着一种情结,也可看成是一种内在驱动力,在我们的意识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人的身体与情感、潜意识与行为,有着复杂的关系。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人的身心都陷入了压抑的状态,一方面人们在公共领域里用理性来规约自身,另一方面通过冒险来寻找自由和刺激。张鲜明的小说从个体经验出发,表达了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关注。这表现为小说中处处弥漫着生命力的非理性张扬,让读者感到现代人内心的焦灼、分裂和挣扎,及生命强烈的内在冲动。作者在“创作谈”里讲:“在梦里,人性是裸露的,它无遮无拦,坦露无疑。”^[4]《寐语》透过荒诞的情节和惊悚的意象,凸显了荒诞的效果,也是对现实压力和束缚的挣脱。

意识流小说家威廉·詹姆斯认为,身体处于人的经验中心,是经验的感受媒介,“身体是集中点,是坐标的原点,是整个经验系列中的重点位置。一切事物都环绕在它周围, (下转第 51 页)

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外溢渠道机理及模型分析

朱 涛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商学院,河南 新郑 451150)

摘 要: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具有外溢效应,本文首先从专业化分工、产业链以及价值链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然后运用 Feder 动态外溢效应模型对外溢效应渠道进行分析,运用 Marrewijk 模型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创造的内生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的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增强规模经济,专业化报酬递增,拓展产业链等方面来实现的。

关键词: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外溢渠道;机理;模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05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22-06

一、文献综述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建设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它贯穿于整个农业生产链之中,以农业和农业生产者为服务对象,是一个为农产品生产提供中间投入服务的融合行业。从产业细分角度,其包括农、林、牧、渔业服务业;从产业链条角度,其包括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产前服务发生在农业生产链条的上游,处于准备阶段,主要包括农业产前信息提供,农业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良种、化肥、农药研究及供应等;产中服务发生在农业生产链条的中游,主要包括产中技术辅导服务、产中信息咨询以及农业保险服务等;产后服务发生在农业生产链条的下游,主要包括存储、加工、质检、运输、销售等。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附加值、延伸农业外部功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外溢效应。在服务业对农业的改造方面,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

工业化、制度变迁、资本积累等都促进了传统农业的改造,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农业、工业、服务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社会,服务业在传统农业改造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约翰·梅勒(1958)指出,技术进步是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Yujiro Hayami 和 Vernon W. Ruttan(1970)提出“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解释了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法。姜凌等(2011)通过理论研究发现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为农业提供高科技、信息化服务等方面。对于中国传统农业改造的研究,潘锦云等(2011)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新旧农业生产要素对改造传统农业的影响。在服务业对农业发展的外溢效应研究方面主要是实证研究,Postner H. Harry(1982)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消耗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这表明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的影响在逐步增强;Kenneth A. Reinert(1998)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要素对于农业的积极影响;全炯振(2009)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增长主要源于农业技术进步。匡远凤(2012)运用随机

收稿日期:2017-04-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的溢出效应、机理及路径研究”(14BYJ222)

作者简介:朱涛(1972—),男,河南柘城人,博士,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教授,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与公司成长。

前沿方法对我国 1988—2009 年的省份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的共同作用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陈笑艳(2014)通过证明广东省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生产率提高有积极作用,并指出农资配送服务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郝爱民(2011)通过对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效率提升、农民增收等有重要作用,研究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生外溢效应的重要渠道。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取得了较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如何促进农业的发展,其外溢效应的溢出渠道有哪些、外溢机理是什么等问题仍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外溢效应的理论分析

从专业化分工角度来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一个细分方向,将现代服务业作用于农业,其对农业外溢效应的基本动力是专业化分工,分工产生的学习效应能不断提高各个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一方面降低了提供服务的成本,起到规模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农业产业链的组成部分,也对农业发展产生了规模经济正的外部性,降低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流通成本。

从农业产业链的角度来讲,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贯穿于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个环节,产生的协同效应能使农业生产的交易成本较大幅度降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能促进农业产业链的产品输送及信息反馈,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链的优化发展,大大降低了产业链中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现象,减少了农业生产、销售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从价值链的角度来讲,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农业的辅助性增值活动。首先,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农产品增值流程的优化,使农产品增值过程的程序化程度增强,降低价值增值的成本;其次,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创新产品、提高科技水平,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最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关联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服务业和农业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实现共同发展。

通过对上述三个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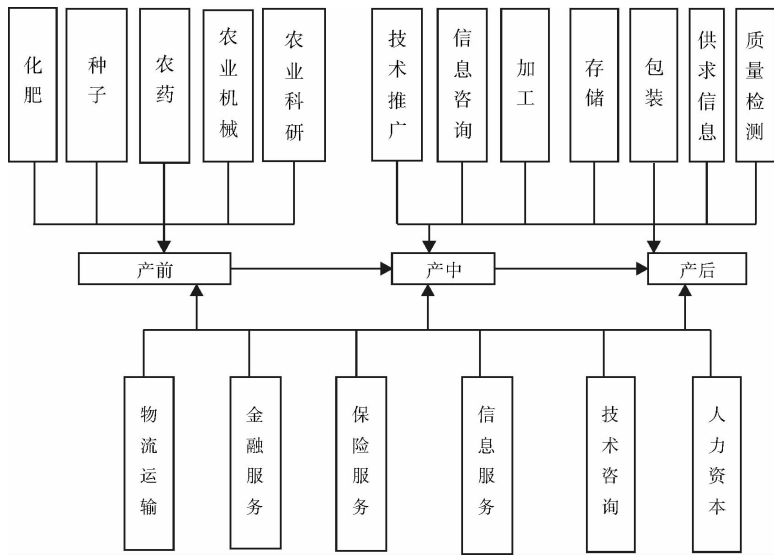


图 1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农业产业链中的功能分布图

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溢出效应的模型分析

(一) 外溢渠道分析——Feder 动态外溢模型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产业链条上不同地位的厂商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只有同一产业链中的不同厂商优势互补,不同环节之间发挥协同效应,才能实现产业链的收益。在农业的产业链中,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的溢

出渠道是什么呢?

菲德(1982)认为出口贸易对整体经济增长具有一定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并在一定假定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两部门经济的生产函数来衡量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程度。本文借鉴菲德模型,构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通过推导得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农业的外溢效

应。

假设:1. 第一产业由农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两部门构成;2.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具有外溢效应;3.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的影响弹性不变;4. 两部门间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存在差异,并且差异值相等。

两部门的生产函数:

$$Y = A + S \quad (1)$$

$$A = A(K_A, L_A, S) \quad (2)$$

$$S = S(K_S, L_S) \quad (3)$$

$$K_Y = K_A + K_S \quad (4)$$

$$L_Y = L_A + L_S \quad (5)$$

Y :第一产业总产出,单位:元; A :农业总产出,单位:元; S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总产出,单位:元; K_i : i 产业的资本投入,单位:元; L_j : j 产业的劳动投入,单位:元。公式(1)和公式(2)分别符合假设1和假设2,公式(2)说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具有外溢效应。

分别对公式(1)、(2)和(3)求全微分,结果如下:

$$dA = \frac{\partial A}{\partial K_A} dK_A + \frac{\partial A}{\partial L_A} dL_A + \frac{\partial A}{\partial S} dS \quad (6)$$

$$dS = \frac{\partial S}{\partial K_S} dK_S + \frac{\partial S}{\partial L_S} dL_S \quad (7)$$

$$dY = dA + dS \quad (8)$$

公式(6)中的 $\frac{\partial A}{\partial K_A}$ 表示农业的资本边际产量和

$\frac{\partial A}{\partial L_A}$ 表示农业的劳动边际产量, $\frac{\partial A}{\partial S}$ 表示农业对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的边际产量;公式(7)中 $\frac{\partial S}{\partial K_S}$ 和

$\frac{\partial S}{\partial L_S}$ 分别表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本和劳动的边

际产量。

依据假设4,设两部门间相等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值为 δ ,则两部门要素边际产量间的关系如下:

$$\frac{\partial S / \partial K_S}{\partial A / \partial K_A} = \frac{\partial S / \partial L_S}{\partial A / \partial L_A} = 1 + \delta \quad (9)$$

$\delta < 0$ 、 $\delta = 0$ 和 $\delta > 0$ 分别表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小于、等于和大于农业的要素边际生产率。

对公式(4)和公式(5)进行微分得到:

$$dK_Y = dK_A + dK_S, dL_Y = dL_A + dL_S \quad (10)$$

由公式(9)可得

$$\frac{\partial S}{\partial K_S} = (1 + \delta) \frac{\partial A}{\partial K_A} \frac{\partial S}{\partial L_S} = (1 + \delta) \frac{\partial A}{\partial L_A} \quad (11)$$

将公式(10)和公式(11)带入公式(8),整理得

$$dY = \frac{\partial A}{\partial K_A} dK + \frac{\partial A}{\partial L_A} dL + \frac{\partial A}{\partial S} dS + \frac{\delta}{1 + \delta} dS = \frac{\partial A}{\partial K_A} dK + \frac{\partial A}{\partial L_A} dL + \left(\frac{\partial A}{\partial S} + \frac{\delta}{1 + \delta} \right) dS \quad (12)$$

根据假设3,设不变弹性为 γ ,则

$$\gamma = \frac{\partial S}{\partial A} \frac{A}{S}$$

变换得

$$\frac{\partial A}{\partial S} = \gamma \frac{A}{S} \quad (13)$$

将公式(12)两边同时除以 Y ,再将公式(13)带入得

$$\frac{dY}{Y} = \frac{\partial A}{\partial K_A} \frac{\partial K}{K} \frac{K}{Y} + \frac{\partial A}{\partial L_A} \frac{dL}{L} \frac{L}{Y} + \left(\gamma \frac{A}{S} + \frac{\delta}{1 + \delta} \right) \frac{dS}{S} \frac{S}{Y}$$

整理得

$$\frac{dY}{Y} = \frac{\partial A}{\partial K_A} \frac{\partial K}{K} \frac{K}{Y} + \frac{\partial A}{\partial L_A} \frac{dL}{L} \frac{L}{Y} + \gamma \frac{A}{Y} + \frac{dS}{S} + \frac{\delta}{1 + \delta} \frac{S}{Y} \frac{dS}{S} \quad (14)$$

在公式(14)中, $\frac{dY}{Y}$ 、 $\frac{dK}{K}$ 和 $\frac{dL}{L}$ 分别表示第一产业

的增长率、资本的增长率和劳动的增长率。 $\frac{\delta}{1 + \delta} \frac{S}{Y}$

$\frac{dS}{S}$ 反映的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第一产业的直接

影响, $\gamma \frac{A}{Y} \frac{dS}{S}$ 表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农业对第

一产业的间接影响。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农业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影响第一产业影响农业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直接影响农业发展。

综上可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的外溢效应来自其自身的发展对第一产业作出的贡献和直接对农业发展产生的影响。农业生产周期长、过程复杂,需要投入多种资源和技术才能完成,而农业生产者不具备多种资源和多种技术,加上农业生产性服务相关的资源和技术资产专用型程度较高,农业生产者进行投资成本过高,因此更多的选择外包。外包,一方面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而壮大了第一产业;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提高了相关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农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间的配合完善了农业产业链,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产业链的营利能力,促进了第一产业的发展。

(二) 内生比较优势:基于 Marrewijk 模型的分析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规模经济 and 专业化报酬递增两方面。规模经济是指,在一个生产函数中,在所有投入要素水平增加比例相同的情况下,随着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多,产出增加的比例更大,对固定成本分摊的更多,平均成本更低。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专业化报酬递增是指,平均劳动生产率随着经济活动的专业化水平上升而提高。在第一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模经济 and 专业化报酬递增,本文中体现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的壮大和分工的深化。

专业化程度的增强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农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专业化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剥离那些不擅长的业务,从而使市场资源配置得到优化。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包也是农民规避投资风险,降低专用型资产投资的结果,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增加了竞争的灵活性(郝爱民,2013)。农产品从种子变为商品,其成本由两部分构成,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专业化程度的增强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通过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节约农产品生产、销售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同时也是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延伸和拓展,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种子、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科技研发、信息服务、物流、运输、储存、包装、销售等专业化服务,我们称之为农业生产者服务集合体。本文通过简化的 Marrewijk 模型来论证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形成的第一产业的内生比较优势,也就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怎样创造内生比较优势,及其外溢效应和作用机制。

假设:1. 第一产业存在若干生产最终产品 P 的厂商;2. 生产 P 产品需要投入劳动(L)、部门专用性资产(K)和农业生产性服务集合体(H);3. 产品 P 的生产保持规模经济不变。

上述三个假设可表示为(科布—道格拉斯函数):

$$P_i = AK_i^\alpha L_i^\beta H_i^\delta \quad (15)$$

在公式(15)中, A 为常数, α 、 β 和 δ 分别为 K 、 L 和 H 的产出弹性系数,且 $\alpha + \beta + \delta = 1$ 。由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异质性、知识密集、信息密集等特征,因此本文假设各个服务业根据其规模和资产专用性程度不同存在不同的垄断经济。假设在投入一定固定资产后,生产某种服务只需投入服务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即可,并且要素边际成本保持不变,那么可设 H 的生产函数为:

$$H_i = H_i(S_i, L, S_j, L, S_n) \quad (16)$$

在公式(16)中, S_j 表示某种生产者服务, L 表示劳动力的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集合的生产函数进行简化,假设 S_j 和 H 是分离的, S_j 的生产函数完全相同且在 H 中的地位是对称的(许德友,2008)。综上, H 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H = \left[\sum S_j^\theta \right]^{\frac{1}{\theta}} \quad (17)$$

其中, $0 < \theta < 1$ 。 S_j 的成本函数可表示为:

$$C(S_j) = wS_j + wF \quad (18)$$

其中, w 表示单位劳动力的工资与 H 的比值, F 表示生产 S_j 所需要的固定成本。

S_j 的生产函数相同,在 H 中的地位存在对称。即,对于生产服务投入品 $X_j = m, j = 1, 2, \dots, n$,其总量为

$$X = \sum_{j=1}^n X_j = nm \quad (19)$$

根据公式(19),公式(17)可简化为 $H = n^{1/\theta} m$ 。因此, H 的全要素生产率为:

$$\frac{H}{X} = n^{\frac{1-\theta}{\theta}} \quad (20)$$

已知 $0 < \theta < 1$,该式表明在既定资源下,当 n 增加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率也会提高。也就是说,在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创造了农业的内生比较优势。 n 的增加也就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从而创造了内生比较优势。可以预见,随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其创造的内生比较优势将增大。

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外溢效应的具体体现

通过对 Feder 动态外溢模型和 Marrewijk 模型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的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其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促进农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由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从而创造的内生比较优势。专业化程度的增强是农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 提高生产率,增加农业收益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于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阶段,其发展提高了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第一,种子、化肥、农药、农业科研等部门的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基础,为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增质、增产、增收提供了动力,是农业取得跨越式发展的决定力量;第二,农业机械、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增加了农业规模经济效益;第三,物流、运输、仓储、

包装、供求信息等部门的发展提高了农业产后的产业链价值流通速度,减少了粮食的浪费,质量检测等技术的发展保证了粮食生产的质量,提高了合格粮食从产出到消费的效率,加快了市场流通速度。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性推动力量,只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充分融合,才能实现规模经济的效率和效益最大化。

(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业化水平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出现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农业从业者的风险和农业的总体风险,降低了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各个部门相互配合的协同效应使农业产业链中的价值流动更加顺畅,提高了农业的产业化水平。首先,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出现不仅消除了农民对农业机械、技术服务等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风险,而且降低了相关资产的闲置成本,节省的资金可以投入到种子、化肥等多个方面,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其次,种子、化肥、物流、咨询服务等部门专业化的增强不仅大大降低了农民的信息搜集成本,而且减少了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现象造成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行为,有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促进市场竞争,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再次,农业供求信息、物流运输等部门的发展理顺了农业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产业链,提升了市场交易效率;最后,金融服务、保险服务、人力资本等部门的发展在农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不断发挥作用,不仅节约了农业的融资成本、人力成本,而且在农业的整个链条中为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拓展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

传统的农业生产和消费以原始农产品为主,粮食的价值从农民转移到消费者手中,没有形成价值链,价值的交换和流动更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观念,也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拓展了农业价值链。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产业链的拓展是从深度和长度两方面进行的:从深度来讲,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包装、品牌塑造、质量检测等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拓展了价值链的深度;从长度来讲,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传统农业的重要补充,在农业的各个生产环节都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农业产出阶段,大大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壮大了农业的整体实力。以农产品深加工和特色农产品为例。农产品深加工一方面对农产品的生产提出了产业化的要求,逆向提高了农业规模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深加工赋予了更多的人力劳动和技术投入,增

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加了价值链的深度和长度。而特色农产品则是通过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检测、特色服务,或者赋予农产品一定的品牌价值,不仅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还逐步提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及产业化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1:基于 Feder 动态外溢模型的分析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不仅具有直接影响而且具有间接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将会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成本的降低将会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比如对农产品的收割和播种机械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价格的下降,必然带动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投入成本的降低。

结论2:基于 Marrewijk 模型的分析表明:在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创造了农业的内生比较优势。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从而创造了内生比较优势。

结论3: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农业具有外溢效应,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只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农业相互融合、相互协同,才能实现农业的飞速发展。

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现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积极构建面向农业生产链的公共服务。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薄弱,部分设施建设还不完备,因此需要政府提供一些面向农业的公共服务,即以政府投入为主,建立一些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需要的服务平台,如农业技术市场、农业综合信息平台、产学研合作平台、物流运输体系平台等。各级农技推广中心、种子站、农机站等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信息技术指导、培训服务。这种模式适用于一些农业企业规模小、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不具有吸引相关服务业企业进驻的规模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而且也无承担建设生产性服务业的巨额资金投入。政府主导建设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极大地促进当地农业发展。

第二,政府引导、扶持龙头企业。政府采用优惠的政策引进项目,一方面鼓励农户或农业企业积极使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包,降低农业的生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大力发展。为了提升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必须以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为突破口。采

取“龙头+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之路，是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必由之路。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经过发展形成了以订单农业和二次结算等模式为主的龙头企业，这种模式将处在最底层的农业生产与企业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有利于农业向产业化发展。这些龙头企业在政府的扶持下，与农户紧密相连，形成了生产的产业化，在外拓市场，内联农户，抵御市场风险，带动农民致富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了农副产品加工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起到外部拉动作用和植入效应。

第三，依托产地批发市场，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主体的崛起。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为实现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保障，对传统市场进行升级改造，使部分批发市场在设施、功能、交易等方面形成模范效应，以高效益、新科技、产业化为发展目标，促进农业的设施发展。农产品批发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引导功能，带动了周边农户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农机市场实行一体化经营引进农机售后服务站，方便广大农民或农机户。农机市场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另一方面为农民跨区作业提高收入提供了条件。

第四，依据农户需求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集中于种子、化肥、农药、病虫害的防治、田间技术指导等。这些服务的获得与市场上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企业或非营利机构密切相关。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的生产，保障农业生产的安全、放心。

参考文献：

- [1] Gerson Feder. On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2(12):59-73.
- [2] 潘锦云,汪时珍,李晏墅.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产业耦合的视角[J].经济学家,2011(12).
- [3] 姜凌,潘锦云.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研究[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4).
- [4] 周启红,谢少安,陈万卷.基于现代农业视角的我国农业服务业研究[J].调研世界,2010(2).
- [5] 全炯振.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1978—2007年[J].中国农村经济,2009(9).
- [6] 匡远凤.技术效率、技术进步、要素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基于SFA的经验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1).
- [7] 潘锦云,杨国才.现代服务业诱致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基于农业信贷影响农业总产出的视角[J].江汉论坛,2013(10).
- [8] 陈笑艳.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J].产业经济,2014(3).
- [9] 郝爱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财贸经济,2011(7).
- [10] 郝爱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的外溢效应与条件研究[J].南方经济,2013(5).
- [11] 郝爱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外溢效应和溢出渠道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6).
- [12] 格鲁伯·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和影响[M].上海:三联书店,1993.
- [13] 许德友.内生比较优势视野下的专业市场集群与政府作为: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Producer Services Spillover Channel Mechanism and Model Analysis of Agriculture

ZHU Tao

(School of Business, SIA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Zhengzhou University, Xinzheng, Henan 451150, China)

Abstract: Producer services have a spillover effect on agri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it from different angles, such as spe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industry chain and value chain, and then respectively uses dynamic Feder spillover 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he spillover effect channel, and uses Marrewijk model to analyze the endogenous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spillover effect on agriculture mainly by reducing both production cost and transaction cost, enhancing economy of scale, specializing increasing returns, expanding industrial chain, etc.

Key words: agriculture; producer services; spillover channels; mechanism; model

质量供给目标下农业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策略分析

漆彦忠

(许昌学院 商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摘要:质量供给既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立足点,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供给质量。农业供给质量主要体现为生产产品质量,而生产产品质量的提升与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组织密切相关。现阶段,完善各项农业政策措施、积极促进生产经营方式转型、建立健全产权市场、培育各种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实现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质量供给;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06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28-04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现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其中增加产能与提升品质的矛盾表现突出,亟需破解。农业质量是现代农业的本质要求,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提升农业生产质量,能有效解决“三量齐增”怪相以及产能相对过剩与质量型需求不满之间的新矛盾。不仅如此,质量供给的要求必然倒逼农业产品供给端生产方式与生产效率的改进,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型。因此,在现有供给侧存在的多种矛盾和问题当中,要素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和产能增加与品质提升的矛盾最为突出,前者关系到生产端产能与效率的有效调整,后者则与质量供给密切相关。探讨从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入手的供给侧改革路径,对于提升农业生产的质量与效率,激发农业内在发展动能有十分必要的意义。

一、质量供给侧改革及其目标设计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

跃升”,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本质内容:前提是保证总需求的增长,重点在于提高供给的质量与效率,核心是提升生产力水平。相关研究者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与目标进行了深入研究,如许经勇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李国祥则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主攻农业供给质量。^[2]这两个观点分别提出了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和质量供给侧改革的重心,与习近平提出的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提升生产力水平的思想不谋而合。

另有研究者从更为具体的角度思考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问题:孔祥智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个重点,分别为土地制度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粮食价格体制改革;^[3]姜长云等认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六个方面的重点,其中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是必然的过程。^[4]这些研究给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实施维度,即深化农地产权、农产品结构、各种农业制度措施等的改革,提升农业产业的市场化、规模化、社会化和品牌化效应。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证质量供给无

收稿日期:2017-05-06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农业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问题研究”(2016B169)

作者简介:漆彦忠(1979—),男,甘肃秦安人,硕士,许昌学院商学院讲师,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疑是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农业供给的质量方面牵涉到农业生产过程的全局和各个生产要素的结构与品质改善,对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农业领域内的“三量齐增”、农产品质量不高、新型农业主体持续经营能力低下、农业产业供给能力偏弱等问题,是当下新型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拦路虎,质量供给构成了各种矛盾的焦点。提升供给质量必然要从供给侧改革入手,而调整供给侧的各种结构,尤其是在生产要素领域内的结构优化,能够最大程度上保证农业供给的质量。

农业质量供给直接表现在供给产品的质量方面,在现代农业体系下,与农业服务质量、生活质量改善等方面的目标,构成现代农业质量供给三大目标。就农产品供给质量而言,尽管是针对农业生产最终产品提出的质量要求,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与农业生产过程的质量以及所介入的生产要素的质量密切相关。因此,产品质量供给的目标体系包括生产要素供给质量和各个环节生产质量两个子目标。农业服务供给方面,有研究者认为至少包含公共性服务、市场服务和第三方服务三个范畴,农业服务供给质量也应当包括这三个层面的供给质量子目标^[5]。在生活质量供给方面,现代农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型产业,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农业种植在获得人所需要的农产品的同时,也同时参与了生态环境的循环体系,并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农业质量供给体系包括农业经营方式质量、生态环境质量以及生活体验质量等目标。

二、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的质量供给意义分析

2016年10月,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介绍《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时指出,能否实现农业现代化,决定了今天和未来能否更好地保障老百姓吃饭,决定了我们能否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也决定了广大农民能不能同步全面进入小康社会。^[6]这一回答说明了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意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粮食安全、生产效率、可持续发展、现代生活品质等方面均有影响,在当前新型农业经营领域内“三量齐增”、农产品质量不高、新型农业主体持续经营能力低下、农业产业供给能力偏弱等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快速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找准突破口,其中,农业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是可行的方式之一。

生产要素理论是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建立了

经济运行和价值创造的基本模式。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生产要素理论形态有着重大差异,进而形成多元的生产要素结构。威廉·配第最早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由此形成土地和劳动两大生产要素。19世纪初期,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伊率先提出生产要素三元论,即土地、劳动和资本,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同样认为生产要素三元构成学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再次扩充了生产要素的结构,在原有土地、劳动和资本基础之上,从资本中分离出了组织这一因素,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由于知识和组织的公有和私有区别的日益重要,有时把组织分开来算作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似乎最为妥当”^[7]。20世纪60年代,我国学者徐寿波提出了劳动力、投资、物资和资源四个生产要素,80年代又提出劳动、生产必须同时具备的六个条件,即劳动人员、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环境、劳动空间和劳动时间。随后这六个条件被逐渐演化为六个力,即人力、财力、物力、运力、自然力和时力,构成了生产要素的六元理论,是较为全面的关于生产要素结构的解释^[8]。另外还有关于知识、技术等作为生产要素的观点,构成了生产要素庞杂的体系。生产要素结构的演变由简单到复杂,表明了经济发展与财富创造日益丰富化的过程。

生产要素对于生产能力与效率的重要影响毋庸置疑,但何种生产要素在何种条件下对生产过程产生最大限度的影响值得深究。生产要素的不同构成因素,其性质与作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既存在物质性的要素,如土地、自然力等,也存在能动性的要素,如劳动力、知识、技术等要素。此外还有一些生产要素具有极强的可变性,其作用能力主要由运作的过程和方式所决定,如资金、运力等。还有一些要素,其本身并不作用于生产产品,而是依靠其对各种要素的调配、组合以及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凸显其生产能力,如组织方式、管理能力等。由此,可以将生产要素至少分为物质性生产要素、可变性生产要素、能动性生产要素和可控性生产要素等四个类型,其中能动性生产要素最为活跃,在生产要素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王树祥等人提出知识经济时代“复合生产要素”的知识属性及其边际效益所产生出的“二次价值”问题,^[9]说明了知识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所产生出的新的价值创造能力,是一种“组合性生产要素”的典型代表。

粗略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不同

时期中生产要素的结构调整,基本可以看出不同生产要素组合模式下生产能力的改进机理。建国初期,物质产品极为缺乏,是典型的短缺经济,生产能力的改进主要依靠物质性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消耗来换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扩大了人们生产和消费的自主权,对物质产品和财富占有的热情被激发,但物质生产能力相对落后,农业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此形成了需求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可变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力被极大释放,尤其在市场化机制的推动下,带来了较大的生产能力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常规农业的不断成熟,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健康、绿色、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成为新的需求,农业供给领域内的问题日渐凸显,农业经济开始走向供给模式。这一模式下,原有家庭式生产主体较难作出突破性改变,生产者之间的联合以及对新技术的应用成为必然,能动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力得到表现。目前,我国农业经营方式正处在由传统家庭式生产向规模化经营的转型,能动性生产要素的功能还未彻底发挥,原有生产要素固化的组合结构还未完全打破,需要在能动性要素完全介入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生产要素结构,推动供给侧改革。现代农业是品质农业,农业的供给质量必将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质量供给目标下还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入可控性生产要素,进行宏观性和总体性的把控,最终推动质量供给的发展。

三、质量供给目标下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措施

农业生产要素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经济模式而进行结构性组合的。目前质量供给模式下,必须不断强化能动性生产要素和可控性生产要素的结构性占比,同时继续创造条件释放物质性生产要素和可变性生产要素潜藏的动能,在生产要素不断优化基础上,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一)完善农业配套政策,改革政策调节机制

农业政策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从质量供给侧的目标要求和农业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出发,目前亟需跟进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和现代化转型的配套政策,即积极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产权交易政策、有利于加快新型农民培育的与科技兴农相关的政策、支持新型农业外向化生产和产业联动融通的社会化服务等能够“加快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10]的政策。配套政策是对农业产业功能的扩展和延伸,配套政策的完善,不仅能够使农业产业自身快速发展,而且也能极大提升农业

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贡献能力,实现现代农业的真正使命。在各种农业政策完善的基础上,还应当不断改革农业政策调节的机制和作用方式,尤其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有关农业的产业政策处于引导、保障和兜底的地位,而不是处于支配和干预或者是缺位的状态。

(二)积极促进经营方式转型,准确定型可行模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在供给端,而农业供给的重心在于生产端,农业生产端的改革主要在于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通常受制于一定历史时期内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其中如何选择和组合农业生产要素则形成了一定时期内农业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革本质上仍然表现为农业各生产要素之间的选择和调配。哪些生产要素需要介入生产环节中,哪些要素在整个生产环节中又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等等,构成了生产要素的基本结构。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选择合适的生产要素结构,才能最终积极促进该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基本处于一种供给经济形态下,生产要素组合模式必须注重能动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力,同时要积极渗入可控性生产要素,推动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目前最为缺乏的就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能动性要素。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过程中,对于一些已经被广泛采用且具有现代农业发展潜力的模式,要积极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予以维护,加速示范和推广的效率。

(三)建立健全产权市场体系,激发各类要素活力

生产要素结构性改革还需要持续激发各个要素的活力,增强生产动能。农业生产中,通常要借助土地、资金和人力等生产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传统农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即使在现代农业时期,这些要素对于农业生产的作用始终难以替代。但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这些传统农业中主要生产要素的价值增长能力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现代农业要实现新的农业增长点,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不断加入新的生产要素,如知识、信息、技术等能动性生产要素的应用,或者强化管理、组织等可控性生产要素的参与能力;二是不断挖掘传统生产要素的潜力,激发其最大化生产能力。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出现正是这两种路径选择的结果,尤其是在以知识和信息为中轴的现代社会中,能动性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与此相对应的

是,传统性生产要素潜能的开发力度并不充足。因此,开放传统性生产要素的产权,不断拓展能动性要素的产权,将物化形态的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转变为土地产权、股权、人力资本定价权、知识产权等产权形式,建立健全产权市场体系,必将充分激发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带来农业生产新的增长点。

(四)培育各种农民经济组织,促进可控性要素增长

在农业生产要素结构体系中,目前还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是组织这一生产要素。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的组织主要是指由农民自发形成、自愿参加的,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互助合作的经济体。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纵向聚合与横向联合的双重作用。^[11]从农民内部来看,传统家庭式生产具有明显的分割性,农户之间相互独立,各自为战,在市场化模式下交易成本不断增大,生产中的“内损”极为严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将农民纵向聚合起来,形成一股合力,共同面对市场化风险,不仅提高了市场驾驭能力,而且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内损”。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出现在不同的产业和各个生产环节中,这种横向联合作用一方面强化了产业的分化,形成多种产业共同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极大地延长了产业链,为各专业化经济组织之间的联合创造了条件。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化优势,有利于凸显组织的生产要素作用,创设能动性、

可变性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平台,同时,能够将管理这一潜在的可控性生产要素引入农业生产中。

参考文献:

- [1] 许经勇.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思考[J]. 学习论坛, 2016(6).
- [2] 李国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主攻农业供给质量[J]. 农经, 2017(1).
- [3] 孔祥智.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政策建议[J]. 改革, 2016(2).
- [4] 姜长云, 杜志雄. 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1).
- [5] 林小莉, 邓雪霜, 骆东奇, 等. 重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对策[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6(2).
- [6]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就《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有关情况答记者问[J]. 农民科技培训, 2016(11).
- [7] [英]阿尔弗里德·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8] 徐寿波. 技术经济学[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 [9] 王树祥, 张明玉, 王杰群. 生产要素的知识属性与知识价值链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4(4).
- [10] 陈锡文. 牢牢把握当前农业政策改革的主要方向: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中国粮食经济, 2017(1).
- [11] 马桂萍. 农民专业合作社方向论析[J]. 科学社会主义, 2016(1).

(责任编辑 许峻)

Analysis of Structural Reform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 Under the Supply of Quality Target

QI Yan - zhong

(Business School ,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Henan 461000, China)

Abstract: Quality of supply is not only the standpoint of agricultural supply - side structural reform, but also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fundamental aim of it. Agricultural supply quality mainly reflects in product quality, product quality improvement. At present, improving the agricultural policy measures, efficientl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operation mode,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market and cultivating all kinds of agricultural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trading organization are the main ways to realize factor structural reforms.

Key words: quality of supply; factors of production; structural reforms

基于品牌个性的旅游目的地差异化定位研究

——以江苏项王故里景区为例

吴宪霞,秦小丽,严敏

(宿迁学院商学院,江苏宿迁 223800)

摘要:从品牌个性的视角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品牌差异化定位的问题,以江苏项王故里景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16份调查数据样本的因子分析,将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划分为质朴、高雅、时新三个维度,实证分析表明:项王故里景区投射品牌个性与游客实际感知的品牌个性不一致,存在较大差异。建议景区参照“质朴+高雅”的品牌个性方向重新调整,进行差异化品牌定位,并正视品牌营销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重塑品牌形象,使品牌个性越发凸显。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目的地品牌;品牌个性;品牌定位;项王故里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07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32-05

一、文献综述

伴随旅游业的发展与繁荣,当前,旅游产品竞争的同质化无异于红海厮杀,而如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已成为各级旅游管理部门普遍关心的话题。在此背景下,旅游目的地品牌化俨然已成为各地、各类景区的营销利器,独特的品牌定位当是大家苦苦寻觅的蓝海。作为“品牌所具有的一组人格特质”^[1]的品牌个性,在品牌定位大行其道的今天,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成为旅游目的地品牌差异性定位的一个有益视角。

品牌个性是把品牌想象成一个人,将人的性格特点赋予品牌从而来加以描述,此类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其研究除了围绕品牌个性的内涵以外,尚有:

一是品牌个性的维度研究。品牌个性究竟如何测量呢?研究者众多,美国学者Aaker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其提出的品牌个性维度分类的大五模型(包含sincerity, excitement, competence, sophistication与ruggedness)^[1],成为测量品牌个性的最有影响力的量表,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是依托该

模型展开的。此外,Maggie的品牌个性模型(包含responsibility, activity, aggressiveness, simplicity与emotionality)^[2]也广受关注。

在品牌个性的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也在积极探索品牌个性维度的跨文化研究问题。通过探索性研究,发现尽管不同文化的品牌个性维度可能有一些改变,但量表仍然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3]。Supphellen & Grnhaug(2003)也通过俄罗斯品牌个性维度的调查,验证了品牌个性量表在跨文化上的有效性^[4]。我国的卢泰宏与黄胜兵^[5]、何佳讯^[6]等人纷纷尝试探索构建适合东方文化的品牌个性维度,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牌个性维度,依次为“仁、智、勇、乐、雅”与“仁和、时新、智慧、诚信、高雅”;Leyland & Pitt等(2007)利用Aaker大五模型量表,基于非洲10个国家研究了品牌个性的沟通问题^[7]。

二是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研究。伴随旅游业的发展,学者意识到品牌个性对于旅游目的地的品牌传播意义重大,值得深入研究。在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测量与维度方面,Murphy(2007)利用Aaker品牌个性量表的测量,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澳大利亚昆

收稿日期:2017-05-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5YJC790082);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SJD783);宿迁学院科研基金项目(2015KY01)

作者简介:吴宪霞(1979—),女,吉林辉南人,硕士,宿迁学院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营销管理。

士兰州 Whitsunday Island 的品牌个性有 4 个维度^[8]。唐小飞(2011)等以中国四大古村镇为研究对象,将旅游地品牌个性划分为“仁和、时新、诚信、智慧、高雅”5 个维度,结果表明“仁和”“时新”两个维度评价最高^[9]。

在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与游客行为方面,品牌个性确实会对品牌形象、品牌偏好、购买意愿、游客满意及忠诚等产生影响。Lee 研究发现, the perceived tour quality(游客感知旅游质量)对游客忠诚有正向影响^[10]。Chena 等以文化遗产旅游为例,实证研究表明体验质量通过感知质量与满意度间接地而非直接地影响行为意图^[11]。刘宇飞(2015)以红色旅游地井冈山为研究区域,指出红色旅游地品牌个性对游客满意度忠诚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2]。Chi & Qu Hailin(2008)以美国阿肯色州的 Eureka Springs 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 SEM 分析表明,目的地形象直接影响属性满意度,二者与总体满意度显著相关,属性满意度与总体满意度对目的地忠诚产生直接积极的影响^[13]。Chen & Tsai(2007)指出目的地形象通过旅游质量、感知价值、满意度对行为意图产生影响^[14]。张春晖(2011)等以西安市长安区“农家乐”为例,探讨了基于场所依赖为中介变量的品牌个性与游客忠诚的关系,指出乡村旅游地品牌个性(实惠、喜悦、闲适、交互、健康和逃逸)中的实惠和闲适两个维度对游客忠诚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15]。

按照营销的定位理论,旅游目的地定位是指要在游客的心目中为目的地找到一个与众不同而又鲜明的位置,即是一个既具有自身优势又显著地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差异性定位。因此,旅游目的地差异化定位的前提是首先要了解自身的状况,然后了解竞争对手,进而确定独特的品牌定位。本研究尝试以江苏项王故里景区为例,基于国内旅游市场探讨旅游目的地品牌差异性的定位问题,旨在为地方旅游景区的品牌定位与营销提供有益的参考视角。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

本研究选取江苏宿迁新兴旅游景区项王故里为例。项王故里,又名“梧桐巷”,坐落于江苏宿迁南郊,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景区历史悠久,早在清康熙年间就立碑以为纪念。

近年来,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区内西楚文化及自然生态资源的优势,着力将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加以培育,拨付巨额资金对项王故里进行了修复与重建,规划建成包括项王故里核心景

区在内的六大景区。其核心景区于 2012 年盛大开园,自开园以来,旅游效益突显,受到各地旅游人士的喜爱。

项王故里是宿迁近年来全力打造的“畅游宿迁深呼吸”中的核心景区,也是地方拟打造的王牌旅游产品之一,成为吸引五湖四海的游客到宿游玩的主要旅游吸引物支撑,在宿迁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旅游目的地投射品牌个性的衡量

旅游目的地投射品牌个性是指旅游目的地根据游客对该类旅游产品某些特征的重视程度,为本旅游产品所塑造的与众不同的、印象鲜明的独特品牌形象,并将该形象通过各种营销渠道生动有效地传递地到目标市场上,从而使该旅游产品在游客的心目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而旅游目的地在各路媒体上的宣传口号很大程度上可视为目的地投射品牌个性的具体体现。因此,本研究集中于 2016 年 6 月至 8 月,从项王故里景区、西祠胡同、景区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宿迁旅游政务网、中国江苏网等搜集到项王故里的营销宣传口号 4 条,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了宣传口号所体现的品牌个性。

(三)旅游目的地感知品牌个性的衡量

旅游目的地感知品牌个性主要通过项王故里景区问卷数据的收集来加以衡量。

1. 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正式问卷主要由 2 部分构成:(1)旅游目的地项王故里品牌个性的测度。基于品牌个性量表尽量符合案例目的地的原则,本研究在 Aaker、唐小飞与黄胜兵等品牌个性维度研究的基础上,经过斟酌考虑,共选取 17 个测量条目(见表 1)。(2)游客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有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职业和旅游方式 6 项,此部分以单项选择的形式设问,问卷其他内容以李克特 5 点量表形式设问。

品牌个性是指品牌所具有的一组人格特质,可以反映出消费者对品牌的感受,获得消费者心理上的认同^[16]。Upshaw(1999)认为,品牌个性是指每个品牌向外展示的品质或魅力,它能与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进行情感方面的交流,是品牌与现实和潜在的消费者相联系的纽带^[17]。近年来,伴随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的研究与应用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领域。Ekinici & Hosany(2006)借鉴 Aaker 的研究,将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解读为由某一目的地联想出来的一组人格特征,提出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的 3 个维度:真诚(sincerity)、兴奋(excitement)和欢乐(conviviality)^[18]。唐小飞

(2011)等以中国四大古村镇为研究对象,将旅游地品牌个性划分为5个维度,论证了影响游客重游意愿的主导因素^[2]。

表1 目的地品牌个性特征名称及来源

品牌个性	来源
纯朴的、独特的、可信赖的	Aaker(1997)、唐小飞等(2011)、高静、焦永兵(2014)、
生态的、有品味的、新颖的、	高静、焦永兵(2014)、黄胜兵
时尚的、创新的、温馨的	卢泰鸿(2003)、何佳讯、丛俊滋(2008)
和谐的	何佳讯、丛俊滋(2008)
友善的、有魅力的	唐小飞等(2011)、何佳讯、丛俊滋(2008)
动感的、奔放的、欢乐的、气派的、美丽的	高静、焦永兵(2014)、黄胜兵、卢泰鸿(2003)

2. 调研方法及样本特征

表2 受调查者人口统计学特征

类别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类别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年龄	≤14岁	6	2.8	性别	男	102	48.1
	15-24岁	74	34.3		女	112	51.9
	25-44岁	95	44.0	职业	公务员	11	5.1
	45-64岁	26	12.0		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23	10.6
	≥65岁	15	6.9		文教/技术人员	42	19.4
学历	初中及以下	14	6.5	商贸服务人员	16	7.4	
	高中/中专	49	22.7	工人	12	5.6	
	大专	41	19.0	农民	2	0.9	
	本科	87	40.3	大学生	36	16.7	
	硕士及以上	25	11.6	中小學生	21	9.7	
月收入	1000元以下	51	23.6	离退休人员	13	6.0	
	1001-2000元	13	6.0	其他	40	18.5	
	2001-3000元	43	19.9	旅游方式	散客	107	49.5
	3001-4000元	30	13.9		旅行社组织	74	34.3
	4001-6000元	51	23.6		其他	35	16.2
	6000元以上	28	13.0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 旅游目的地投射品牌个性

对搜集到的4条项王故里的宣传口号,邀请了4位营销方面的专家,对照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特征的列表,指出各宣传口号所体现出的品牌个性特征,对于意见不一致的,由专家组集中讨论后最终确定。

(二) 项王故里感知品牌个性

为识别项王故里感知品牌个性维度的构成,本研究采用SPSS22.0对所获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提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选取特征值大于1作为公因子,为使提取的因子更具代表性,剔除因子载荷不及0.4或同时在两个因子载荷的系数都大于0.4的测量项目。公因子的命名基于归于此类的因子载荷较高的测项与其他测项间关系的分析^[19]。

1. 项王故里感知品牌个性

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品牌个性量表的KMO

本研究于2016年7-8月在项王故里景区集中进行了实地调查,主要在出口处,采取随机拦截访问的方式选取调查样本,共发放问卷235份,回收216份,有效率为92%。

在216份调查样本中,从年龄结构上看(见表2),以中青年为主,25至44岁的占到样本总数的44%;本科学历的受调查者居多,占总量的40.3%;月收入方面以4001至6000元者比例最高,为23.6%;性别方面,男女比例基本持平,男性占比48.1%,女性为51.9%;职业方面,各行业均有涉猎,尤以文教和技术人员居多,占比19.4%;旅游方式方面,散客占49.5%,旅行社组织的占34.3%,选其他项的多为学校、单位或团体组织的暑假游。

值为0.92,偏相关性较好;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1747.192(df=136),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0.001,表明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

经过三次因子分析,剔除因子载荷不及0.4或同时在两个因子载荷的系数都大于0.4的测量项目,最终得到项王故里品牌个性的3个维度:质朴、高雅与时新,各维度特征根值分别为6.164、1.215和1.005,方差解释率分别为21.826%、19.802%和18.254%,累计方差解释率达59.882%。第一维度包含生态的、温馨的、和谐的、友善的和可信赖的5个变量,体现了景区良好的自然环境与纯朴的人文环境,因此命名为质朴;第二维度包含气派的、有文化的、有品位的、独特的和奔放的5个变量,大多属于黄胜兵等所说的品牌个性的“雅”^[5],可命名为“高雅”;第三维度包含了时尚的、新颖的、欢乐的和美丽的4个变量,前两个变量因子载荷最高,与何佳讯^[6]等品牌个性维度中的“时新”维度接近,因此命

名为“时新”。

2. 项王故里感知品牌个性分析

对项王故里品牌个性维度的贡献率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品牌个性维度在项王故里感知品牌个性中所占的权重。第一维度“质朴”在景区品牌个性中所占的权重为0.36,这表明游客对项王故里品牌个性的感知以“质朴”居于首位,包含有生态的、温馨的、和谐的、友善的和可信赖的5个词,体现了项王故里景区良好的生态资源、纯朴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人文景观巧妙融合的特征,给游客营造出一团温馨与和谐的氛围;“质朴”维度比第二个维度的“高雅”(权重为0.33)仅高出了0.03个权重,差距不大,表明项王故里的品牌个性特征并不鲜明,也说明项王故里除给人以质朴的印象外,还具有气派的、有文化的、奔放的等代表“高雅”的品牌个性。

(三)旅游目的地投射与感知品牌个性比较

将旅游目的地投射品牌个性与首要感知品牌个性(第一维度)比较后发现,项王故里景区投射品牌个性与游客实际感知到的品牌个性存在一定的差距。景区投射品牌个性中生态的、温馨的、友善的与游客感知相一致,但奔放的、有文化的、动感的、气派的及新颖的未进入游客首要感知(见表3),表明项王故里景区品牌投放与实际感知一致性较差。

表3 项王故里投射与感知品牌个性对比

投射品牌个性	感知品牌个性	一致个性
奔放的、有文化的、生态的、动感的、气派的、温馨的、新颖的	生态的、温馨的、和谐的、友善的、可信赖的	生态的、温馨的

(四)旅游目的地品牌定位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项王故里景区想要塑造的品牌形象与目标市场中游客实际感知到的形象尚有一定差距,这表明项王故里在景区林立的旅游竞争市场中还没有找到自身独特的优势,或者说还没有在游客心目中成功塑造与众不同的品牌定位形象。从其营销宣传口号“项王故里,英雄传奇”“项王故里,读霸天下”里,我们可以看到,其想要塑造的是那种奔放、豪迈、气势恢宏而又与众不同的拔山举鼎的盖世英雄形象(即感知品牌个性中的“高雅”维度),但问题是实践中未能成功地诠释这一形象。相反,在现实中,更多的游客评价认为,把项羽塑造得过于文弱,甚至于有些女性化倾向,这与项羽千百年来留给世人的形象严重不符(笔者在《以西楚文化优势打造特色旅游景区》一文中作了深入分析,此处不赘述)。结合游客感知与评价,本研究以为,项王故里景区投放品牌的定位可选择为质朴+高雅,景区可依据现有品牌定位形象的差距,参照竞争对手的优

秀旅游产品,诸如无锡三国城、沂水天上王城、杭州宋城、云南古城等,调整并确定自身独特的品牌定位;注重营销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着手完善后续营销活动,逐步缩小差距,直至成功谱写“英雄传奇”。

四、结束语

基于江苏项王故里景区的实证分析,将旅游目的地品牌个性划分为质朴、高雅、时新3个维度,通过旅游目的地投射与感知品牌个性的对比分析,发现项王故里景区品牌个性的一致性较低,建议景区参照“质朴+高雅”的品牌定位,注重品牌营销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重塑品牌形象,使品牌个性越鲜明,希望本研究能为项王故里景区的品牌管理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由于经费及人员等的限制,本研究仍有一些不足:一是,仅对项王故里品牌定位的差异性予以分析,没有与其他景区作横向的对比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二是,问卷调查的数量较少,导致代表性不足。下一步拟对竞争对手的旅游产品(即上文提及的相关古城)作进一步的实地调研,期待本文的不足之处在后续研究中予以完善。

参考文献:

[1] Aaker J L. Dimensions of Brand Personality[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7(3).

[2] Maggie Geuens, Bert Weijters, Kristof De Wulf. A New Measure of Brand Personality[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2009(26).

[3] Aaker J L, Benet - Martinez V, Garolera J. Consumption of Symbols as Carriers of Culture: A Study of Japanese and Spanish Brand Personality Construct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3).

[4] Supphellen M, Grnhaug K. Building Foreign Brand Personalities in Russia: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nsumer Ethnocentr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03(2).

[5] 黄胜兵, 卢泰宏. 品牌个性维度的本土化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03(1).

[6] 何佳讯, 从俊滋. “仁和”与“时新”: 中国市场中品牌个性评价的关键维度及差异分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5).

[7] Leyland. F, Pitt Robert, Poku, et al. What I Say About Myself: Communication Brand Personality by African Countrie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28).

[8] Murphy L, Benckendorff P, & Moscardo G. Linking Travel Motivation, Tourist Self - image and Destination Brand Personality [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07(2).

[9] 唐小飞, 黄兴, 夏秋馨, 等. 中国传统古村镇品牌个性特

- 征对游客重游意愿的影响研究:以东河古镇、周庄古镇、
 阆中古镇和平遥古镇为例[J]. 旅游学刊,2011(9).
- [10] Lee S, Jeon S, Kim D. The Impact of Tour Quality and
 Tourist Satisfaction on Tourist Loyalty: The Case of Chinese
 Tourists in Kore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5).
- [11] Chena C F, Chen F S. Experience Quality, Perceived Val-
 ue, Satisfac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for Heritage Tour-
 is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1).
- [12] 刘宇飞. 红色旅游地品牌个性、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关
 系研究:以井冈山为例[D].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5.
- [13] Chi Christina Geng - Qing, Qu Hailin. Examining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of Destination Image, Tourist Satis-
 faction and Destination Loyalt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8(4).
- [14] Chen Ching Fu, Tsai Dung Chun. How Destination Image
 and Evaluative Factors Affect Behavioral Intention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4).
- [15] 张春晖,白凯. 乡村旅游地品牌个性与游客忠诚:以场
 所依赖为中介变量[J]. 旅游学刊,2011(2).
- [16] Keller K L. Conceptualizing, Measuring and Managing Cus-
 tomer—Based Brand Equity [J]. The Journal of Market-
 ing. 1993(1).
- [17] 林恩. 阿普绍,塑造品牌特征[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1999:87-88.
- [18] Ekinici Y, Hosany S. Destination Personality: An Applica-
 tion of Brand Personality to Tourism Destinations [J]. Jour-
 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6(2).
- [19] 高静,焦勇兵. 旅游目的地品牌差异化定位研究:基于
 品牌个性视角[J]. 旅游学刊,2014(3).

(责任编辑 许峻)

Differentiating Brand Positioning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based on the Brand Personality Perspective

—A Case of Xiang Yu's hometown in Jiangsu

WU Xian - xia, QIN Xiao - li, YAN Min

(Business School, Suqian College, Suqian, Jiangsu 2238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and personality, the paper probes into the differentiation positioning problem of tourism destination. Based on the factor analysis of 216 data samples from the Xiang Yu's hometown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brand personality is divided into 3 kinds of dimensions: simplicity, elegance and trend.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ject brand personality of Xiang Yu's hometown i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ctual perception of the brand personalit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cenic area should readjust the brand positing according to the brand personality of "simplicity + elegance"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actice of brand marketing to restore the brand image and highlight the brand personality.

Key words: tourism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brand; brand personality; brand positioning; Xiang Yu's hometown

我国房地产业投入产出优化及其预测研究

杨洋洋, 杨中宣

(中原工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 郑州 450007)

摘要:运用 MAXDEA 软件, 选用投入导向的 CCR 模型, 并做投影分析, 获得相对最优的投入产出数据。在此基础上, 以投影数据作为历史数据, 构建 SPSS19.0 软件预测模型, 预测 2017 年 1 月—6 月房地产业投入产出数据, 并用相对误差对预测数据进行调整, 提高预测精度。结果表明: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国房地产业整体效率水平较低, 各指标投入严重冗余, 资源浪费严重, 利用效率低下; 由预测数据可知, 2017 年上半年房地产竣工面积与 2016 年上半年基本相当, 而 2017 年上半年各指标的投入量与 2016 年相比却缩减了将近二分之一, 表明 2016 年上半年房地产业各指标投入了严重冗余。政府和企业可以预测数据为基准, 指导房地产开发与生产, 提高生产效率, 优化配置资源, 保证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业; 投入产出效率; 优化; 预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08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37-07

一、引言

近年来, 房地产业飞速发展, 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2016 年 12 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值高达 102581 亿元, 累计增长 6.9%; 2016 年 12 月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达到 106128 万平方米, 累计增长 6.1%。房地产业的发展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并切身感受到发展的成果, 大大提高了我国城镇化水平, 改善了人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我们在享受房地产业带来的福利的同时, 也见证了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一些弊端, 建筑施工场地雾霾严重, 建筑垃圾随处可见, 烂尾楼事件频繁发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思考, 房地产业的生产效率到底如何? 资源是否得到最优的配置利用? 政府和企业又将依据何种标准来调控房地产业的生产和运营?

众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刘晓君^[1](2009)、任晓萍^[2](2011)、郑潇潇^[3](2015)、任阳军^[4](2015)以我国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房地产业相关数据为样本, 运用 DEA 方法, 构建房地产业

DEA 效率评价模型, 从不同的区域维度对我国房地产业的整体效率水平进行了研究, 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袁峰^[5](2010)、丁琦^[6](2011)、韦晓慧^[7](2015)和白云峰^[8](2015)采用 DEA 方法, 选取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作为决策单元, 收集房地产上市公司相关数据, 构建 DEA 模型, 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绩效状况进行评价, 提出了绩效改进措施。

目前, 我国学者主要集中在选取不同决策单元或从不同维度对我国房地产业的效率进行分析研究, 并给出具体的改进建议, 而在房地产投入产出预测方面的研究很少见。基于此, 本文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我国房地产投入产出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 作为政府与企业生产和运营的一个基准。

二、模型简介

(一)DEA 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 (DEA) 是 1978 年 A. Charnes、W. W. Cooper 和 E. Rhodes 首次提出的, 该方法的原理主要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的输入或输出不变, 借

收稿日期: 2017-04-16

基金项目: 河南省科技厅科技攻关项目“基于虚拟组织理论的产业集聚数字化管理技术研究”(162102210091)

作者简介: 杨洋洋(1992—), 女, 河南周口人, 中原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工程管理。

助于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将各个决策单元投影到 DEA 的生产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 DEA 生产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

CCR 模型是最早提出的一种 DEA 模型,此后,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模型,其基本原理如下:

$$\begin{aligned} \min \theta \\ \text{s. t. } \begin{cases} \sum_{j=1}^n x_j \lambda_j + s^- = \theta x_{j_0}, (j = 1, 2, \dots, n) \\ \sum_{j=1}^n y_j \lambda_j - s^+ = y_{j_0} \\ \lambda_j \geq 0 \\ s^+ \geq 0, s^- \geq 0 \end{cases} \end{aligned}$$

CCR 模型分为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两个基本类型,投入导向基于投入的技术效率,即在一定产出下,以最小投入与实际投入之比来估计。产出导向基于产出的技术效率,即在一定的投入组合下,以实际产出与最大产出之比来估计。

本文综合考虑实际情况,选取投入导向的 CCR 模型对我国房地产业投入产出进行优化研究。

(二) SPSS 时间序列模型

时间序列分析是根据系统观测得到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曲线拟合和参数估计来建立数学模型的理论和方法,一般采用曲线拟合和参数估计方法进行。在 SPSS19.0 软件中实现时间序列预测的模型有三个:专家建模器、指数平滑法和 ARIMA 模型。

专家建模器是系统根据数据的特点自动模拟出相对较好的模型,模型类型可以是所有模型、仅限指数平滑法模型或者仅限 ARIMA 模型,建模简单,适用范围广泛。

指数平滑法由 Robert G. Brown 提出,该方法有助于预测存在趋势或季节的序列,指数平滑法分为非季节性模型和季节性模型。非季节性模型包括简单模型、Holt 线性趋势模型、Brown 线性趋势模型和阻尼趋势模型。季节性模型包括简单季节性模型、Winters 可加性模型和 Winters 相乘性模型。

ARIMA 模型又称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模型,是指将非平稳时间序列转化为平稳时间序列,然后将因变量仅对它的滞后值以及随机误差项的现值和滞后值进行回归所建立的模型,包括移动平均过程(MA)、自回归过程(AR)、自回归移动平均过程(ARMA)以及 ARIMA 过程。

本文在建立预测模型的过程中,首先使用专家建模器,然后运用指数平滑法或 ARIMA 对模型加

以调整,寻找最优的模型。

三、房地产业投入产出优化

(一) 变量与数据

以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 48 个月作为决策单元,综合考虑房地产业特点、指标选取科学性和数据可获得性,选取房地产投资累计值、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和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 3 个指标为投入指标,选取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为产出指标。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地产业相关数据,由于选取的各指标是累计值,2013 年 1 月、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这 4 个月的数据官网未公布,考虑到时间的连续性,本文对这 4 个月数据加以处理,分别取为 2013 年 2 月、2014 年 2 月、2015 年 2 月、2016 年 2 月这 4 个数据的二分之一,各指标的初始数据如表 1 所示。

(二) 结果与分析

采用 MAXDEA 软件,选取 DEA 模型中以投入为导向的 CCR 模型,其技术效率值如图 1 所示,只有 2013 年 1 月、2013 年 2 月、2016 年 1 月、2016 年 2 月技术效率值为 1,处于生产前沿面上,有 79% 的数据位于 0.5—0.8 之间,平均技术效率值仅为 0.6491,可见,2013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我国房地产业整体效率水平并不高,其投入产出效率有待提高。基于此,本文对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的投入产出数据做投影分析,得出相对最优的投入产出目标值,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第一,房地产投资累计值平均投入冗余率高达 70.53%,其中,只有 25% 的数据投入冗余率位于 50% 以下,22.92% 的数据投入冗余率超过了 100%,资金投入过剩,说明资金利用率不高,造成资金闲置,延长资金投资回收期,降低企业总收益。

第二,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平均投入冗余率高达 78.68%,其中,只有 22.92% 的数据投入冗余率位于 50% 以下,37.5% 的数据投入冗余率超过了 100%,固定资产投资冗余,说明固定资产使用率降低,增加生产成本,加大房地产企业的经营风险。

第三,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平均投入冗余率高达 61.39%,其中,只有 35.42% 的数据投入冗余率位于 50% 以下,14.58% 的数据投入冗余率超过了 100%,土地投入过剩,说明房地产开发商炒房现象严重,盲目地买地投资,造成土地资源闲置浪费。

由此可见,房地产业乱投资现象严重,各个行业纷纷进入房地产业瓜分蛋糕,造成房地产业投资严重过剩。房地产业投入过剩,资源利用率不高,这也

是造成房价上升的一个原因,因此,政府需要加强管制和监督,提高房地产业进入壁垒,优化房地产业资源配置,改善房地产业投入产出效率,保证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以2013年1月—2016

年12月相对最优的投入产出投影数据作为历史数据,预测2017年1月—2017年6月房地产业最优生产前沿面,以此作为政府调控房地产业的一个基准。

表1 房地产业投入产出优化初始数据

时期	房地产投资 累计值(亿元)	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累计值(亿元)	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 累计值(万平方米)	房地产竣工面积 累计值(万平方米)
201301	3334.85	4038.185	1906.355	6762.22
201302	6669.7	8076.37	3812.71	13524.44
201303	13132.57	16517.39	6133.74	19473.41
201304	19180.14	24641.72	8824.93	23758.9
201305	26797.97	34620.38	11755.93	28745.07
201306	36827.94	47588.44	15721.49	35346.07
201307	44301.58	57336.81	18716.95	41642.71
201308	52119.77	67475.39	21482.29	46649.66
201309	61119.55	79276.56	25166.63	52705.61
201310	68693.18	89525.65	26657.54	59390.19
201311	77412.16	100290.54	34772.79	69419.65
201312	86013.38	111423.85	38814.38	101434.99
201401	3977.99	4809.945	2031.01	6209.12
201402	7955.98	9619.89	4062.02	12418.24
201403	15339.24	19208.85	5989.64	18520.17
201404	22321.56	28445.01	8130.41	23685.46
201405	30738.58	39523.18	11089.9	30700.42
201406	42018.62	54296.47	14807.46	38214.96
201407	50381.25	65345.93	17823.98	43524.49
201408	58974.51	76490.12	20787.35	49758.81
201409	68751.21	89227.28	24014.1	56503.8
201410	77220.27	100583.37	26971.71	63888.88
201411	86601.36	112463.69	29736.28	75062.66
201412	95035.61	123689.78	33383.03	107459.05
201501	4393.18	5353.1	1386.38	5407.27
201502	8786.36	10706.2	2772.76	10814.54
201503	16650.64	20942.62	4051.42	16993.65
201504	23669.04	30452.88	5469.47	21209.94
201505	32291.84	41936.69	7650.48	26611.42
201506	43954.95	57405.2	9799.74	32941.25
201507	52562.22	68793.65	12113.37	37833.37
201508	61062.54	80084.21	14116.01	42475.17
201509	70535.07	92625.96	15890	50967.04
201510	78800.74	103985.2	17847.41	61200.64
201511	87702.38	115583.48	19893.72	72412.89
201512	95978.85	126674.25	22810.79	100039.1
201601	4525.895	5610.505	1117.8	6970.92
201602	9051.79	11221.01	2235.6	13941.84
201603	17676.62	22660.93	3576.58	20000.82
201604	25375.64	33007.77	5113.65	25478.22
201605	34564.11	45177.17	7196.09	32027.7
201606	46630.52	61520.55	9501.89	39545.96
201607	55360.5	73054.75	11167.16	45903.78
201608	64386.74	84877.78	12922.45	50592.3
201609	74597.59	98423.02	14916.61	57111.81
201610	83974.61	110823.74	16872.73	65211.16
201611	93387.08	123111.89	19045.73	77036.6
201612	102581	135283.69	22025	106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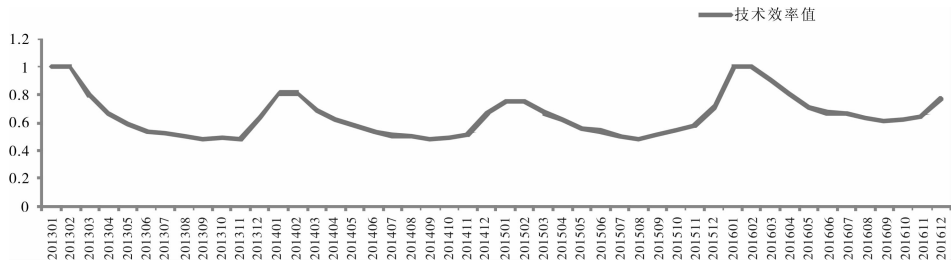


图1 房地产业投入产出优化 DEA 技术效率值

表2 房地产业投入产出优化投影数据

时期	Projection (房地产投资累计值(亿元))	Projection (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亿元))	Projection (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万平方米))	Projection (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万平方米))
201301	3334.85	4038.185	1906.355	6762.22
201302	6669.7	8076.37	3812.71	13524.44
201303	10409.67096	12701.49185	4861.974096	19473.41
201304	12771.82028	15591.56222	5876.412786	23758.9
201305	15724.05535	19225.40322	6897.943913	28745.07
201306	19524.10535	23892.0173	8334.651002	35346.07
201307	23086.44932	28260.31908	9753.781187	41642.71
201308	26086.33132	31956.32677	10752.04542	46649.66
201309	29482.97023	36118.3562	12139.92909	52705.61
201310	33896.87456	41596.74432	13154.25039	59390.19
201311	37648.9634	45997.42695	16911.54849	69419.65
201312	54919.56386	67087.63269	24782.99098	101434.99
201401	3199.91083	3891.262907	1643.094438	6209.12
201402	6399.82166	7782.525814	3286.188876	12418.24
201403	10548.56226	12942.4769	4118.984413	18520.17
201404	13800.24527	16964.15802	5026.60442	23685.46
201405	17941.78302	22060.69925	6473.056969	30700.42
201406	22498.82071	27680.5894	7928.637061	38214.96
201407	25593.55735	31484.95796	9054.540217	43524.49
201408	29293.17323	36039.56692	10325.26501	49758.81
201409	33358.04902	41050.02922	11651.62802	56503.8
201410	37718.20244	46415.60721	13174.31832	63888.88
201411	44548.40705	54844.10123	15296.57162	75062.66
201412	63329.32017	77921.23533	22245.60452	107459.05
201501	3279.194606	4044.018174	1047.345635	5407.27
201502	6558.389212	8088.036347	2094.691269	10814.54
201503	11033.18867	13677.24178	2724.963415	16993.65
201504	13770.63019	17070.69862	3401.053366	21209.94
201505	17277.5606	21418.04883	4267.19074	26611.42
201506	21387.2256	26512.57622	5282.190765	32941.25
201507	24563.45219	30449.97096	6066.651315	37833.37
201508	27577.15761	34185.89708	6810.972587	42475.17
201509	33090.53489	41020.52997	8172.659751	50967.04
201510	39734.73667	49256.98426	9813.636563	61200.64
201511	47014.3305	58281.0994	11611.54173	72412.89
201512	64950.74718	80515.89614	16041.45593	100039.1
201601	4525.895	5610.505	1117.8	6970.92
201602	9051.79	11221.01	2235.6	13941.84
201603	12985.60466	16097.54532	3207.168723	20000.82
201604	16541.8264	20505.99931	4085.480011	25478.22
201605	20794.09996	25777.31074	5135.701322	32027.7
201606	25675.35743	31828.3392	6341.26831	39545.96
201607	29803.19504	36945.39418	7360.756584	45903.78
201608	32847.23359	40718.92263	8112.569494	50592.3
201609	37080.04902	45966.11288	9157.985061	57111.81
201610	42338.58128	52484.82829	10456.73091	65211.16
201611	50016.29093	62002.46588	12352.96223	77036.6
201612	68903.9875	85416.5124	17017.82238	106128

四、房地产业投入产出预测

(一) 模型建立

以上文房地产业投入产出优化的投影数据作为历史数据,采用 SPSS19.0 软件预测模型,分别对房地产投资累计值、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和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四个指标建立拟合模型,以 2013 年 1 月—2016 年 6 月的数据作为拟合数据,以 2016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的数据作为检验数据。首先使用专家建模器,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模型参数,寻找拟合程度最优的模型,房地产投资累计值和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分别选择 ARIMA(1,1,0)(1,1,0)模型和 ARIMA(0,1,0)(1,1,0)模型,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和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选择指数平滑法中 Winters 乘法模型和 Winters 加法模型,各指标的拟合模型曲线图如图 2—5 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各个模型的模拟效果都比较好。

表 3 房地产业投入产出拟合模型

指标	模型类型
房地产投资累计值	ARIMA(1,1,0)(1,1,0)
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	ARIMA(0,1,0)(1,1,0)
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	Winters 乘法
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	Winters 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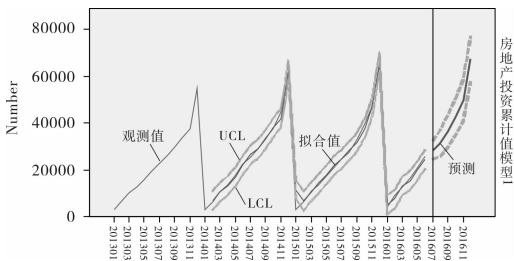


图 2 房地产投资累计值拟合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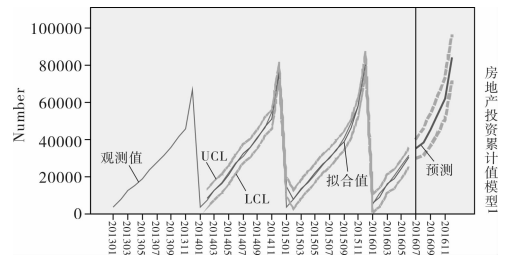


图 3 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拟合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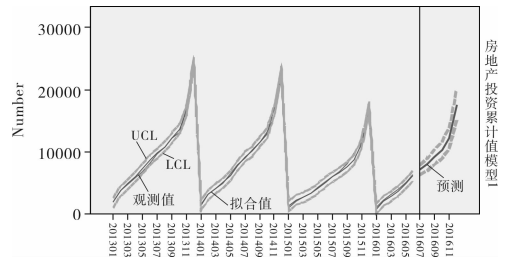


图 4 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拟合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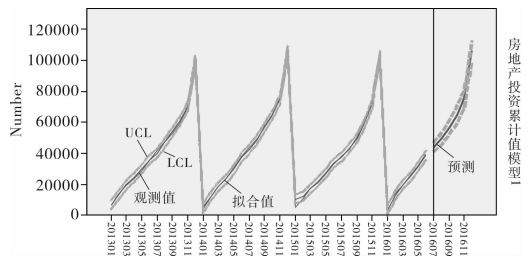


图 5 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拟合模型

(二) 模型评价

从图 2—5 来看,各指标的拟合值与观测值基本重合,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的模型比较合理科学,本文建立模型的目的是为了预测数据,这里用 2016 年 7 月—2016 年 12 月的数据来检验模型的预测精度,用各指标实际值与预测值的相对误差来检验。

表 4 房地产业投入产出预测模型检验

时期	房地产投资累计值			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			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			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		
	实际值	预测值	相对误差	实际值	预测值	相对误差	实际值	预测值	相对误差	实际值	预测值	相对误差
201607	29803.19504	28551.3929	-0.0420	36945.39418	35457.2558	-0.0403	7360.756584	7188.167	-0.0234	45903.78	43991.17	-0.0417
201608	32847.23359	31357.3583	-0.0454	40718.92263	38854.6738	-0.0458	8112.569494	8037.0363	-0.0093	50592.3	49285.25	-0.0258
201609	37080.04902	36498.6356	-0.0157	45966.11288	45434.1944	-0.0116	9157.985061	9210.8832	0.0058	57111.81	56382.82	-0.0128
201610	42338.58128	42706.8681	0.0087	52484.82829	53448.5708	0.0184	10456.73091	10338.9545	-0.0113	65211.16	64483.89	-0.0112
201611	50016.29093	49690.8147	-0.0065	62002.46588	62178.8049	0.0028	12352.96223	12258.9187	-0.0076	77036.6	75289.04	-0.0227
201612	68903.9875	67430.5494	-0.0214	85416.5124	84074.3485	-0.0157	17017.82238	17625.8584	0.0357	106128	105968.39	-0.0015

由表 4 可知,房地产投资累计值的相对误差绝对值最高为 0.0454,最低为 0.0065,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0.0204;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的相对误差绝对值最高为 0.0458,最低为 0.0028,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0.0154;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的相对误差绝对值最高为 0.0357,最低

为 0.0058,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0.0017;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的相对误差绝对值最高为 0.0417,最低为 0.0015,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0.0193。总体来看,四个指标的相对误差绝对值都在 5% 以下,最高误差为 -0.0458,最低误差仅为 -0.0015,各指标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都在 3% 以下。因此,房地

产业投入产出各指标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比较好,模型构建得比较科学合理。

(三)模型预测

根据各指标拟合的模型,预测 2017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房地产业投入产出数据,如表 5 所示。为了提高预测的精度,利用下列公式对预测数据进行优化调整,得到如表 6 的优化预测数据。

$$F = \frac{A}{1 + w}$$

F —— 优化预测值

A —— 预测值

w —— 相对误差

表 5 房地产业投入产出预测值

时期	房地产投资累计值(亿元)	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亿元)	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万平方米)	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万平方米)
201701	7948.72	9887.77	1171.46	9452.53
201702	11673.40	14686.00	2453.63	15790.59
201703	15123.44	18916.21	3221.97	21863.53
201704	17954.21	22552.54	3905.91	26650.34
201705	21494.08	27058.36	4758.54	32639.05
201706	25658.27	32341.53	5763.19	39630.65

表 6 房地产业投入产出优化预测值

时期	房地产投资累计值(亿元)	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亿元)	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万平方米)	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万平方米)
201701	8297.20	10302.98	1199.53	9863.85
201702	12228.58	15390.90	2476.66	16208.78
201703	15364.67	19138.21	3203.39	22147.01
201704	17799.36	22145.07	3950.55	26952.20
201705	21634.71	26982.81	4794.98	33397.17
201706	26219.36	32857.39	5564.54	3969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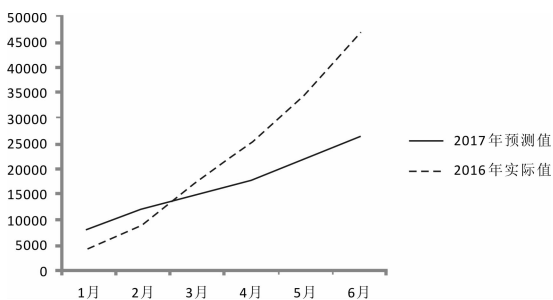


图 6 投资累计值优化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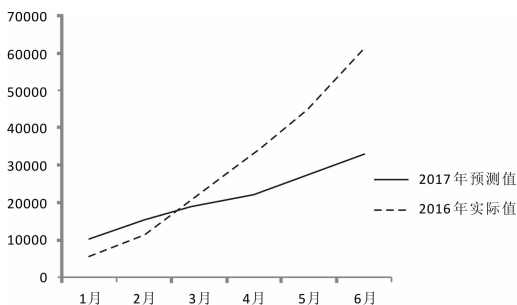


图 7 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优化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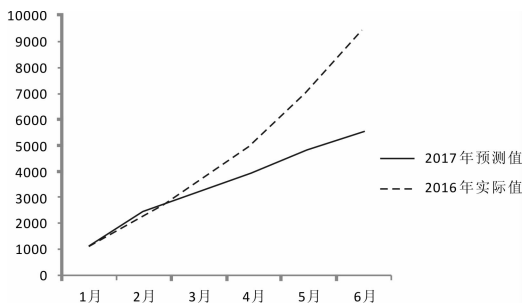


图 8 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优化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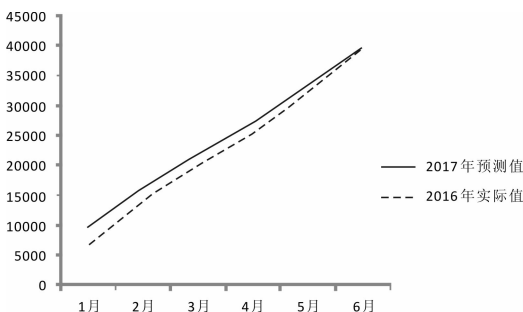


图 9 竣工面积累计值优化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图

表 6 为调整后的优化预测值,图 6—9 为房地产投资累计值、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和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四个指标 2017 年 1 月—6 月与 2016 年 1 月—6 月的比较图,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第一,由图 6—8 可知,房地产投资累计值、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和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三个指标的投入 2017 年 1 月—3 月同比 2016 年略有增长,而在 2017 年 4 月—6 月同比 2016 年投入有明显的降低,2017 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三个指标的投入分别为 2016 年上半年的 56.23%、53.41% 和 58.56%,2017 年各指标的投入量几乎缩减了二分之一。

第二,由图 9 可知,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 2017 年 1 月—5 月一直位于 2016 年的上方,而在 6 月与 2016 年重合,说明 2017 年上半年房地产竣工面积与 2016 年上半年基本相当,而 2017 年上半年各指标的投入量却缩减了将近二分之一,表明 2016 年上半年房地产业各指标投入了严重冗余,2017 年需要政府和企业以此为基准,提高生产效率,优化配置资源,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和管制,保证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五、结论与建议

采用 SPSS19.0 软件预测模型,分别对房地产投资累计值、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和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值四个指标建立拟合模型,根据各指标拟合的模型,预测 2017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房地产业投入产出数据,并用相对误差来调整预测数据,提高预测精度。根

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建议:

第一,整体来看,2013年1月—2016年12月我国房地产业整体效率水平并不高,平均技术效率值仅为0.6491,79%的数据位于0.5—0.8之间。房地产投资累计值平均投入冗余率高达70.53%,22.92%的数据投入冗余率超过了100%;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值平均投入冗余率高达78.68%,37.5%的数据投入冗余率超过了100%;房地产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值平均投入冗余率高达61.39%,14.58%的数据投入冗余率超过了100%。由此可见,房地产业资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低下。近年来,各行各业纷纷踏足房地产业,一味地盲目投资,肆意炒房,烂尾楼不断出现,给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诸多问题和阻碍。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需要不断地改革内部管理制度,提高生产效率,优化配置资源,才能保证企业的长足发展。对于政府来说,需要不断地完善房地产业法律法规,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督和管制,提高房地产业进入壁垒,保证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四个指标的拟合模型相对误差绝对值都在5%以下,最高误差为-0.0458,最低误差仅为-0.0015,各指标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都在3%以下,因此,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比较好,模型构建得比较科学合理。以此为基础预测2017年1月—6月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房地产竣工面积与2016年上半年基本相当,而2017年上半年各指标的投入

量与2016年相比却缩减了将近二分之一,表明2016年上半年房地产业各指标投入了严重冗余,2017年企业可以此为基准,指导房地产开发与生产,政府也可以此为基准,调控房地产市场,确保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晓君,张卫红.基于DEA的我国房地产业效率研究[J].建筑经济,2009(6):49-52.
- [2] 任晓萍.基于三阶段DEA的我国各省房地产业效率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8):44-47.
- [3] 郑潇潇.基于DEA方法的我国房地产业效率研究[J].经济论坛,2015(4):116-121.
- [4] 任阳军,曹泽.基于DEA和Malmquist指数法的我国房地产业生产效率评价[J].工程管理学报,2015,29(6):134-138.
- [5] 袁峰.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绩效:基于DEA的2008年报数据分析[J].兰州学刊,2010(1):124-126.
- [6] 丁琦,王要武,徐鹏举.基于DEA-FCE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绩效综合评价[J].系统管理学报,2011,20(2):196-201.
- [7] 韦晓慧.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绩效评价研究:基于三阶段DEA的分析法[J].中国房地产:学术版,2015(36):20-28.
- [8] 白云峰.基于DEA方法的上市房地产企业绩效评价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商业大学,201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and Prediction of China's Real Estate Industry Input and Output

YANG Yang - yang, YANG Zhong - xuan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450007,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obtain the relative optimal input - output data in the projection analysis processing by the input oriented CCR model in MAXDEA software. On this basis, regarding the projection data as historical data, this paper constructs prediction model by SPSS19.0 software, forecasts January 2017 - June 2017 real estate input - output data, and the relative error to adjust the prediction data, and to improv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The results show: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6,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China's real estate industry is relatively low, the input of each index is seriously redundant, the waste of resources is serious, and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s low; The forecast data shows that the first half of 2017's completed real estate area compared with the completed area of the first half of 2016 is quite basic, but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7 the target amount of investment reduces by nearly 1/2 compared with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6, shows that each index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is seriously redundancy.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ensur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the forecasting data,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Key words: real estate industry; input - output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forecast

营改增财险公司会计核算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吕庆元

(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 450009)

摘要: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纳入试点范围,运行20多年的营业税税制告别历史舞台,增值税抵扣链进一步扩充完善。增值税属于价外税,保险业务的各个环节都要拆出增值税税额,会计核算流程和财务信息系统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和改造。保监会对保险公司业务财务及信息系统建设有专门的监管规定,保险业务核算流程和信息系统有明显的行业特征,本文对营改增后财险公司会计核算流程设计和信息系统改造方案提出个人建议。

关键词:财险公司;会计核算;信息系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09

中图分类号:F84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44-08

保险公司属于社会公众性公司,其服务对象比较广,公司经营好坏直接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所以,保险公司经营活动受到社会各层广泛关注和政府职能部门特别是保监会的严格监管,保监会对保险公司业务财务数据无缝对接、数据一致性的要求,加大了保险公司会计核算及信息系统的复杂性。增值税税制下保险公司销售、承保、理赔、开票、资产采购、费用结算等业务环节都要单独核算增值税,业务流程和信息系统改造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结合笔者对财产保险公司信息系统和业务流程改造的经验,对原保险业务的销售承包业务、理赔业务、手续费及费用结算业务,共保业务、再保业务等核算流程和相应的系统改造的关键点作简要说明。

一、原保险业务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一) 保费收入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原保险合同确认收入的条件之一是:“原保险合同成立公司并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公司在保险合同生效日前收到的款项,不应确认为保费收入,而应确认为预收保费(负债),保险责任开始日,将

预收保费转入保费收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相关规定:“销售应税劳务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提供劳务同时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的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可以看出,增值税缴纳义务发生时间为下面三个时间的较早者:①收到保费资金的时间;②保单约定的收款时间;③开具发票的时间。

会计上确认保费收入的时间与税务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并不相同,下面分四种情况分别介绍。

1. 先收取保费资金后承担保险责任的业务

财产保险公司大部分业务特别是车险,一般是先收取保费资金,后签发保单承担保险责任。收到保费资金时不满足收入确认的条件,不能确认为保费收入,但是增值税纳税义务已经产生,需要核算销项税额。

业务系统需要将收到的保费资金拆分为“预收保费”和“销项税”两个项目。销项税 = 收取保费资金 ÷ (1 + 6%) × 6%, 预收保费 = 收取保费资金 - 销项税, 计算销项税时可能存在尾差,建议业务系统先计算销项税金额,再用收到的全部资金减去销项

收稿日期:2017-04-18

作者简介:吕庆元(1982—),男,河南商丘人,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责任人,注册会计师。

税,计算出预收保费金额。

对于一年期以上健康险、出口货运险等免税产品,收取的保费资金全部计入保费收入科目,增值税税额为零。对于车险和其他组合险保单,需要对组合险产品拆分到不同险种分别核算,分别计算销项税。在处理组合险增值税尾差时,建议先用总保费资金计算出总体的销项税额,再分别计算出各险种的销项税额,总体与各险种销项税额的差额,在一个险种上调整。

① 收取保费资金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等科目

贷:预收保费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② 预收保费转入的分录

借:预收保费

贷:保费收入

2. 先承担保险责任后收取保费资金的赊销业务

赊销业务,保险合同应约定应缴费日期,按约定缴费日期确认增值税。如果保险合同没有约定应缴费日期,在保险责任开始日期确认增值税。

① 确认保费收入的分录

借:应收保费

贷:保费收入

② 保险合同约定应缴费日期的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赊销业务,公司不能收到资金,并且可能需要垫付增值税及附加,对于资金比较紧缺的公司,应关注赊销业务对企业的现金流的影响。

3. 原保险合同约定了分期收款的业务

分期收款业务,保险合同应约定每期应缴费日期和金额,并按约定缴费日期和金额分次确认增值税。如果保险合同没有约定每期应缴费日期和金额的,在保险责任开始日一次全额确认增值税。建议保险公司对分期收款业务,在保险合同中注明每期保费应缴费日期和金额,并且分期开具保险费发票,合理筹划增值税纳税时间。

保险责任开始日,可以把各期保费全额计入保费收入,但尚未到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各期保费对应的增值税在“待转销项税额”科目核算,在约定应缴费日期,将本期保费对应的增值税从“待转销项税额”转入“销项税额”科目。

① 确认保费收入的分录

借:应收保费

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贷:保费收入 (各期应收之和)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待转销项税额

② 保险合同约定应缴费日期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待转销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 先开具发票后收取保费资金和承担保险责任的业务

既没有收取资金又没有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保单,财务上一般不做会计处理,但是先开具发票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已经产生,需核算缴纳增值税。保费打印发票后,需要将开票数据信息传送到核心业务系统,并产生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二) 赔付支出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1. 赔付支出包含的项目

财产保险公司赔付支出一般可以分为直接赔款支出、直接理赔费用、间接理赔费用等项目。为了核算赔付的实际构成情况,财险公司应设“直接赔付支出”“直接理赔费用”“间接理赔费用”“代位追偿款”“损余物资折价”等五个二级科目。“间接理赔费用”纳入公司日常费用报销处理流程。

按现行税收制度,财产保险公司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机动车辆保险赔付时,从修理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进项税额。该政策实际执行时,各省税务局解释有较大差异,本文按车辆实物赔款增值税可以抵扣并且不视同销售处理。

2. 直接赔款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缮制赔案时,该赔案能否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增值税金额不能确定,所以在缮制赔案时,赔款金额以价税合计填写。支付赔款时,可能存在先支付赔款后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景,也可能存在先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赔款的情景。所以,收付系统支付赔款和赔款增值税抵扣要设计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功能,并且没有优先顺序。

根据保监会的业务财务数据一致性要求,赔款增值税抵扣时,需要逐案抵扣,收付确认抵扣增值税时,需要录入赔案号等信息,抵扣后增值税信息需要同步到理赔系统,保证理赔系统、收付系统数据一致,理赔系统需记录赔款增值税抵扣金额和抵扣时间。

① 赔案核赔结案,计提赔款支付的分录

借:赔款支出—直接赔付支出 (价税合计)

贷:应付赔付款—直接赔款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赔款支出—损余物资折价

(三)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手续费及佣金是保险公司向代理人或经纪人支付的报酬,是保单获取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根据保监会相关要求,财产保险公司手续费及佣金支出要跟单结算(支付手续费时,需要对应保单)。支付手续费及佣金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代扣税完税证明,也应该逐单确认进项税额。

1.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的计算公式及确认时间

营改增后,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包括保费收入和增值税两部分,计算手续费及佣金时,应以不含税保费收入为计算基础。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 不含税保费收入 × 手续费率。如果是 2016 年 5 月之前签单的代理合同,需要按保费价税合计结算手续费,业务系统录入手续费比率 = 合同签订的手续率 × (1 + 6%)。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保险人在取得原保险合同过程中发生的手续费、佣金,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行业内对手续费及佣金有两种处理方法:(一)在保单生成时计入当期损益;(二)在确认保费收入时计入当期损益。根据收入支出配比原则,并兼顾企业税收利益,本文采用第二种做法。

2.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的计提

确认保费收入的同时,应计提手续费及佣金,公司应设置“预付手续费及佣金”“应付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科目核算手续费及佣金。计提手续费及佣金时,建议按价税合计计入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不能确定是否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计提手续费及佣金分录:

借: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价税合计)

贷: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价税合计)

3.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系统改造建议

公司收到保费资金时,一般就需要结算手续费及佣金,对预收保费也可能需要结算手续费及佣金。根据配比原则,支付预收保费的手续费计入“预付手续费及佣金”科目,确认保费收入时,再转入“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科目。

①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分录

借: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价税合计)

预付手续费及佣金 (价税合计)

贷:银行存款

② 向个人代理人支付手续费及佣金

根据税务规定,向个人代理人支付手续费及佣金,

② 实际支付赔款资金时

借:应付赔付款—直接赔款

贷:银行存款

③ 实物赔款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赔款支出—直接赔付支出

3. 直接理赔费用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直接理赔费用和直接赔付支出收款对象、支付时间可能不同,拒赔案件直接理赔费用需要支付,所以理赔系统直接理赔费用和直接赔付支出应分别核赔、结案处理。直接理赔费用核赔时也无法准确确定增值税金额,缮制赔案时直接理赔费用按价税合计录入。

① 直接理赔费用核赔结案时

借:赔款支出—直接理赔费用

贷:应付赔款—直接理赔费用

② 实际支付直接理赔费用资金时

借:应付赔付款—直接理赔费用

贷:银行存款

③ 直接理赔费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赔款支出—直接理赔费用

4. 损余物资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处置损余物资是否缴纳增值税,税务局尚未明确规定,但目前比较统一的意见是:按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按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对待,按简易办法依 3% 减按 2% 征收增值税。

① 取得损余物资时的分录

借:损余物资

贷:赔款支出—损余物资折价

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② 处置损余物资时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损余物资

③ 将待转销项税额计入销项税额的分录

借: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这样处理比较复杂,可能对一笔损余物资处理,理赔上需要两次重开赔案,实际业务中,损余物资一般价值较小,可以在实际处置时,按实际处置的不含税收入冲减直接赔付支出,并同时计算缴纳销项税额。合并后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保险公司需要代扣代缴增值税及附加、个人所得税。保险公司可以每月汇总到税务局代开手续费发票,可凭代扣增值税完税证明或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增值税。向个人代理人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分录:

借: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价税合计)
 预付手续费及佣金 (价税合计)
贷:应交税费—代扣代缴—增值税
 应交税费—代扣代缴—城建税
 应交税费—代扣代缴—教育费附加等
 应交税费—个人所得税—代理人
 银行存款

4. 确认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的进项税额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取得可抵扣票据对应的保单,确认进项税,并冲销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将增值税抵扣金额和抵扣时间传送到核心业务系统。为了减少工作量,不能取得可抵扣票据对应的保单,手续费增值税不做处理。

如果支付的手续费及佣金属于下面情形之一的,不确认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增值税。(1)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属于免税产品,(3)个人代理人没有达到增值税起征点。

确认手续费及佣金支出进项税额的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四)保险费发票开具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1. 开票系统开票信息需传送核心业务系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销售应税劳务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开具发票时间,可能会影响公司纳税义务时间,所以开票信息需传送核心业务系统(发票代码、发票种类、发票金额、付款人名称、发票开具时间等信息传送核心业务系统)。对既没有收取资金又没有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保单,先开具发票的,产生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 核心业务系统保单信息传送开票系统

为了减少手工开票工作量,核心业务系统保单信息应传送开票系统,比如保险单号、产品名称、保费金额、付款人名称、税号、地址及银行账号、代收车船税税款所属期(详细至月)、代收车船税金额、滞纳金金额、代收车船税金额合计等信息。

3. 增值税发票应备注代收车船税税款信息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机构代收车船税

开具增值税发票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1号):“保险机构作为车船税扣缴义务人,在代收车船税并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增值税发票备注栏中注明代收车船税税款信息。”

增值税发票备注栏空间较小,备注栏也只有一个车辆的代收车船税信息空间,对单位车队车辆,客户要求合并开具发票的,可以单独打印代收车船税清单。

4. 免税产品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6〕156号)第十条:“销售免税货物不得开具专用发票,法律、法规及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免税产品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上税率应为零,税款金额也应该为零。对一个保单既有免税产品又有应税产品(如主险应税,附加险免税)的,需分别开具发票,免税部分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对组合险产品(有免税部分和应税部分,但无法拆分),整个保单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五)费用报销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1. 增值税抵扣的税务规定

增值税属于价外税,资产、服务采购支付的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不计入采购成本。但按照目前税务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先比对后抵扣,也就是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税务局认证通过后,方可抵扣。保险公司在免税产品、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等业务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抵扣。

2. 费用报销核算流程设计建议

支付资产、服务采购款时,有两种选择:第一,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先进行税务认证,认证通过后再支付资金;第二,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先支付资金,后进行税务认证。认证前,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税额计入“待认证增值税额”科目,发票认证通过后转入“进项税额”科目,不能认证通过的专用发票,转入相关的采购成本。采用第一种方式,财务处理比较方便,不涉及税额调整,也有利于公司降低采购成本。但实际业务复杂多样,公司很难做到,还是建议公司采用第二种处理方法。

3. 费用报销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增值税专用发票先支付资金,后进行税务认证。费用报销流程为:经办人提交报销单→审批→付款→发票认证→增值税确认。付款前的流程基本不变,增加可抵扣的增值税确认环节。

费用报销系统中每个报销项目,应列示报销不

含税金额、增值税额、报销总金额三项,报销总金额=不含税金额+增值税额。报销单增加“是否不得抵扣”的标志。经办人在费用报销系统提交报销申请时,每个报销事项需要分别录入不含税金额、增值税额、报销总金额。对于属于不得抵扣项目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选中“不得抵扣”的标志。

① 报销单审批、付款的分录

借:业务及管理费 (“不含税金额”项目)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增值税额”项目)

贷:银行存款 (“报销总金额”项目)

② 如果是不得抵扣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付款分录

借:业务及管理费 (“报销总金额”项目)

贷:银行存款 (“报销总金额”项目)

③ 费用报销系统应有单独的模块记录、归集所有包含“增值税额”项目的报销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通过后,将发票对应的报销单进行增值税确认通过,产生的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④ 如果是不得抵扣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确认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⑤ 如果增值税专用发票最终认证不通过,将发票对应的报销单“增值税额”改为零,并将报销单确认通过,产生的分录

借:业务及管理费 (“增值税额”项目)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

报销单增值税额确认为零,需要将待认证进项税额还原到报销单的对费用项目。如果该报销单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本性支出项目,涉及到资产卡片原值的调整,还需要修改资产卡片原值。

4. 合理选择供应商可以降低采购成本

资产、服务采购时如果取得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的税额不计入采购成本。如果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则支付的税额不得抵扣,全部计入采购成本。建议公司选择供应商时,同等情况下选择能够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供应商。公司应对目前供应商名单进行梳理,或者重新确定供应商名单。

二、共保业务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共保业务(又称“共同保险业务”)是指公司与其他保险公司,使用同一保险合同,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责任,在同一保险期限进行保险的业务

形式。共保业务是两家及以上保险公司对同一投保人标的进行承保,分为主共保业务、从共保业务。本节只涉及主共保业务的会计核算及财务系统改造建议,从共保业务参考原保险业务保费会计核算流程的相关内容。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86号)关于共保业务开具发票的规定》:(一)主承保人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并全额收取保费,然后再与其他共保人签订共保协议并支付共保保费的,由主承保人向投保人全额开具发票,其他共保人向主承保人开具发票。(二)主承保人和其他共保人共同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并分别收取保费的,由主承保人和其他共保人分别就各自获得的保费收入向投保人开具发票。

根据上述规定,主共保公司核心业务系统录单时,应增加“全额开具发票”“净额开具发票”选项。开票的方式决定了主共保方的业务及核算流程。

为核算共保业务保费收付情况,建议公司设置“应收共保款—保费”“应付共保款—保费”“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等会计科目,用于核算代从共保方收取的保费和向从共保方支付的保费。

(一)主共保业务数据拆分

核心业务系统录单时,需要区分总保费收入、总销项税额,主方、各从方保费份额和主方、各从方销项税额。

[例1]保单总收入1000万元,主方份额收入600万元(60%),从方份额收入400万元(40%);增值税主方份额36万元,从方份额24万元,销项税总金额60万元,该保单价税总计1060万元。业务数据传送财务时,应区分以下数据:

总保费收入1000万元,从方保费-400万元(用负数表示);

总销项税额60万元,从方销项税-24万元(用负数表示)。

(二)全额开具发票先确认保费收入后收款

采用共保形式承保业务,大多数是财产险、工程险等单一危险单位保险金额较大业务,保险合同一般是先起保,后收款。全额开具发票的业务,公司应按份额确认保费收入,按合同全部收入计算确认销项税。接上例。

①按合同约定确认保费收入的分录

借:应收共保款—保费	400
应收保费	600
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60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共保业务

24

贷:保费收入 6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0

应付共保款—保费(价税合计) 424

②如果是先开发票,保险合同后起保的,需要将开票系统增值税相关信息传送财务系统,财务系统产生的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6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0

③收取投保人全额保费资金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1060

贷:应收共保款—保费 400

应收保费 600

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60

(三)全额开具发票先收款后确认保费收入

先收取保费资金后承担保险责任的,主共保方应在收取资金时按合同全部保费计算确认销项税,按收入份额计入预收保费(负债)。

①预收全额保费资金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1060

贷:应收共保款—保费 400

预收保费 6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60

②保险责任开始,将预收保费转入保费收入的分录

借:预收保费 600

应收共保款—保费 400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共保业务

24

贷:保费收入 600

应付共保款—保费 424

③向从共保方支付共保款时

借:应付共保款—保费 424

贷:银行存款 424

④取得从共保方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认证通过后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24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共保业务

24

一般保险公司都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能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从共保方不能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主共保方一般需要代扣代缴增值税,避免出现主共保方承担合同全部增值税的现象。

(四)净额开具发票业务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各共保方分别向客户开具发票,主共保方应按份额确认保费收入,承例1,按合同收入份额计算确认销项税,应确认的销项税额 = 600 万元 × 6% = 36 万元。

①按合同约定确认保费收入的分录

借:应收共保款—保费 400

应收保费 600

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60

贷:保费收入 6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6

应付共保款—保费 424

②如果是先开发票,保险合同后起保的,需要将开票系统增值税相关信息传送财务系统,财务系统产生的分录

借: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36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6

③主共保方收取全部保费资金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1060

贷:应收共保款—保费 400

应收保费 600

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60

④向从共保方支付共保款时的分录

借:应付共保款—保费 424

贷:银行存款 424

⑤投保人分别向各共保方支付保费资金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636

应付共保款—保费 424

贷:应收共保款—保费 400

应收保费 600

其他应收款—应收增值税 60

各共保方分别向客户开具发票,主共保方不涉及从共保方增值税的确认和抵扣。

三、再保险合同业务核算流程设计及信息系统改造建议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再保险业务的税收政策《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有关再保险、不动产租赁和非学历教育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68号):“试点纳税人提供再保险服务,实行与原保险服务一致的增值税政策;境内保险公司向境外保险公司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再保险服务,免征增值税。”从政策可以得出,再保险分出业

务和境内再保险分入业务是否缴纳增值税,由该再保险业务对应的原保险业务决定;境外的再保险分入业务免增值税。下面分再保险分入业务和再保险分出业务两种情况分别介绍。

(一)再保险分出业务

再保险分出业务与原保险业务增值税税收政策一致。也就是说,原保险业务免增值税,对应的再保险分出业务也免增值税;原保险业务应缴纳增值税,对应的再保险分出业务也需要缴纳增值税。

再保险系统分出保费需要拆分成不含税分出保费、分出保费增值税、分出保费价税合计三个项目,分保摊回的手续费、赔款项目不变。原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增值税项目分别乘以相应的分保比例,计算出不含税分出保费和分出保费的增值税,如果原保险合同增值税为零,计算出的分出保费增值税也为零。

[例2]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100万元,销项税6万元,保费价税合计106万元。分出比例10%,则不含税分出保费为10万元($100 \times 10\%$),分出保费增值税0.6万元($6 \times 10\%$),分出保费价税合计10.6万元。

①再保险分出业务月度挂账账单分录

借:分出保费	10.00
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再保业务	0.60
贷:应付分保账款—分出保费	10.60

每月业务部门出具的再保挂账账单,尚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挂账账单的分出保费增值税在“待认证进项税额”科目核算。为了区分共保业务、其他业务待认证进项税额,建议增设“再保业务”三级科目。

②再保结算分录

借:应付分保账款—分出保费	10.6
贷:银行存款	10.6

③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通过时的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0.6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再保业务	0.6

先取得并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结算再保资金,这样结算对公司最有利。实际工作中,往往要求先支付资金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收付系统中增值税抵扣和再保资金结算设为两个独立的业务模块,可以先抵扣后支付,也可以先支付后抵扣。

④再保结算,再保接收人是境外机构,需代扣代缴税费的分录

借:应付分保账款—分出保费	10.6
贷:应交税费—代扣代缴—增值税	0.6
应交税费—代扣代缴—城建税	0.042
应交税费—代扣代缴—教育费附加	0.018
应交税费—代扣代缴—地方教育费附加	0.012
银行存款	9.928

⑤公司用代扣代缴增值税完税凭证抵扣公司销项税时的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0.6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再保业务	0.6

⑥再保结算,如果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分录

借:分出保费	0.6
贷:应交税费—待认证进项税额—再保业务	0.6

如果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将不可抵扣的增值税还原成再保险系统的分出保费,需要还原到具体的保单。改环节再保系统改造比较大,如果暂时不能实现数据还原,可以在“业务及管理费”科目下设置“无法抵扣增值税”明细科目,用来核算再保业务不能抵扣的增值税。

(二)再保险分入业务

再保险系统分入业务应区分:境内免税业务、境内应税业务、境外免税业务、境外代扣税业务四种情况。如果是免税收入,分入的保费全部计入“分保费收入”;如果是应税收入,将分入保费对应的增值税计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

目前我国对境外分入的免增值税,但从国际上来看,分出国有可能不免税,并且要求分出方代扣代缴增值税及附加。应税再保分入,如果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出单位可能代扣增值税及附加。

①再保分入挂账账单分录(如果是免税,销项税额为零)

借:应收分保账款—分入保费	
贷:分保费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②再保分入业务结算时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分保账款—分入保费	

③如果是境外分入业务,分出单位按规定需要代扣税时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分保费用

贷:应收分保账款—分入保费

境外分入业务代扣的增值税及附加,不能抵扣,建议将这部分代扣的税金及附加计入“分保费用”。业务上向境外机构签订再保险分入协议时,应该了解分出机构所在国家的分保税务政策,如果分出国对再保分出业务不免税,再保业务部门出具挂账账单时,将税费计入分保费用,避免采用结算时再将税费还原到分保账单的处理方式。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form Suggestion for Insurance Company Accounting System and Information System after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a Value-added Tax.

LV Qing - yuan

(Answern Property Insuranc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Zhengzhou 450009, China)

Abstract: Since May 1, 2016, a nationwide business tax paid VAT pilot has implemented, financial industry, life services etc are all included in the pilot sectors, and this is the end of business tax, which has been operated more than 20 years. The chain of VAT deduction get further expansion. VAT tax needs to be calculated specifically excluded in price, accounting process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system in each section of insurance business are also needed to make th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 and reform. CIRC has special regulations for accounting processing platform and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of insurance company since insurance business accounting process and information system h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paper, some personal advice is put forward to insurance company for accounting process design and information system retrofit scheme.

Key words: insurance company; accounting process; information system

(上接第 21 页) 并且从它的观点而被感觉。”^{[7]130}张鲜明的《寐语》以身体意象为载体,在梦境中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表现出对现代个体生命的内在关怀。

参考文献:

- [1]张鲜明.寐语[J].大家,2016(4).
- [2][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3]管健.身体意象的心理学表达与社会表征意蕴[J].南开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5 号:原保险合同[Z].2006-02-15.
-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6 号:再保险合同[Z].2006-02-15.
- [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Z].2016-12-03.
- [4]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Z].2016-03-23.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 [4]张鲜明.创作谈[J]//寐语.大家,2016(4).
- [5]伍茂国.从叙事走向伦理:叙事伦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 [6]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7][美]威廉·詹姆士.彻底的经验主义[M].庞景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Narrative Imagin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Zhang Xianming's Novel *Dreamspell*

QIAO De - m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Zhang Xianming's new novel, *Dreamspell*, he uses the dream as the main frame, and finds a new way to narrative. In order to deliver the worry about living and identity, he uses fragmentation and a series of images. As for the images, some of them are the part of body. These images have the specific meanings and represent the complex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

Key words: imagination; body; fragmentation; identity - anxiety

产业融合视阈下“物流+”发展模式探索

——以商丘市为例

王海英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经贸系,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物流产业作为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制造业、商贸业之间的交互活动非常频繁,不同产业之间相互融合,产业界限逐渐趋于模糊。本文从产业融合视角,以“物流+农业”“物流+制造业”“物流+商贸业”的产业融合关系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竞争力的动力来源,以欠发达城市——商丘为例,提出区域物流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建议。

关键词:产业融合;物流业;农业;制造业;商贸业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10

中图分类号:F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52-04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产业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产业融合现象伴随新兴业态模式越发凸显并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强劲的动力。20世纪70年代,产业融合开始在计算机和通讯领域出现,随后扩展到金融、物流等服务性行业,并向第一、二产业渗透。作为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现代物流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较为密切,产业之间胶着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融合趋势。

一、文献综述

对产业融合的研究,主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尼古路(Nicholas Negroponte)运用经济学和几何学结合的方法,用三个相互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机业、广播业和印刷业三者的技术边界,他指出三个圆圈的交集部分将成为成长以及创新最快的领域。

Yoffie(1996)将产业融合定义为“采用数字技术后原来各自独立产品的整合”^[1]。以数字融合为基础,Greenstein和Khanna(1997)认为产业融合是“为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2]。

这些定义虽然只局限于以互联网为标志的计算机、通信和广播电视业之间的融合,但研究视角已从

引起产业融合现象的技术基础转向发生融合的产业边界的变化。欧洲委员会(1997)指出,产业融合是“技术网络平台、市场和产业联盟与合并三个角度的融合”^[3]。日本学者植草益(2001)认为产业融合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间的壁垒,以加强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4]

随着产业融合现象的扩散,理论界的研究视角也更为宽泛。国内学者对产业融合的研究也基本遵循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对产业边界的变化较为关注。厉无畏(2002)认为产业融合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进行相互交叉和渗透,直至融为一体,形成新的产业属性或者新型的产业形态^[5]。周振华(2002)通过对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融合案例的研究,认为产业融合是因为适应产业增长而产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6]。马健(2002)提出产业融合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带来产业边界和交叉处的技术融合,通过产业间业务、管理以及市场的资源整合,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的特征和市场需求,导致产业的企业之间竞争合作关系发生改变,最终使产业界限趋于模糊甚至重划产业界限。^[7]

收稿日期:2017-05-06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项目“产业集聚区内涵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一致性研究”(152400410382)

作者简介:王海英(1973—),女,河南虞城人,商丘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系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物流。

综上所述,关于现代物流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产业融合如何导致区域物流经济发展上来,本文以中部欠发达中小城市——商丘为例,分析物流业与农业、物流业与制造业、物流业与商贸业之间的产业融合关系及其表现的竞争力。

二、商丘市物流业发展基础

商丘市位于豫鲁苏皖四省接合部,是全国66个区域物流节点城市之一,同时也是国家“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之一。郑徐高铁与商合杭高铁交汇于此,京九与陇海普铁、310与105国道、连霍与济广高速也在此交汇,形成黄金“十字架”交通网络体系,交通枢纽城市地位已经初步确立。商丘市对物流业的发展高度重视,提出“依托大交通,形成大物流,构建大产业”的发展理念,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相关职能部门责任,在制度、政策上进一步向物流产业倾斜。2016年12月颁发了商政办[2016]151号文件,制定了《商丘市现代物流业跨越发展行动计划》。政策指向主要依托区位优势,以物流产业为抓手,进而带动商丘经济整体良性发展。

《2016年商丘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年末全市总人口915.12万人,常住人口728.17万人,属于人口大市,具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沿海地区及一、二线大城市。这也是东部产业转移的驱动力之一,为商丘市第三产业特别是物流产业的发展储备了低廉丰富的人力资源。

商丘地处中原,地势平坦,灾害性天气较少,有利于工程实施和交通运行,土地使用成本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吸引大型物流企业的入驻。

商丘市作为区域交通枢纽城市,具备发展物流产业的先天条件,作为欠发达地区,能否从产业融合视角以发展物流业带动融合产业,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Xin Zou 和 Brianna Smith(2015)认为区域物流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均衡发展的关系,物流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8]。基于这种观点。本文尝试构建了“物流业+”融合发展模式。

三、商丘物流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一)物流业+农业

传统的农业运输属于物流业的一个分支,以实现农资等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及其相关信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流动来满足市场需求的一个动态过程。近年来,随着农业物流逐步向高附加值的农产

品加工、配送等环节渗透,物流与农业的界限逐渐趋于模糊,农业物流逐渐活跃在欠发达农区,成为多元经济中颇具潜力的经济增长点,业态模式和产业主体也趋于多元性和创新性。

1. 以“310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依托,构建“农业+物流业”的产业融合主体

(1)构建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商)为核心的产业融合主体。商丘市310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在我国农产品市场上已具备一定影响力,并成为带动商丘农产品物流的骨干力量,但特色优势仍需挖掘,物流基础设施和设备需要升级和完善,物流信息平台尽管已经完成构建投入使用,但其开放程度、包容性、安全性等方面还需提高;商丘市构建“310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为产业融合主体,主要是提高农产品物流的储存、配送价值,引入物联网概念和产品质量追溯系统,通过农产品物流价值的不断提升,带动上游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农产品的升级,实现农业的供给侧改革,促进农产品价值链的整体增值。

(2)构建以农村合作社为核心的产业融合主体。商丘有很多优质的农产品,除小麦、玉米等传统品种外,宁陵酥梨、虞城红富士和惠楼山药,柘城辣椒和胡芹等特色农产品品质优越,但突出问题是这些优质农产品缺乏宣传力度,加工附加值较小,销售市场主要在当地,市场知名度低,加工储存手段原始,市场范围受到限制。因此,可以农村合作社为主体,建立特色农产品配送加工点,组织农民就地加工、分拣、包装,由政府支持加大对农产品物流设施的建设,并由农产品物流带动农资物流的良性运转。

2. 挖掘农业与其他产业联动中的物流价值

商丘市物流业与农业融合的发展通道中,不仅涉及到农业、物流业的两两融合,还和制造业紧密相连,其产业融合通道主要有两个:一是发展冷链物流,围绕“310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集散商品,瞄准目标消费区域——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进行城市配送活动,分散城市功能;二是农产品流通加工、深加工和高端农业,由原始粗放低附加值状态转变为高效的增值服务,促使产业链的转型升级。目前,利用物联网技术建设高端绿色农业示范园,也是农产品增值化的重要趋势。

(二)物流+制造业

早时期,物流活动最基本的形式就是企业物流。随着产业社会化程度的加大和物流服务功能的多元化,第三方、第四方物流的兴起,物流业产权的分离并没有引致产业服务功能的分离,制造业和物流业

的产业界限反而愈加模糊,与制造业交互融合的区域,被认为是物流活动最频繁的区域,也是物流增值最大的区域,可以看成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其主要发展模式有两个:

1. 基于供应链的协同物流发展模式

协同物流是供应链上各节点企业为了共同的客户目标,建立稳定的物流业务合作伙伴关系,自觉协调彼此行动的一种物流模式。协同物流模式本身就是供应链管理的进一步完善,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要求制造企业不仅考虑自身的物流运作,而且要考虑供应商;不仅要考虑到客户的客户,而且要考虑到供应商的供应商;不仅要致力于降低某项具体物流的成本,还要考虑整体供应链运作的总成本最低。可供操作的思路有两个:一是制造商设计供应链物流整体方案,制造商主导供应链,整合上下游节点企业的物流资源,寻求供应链物流合作商,进行信息共享,优化链条物流活动而非仅仅节点企业,从而达到供应链物流成本有效降低;二是物流商主动介入模式,树立供应链服务理念,而非单体制造企业。供应链实现协同物流的关键就是信息共享,商丘可以借鉴的手段是借助商丘传化物流项目,将知名制造业引入传化港区,由传化物流整合制造业供应链,特别是供应链物流,从而实现协同发展。

2. 基于产业集群视角的战略联盟合作模式

物流业与制造业组成战略联盟,促使现代物流服务网络与制造业产业集群进一步协调发展,以产业集群发展作为自身发展的坚实基础,充分利用好产业集群为其提供的契机,与制造业产业集群融合渗透、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这种联动发展属于产业融合与共生关系。

商丘市产业集聚区在区域经济中主导作用非常突出,2016年全年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04.3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86.2%。物流业与制造业产业集聚区融合发展的模式有三种:一是“企业+企业”模式,即产业集群内的知名企业设计自己的物流战略和物流方案,寻找物流合作企业支撑其完成,物流企业需要结合制造企业的战略和方案调整自己的组织体系和业务流程;二是“集群+企业”的模式,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在追求行业规模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引入大中型物流企业,设计为集群服务的整体物流方案;第三种即政府层次,“集群+政府+物流园区(配送中心)”的模式,政府负责提供政策支持,规划产业集群的整体发展战略,选择在产业集群周围建立物流园区或者配送中心,针对产业集群的产业特色提

供物流服务。在税收政策、土地规划等方面给予优惠,吸引优质物流企业入园。这种发展模式,既结合了商丘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商丘市“一核十园多节点”的产业布局,具有实际操作意义。

(三)物流+商贸业

商丘商贸业的发展必须依托电子商务发展,电子商务与快递业又紧密关联。这种高度融合的发展模式是业态发展的自然模式。规划电子商务产业园时可独立设计快递区。如果商丘物流服务远期目标定位是国内甚至国际快递中转枢纽的话,设计时应预留足够空间。

基于商丘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三商之源”的文化底蕴,物流与商贸业的协同融合发展模式主要如下:

1. 以商丘“保税物流中心”为依托的跨境电商模式

随着中高消费阶层的形成,国际“轻奢品”(化妆品、服装、奶粉等)市场逐渐受到白领阶层的热捧,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商丘市可以通过“保税物流中心”快速完成境外商品的配送。同时也可集“货”出关,带动输出性物流,建设国际物流中转枢纽。商丘“保税物流中心”建成后具有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口岸功能、信息处理和咨询服务、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等七大功能,成为辐射周边150千米内唯一“内陆港”和大型保税物流服务平台,对商丘及周边地区外向型经济平台建设、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改造具有积极意义。商丘也有望成为覆盖方圆半径150千米的国际进出口商品集散地、集保税仓储、国际物流中心、跨境电子商务中心等等于一身的外向型经济城市。

2. 依托商丘立体交通优势的多式联运模式

多式联运型物流园区建设是我国物流节点建设和政策倾向的主流,也是具有交通节点优势的城市物流建设与设计的重点方向。多式联运强调至少有两种以上的运输方式,选址尽量处于公路、铁路、水路运输的交叉点上,以实现多种运输方式的有效衔接。商丘可以通过发展多式联运模式开展国际物流业务,在充分发掘商丘自身制造力的同时,输入国际市场廉价的原材料,将过剩的食品、纺织、五金量具等产能出口到国外,从而盘活资源搞活企业,达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利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自身便捷的交通优势,组织采购国内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将性价比高的商品销往中亚、西亚、南亚、拉美、非洲、中欧等新兴市场和东盟自贸

区,由此撬动国际物流与商贸业协同发展的创新板块。

3. 依靠区域优势树立的商贸品牌模式

物流的“物”字,除了挖掘本地物“源”,发展农业、制造业之外,还应该依托交通优势,发展以市场为依托的商贸业,打造具有较强国内外影响力的市场品牌。如“310农产品批发市场”“中意建材市场”、全国性的五金量具交易市场、全国性超硬材料(金刚石粉)交易市场,依托民权中国制冷基地和商丘农业大市,打造全国性冷链物流市场。

发展区域专业市场:区域性的建材市场,比如“中意建材”“八一建材”市场;区域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如“光彩大市场”;区域性的汽车交易市场,如“中原汽车城”等。利用这些品牌市场,引物入商,集散商品。

围绕现有的专业市场基础,做大做强,发展区域物流、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不仅要服务于商丘本地和周边,还可以将优质专业市场的辐射面扩大到国内,利用商丘交通枢纽条件,发展物流中转、仓储、配送功能,建设区域性的中转中心、仓储中心和配送中心,快速实现国内商品的集散、配送,以此构建基于专业市场的大型仓储配送网络和货物中转枢纽,物流业和商贸业良性互动,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 [1] Yoffie D B. Introduction: Chess and Competing in the Age of Digital Convergence [C] // Yoffie D B (ed.). Competing in the age of digital convergence, Boston, 1997.
- [2] Greenstein S, Khanna T. What Does Industry Convergence Mean? [A] // Yoffie D (ed.). Competing in the Age of Digital Convergence, Boston, 1997: 201 - 226.
- [3] European Commission. Green Paper on the Convergen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R]. <http://www.ispo.ece.be>, 1997.
- [4] 植草益. 信息通讯业的产业融合[J]. 中国工业经济, 2001(2).
- [5] 厉无畏. 产业发展的趋势研判与理性思考[J]. 中国工业经济, 2002(4): 5 - 11.
- [6] 周振华. 信息化进程中的产业融合研究[J]. 经济学动态, 2002(6): 12 - 14.
- [7] 马健. 产业融合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8] Xin Zou, Brianna Smith. An Empirical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Logist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Logistic Model [C] // 信息化与工程国际学会. Proceedings of 2015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CEMIT 2015). 信息化与工程国际学会, 2015: 8.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Logistics + ” in the View of Industry Convergence

——Taking Shangqiu as an Example

WANG Hai - yi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ing, Shangqiu polytechnic, Shangqiu, Henan 476000, China)

Abstract: As a service industry with the high degree of socialization, logistics industry has frequently interacted with agricultur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makes the industry boundaries vagu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nd the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onvergence, such as “logistics + agriculture” “logistics + manufacturing”, “logistics + commerce”. It takes a developing city, Shangqiu,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of util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logistics to lead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industry convergence; logistics industry; agricultur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mmerce industry

论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批准制度

伊士国^{1,2}, 李杰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 100720; 2.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2)

摘要:2015年《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使我国地方立法主体实现了极大扩容,但也面临危及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风险。而建立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立法质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目前这一制度存在审查的标准不够明确、审查批准的程序缺失、审查之后的处理办法规定不明等问题,需要通过采取诸如明确审查的标准、细化审查批准的程序、明确审查之后的处理办法等措施,进一步完善该制度。

关键词: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11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56-06

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以下简称2015年《立法法》)赋予了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使设区的市成为了独立的立法层级,实现了由较大的市立法权到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过渡;也使我国地方立法主体实现了极大扩容,即由49个较大的市直接扩容到了284个设区的市,这就重构了我国的立法格局。那么,在今后“法出多门”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就成为了未来立法工作的重点难点所在,而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批准制度正是因此而生。

一、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功能定位

2015年《立法法》既“授权”又“限权”,即在赋予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的同时,为了避免立法权的滥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又采取了诸多“限权”措施,其中的核心之一就是建立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批准制度。

(一)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基本内容

2015年《立法法》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

查批准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批准制度。必须要说明的是,审查批准制度并非2015年《立法法》所首创,1986年《地方组织法》首次赋予较大的市立法权时,就规定较大的市地方性法规需经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实施,以加强对较大的市立法权的监督。而基于同样目的,2000年《立法法》沿袭了上述规定。根据2015年《立法法》第72条第二款的规定,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审查批准的主体。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批准主体是其上一级立法主体,即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二,审查批准的客体。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的客体仅限于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而不包括设区的市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第三,审查批准的标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的标准即合法性标准,也就是审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是否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省级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第四,审查批准的时间。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的最长期限为4个月,即只要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符合合法性标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

收稿日期:2017-04-19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设区的市立法权研究”(HB16FX003);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河北省公众参与地方政府立法机制研究”(HB15FX042)

作者简介:伊士国(1982—),男,河北永年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宪法学。

4个月内必须予以批准。第五,审查结果的处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根据审查的结果,作出相应的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

(二)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功能定位

对于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批准制度是否应设立的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不少争议。反对者认为,这一制度的设立,使得设区的市立法权成为了“不完全立法权”或“半个立法权”,这就难以实现2015年《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的目的。而支持者则认为,这一制度的设立,具有合理性,体现了2015年《立法法》对设区的市既“授权”又“限权”的立法目的。我们赞同后者观点,认为这一制度的设立非常必要,具有重要的功能,具体如下:

第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功能。随着2015年《立法法》赋予了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我国地方立法体制有了重大调整,立法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任务更加繁重,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设立也显得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是我国宪法规定的重要原则,其“包括三层意思:一是一切法的形式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二是下位阶的法不能与上位阶的法相抵触;三是同位阶的法相互之间不能抵触。这三个层次结合起来,就能保证我国法律体系的内部和谐一致,从而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1]由此可知,坚持不抵触原则,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而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设立,其目的就在于保证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行使必须贯彻落实不抵触原则。这表现在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要对报送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只有在其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时才批准其生效,这就保证了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第二,监督制约功能。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对于设区的市立法权来说,亦是如此。在2015年《立法法》一次性赋予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防范设区的市立法权滥用就成为了当务之急。为此,2015年《立法法》规定了一系列的监督制约措施,一是明确限定了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即将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定在“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

制定地方性法规”;二是建立了设区的市立法权行使批准制度,即为了避免因设区的市立法能力的不足而导致的立法质量下降,2015年《立法法》明确规定,除了原有的较大的市外,其他设区的市开始行使立法权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综合考虑其立法能力、立法需求等因素后确定;三是建立了备案审查制度,即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必须经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四是建立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其中,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最为重要,因为其属于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对设区的市立法权的直接监督制约,是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生效前的最后一道“把关”环节,关系到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能否最终生效。

第三,合宪性保障功能。合宪性是设区的市立法权存在和行使的重要基础。但我国现行《宪法》目前只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并未规定原较大的市和设区的市享有立法权。特别是在1986年《地方组织法》赋予原较大的市立法权之后的几次修宪过程中,也没有将原较大的市立法权列入宪法文本中。那么是否意味着原较大的市或设区的市立法权违宪呢?我们认为,并非如此,主要原因在于《立法法》在赋予原较大的市或设区的市立法权的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审查批准制度,解决了这一合宪性问题。具体言之,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原较大的市和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只有经过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法性审查后,经批准才能生效,即原较大的市和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生效的最终决定权在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手中。这种“不完全立法权”或者说“半个立法权”可以看作是省、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的延伸,从而也就消除了原较大的市和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违宪嫌疑,保证了原较大的市和设区的市立法权的合宪性。

二、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性质之探讨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之所以备受争议,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这一制度的性质和功能始终不能达成共识。由于上文已对这一制度的功能定位进行了分析,现对其性质进行探讨,以便于为后文探讨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审查批准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的建议提供基础和依据。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

查批准制度的性质认定,主要有两种分歧:一是认为这一制度属于一种监督性制度,据此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享有的审查批准权是一种监督性权力,只能在程序上对设区的市立法权进行监督制约,只要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不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与上位法不抵触,就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批准决定;二是认为这一制度属于一种决定性制度,据此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享有的审查批准权是一种实质性权力,其不仅仅掌握着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生死大权”,还能左右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内容,是一种决定权。也就是说,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既要报批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形式审查还要进行实质审查,除了作出批准与否的决定之外,还可以对其进行修改。那么,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性质究竟如何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地方立法权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制度应属于一种监督性制度。整体而言,我国地方立法权经历了从省级地方立法权到较大的市立法权、从较大的市立法权到设区的市立法权两个阶段。而从较大的市立法权到设区的市立法权,又经历了两个小阶段。第一阶段(1982—1986年):1982年《地方组织法》修改时,对较大的市立法权作了开创性的规定,赋予了较大的市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的拟定权,即此时较大的市人大常委会只能拟定本市需要的地方性法规草案交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制定,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立法主体。1986年再次修改《地方组织法》时,不仅将较大的市人大常委会“拟定权”升格为了“制定权”,且赋予了较大的市人大常委会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但其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必须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这就改变了原来的“审议制定”规定。至此,49个较大的市拥有了较完整的地方立法权,改变了地方立法主体格局。第二阶段(1986—2015年):2015年修改《立法法》时,正式赋予了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实现了从较大的市立法权到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过渡,但又规定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必须交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即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综上,从“拟定权”到“制定权”,从“审议制定”到“审查批准”,可以看出,立法权不断下放、地方立法权限不断完整是大势所趋。若认为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批准权不仅可以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合法性进行审查,还可以对其进行合理性审查,甚至还能修改其内容,无异于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权等同于了其过去享有的“审议

制定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据此,我们可以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权界定为监督性权力,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性质界定为监督性制度。

其次,从立法目的来看,这一制度应属于一种监督性制度。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设区的市土地、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环境、城乡建设与管理、社会治理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管理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区域当然要依靠法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除了国家的法律法规、省一级的法规,还有一些具有本行政区域特点和特别需要的事项,国家和省级不可能专门立法,所以有必要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赋予其地方立法权。”^[3]2015年《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的目的在于此。因而,为了更好地发挥设区的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立法推动设区的市治理的法治化,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定位为一种监督性制度更为合适。因为若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权定位为决定权,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会过多地干预设区的市立法权,不仅会遏制设区的市立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降低地方立法的特色性和可操作性,还有可能将新赋予的设区的市立法权架空。

再次,从立法权行使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应属于监督性制度。根据有关规定,具有立法权的主体每年度都会制定立法工作计划,也会审议下一级立法主体的立法工作计划。过去立法实践中,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较大的市的立法工作计划进行审议,一方面是增强其立法的计划性,确保立法质量;另一方面也会为减轻自身工作而对其立法计划进行压缩和精简。而随着2015年《立法法》赋予了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地方立法主体急剧增加,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数量必然也大量增加。这时,如果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批准工作不仅仅是一种监督性工作,还包括其他实质性审查事项,他们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也根本难以承受,设区的市立法质量自然也会大打折扣。因而,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只能是一种监督性制度。

综上所述,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批准制度只是一种监督性制度,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只应依照不抵触原则对设区的市报批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若其与上位法不抵触,又在设区的市相应立法权限内,就应在4个月内对其作出批准决定。这与2015年《立法法》第72条第二款的规定也是相符合的。^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也明确指出:“对于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是否适当、立法技术

是否完美、文字表述是否优美,不作审查。”^[3]

三、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2015年《立法法》试图从立法上建立一个完善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但随着设区的市立法实践的不断开展和深化,这一制度存在的问题日益显露,主要表现在:

(一)审查的标准不够明确

根据2015年《立法法》第72条第二款的规定,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要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其审查标准就是“不抵触”。但实践中“不抵触”的具体判断标准尚不明确,亟需解决。具体言之,第一,尽管根据2015年《立法法》第96条的规定,立法中的相抵触情形一共包括三项,即超越权限的、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违背法定程序的,但这些规定较为抽象、笼统,难以为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开展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工作提供明确的标准依据,有待于进一步细化。第二,根据2015年《立法法》第72、73条的规定,为了贯彻落实不抵触原则,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必须从四个方面入手,一要立足于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二要符合自身的立法权限;三要与法律、行政法规等上位法相一致;四要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內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以上四个方面看似明确,但对于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来说,依然面临标准不明、操作难的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立法技术、立法水平的缺陷,重复立法是地方立法长期存在的主要弊病之一。重复立法实质上是立法的怠惰,只重复不立法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还会造成立法资源的大量浪费。^[4]但重复立法是否应纳入合法性审查的范围?重复立法是否属于“相抵触”的情形?目前立法上并未明确规定,上述的三个“相抵触”情形也不包括这一情形。且更为矛盾的是,2015年《立法法》第73条第四款规定的是,一般不对上位法作重复性规定,而“一般”这种模糊的表述似乎是为重复立法开了一条口子。

(二)审查批准的程序缺失

2015年《立法法》只是笼统地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作了规定,而没有对具体的审查批准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各地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做法不一,影响了这一制度功效的发挥。实际上,审查批准程序包括两部分:第一,报请审查批准程序,即由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请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其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的程序,这里面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报

请审查批准的主体是谁?由于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都能制定地方性法规,那么,究竟由谁来报请审查批准呢?是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报各的?还是由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统一报请?目前尚无明确规定。二是在多长时间内报请审查批准?2015年《立法法》只是规定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的时间,即4个月内,而没有规定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请审查批准的时间。三是报请审查批准的材料都包括什么?是否需要提交除了法规草案以外的其他材料?目前也缺乏明确规定。第二,审查批准程序,即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的具体程序,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审查批准工作的具体步骤包括哪些?目前尚无明确规定。二是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形式为何?是书面审查还是需要召开一个专门的审查会议?需不需要由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派人参加并作出必要的说明和答疑?这些目前也无明确的规定。

(三)审查之后的处理办法规定不明

从2015年《立法法》第72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內容来看,似乎其对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之后的处理办法作了明确规定,但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其还存在许多不明之处,具体说来:第一,尽管2015年《立法法》明确规定,只要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形,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就应当作出批准的决定,但如果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存在相抵触的情形,是不是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只能作出不批准的决定?还有没有其他处理办法?这些都处于一个不明确的状态。第二,2015年《立法法》只是笼统规定,如果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本省、自治区政府规章存在相抵触的情形,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应当作出处理决定”,但是对于其应当作出哪些处理决定?现行立法并无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无章可循,各地做法不一。

四、健全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

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凸显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的不足,也影响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应有功效的发挥。因而,我们应采取相应措施,健全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制度。考虑到2015年《立法法》颁布实施才一年有余,因而,从尽可能保持立法的稳定性角度出发,不宜轻易修改《立法法》,可以考虑通过立法解释或由各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制定配套性法规的途径予以解决,具体说来:

(一)明确审查的标准

为了保证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能够有效行使审查批准权,首先需要明确合法性的审查标准,即判断“不抵触”或“抵触”的具体标准。目前,各省、自治区根据2015年《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制定或修定地方立法条例的形式,对“不抵触”或“抵触”的具体标准作了细化^②,为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审查批准工作提供了明确依据。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规定虽然明确,但也存在一些模糊和抽象之处,缺乏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予以细化明确。例如,什么属于“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情形?实践中并不好判断,需要进一步予以细化。对此,我们认为,可以借鉴苗连营教授的观点,将其进一步细化为四种情形,具体包括:“1.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而地方性立法却作出禁止性规定;或明文禁止的却作出允许性规定。2.增加、减少或变更了法律责任的种类、幅度、适用范围或适用条件。3.增加、减少或变更了执法主体、执法主体的执法权限或执法程序。4.增加、减少或变更了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或者改变了履行义务、行使权利的原则、条件或程序。”^[5]

此外,对于重复立法是否能作为判断“不抵触”或“抵触”的具体标准的问题,我们认为,重复立法尽管造成了大量的立法资源浪费,但重复立法仅仅是下位法对上位法的重复规定,并不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不属于“抵触”的情形。而且,如果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是否属于重复立法都要进行审查的话,则会大大增加其负担,使其不堪重负,导致审查批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且这也与2015年《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相违背,一方面,2015年《立法法》第72条第二款的立法原意就是,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只能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不能进行别的方面审查;另一方面,2015年《立法法》第73条第四款的立法目的就在于解决过去长期存在的重复立法问题,而不是解决“抵触”问题。其之所以没有绝对禁止重复立法,原因在于地方立法分为创制性地方立法和实施性地方立法两种,如果要求创制性地方立法不得重复立法,那是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如果要求实施性地方立法不得重复立法,则难以做到,因为实施性地方立法本身就是对上位法的细化,有内容重复属于自然状况。

(二)细化审查批准的程序

为了保证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效开展审查批准工作,必须要建立细致的程序规则,以为其提供

程序保障。目前,各地已经通过立法进行了探索,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程序机制,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具体说来:第一,要建立完善的报请审查程序。一是关于报请审查的主体。尽管按照“谁制定、谁报批”的原则,应该由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别对自己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报批,但考虑到设区的市人大每年仅召开一次会议,会期为七天左右,加上会务繁重,因而由设区的市人大对其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报批显然是不太符合实际的,再加上设区的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大多是由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起草完成的,对其内容比较熟悉,因此,为了方便开展工作,由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统一对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报批审查较为妥当。目前各地立法均采纳了这一主张。二是关于报请审查的时间。考虑到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在表决通过后,如若提请审查被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否决,会造成极大的立法资源浪费,因而,我们建议可以提前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草案提交给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审议,及时征询其对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草案的意见,以避免“抵触”条款的出台,节省立法资源。三是关于报请审查的材料。为了保证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效地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请审查的材料除了包括地方性法规草案外,还应当包括制定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详细说明、参考资料、专家意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等。第二,要建立完善的审查批准程序。一是关于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审查批准工作的具体步骤。借鉴地方立法的有益经验,其具体应包括:先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审查后,向主任会议提交审议情况报告,再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最后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后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二是关于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的形式。考虑到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特点及其审查批准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建议,应通过召开专门审查会议的形式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报请审查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应当到会作出解释说明,并回答询问,听取各种意见建议。

(三)明确审查之后的处理办法

对于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之后的处理办法,我们认为,应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分别予以明确,具体说来:第一,当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不存在“抵触”情形时,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应在4个月内作出批准的决定。第二,当设区

的市地方性法规存在“抵触”情形时,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理应作出不批准的决定,并将相关理由告知该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但考虑到具体情况比较复杂,我们认为,可以进一步予以细化,一是当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某些条款存在“抵触”情形,且与整部地方性法规不可分割时,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就只能作出不批准的决定,由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重新制定或作重大修改,再依照程序重新报批;二是当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某些条款存在“抵触”情形,且可与整部地方性法规分割时,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可以建议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对这些“抵触”条款进行修改,再依据修改情况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第三,当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存在与省、自治区政府规章相抵触的情形时,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其中,若认为省、自治区政府规章不适当的,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应当批准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同时视情况撤销省、自治区政府规章或责成省、自治区政府修改该政府规章;若认为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不适当的,但不存在“抵触”情形的,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可以在该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修改后,视情况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若认为两者都不适当的,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则可根据上述两者情况分别作出处理决定。

注释:

①《立法法》第72条第二款:“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

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②例如,《贵州省地方立法条例》第41条规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抵触:(一)超越立法权限;(二)违反上位法规定;(三)设定的行政处罚超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河南省地方立法条例》第65条规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抵触:(一)超越立法权限;(二)上位法有明确规定的,违反该规定;(三)上位法没有明确规定的,违反上位法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 [1] 乔晓阳.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四讲: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维护国家法制统一[EB/OL].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1998-10/20/content_1459904.htm.
- [2] [法]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张雁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54.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7.
- [4] 吕新华. 论重复立法之克服[J].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7):36-41.
- [5] 苗连营. 论地方立法工作中“不抵触”标准的认定[J]. 法学家,1996(5):39-4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On th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of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Districts

YI Shi - guo^{1,2}, LI Jie²

(1. Institute of Law,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20, China;

2.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0, China)

Abstract: In 2015, the “legislative law” grants the legislative power to all districts, so that the local legislative system of our country achieves great expansion, but also faces the risk of endangering the unity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ity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on and to maintain the unity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But current approach doesn't have a clear standard of review, lacks of procedure for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So we need to establish a regulation for a clear standard review, a detailed approval procedure and a standard for all the solutions after review to get a further improvement for this system.

Key words: city of districts; local regulations; examination; approval

新形势下我国《律师法》的修订与完善

曹志龙, 陆利平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上海 200002)

摘要: 律师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律师法》的历次修订体现了一定的规律性。在当前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新形势下, 应当根据国家对于律师制度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 从律师定义、律师业务、律师执业管理、律师权利保障、律师事务所管理、律师行业发展与管理等方面, 对《律师法》进行新一轮的全面修订。

关键词: 律师法; 修订; 律师制度; 律师; 律师行业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12

中图分类号: D91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17)03-0062-07

律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 律师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律师法》于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这在我国律师事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此后经历了三次不同程度的修改。2016年6月13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根据我国法治建设的新形势、律师业的新发展, 纲领性地提出了律师制度改革的精神和部署。本文将以此为指导, 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律师行业的不断发展、诉讼程序的不断优化的大背景下, 从律师行业发展和律师制度创新的视角, 对《律师法》的修改与完善进行探讨。

一、我国现行《律师法》的颁布实施与三次修订

(一) 1996年《律师法》的颁布与实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 同时, 健全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此背景下, 我国的律师制度得以逐步恢复起来^[1]。

1979年7月,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七

部法律中, 系统地规定了被告享有辩护权及律师参加刑事辩护的基本原则。同年, 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的文件, 司法部开始恢复筹建并着手重建律师制度工作。1980年3月, 邓小平同志指出: “律师队伍需要扩大, 不搞这个法制不行”, “中国要有十几万律师”。在党中央的指示和领导下, 恢复和重建律师制度的工作迅速推进。

1980年8月26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 对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性质, 律师的任务、职责, 律师资格的取得, 律师的业务范围, 律师的权利、义务, 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工作的管理,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性质和地位等内容做了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律师制度的第一部法律。

1989年3月, 司法部与有关部门在改革实践的基础上, 开始着手起草《律师法》。1995年9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律师法》, 并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典, 在我国律师事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 对于完善律师制度、保障律

收稿日期: 2017-03-12

作者简介: 曹志龙(1975—), 男, 山东菏泽人,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全国律协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律协理事。

师依法执业、规范律师执业行为、进一步发挥律师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律师法的三次修订

1. 《律师法》第一次修订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律师法》进行了小范围修订,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主要修订的内容是针对国家已经建立的统一司法考试,在原有的律师资格考试基础上,进行相应的修改。

2. 《律师法》第二次修订

自2004年起,司法部组建修改《律师法》十人专家组,着手研究修改《律师法》。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律师法》,定于2008年6月1日起实施。此次修改后的《律师法》存在不少超越当时《刑事诉讼法》的内容,表明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已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更要关注各种社会矛盾^[2],修改《律师法》成为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

此次修改《律师法》,删除各种表述50多处,增加内容90多处,调整表述先后顺序40多处,是《律师法》历次修改中动作最大的一次。修改后的《律师法》,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律师定义、律师执业许可、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律师执业权利和义务、律师协会的职责、律师业务和律师执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提出不少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律师制度的举措。此次修改幅度最大的是关于律师权利义务的修订。比如:有关辩护人的职责及证明责任降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被明确提前到侦查阶段、侦查阶段律师的地位被明确为辩护人、扩大了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查阅案卷材料的范围、强化了律师调查取证权、新增了律师免证权、律师言论豁免权等等,体现了权利保障原则在律师制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

3. 《律师法》的第三次修订

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就《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脱节之处进行了修改。可以说,这次《律师法》的修改,主要是为了配合《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实施。两部修订后的法律,都于2013年1月1日开始施行。2012年《律师法》修改涉及6个条文,主要包括:(1)将刑事案件的接受委托统一为担任辩

护人;(2)特别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3)扩大会见权的时间范围;(4)扩大阅卷权的时间范围;(5)侦查机关对律师涉嫌犯罪通知程序的优化;(6)律师保密权。

二、《律师法》修订的特点

(一)《律师法》颁布、修订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具有因果关系

1996年《律师法》的颁布背景,是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并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通过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相比较,发现2007年第二次修改后的《律师法》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诉讼程序中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执业权利的内容。但由于与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律师执业的规定存在着冲突,以致于《律师法》施行后并未真正得到贯彻落实,执行机关亦多是选择性执法,甚至学术界与实务界对适用新法优于旧法,还是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定来选择适用法律观点各异。当然,这也揭示了这一冲突背后隐含的刑事司法理念的转变及冲突。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决定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修改幅度之大前所未有,达到111处之多。其中一部分修改,就2007年《律师法》修订超越当时《刑事诉讼法》的部分进行了修改和统一,同时也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些程序性和权利性规定,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前瞻性规定。为确保与《刑事诉讼法》的一致性,2012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重点针对《律师法》中关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和程序性规定进行了修改。

由此可见,《律师法》颁布、修订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同时也说明,律师制度并不是与国家、法同时产生与存在的,而是在国家与法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一种法律制度,律师制度的产生要以国家的基本法以及诉讼法确定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为前提,律师制度无法超越诉讼立法特别是刑事诉讼立法而存在。而诉讼立法所确定的国家司法权力配置、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往往可以成为评价和反映司法民主与法治程度的标志^[3]。

(二)《律师法》的修订与法律职业制度改革具有直接关联性

2001年10月31日,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

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实施办法》规定,从2002年起,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相应地,2001年12月29日修订了《律师法》,将原规定的律师资格考试改为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2015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提出将现行司法考试制度调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司法考试制度确定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四类法律职业人员基础上,该《意见》将部分涉及对公民、法人权利义务的保障、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法律从业人员纳入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范围。因此,此次《律师法》修订,也应当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的相关内容取代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相关内容。

可以说,律师制度改革是法律职业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法律职业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

(三)《律师法》的修订取决于律师业发展及面临的挑战

律师业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新挑战,例如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问题、律师规范执业问题、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问题、律师行业自律问题等。为适应新时期面对的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相继出台规章制度、意见、办法,如《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等,在规范和管理律师执业的同时,推动建立和落实律师权利救济和保障机制。因此,《律师法》的修订既要针对律师业发展和面临的挑战,也要回应党和国家关于律师制度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

三、新一轮《律师法》修改的背景

2012年10月《律师法》第三次修改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律师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新的挑战。

(一)中央有关重要文件陆续出台

2014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2015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两高分别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就保障律师权利、为律师履职提供便利、建立律师权利救济机制等进行了规定。

2015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通过了49个条文,就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促进律师事业发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作用进行了详细规定,有些规定是对现有《律师法》和三大诉讼法规定的进一步明确,有些规定则是直接提出了保障律师权利的新做法,如关于便利律师参与诉讼的有关措施的规定等。

2016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对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意见》肯定了律师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律师队伍为国家法治建设作出的贡献和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从完善律师执业保障机制、健全律师执业管理制度、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了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任务措施,尤其是提出关于律师队伍要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要求。为完善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制度,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积极稳妥推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

近年来,司法部一手抓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认真贯彻落实《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推动建立和落实律师权利救济和保障机制;一手抓律师执业规范和管理,修订《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律师行为规范和律师事务所管理规范。司法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协会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律师协会建设、发挥律师协会行业自律作用等提出明确要求。为推进涉外法律服务发展,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明确提出发展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健全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司法部还先后参与了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等司法体制改革项目的研究工作等,进一步完善律师制度。

(二)律师业和律师队伍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推动《律师法》修改

律师执业权利不受保障现象屡见不鲜。首先是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受到不当干扰,看守所或其他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予以拖延甚至拒绝。其次是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受到司法机关的不公正对待,比如广西某律师因立案受阻导致发生冲突,最终裤子被撕破,经媒体报道后,直接影响了法院和律师双方的形

象。再次是律师在庭审过程中的辩护权、辩论权被审判人员剥夺,甚至受到法警的干扰和威胁^[4]。近年来,此种现象层出不穷,归根结底,是三大诉讼法和中央的有关文件中关于律师权利保障的规定在基层并未得到有效执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律师法》中并未将有关权利性的规定予以正式固定。法律是权利的宣言书,权利必须明定在法律中,并规定相应的保障和救济措施^[5]。

极少数律师的不当言行,损害了律师队伍的形象,也影响了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比如极少数律师在律师权利未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采用非常规方式,如在法院门口“静坐”“打拳”等方式予以抗议。也有律师在互联网上发布与党和国家的法律、政策相违背的言论,误导公众,甚至危害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安全。对此,十分有必要在《律师法》修改时将政治坚定性作为律师执业的基本要求。

律师业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有损律师行业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首先,律师收费标准的市场导向,导致律师行业通过不合理压价进行价格竞争加剧,有些时候甚至作为律师法律服务购买者的政府机关也不当地利用这种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一方面导致行业管理混乱,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律师服务的整体水平。其次,律师队伍规模的不断壮大,律师管理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律师不当兼业问题、涉外法律服务机构问题等等。

律师协会自身的不断建设也需要《律师法》不断完善及修改。本文后续也会提及,目前我国各地律师协会在自身建设中就其定位、管理体制、层级设置均出现不同意见,实践中各地律师协会也采取不同的治理结构,导致设置不明确、管理混乱等情况出现。因此,借助修订《律师法》来起到规范作用,律师协会这一自律管理组织也会不断完善。

(三)有关领导讲话精神为《律师法》的修改指明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法律规定的律师执业权利切实落实到位,建立健全配套的工作制度和救济机制,依法保障律师在辩护、代理中所享有的各项执业权利,确保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能够得到及时纠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在2015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化律师制度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是律师事业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要抓住制约律师事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以进一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为重点,加大改革力度,完善律师法

等法律制度,为律师队伍在全面依法治国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制度保障。

2017年3月,司法部部长张军提出了律师是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朋友的论断,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为《律师法》修改中协调各方关系,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准备作用。

四、新一轮律师法需要修改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本次《律师法》修改的内容主要涉及十二个方面:(一)关于律师的定义、定位与职业属性;(二)关于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三)关于司法行政机关职责;(四)关于申请律师执业条件;(五)关于律师执业机构和地域;(六)关于律师执业的专属性;(七)关于律师事务所及分所设立条件;(八)关于律师事务所管理制度;(九)关于律师事务所规范经营;完善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十)关于律师法定业务;(十一)关于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与执业行为规范;(十二)关于律师协会建设。

(一)关于律师的定义、定位与职业属性

笔者建议,第二条应进一步完善律师定义,律师定义应涵盖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三种,可以概括定义,也可以分别定义。如采用分别定义的方式,可将现第二条修改为:“本法所称律师包括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社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公职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或司法部颁发的法律职业资格,在政府部门或具有社会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法律服务,并依法取得公职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公司律师是指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或司法部颁发的法律职业资格,作为职员在公司、企业中从事法律服务,并依法取得公司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致力于国家与社会法治建设。”此外,从立法技巧来看,笔者认为也可将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作为专门章节独立设置。

提出上述修改的主要理由有三个方面:第一,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已经试行多年,其法律地位亟待明确,这也是规范管理、推进律师业整体发展的需要。过去由于顶层制度设计不清晰致使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究其本质,社会律师与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可以互为补充、并行不悖,又可以互相推动发展,特别是在涉外律师业务中,公司律师基于对所在公司业务的熟悉可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当然,在“两公”律师入法的同时,在执业条

件、执业范围、权利与义务方面应进行相应的限制性规定以便与社会律师相区分。第二,关于概括定义还是分别定义,目前的律师称呼为“律师”还是修改为“社会律师”“专职律师”等,笔者认为并非实质问题,因为社会上可以辨认三种律师的区别,而且后续可以通过颁发不同执业证书以区分。第三,在“两个维护”继续保留的情况下增加“致力于国家与社会法治建设”,可以明确并提升律师的政治地位,既与党和国家对于律师的定位相契合,也与律师参政议政、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及从律师中遴选法官、检察官、立法人员的实际情况在制度上进行衔接。

(二)关于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

当前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更多地强调律师的法律属性、社会属性。但律师与其他专业人士不同,其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同时考虑到对于律师参政议政、遴选法官与检察官的制度设计等情况,应将“拥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律师从业的基本条件。笔者建议第三条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中增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如“第三条 律师执业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三)关于司法行政机关职责

《律师法》第四条规定了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但实际上司法行政部门所依据的其他相关法律及关于规范律师、律师事务所执业行为的相关规定,也规定了司法行政部门具有依法维护律师、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职责。为使条文与行政法及司法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进行对接,笔者建议第四条中增加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维护律师、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即“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应当依法维护律师、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

(四)关于申请律师执业条件

由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已经变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律师法》应与实际情况相一致,因此笔者建议:

1. 将第五条中第(二)(三)项修改为:“(二)取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三)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或所在机构、企业任职满一年”。

2. 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前取得的律师资格凭证、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合格

证书,在申请律师执业时,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3. 第六条申请律师执业提交材料增加“职业申请书、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4. 第六条“(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修改为“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请人或所在机构、企业同意申请的证明”。

(五)关于律师执业机构和地域

考虑到目前关于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相关规定本身具有一定限制,修改后的《律师法》还是应当保留,且公职律师本身兼具公务员与律师双重属性,因此应当将公职律师与一般公务员相区分。笔者建议第十条中增加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执业机构和地域限制,或者考虑设置“公职律师与公司律师”专门章节。如“公职律师仅限于从事其所在单位或单位系统内部的法律事务,为本单位或单位系统提供法律服务。但接受指派提供法律援助或参加公益诉讼的情形除外”。如“公司律师仅限于从事其所在企业或企业集团系统内部的法律事务,为本企业或企业集团系统提供法律服务。但接受指派提供法律援助或参加公益诉讼的情形除外”。同理,第十一条“公务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应修改为“公职律师外的其他公务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

(六)关于律师执业的专属性

当前“假律师”“律师黄牛”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影响律师执业形象,有些咨询公司实质上在变相从事律师法律服务,甚至其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就含有“法律咨询”或者“法律服务”项目。原《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在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方面已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完善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同时,应强化律师执业的专属性,净化法律服务市场,提升法律服务质量。笔者建议第十三条中“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修改为“除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业务”。

(七)关于律师事务所及分所设立条件

为进一步完善合伙所、个人所、分所的设立条件及限制,以便进一步规范律师事务所管理及执业行为,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有序、平衡发展,笔者建议第十三条“(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修改为“(二)有符合本法规定的专职律师”;进一步规范个人所的设置,在第十六条中增加一款“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区情况调整设立个人事务所的条件”;建议进一步完善设立分所的条件,如在第十九条中增加“律师事务所可以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所,省会城市律师事务所经批准可以在本省

其他地级市设立分所,本直辖市、地级市内不得设立分所”;建议在第二十二條中增加“六个月未开业或者无正当理由停业一年”的应当终止。

(八)关于律师事务所管理制度

虽然律师事务所管理制度属于律师事务所内部事务,但是实践中由于管理制度不完善往往会导致律师业务质量无法保障、风险不能有效控制,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利益冲突、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管理,必然有利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的规范发展。目前司法部发布的关于规范律师、律师事务所执业的相关规定,也是要求律师事务所承担起监督管理律师执业行为的主要责任。据此,笔者建议第二十三条中增加律师事务所管理制度的相关内容,如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执业管理、利益冲突审查、收费与财务管理、薪酬和分配制度、投诉查处、年度考核、档案管理等制度,维护律师执业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对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执业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指导。”

(九)关于律师事务所的规范经营

不正当竞争与律师事务所从事经营业务,是目前律师事务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应当在这一轮律师法修订中考虑解决。在第二十四条中细化不正当竞争行为,明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理方式,可以增加:“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不得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同行业不正当竞争:(一)不合理压低法律服务报价;(二)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潜在委托人表明可能影响案件公正性的因素;(三)诋毁其他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声誉”,明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可诉性,并参照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建议在第二十七条明确律师事务所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其他经营业务。

(十)关于律师法定业务

为区分外部法律顾问、内部法律顾问及两公律师各自的职能、权利与义务、责任、相互关系,笔者建议第二十八条中规定三种律师的业务范围,明确未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不得从事律师法律服务;建议在第二十九条中区分不同类型的法律顾问;建议通过修改第四十一条以进一步规范法官、检察官的任职限制,增加从律师中遴选法官、检察官、立法工作人员,一般应当限制在社会律师范围。

(十一)关于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与执业行为规范

针对实践中仍然存在与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

证权、辩护和辩论权、人身权、保密权有关的问题,笔者建议相应修改第三十三至三十八条,增加权利保障、权利救济方式等,切实将律师的权利落到实处。与之相对应的是修改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九、五十條,以进一步细化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执业中的禁止性行为。

律师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律师持证调查是一种严肃的执行法律行为,具有严格的程序和一定强制性。律师可以凭借专业的法律技能为当事人“收集”到最适当的证据,又可以为法院减轻大量的非审判性工作负担。然而当前律师调查权受到不少被调查单位的严格限制甚至抵触。为树立律师职业的权威,保障律师权利的实现,笔者建议在律师权利保障中明确增加一个条文,规定:“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只能由司法机关进行调查的事项外,律师持执业证向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进行调查,接受调查的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并在合理时间内提供被调查信息。在合理时间内无法提供被调查信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十二)关于律师协会建设

当前,律师协会的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实践中律师协会的设置层级较为混乱。(1)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是二级设置,即全国律协、省级律协,如上海、天津等。(2)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是三级设置,即全国律协、省级律协、地级市律协,如山东、北京等。(3)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是四级设置,即全国律协、省市律协、地级市律协、县级律协,如江苏、浙江等。比较典型的是苏州市律师协会还下设昆山市律师协会、常熟市律师协会等。(4)除了层级不同外,省级或地市级律师协会不少还下设了律师工作委员会,如上海、天津,还有南京、宁波等。其次,目前上海、天津等地出现的“律师工作委员会”的法定地位还不明确,没有有效的公章及账户,经费的使用不甚规范。律师工作委员会是派出机构还是可以与协会一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尚不明确,《律师法》中可以有原则性规定,从而明确律协与律师工作委员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第三,“设区的市”以下的行政区划是否可以设置律师协会认识不一致。最后,在调研中对于律师协会的定位、两结合的管理体制、律师协会换届、律师协会设置等问题均提出了不同意见,各级律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上下级关系还是业务指导关系),工作界面是什么,各级律协的职责划分,律师代表是否常任制,而《律师法》亟需解决的是律师协会的设置问题及各级律协的关系问题。

据此笔者建议修改第四十三条,明确律师协会层级的设置,采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分清各自的权利义务界面,完善律师协会治理结构,加强律师协会建设。从目前调研情况来看,各级律协之间的关系意见不一致,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更倾向于业务指导关系。明确各级律师协会设置,可以为今后律师协会代表制度、理事会制度、会长选举制度等制度完善提供法律依据。

五、结语

《律师法》是为了完善律师制度,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作用而制定的法律。现行《律师法》颁布实施至今已经 20 余年,《律师法》虽三经修改,但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步伐。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律师制度改革深入发展,取得了很多方面的积极成果。律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律师服务社

会的水平提升了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水平。随着新常态,这些良性的变化有必要尽早通过修定《律师法》而体现出来、固定下来。

参考文献:

- [1] 王胜明,赵大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释义[M]. 北京:法制出版社,2007:2.
- [2] 王俊民. 我国第三次《律师法》修改背景问题访谈[J]. 法苑,2008(1).
- [3] 王俊民. 新律师法实施与立法性冲突问题研究[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4).
- [4] 王煜. 广西遭撕裤夺手机律师否认作秀 拒接受法警道歉 [EB/OL]. (2016 - 06 - 12) [2017 - 03 - 16].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6_06_12_363598.shtml.
- [5] 化耀民. 完善我国公民权利救济制度的思考[J]. 法制与社会,2013(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Revis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Chinese Lawyer Law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CAO Zhi - long, LU Li - ping

(Shanghai United Law Firm, Shanghai 200002, China)

Abstract: The lawyer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and some regular patterns can be found in the previous revisions of the Lawyer Law.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the legal construction process, based on a series of important decisions and deployments proposed by the government, a new round of revision of the Lawyer Law should be launched. The new round revision should focus on the definition of a lawyer, the profession of a lawyer, the management of a lawyer, the protection of a lawyer'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e management of law firms,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lawyer industry.

Key words: Lawyer Law; revision; lawyer system; lawyer; lawyer industry

关于“顶层设计”的思考

——以城市规划建设为例

周春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随着国家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深入发展,“顶层设计”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同时,各种冠以“顶层设计”的说法在各部门、各行业也层出不穷。但在当前的社会学方面,“顶层设计”仍缺乏成熟的理论支撑,仍处于摸索积累阶段,“顶层设计”在实践中也同样存在种种困难,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对当前的“顶层设计”状况进行深入的检讨,寻找构建合理“顶层设计”的途径。本文以城市规划为例对“顶层设计”进行深层次探讨,指出“顶层设计”中存在着设计缺失、设计不科学以及设计随意更换等突出矛盾,阐释了“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并提出构建合理的“顶层设计”必须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坚持战略、系统的整体设计思维;坚持新发展理念来指导,制定的设计方案要体现层级性特点。

关键词:顶层设计;城市规划建设;对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13

中图分类号:D616;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69-04

“顶层设计”本是一个工程术语,指要在最高层次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2010年后这一术语的意义得到延伸,转化成政治学术语。当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此后,“顶层设计”的概念进一步延伸,上升为一个哲学命题,成为各领域发展的理论指导。

城市规划是城市管理的先行者,也是进行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力图使城市规划科学化,规范化^[1]。但在发展实践中,我国的城市规划仍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城市规划前瞻性、严肃性、强制性和公开性不够,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等乱象丛生,特色缺失,文化传承堪忧;城市建设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节约集约程度不高;依法治理城市力度不够,违法建设、大拆大建问题突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

市病”蔓延加重。这些问题影响了城市的健康、良性发展,阻碍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一、当前“顶层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市规划发展中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在于城市规划缺乏“顶层设计”,或者说“顶层设计”不够科学。而且,顶层设计执行随意性,换一届领导就换一套发展思路,使城市发展规划无法按照自身规律进行建设。

1. 顶层设计缺位

城市规划发展的“顶层设计”事关城市发展的前景与准确定位,需要有科学论证。目前在我国的城市规划实践中,“顶层设计”严重缺失,使得发展方向不明,效率低下。大到直辖市,小到县级市,规划建设工作的职责基本上都是由当地党委、政府承担,规划部门基本上只是领导决策的执行者。作为一座城市的管理者,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很难站在全国和全局的高度去考虑问题,只能是就城市论规划,缺乏从更高层面的视野去规划城市的动力。这样给

收稿日期:2017-04-17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河南省持续优化政治生态问题研究”(2016B288)

作者简介:周春辉(1962—),男,河南焦作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主要从事思想政治与党建方向的研究。

城市的发展带来的是缺乏统筹规划,没有分工,产业雷同,恶性竞争。虽然也有某种程度发展设计,但“顶层设计”却严重缺失,造成不同城市间恶性竞争。如当年富士康决定在内地选址建设新工厂时,引发郑州、武汉、成都、重庆等城市竞相争抢,为获取富士康的青睐纷纷出台优惠政策。而富士康则利用这种局面,拼命压低入驻条件。最后郑州以减免税收、投资为其建设厂房(富士康付租金)并由政府出面为其招聘员工为条件,才在激烈的竞争中惨胜。

再如会展中心建设。会展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是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标识,不仅可以提高城市活力,扩大城市影响力,更有利于促进城市市政、交通等全方位配套的提升,提高城市的国际影响力与发展活力,近年来正日益引起全国各地发展的高度热情。很多大中城市不经论证,直接上马建设,仅中部地区就有郑州、武汉、西安、石家庄等都建有规模宏大的会展中心。^[2]但这些项目建成后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闲置之中,每年还要财政贴钱来维持管理费用。相关数据表明,2005年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率不足30%,销售收入1亿余元,而在不考虑地价上涨、设备折旧基础上,其销售成本大约为8000万元,仅能维持基本的运营,很难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一线城市的经营状况尚且如此惨淡,二、三线城市的会展中心发展更是难以为继。如湖南长沙的国际会展中心,测算盈亏点为1.25亿元,而该场馆2005年全年总收入仅300余万元,两者相差甚远。同样,作为东北重镇的沈阳,其国际会展中心年收入只有不到2000万元,而该中心正常盈亏平衡点为4000万元左右,不足部分只好由地方政府拿出财政补贴维持。^[3]如果国家层面能在城市规划中事先为各城市制定合理的顶层设计,对城市规划有明确的定位分工,这种资源浪费状况完全可以避免。

2. 顶层设计缺乏科学性

“顶层设计”是城市建设发展的先行条例和灵魂所在,不同的城市在发展中要根据自身优势明确定位,科学地制定符合本地的发展路径。美国一些城市分工定位的顶层设计非常清晰,如纽约是全美的经济中心,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洛杉矶则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芝加哥是物流中心等,城市各具特色,避免了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

而目前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顶层设计”仍在摸索之中,存在着定位不准确、规划不科学的问题。虽然每个城市在建设前都有建设规划,而且规

划需要经上级相关部门批准。但这些规划在制定审批过程中流于形式,缺乏整体规划与科学依据。而且规划主要局限在城市建设规模方面,对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文化特色等方面缺乏准确的定性分析。这就造成我国的城市发展定位模糊、城市建设中出现千城一面、特色丧失,相互间存在恶性竞争。对“顶层设计”体系中应具有的一些基本要求,如结构的系统性、整体性,各层次间的统领性、协同性,层次的可操作性等弃之不顾。不管是中心城市还是区域城市,都在追求大而全,不顾本地发展实际,不切实际地搞摊大饼式的发展,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

3. 顶层设计更改随意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长期的历史积淀与风格延续,才能形成自己的城市定位与文化特色。这么复杂的工程需要详细、缜密的“顶层设计”,更需要设计者能够站在全局和长远的高度,对系统内各方面、各层次的要素、功能和结构进行通盘考量,统筹谋划。而“顶层设计”一旦确立,就要严格按照设计开展建设工作,不能随意更改。但目前,城市的规划发展常常面临随意更改的困境,一个领导一个建设思路,一届班子一个建设重点,常常会因为领导或班子的变更而随意修改设计规划。在这种规划管理模式下,城市的发展陷入重复建设、朝令夕改的困境,很难找到一条符合城市特点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规划。

二、顶层设计的必要性

城市规划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其他不同方面我们都面临着发展中的阵痛,“顶层设计”的必要性也更加凸显出来。其重要性是由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要求决定的,也是由于“顶层设计”的自身属性决定的。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践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的宏观指导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必然性决定的,体现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

1. “凡事预则立”的内在要求

“事未至而预图之,则处之常有余,事即至而后图之,则处之常不足”“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这些圣哲之言也都肯定了“预”在行为处事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其中的“预”就是指计划、规划。社会建设中如果能有预见,有计划,则会游刃有余,事半功倍;不做准备,没有计划,则会措手不及,事倍功半。

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必须以“预”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正确性为前提和根本。我们在做事时对事情的态度无非三种情况:一种是不“预”,毫无计划。

这种情况下的盲目发展,往往会造成事倍功半,甚至一败涂地的后果,严重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第二种情况是不科学的规划。这种情况体现在虽然有规划,但是计划缺乏调查研究,不科学,不准确,难以厘清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如果预见出现偏差,计划错误,可能(甚至肯定)还不如没有计划。有些地方确立的项目或建好的大楼,刚上马不久就停产或拆除的现象,我们常在新闻报导中看到。究其原因就是计划不科学造成的。但这并不是计划本身存在问题,计划过死、计划不周、计划脱离实际才是计划经济走入死胡同的原因。现在有人以此为借口反对搞计划经济,提倡全面的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经济,实在是本末倒置。殊不知资本主义至今没有灭亡的原因正是因为学会了“计划”,根据发展需要制定相应的“顶层计划”。第三种情况是科学实施的“预”。在实施之前认真进行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统筹考虑,顶层规划,并按照规律推动事物发展。不同的措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因此,必须将制定科学、完善的“顶层设计”作为社会发展规划的前提与保障,。

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参照世界银行对收入的划分,当前我国的经济水平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正处于由温饱型向富裕型过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各项改革也进入深水区,国家发展也遇到了许多难啃的“硬骨头”,如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和城市规划不合理等经济社会问题也都凸显出来。这些问题都与过去缺少正确的顶层设计相关,也要求社会发展再也不能仅靠“摸着石头过河”,而要对社会发展从更加宏观的层面综合考虑,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事关着决胜小康战略成败的“顶层设计”的必要性就愈发凸显。正确的“顶层设计”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创建“美丽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作为决胜全面小康,建设“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美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十三五”计划已经颁布,用以指导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建设。但在发展实践中,地方层面的“顶层设计”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缺失或者“设计”不完善、不科学现象,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国家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要高度重视。^[4]

三、“顶层设计”的构建途径

1. 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

“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强调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对事物进行深入、符合实际的调查研究,才能获取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格物致知”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也是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建设时必须遵循的。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同样要追求“格物致知”的精神,做到实事求是,对形势的发展要有科学的预见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党长期积淀下来的优良作风,也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进行“顶层设计”时,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顶层设计”建构于坚实的“基础”上,根据发展的具体实际来进行相应的“顶层设计”,绝对不能脱离实际拍脑袋、想当然。否则,设计出来的“顶层”则会成为“空中楼阁”或者“沙上建塔”,以此为据进行社会建设只能是缘木求鱼。相反的例子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抗战时局与中日两国的情况深入分析后,在战略层面提出“持久战”的“顶层设计”思想,这一思想指导着中国的抗日战争策略,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

2. 战略、系统的设计思维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突出体现战略系统的设计在改革中的方法指导与方向引领的意义,无论哪个层级的“顶层设计”,都需要兼顾战略与系统的思维。综合运用战略系统的思维方法,可以在“顶层设计”中整体推进,纵向横向的协作与联动,从战略高度认识和规划工作。根据系统中的位置,分工合作,确定责任范围、列出权力清单和落实责任主体,从宏观层面理顺各部门职责分工,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将各要素深度聚合,形成合力,发挥“顶层设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特点,引领各项事业的科学与可持续性发展。

3. 坚持发展新理念指导

从理论阐释到实践需要正确的途径,讲求科学的方法,而“顶层设计”正是这必不可少的途径与方法的体现。“顶层设计”要想具有生命力,能够有效地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就要善于打破思维定式,增强创新思维,契合时代要求,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境界、新局面。面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新常态、外部经济复苏缓慢,缺乏动力的国内、国际形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无疑是一副良方,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搞好“顶层设

计”的基本原则。只有建立在这个发展理念基础上的“顶层设计”才能够真正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指针。就城市建设发展而论,必须有大局意识、整体意识,必须坚持协调发展。

城市的发展规划,甚至各种事业的建设方针,都必须创新发展理念,抛开一城一地的束缚,扩大视野,将城市规划放置于全国乃至全球的大局中,整体考虑其分工协调发展,要对城市发展有明确定位。就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规划而言,作为首都的北京定位就是政治中心、上海就是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广州是对外开放中心,西安是文化中心,郑州是会展物流中心,城市建设就围绕其定位进行规划发展。其他城市的定位设计也要根据其在全国和地区的位置,结合城市自身特点进行合理定位、顶层设计、产业分工。如张家界、泰安之类城市,定位是旅游城市,主要发展旅游产业也是比较准确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轰而上、恶性竞争、重复建设。^[5]

4. 层级性的设计方案

“顶层设计”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案,并不是都要从国家最高层面来设计,而是要根据任务的不同,由不同的部门分级设计,具有明显的层级性。从行政层面上看,从中央到省、市、县,甚至于乡镇等不同行政层级都需要设计自己的“顶层”^[6]。

而且从适用范围上看,“顶层设计”又可分为全局性整体工作的顶层设计、局部性单项工作和具体项目的顶层设计等层级。这就要求不同层级上的“顶层设计”制定者要针对自己的责权范围设计不同的顶层内容,使制定的顶层设计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便于贯彻执行,具体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 [1] 中国应急管理编辑部.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J]. 中国应急管理, 2016(2).
- [2] 蔡国峻. 浅谈城市会展中心规划设计发展需求:以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5(2).
- [3] 覃旭瑞, 葛维琦. 我国城市国际会展中心规划建设的若干问题[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 [4] 孙鹏. 智慧城市建设缺乏顶层设计[J]. 中华建设, 2015(7).
- [5] 卫玲, 王炳天. 丝绸之路经济带支点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6).
- [6] 陈智国. 做好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J]. 北京观察, 2012(8).

(责任编辑 许峻)

Thoughts on the “Top – level Design”

——Taking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as an Example

ZHOU Chun – hui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form, the importance of “top – level desig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At present, China’s “top – level design”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ere are still such problems or the existence of these problems on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lanning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the “top – level design”, and points out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in the current “top – level design”, the lacks of science and free replacement, and explains the “top – level design”’s necessity and approach.

Key words: Top – level design;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countermeasure

论民国时期粤汉铁路广东段的“国有化”工作

庞广仪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南宁 530007;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成都 620860)

摘要:清末民初, 广东商民勉力推进粤汉铁路广东段的商办事业, 在近代中国政治史和经济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最终还是受制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而难以为继。为了将粤路收归国有, 北洋政府试图以调解公司纷争和整顿财务的途径循序渐进的推进, 旧桂系政府则采取了军事管制、借款筑路的途径, 但由于政局动荡而功败垂成。国民政府先是采取官督商办, 继则收购商股, 最终在广大商民做出巨大牺牲和让步的情况下将粤路全盘收归国有。

关键词:民国时期; 粤路; 商办; 国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14

中图分类号:F532.7; 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73-06

粤汉铁路广东段是近代中国名副其实的商办铁路。从粤路商办和收归国有的归宿中, 我们可以管窥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实业救国”的美好初衷和艰辛历程, 也可以透视近代中国国家力量重新整合道路之曲折。

一、粤路商办的丰功伟绩和重重危机

粤路商办在推动近代中国社会革故鼎新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干线商办毕竟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化行为, 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势在必行。

(一) 粤路商办的丰功伟绩

第一, 在经济上, 粤路商办是近代民间资本参与实业救国的最大的一次尝试。清朝末年, 列强欲借注资兴建粤汉等铁路之机觊觎中国利权, 广东全省绅商民众为了抵制列强图谋, 在九大善堂和七十二行商会的领导下于1905年底掀起了规模空前的争办干线运动。全省商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措股金1410,0607元, 迫使力主“干线商办, 借款筑路”的晚清政府不得不允诺粤路商办。1906年5月, 商办广东粤汉铁路公司成立, 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公司全系商办, 不得接纳外资, 亦不接受官方干预。^[1] 粤路公司在广东父老的大力支持下推进干线建设和运营,

至1910年5月敷竣了广州至黎洞的路段。粤路敷设之后很快发挥出造福桑梓的功效: 由于商贾借助铁路而便于贩运, 广州贸易日旺, 出口货值由1900年的1900万两增至1910年的5400万两, 进口货值也由1400万两增至3300万两, 增长幅度都在200%以上。^[2] 粤路公司也取得了连年盈余的营运佳绩, 1911年度盈余达17.7万元。从资本总额而言, 粤路公司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一家民族资本企业; 其股东人数之多, 牵涉面之广, 受惠人群之众, 在近代史上亦属空前。

第二, 在政治上, 粤路公司推动了近代中国革故鼎新。在粤路商办的鼓舞之下, 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干线商办的热潮。至1911年, 全国“商办铁路”达18条之多。虽然真正由商民募股筹办的“商办铁路”只有粤路、浙路、苏路、新宁和潮汕铁路, 其他铁路公股额的比例远远高于商股额, 但是, 由于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公股中官方的铁路专项拨款比例极少, 主要来源于以筑路为名强行摊派于民的(地)租股、粮捐、米捐、茶股、盐股。广大商民以此为依据, 纷纷要求仿效粤路公司成例排斥官方势力, 以商办的形式兴筑和运营干线。

收稿日期:2017-05-06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6M600739)

作者简介:庞广仪(1977—), 广西钦州人, 博士,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

由于铁路是国家大政,急于借助铁路干线控御天下局势的晚清政府当然不能坐视干线股权“官退民进”,使官方丧失对铁路的控制权。以载沣为首的满洲少壮权贵更是迫不及待地推行“举借外债,收购民股,速成干线”之策。但是,晚清政府长期对外妥协对内高压使其威信下跌,借款筑路、干线国有之策不但不能有效整合国家与民族力量,反而被举国商民尤其是粤、川、鄂、湘等省商民视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之举,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保路运动”对没落的封建政权的统治权威进行了挑战,在民众中普及了一次民主爱国观念的教育,并与当时同样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及革命运动遥相呼应,不但促成了政权的革故鼎新而且一扫数千年来沉闷的政治空气。

(二)粤路公司的重重困境

第一,资金捉襟见肘。铁路干线的兴筑和运营所需资金数额巨大,而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国力不能承受。当时兴筑和运营都比较成功的京汉等铁路都是采取多国注资、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股票的形式来募集资金。粤省商民爱国保路之心当然可嘉,但他们举全省及海外侨胞之力所募集的资金,相对铁路的兴筑、运营和维护之浩大开支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

第二,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粤路公司理想化地排斥官方对公司事务的干预,但是,失却官方的权威仲裁,股东内部纷争根本无法依靠自身的“选举”“协调”来妥善解决。1921年4月,股东代表向孙中山反映了公司内部如下乱象:其一,账务管理混乱,每年因此坐耗百余万之巨资;其二,选举加剧内讧,大、小股东各自结党营私,以维护公司商办为名屡屡掀起斗争风潮,导致人心涣散;其三,“高薪养廉”反而加剧贪腐行为,公司为总协理岁支2万4千元,协理亦有1万余元,还都另有办公经费,管理者往往通过贿选等手段争夺管理职位,一旦任职立即以权谋私;其四,管理层缺乏远见,不收银两而收取纸币作为股金,不料随后政局混乱,纸币价值日贬^[3]。

第三,无力应对各种社会纠纷。社会纠纷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其一,铁路兴建面临着繁杂的房屋拆迁、坟地迁移、农田征用和青苗补偿问题,村民们往往“任意昂勒,不肯遽卖”;其二,政府的捐税和封建行会的勒索;其三,乱兵惯匪征用车辆,坐“霸王车”,甚至因为争执而打死打伤铁路员工,公司欲严厉惩治但自身又无执法之权,欲投诉于政府却又屡吃闭门羹。

由此可见,脱离政府的统筹与支持,干线商办寸

步难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粤省商民呼吁将粤路收归国有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二、北洋政府调解公司纷争和整顿财务

(一)调解公司选举纷争

民国初年,粤路公司选举乱象继续上演。

在1910至1914年间,粤路公司总经理由总工程师詹天佑出任,此期间公司管理尚属正常。1914年,詹天佑辞去粤路总理之职位,由副总理李敬宽暂时接替总理之位。为了长期把持路事,代理总理李敬宽通过私贿李道生、刘宗贤、余沃文等任董事的大股东,操纵拖延换届选举。同时,绕开股东大会向英商汇丰银行(上海)借款1200万元,其目的一则借助外力以巩固其在公司内部的地位,二则通过借款推动粤路的修筑和改善经营来为自己谋求更多利益。李敬宽等人的违纪行为引发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强烈指责,由此引发了“倒李”风潮。

由于粤路公司内部纷争不息,政府不得不出面“主持公道”。1914年5月15日,公司换届选举依期举行,广东省长派出警察厅厅长亲自督率警兵到场,代表中央和地方来监督公司领导的换届选举。最终,公司选举“欧赉祥为总理,黄嵩龄为协理,总工程师一职以副工程司容麒勋升任”^[1]。

然而,公选的公司高管仍然摆脱不了贪腐之风。至1916年,运转10年的粤路公司用费已达3000余万元,仅成路400余里,其中亏耗之银达1300余万元。^[4]

除了高管选举之外,公司董事选举同样也是内讧不断。为了当选董事,有些股东出资购买选举票,而且还是明码标价,“据说每万股出银七百元,须二十万股左右始有当选把握,这样需要贿银一万数千元方得一董事。”^[4]大股东不惜巨资而贿选董事,当然并不是看重董事一职每月百元的年薪,同样是看中操纵公司内部事务所获得的私利。为了避免股东内部分裂,政府同样不得不作为仲裁者介入公司董事的选举和任命。

2. 代偿外债,整顿财务

首先,民初政府动用“善后借款”,为粤路公司代偿了巨额外债。

粤路公司第一笔大债务是举借港英当局的赎路款项。1905年晚清政府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中赎回粤汉铁路,曾向英国香港政府商借英金110万镑为赎路之款。赎路借款由鄂、湘、粤三省分别偿还,其中粤路公司应还债务“占全数的七分之三,共分十年偿还,每期应还本一十一万镑,利息以每百镑四镑半计算”。^[1]

1911年10月6日,港英政府催促粤路公司偿还赎路借款第6期本及第12期息,共计港洋58,2900余元。粤路公司无从应付,只得求助于官方,最后由邮传部出面与港英政府交涉并代偿本息。民国成立之后,该项债款的债权由交通部继承,至1916年6月,粤路公司所欠交通部单利息已累加至14,4000元。

旧债未了,新债又来。1915年10月,港英政府催偿赎路借款第10期本第20期息。由于当时政局混乱,粤路公司欲绕过本国政府直接与外方交涉。面对粤路公司提出的举借新债偿还旧债的提议,债权人港英政府借机要挟,以粤汉广九两路接轨为条件,并示意各外国银行取同一态度。^[1]粤路公司当然无法应对外方的要挟,不得已又求助政府,由交通部出面调停公司与外国势力的关系。在交通部的出面调停之下,粤路公司与香港交通银行商借外债毫洋75万元,二一折,实借入港银619000余元,债务关系由交通部承认成立。此项借款虽以一年为期,而运营业绩欠佳的粤路公司却不能如期清还,以致债息越积越高,至1921年4月15日止,应欠香港交通银行本息109,0000余元。

粤路公司另一笔债务是摊还美国合兴公司金圆小票债款。清政府收回粤汉铁路时,承诺高价赎回合兴公司在欧洲市场上发行的金圆小票。这笔债款先由邮传部借款垫付,再由鄂、湘、粤三省分别摊还。1911年9月1日,经清朝邮传部核算,粤路公司所应摊还的金圆小票债款,计折合港洋227,7000余元。民国成立之后,这笔债款拨入交通部,也即交通部充当了债权人的角色,至1915年6月底,利息已经累加至57,9600余元。

根据1916年底核查账目,粤路公司共欠交通部370,3000余元,扣去交通部应缴粤路官股,粤路公司共欠交通部233,9000余元。

政府代替粤路公司偿还外债,实质上是将外债转换成为内债,分摊到大小股东身上的巨额债务并未消失,必须通过募集股金的方式偿还。但是,由于公司账务混乱和股东资金短缺,股款不能按时募集。

清末粤路公司成立之初,广大商民以热情高涨购买股票的行动来抗拒官府和外资势力强取豪夺干线控制权,1906年至1908年的第一期和第二期股款均能按数收缴。第三期股款从1909年开始募集,直至1915年仍然没有收齐。按照广大中小股东的说法,公司管理层贪赃枉法、监管制度缺失而导致账务混乱,中小股东为了捍卫“正义”,也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而拒绝上交股款。但事实上,粤

省父老和海内外侨商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铁路干线建设、营运和维护经费动辄数百万英镑,即便是竭全省商民财力亦难以持续弥补粤路公司巨大的财政黑洞,所以对股东个人而言,与其继续让自身财富深陷其中,不如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及时抽身而出。

由于公司管理层无法劝说股东缴纳股款,交通部又不得不介入调停。

1915年,交通部派员常驻粤路公司,督促管理层对会计处工作进行改革,“分为综核、出纳、统计三课”,使财务工作透明化、规范化,以取信于广大股东。同时,交通部力劝广大股东放弃前嫌,按时缴纳股款,以免耽误工程。

碍于交通部出面调停,广大股东虽然表示愿意继续缴纳股款,但却纷纷缴纳纸币而不愿缴纳保值性高的银元。交通部和公司管理层明知在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下纸币极易贬值,但唯恐激起事变,不敢强行要求股东用银元缴纳股款。果不其然,1915年之后,护国、护法运动接连爆发,北洋政府发行的纸币迅速贬值,粤路公司所收的三期股款大为缩水,“平均扣计不下二百余万圆”。^[1]

北洋政府的粤路整顿工作虽然初见成效,但很快因为南北政府的对峙而半途而废。

三、旧桂系据粤时期的“铁路军管”和“借款筑路”

1917年起,参加护法运动的各派军政势力云集广州,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之后,以陆荣廷、岑春煊为首的旧桂系军阀不断排挤异己,独揽广东军政大权。旧桂系军阀垄断粤省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粤路军管和借款筑路。

(一)军事管制铁路运输

1918年粤路公司召开董事换届选举会议,选举现场一如既往的混乱不堪。旧桂系借机介入操纵选举,控制公司管理层,并随即强行征用并“军管”铁路。

在桂系“军管”之前,粤路运输是在公司与封建行会相互妥协下进行的。由于粤路路线与北江平行,故其贯通后北江水运大受冲击。先前操控北江水路和码头的封建行会纷纷改行操纵铁路运输业务:为客商代理承揽货物运输和报纳捐税等一切手续等业务,并从收取客户佣金中获取收入。行会势力为了扩大业务,对客商暗中收取“回头佣”,想方设法让付货经手人从货主那里获取报酬,同时多方贿赂和结纳公司管理人员,其行为难免滋长了腐败。

旧桂系以整顿运输腐败、打击行会势力为名,迫不及待地在铁路车站新添货捐局,横征暴敛以维持巨额军费开支,并大肆征用铁路以运输军队和战略

物资。公司方面为了弥补军阀部队征用铁路以及战事对铁路的破坏所带来的损失,必须在客货运输上加征薪费以及缩减乃至拖欠员工薪水;员工因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而导致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对于军阀政府的粗暴行为,粤路公司不但抗议无门,而且还不得不设置特种票业务等措施来讨好桂系骄兵悍卒,“至特种票则有来回团体票,军人乘车半价票,军用半价票,免费票,四种免费票内,又分软纸硬纸二种,软纸一次用,硬纸长期用”^[1]。但是,军方征用铁路大规模运兵一般只记账不付实款,即便是游兵散勇也敢持枪强坐“霸王车”,“路权几归消灭,悍卒何难效尤。弊之惨酷,莫甚于此”^[5]。

(二) 筹划“借款筑路,干线国有”

旧桂系军阀操控粤路运营之后,还筹划构建西南铁路网。1919年9月,护法军政府交通部召开西南八省铁路督办公署咨陈政务会议,强调了统一西南铁路事务的重要性:参加护法运动的滇、黔、川、陕、粤、桂、湘、闽八省地域辽阔,无铁路实难以沟通联系,而八省铁路的兴建又必须统一筹划、统一事权,为此专设八省铁道督办公署于广州,“凡八省区域以内应行建设之铁道,概由公署综核办理,计划统一,路线无相抵触,权责专属,推行自能尽利”^[6]。

军政府主席总裁、桂系精神领袖岑春煊在政界名声卓著,在两广总督任上与粤路股东多有来往,同时也是晚清“借款筑路,干线国有”的重要践行者,所以是出任西南铁路督办不二人选。

岑春煊走马上任之后,马上重提“借款筑路,干线国有”旧事,试图举借外债以作为西南铁路建设的启动资金,而这一计划首先从粤路收归“国有”开始。1919年底,岑春煊绕开广大股东,与粤路公司总经理温良彝密谋向港商举借200万元借款以作为粤路国有启动基金,并以铁路本身作为抵押。

桂系军阀“借款筑路,干线国有”的计划遭到了国民党集团的抵制。早在此前的1918年5月,孙中山受桂系军阀排挤,离粤赴沪,国民党集团与桂系军阀分道扬镳。为了不让桂系军阀通过兴建西南铁路而掌握粤省经济命脉,国民党集团利用宣传工具进行了犀利的攻击。岑春煊的“借款收路”计划尚未

实行就被国民党情报人员探知,并将其公诸报端,尖锐地指出岑的目的不外是为了谋取借款筑路所带来的高额回扣,“然岑所以为此者,盖为攫钱计也”。岑春煊是否真的拿回扣中饱私囊,国民党集团当然没有举出更具体的证据,然而岑也无从自我澄清,因为广东商民对于桂系军阀在粤省的胡作非为已经深恶痛绝。粤路股东更是表示要抗争到底,不肯善罢甘休,以致一时之间“人言啧啧,报纸喧传”^[7]。无奈之下,岑春煊只得放弃粤路“国有”计划并辞去西南铁路督办之职。

1920年初,旧桂系军阀再度以改善粤路经营、构建西南铁路网为名举借外债。该年5月,桂系军阀召开财政会议,通过秘密的形式商谈签订条约借款事宜,并声明借款以两广财税做担保。国民党很快通过内线获取该绝密消息:桂系既与北洋军阀为敌,又复得罪于国民党、滇系军阀和粤省商民,以致“一切政费无从而出”,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马上对桂系军阀的“借款筑路”行为予以讽刺:“但以余观之,军政府今非昔比,难保资本家不中途变卦也。”^[7]

果不其然,国内外财团不敢贸然斥资支持四面楚歌的桂系军阀。1920年10月,众叛亲离的桂系军阀在粤省军民的攻击下狼狈败回广西,借款筑路,构建西南铁路网的计划遂成为一枕黄粱。

四、国民政府全面国有化工作

1920年底,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集团重新开府广州。此时的孙中山把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确保充足的财政实力的支持作为国家统一的必备条件。粤路国有正是在此方针指导线循序渐进地开展的。

(一) 全面介入粤路经营

强化政治、经济集权是国民党据粤自保和争雄天下的重要保障,而粤路国有则是其集权方略中的关键环节。而粤路股东在尝尽种种波折之后,深知缺乏政府的仲裁和“枪杆子”的庇护,干线商办根本无法在乱世中成行,遂多有急流勇退之意。

从1923年起,大元帅府(1925年后改组为国民政府)直接介入粤路公司的行政管理,粤路公司的管理(政府在公司代理人)、总理和协理等高层管理职位皆由政府直接任命。其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1923年4月至1925年粤路公司领导一览表

职务	管理	总理	协理	复任管理	代总理	总理	复任总理
姓名	陈兴汉	许崇灏	张少棠	陈兴汉	王棠	林直勉	许崇灏
到任年月	1923.4	同前	同前	1924.8	1924.11	1924.12	1925.6
备注	大元帅委任	同前	同前		由陈兴汉呈请委任	政府委任	政府委任

资料来源:《交通史路政编》,第16册,第278页。

1925年7月3日,国民政府设立广东省建设厅。强化对粤路公司的监控是建设厅的工作重点,而其切入点是改革公司领导体制。建设厅认为粤路公司自1907年成立以来采用的总协理制度没有一套严密的规则,加之没有政府的良性指导以及公司内部派系林立,经常导致内部长期以来风潮迭起,长期以往必不能应付当前路款支绌的困境,因此,公司现行的总协理制必须改组为委员制,委员由省政府委任,以便政府进一步支配公司内部事务。

政府在介入粤路公司行政管理的同时,也对粤路日常运输实行军管,1923年4月,大元帅府“以粤路管理腐败、车辆破坏、枕轨失修、负债累累,且粤路为中国重要干线,是时正值革命军兴师北伐,军运所关,尤不能长此任令废弛,乃于是年四月派陈兴汉管理路务,粤路至是遂由商办之局变为官督商办”^[1]。

经过政府整顿之后的粤路,营运业绩快速攀升,1922年,货运吨数达38,6144吨;1923年达41,2696吨,1924年达400,1525吨,两年之内货运量增长超过10倍。^[1]

政府对粤路公司的直接管理,伴随着大量的“强征”和“摊派”行为。在强征车辆方面,1921年,政府和军方租用专车挂车187柱,1922年为233柱,1923年为380柱,1924年为450柱,这些为军政服务的专车挂车尽管仅收取半价,仍不能按时支付给公司。到1926年统计的时候,政府积欠粤路公司费用总数达实银100多万圆。在“摊派”方面,由于欧洲战事吃紧,煤铁等原料价格飞涨,大元帅府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而缓和压力的主要举措就是对粤路公司等民营企业进行“摊派”。从1919年7月起,大元帅府将粤路公司赁率增加至30%,但仍然无法维持浩大的军饷开支,遂不得不在此基础上于1923年7月再增加30%,同年12月又附加军费二成,1925年附加薪费二成。^[1]

(二)收购商股,全盘国有

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加快在政、财、军等领域整合国家力量的步伐,粤路全盘国有化由此提上了日程。

1929年3月,铁道部部长孙科主持拟定《粤汉铁路建设委员会完成粤汉铁路全程的工程计划书中》,强调贯通粤汉铁路是构建国家铁路网的关键步骤,而将粤路收归国有又是贯通粤汉全线的先决条件。^[8]同月,孙科致电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铭枢和广东省建设厅厅长马俊超,要求粤路公司在运营和处理内部问题上接受铁道部的监督,公司

的一切工作进展随时向部里汇报。从6月起,铁道部和广东当局对粤路的固定资产和经营情况开展彻底调查。

1929年7月,孙科要求裁撤广三(广州—三水支线)铁路局,和粤路合并为粤汉铁路南段。

随着国有化步伐加紧,粤路公司部分董事担心其经济利益得不到保证,多次发动股东联名上书国民政府中央、铁道部和广东省政府,要求取消粤路国有计划,重新完全放归商办。有鉴于此,孙科于1929年10月上交《发行公债二千万为整理广东粤汉铁路及收回该路商股之用》提案,强调粤路国有工作不会受反对意见的存在而有所延缓,其原因如下:其一,全盘国有方能便于统一管理,避免同一干线之中既有国有路段又有商办路段的混乱局面出现;其二,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商办公司无力展筑干线,唯有收归国有以竟全功。孙科在提案中还强调,反对干线国有的主要是担心经济受损和大权旁落的部分大股东,只要政府采取发行公债的方式收购商股以照顾股东利益,必能消除疑虑,为“示人民以大信”^[9]。

孙科的提案得到国民政府中央讨论通过之后,铁道部即于11月全面收购粤路商股。其步骤如下:其一,建立政府与股东沟通管道,将铁道部处理意见有效传达给股东,股东意愿也得以及时回馈;其二,照顾侨民股东利益,咨请各驻外各领事馆,通告国外侨民准照办理未能如期登记及抵换的债票;其三,为商民争取“股票在抵换公债时期应否仍准报失”的权利。^[8]

铁道部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很快完成了从行政管理到股份上对粤路公司的完全控制。1930年2月17日,国民政府命令组建粤汉铁路广韶段管理局负责粤路运输。^[10]

值得说明的是,粤路国有是建立在广东商民让步和理解的基础上的。铁道部尽管拟定了详尽的粤路债票还本付息计划,但由于战乱不断,国民政府无力也无暇顾及到还本付息事宜。这点我们可以从表2的分析中得以证实。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铁道部为了安抚股东之心,在股票发行的第一年即1930年计划偿还20万元利息,但是年“中原大战”爆发,还息之事由此搁浅。按原计划,铁道部在1935年开始偿还债本,1936年始逐年偿还利息。但事实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中央被迫西迁重庆,还息之事遂不了了之。至今,当年未能兑换的粤路公司债票仍然不断出现在文物交易市场上。

表2 粤路公债计划还本付息表

单位:元

年份	还本数目	付息数目	尚欠债本数目	年份	还本数目	付息数目	尚欠债本数目
1930	无	20万	2000万	1946	200万	18万	1700万
1935	100万	无	1900万	1947	200万	16万	1500万
1936	200万	38万	2700万	1948	200万	14万	1300万
1937	200万	36万	3500万	1949	200万	12万	1100万
1938	200万	34万	3300万	1950	200万	10万	900万
1939	200万	32万	3100万	1951	200万	8万	700万
1940	200万	30万	2900万	1952	200万	6万	500万
1941	200万	28万	2700万	1953	200万	4万	300万
1942	200万	26万	2500万	1954	200万	2万	100万
1943	200万	24万	2300万	1951	200万	8万	700万
1944	200万	22万	2100万	1952	200万	6万	500万
1945	200万	20万	1900万	1953	200万	4万	300万

资料来源: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铁道公报》,1929年11月。

综上所述,粤路商办体现了近代中国民间力量反对专制,期盼拥有经济发展良好环境的愿望。但近代中国并不具备铁路干线商办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和社会与文化土壤。从民国成立开始,历届政府都着手开展了粤路国有化工作,由于政府财政拮据、国家政局动荡不已,粤路国有工作旷日持久,广东商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参考文献:

- [1] 民国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 交通史路政编(第16册)[M]. 出版社:不详,1935.
- [2] 章有义.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133.

- [3] 借款完成粤路之意见[N]. 民国日报,1921-04-25.
- [4] 夏东元. 郑观应传[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 [5] 郑观应,等. 请求粤路国有书[M]. 上海图书馆馆藏资料,1916-04-08.
- [6] 西南八省之铁路计划[N]. 民国日报,1920-01-06.
- [7] 八省铁路借款之传闻[N]. 民国日报,1920-06-20.
- [8] 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 铁道公报[M]. 1929:191-192.
- [9] 孙科. 发行公债二千万为整理广东粤汉铁路及收回该路商股之用[C]//铁道公报,1929.
- [10] 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编译处. 中华民国法规汇编:财政[M]. 北平:中华书局,1935:1010-1012.

(责任编辑 许峻)

On the “Nationalization” of Guangdong Section of Guangzhou – Wuhan Railwa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PANG Guang – yi

(Guangxi Cadres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Nanning 530007, China;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people in Guangdong province promote the railway construction in form of commercial management, but it is difficult to carry out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The Beiyang Government tries to promote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railway by mediating disputes and rectifying financial affairs, the old warlord of Gui clique controls the railway company by military means and borrows money to construct the railway, both of them fail due to political unrest. Firstly by means of “government – supervised and merchant – managed” then purchasing shar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finally takes over the operation of the railway and nationalizes the railway with the huge concessions made by the people.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Guangdong section of Guangzhou – Wuhan railway; commercial management; nationalization

绘画艺术与心理表达

——刘狄洪绘画中个人经历和社会文化的心理表达

刘泳俊

(中原工学院图书馆, 郑州 450007)

摘要:绘画艺术是通过视觉语言揭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心理过程和本质,绘画艺术家们往往通过一些看似非常普通的事物来揭示那些可能被抑制的充满感情的内容,用画面语言充分表达个人的思维。这些思维是从幼儿开始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要素综合。当然,这些要素也形成了艺术家个人的独特的精神世界,并带有社会和文化沉淀的智慧色彩。

关键词:绘画;艺术;心理表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15

中图分类号:J2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79-04

绘画艺术家创作手法的自由表达,首先要有眼光,眼光不仅限定他所寻找的事物,影响他在所观察的事物中抽取出什么特点,并且影响他怎样描述他的观察所见。绘画可以使我们有意识地进行信息加工,并达到与外界交流的目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工大量意识之外的信息,对未被意识知觉到的信息进行反应^[1]。相较于创作手法,心理和灵魂的自由表达是更深层次的境界。而艺术的眼光和灵魂又与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和个人品质紧密相关,与其生活经验和心路历程密不可分。

刘狄洪曾经有近二十年的中国画经历,通过近几十年的油画艺术探索(1983年之后),他将一些中国特色的东西巧妙地融进油画作品中,同时将他中国山水画创作的心得和体验不着痕迹地融入油画创作中。刘狄洪将进入眼帘的自然风景万物,进行了融合、创化,利用手中的画笔、工具进行表达,将头脑中、心灵上的意境、思想呈现于作品中,即达到“画中有话,画中有诗意,有神韵”。

一、绘画中的投射表达

(一)个人经历在绘画作品中的投射表达

有时候人需要表达一种思想,而文字语言却又无从表达或显得苍白无力。刘狄洪先生通过艺术语

言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某些潜意识和表意识的情感。油画作品《夕阳》(见图1)表现了太阳落山前的明亮,周围绿树清晰,画面最前面的一颗树根是黑色的,预示着黑暗的快速到来。整个画面只有一抹红,就是这棵树的树冠,代表着热烈和激情,寓意笑看黑暗前表面上的风光。《夕阳》中,艺术家通过绘画的构图、色彩,描述自己与外界社会的关系,与艺术家的孤傲本性不谋而合。艺术家在进行绘画创作时,沉醉于另一个世界里,将周围人隔绝于外,仿佛世界静止了,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正是这种超我忘我的境界,让他和自己的作品完全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他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这时候外界的繁杂都离自己很遥远,他沉浸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对于像他、像梵高这样的真正的艺术家而言,他是孤独的,但幸运的是,他的艺术可以缓解他的孤独和焦虑。绘画艺术对于他确实是有种治愈功能。

在艺术作品中总是能够找到艺术家本人人生经历和社会认知的痕迹。我们常说,字如其人,实际上,画也如其人。艺术作品往往和作者本人的个性、特点都有非同一般的相似。观摩刘狄洪的油画,会发现他的画作有着西方绘画的严谨和东方中国画的飘逸,具有独特的艺术图形样式。在他的作品中,比

收稿日期:2017-02-20

作者简介:刘泳俊(1973—),男,湖南常德人,硕士,中原工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心理学、艺术社会学。

如《南天门》《原始森林》(见图2)等,画面总是排得有些满,留白的空间很少,这与画家本人非常相似。真实的生活中他是一个心理空间几乎填满的人,各种各样杂乱的事情,他都不肯放下,始终充斥在他的头脑中,可以说是内心满满,忧愁和喜悦、希望和绝望同存。很多时候他不愿意交流他的情感,他更愿意将自己的想法和心情融进他的作品。他的画作题材很多都是以湘西北为题材的风景画,来自于他在湘西北的人生经历。在他眼里,那些画不仅仅是艺术作品,更多的是他的心路历程,有彷徨、焦虑、相思和向往,这些作品是他一生经历的写照。



图1 夕阳



图2 原始森林

其实每个人的心路历程中都隐藏着巨大的财富,可是身在其中的人却感受不到。但当远离了自己的童年生活,置身于新的环境,往往容易触景生情,勾起无限的回忆。刘狄洪先生数次跑到湘西北深山老林去户外写生创作,在那儿,童年、成长、情感、生命感思纷至沓来,统统汇集到先生的内心和情感里。他在人之初的前六年生活在湖南邵东山区,成年后对山景、树木、森林、水塘等寄托着特别的情愫。

刘狄洪在2004年创作的小幅油画《晚归》(见

图3)实际上是其本人潜意识中对童年生活的一种追忆,一种向往。画面中的风景成了相思之地,也是他生活理想的伊甸园。创作者的出生地、生活地以及近郊的农村山区对于其本人而言,都是永远抹不去的怀念。远处和近处的山、森林、骑牛的牧童,都是艺术家小时候真实生活的写照和缩影。通过这幅《晚归》,创作者表达了都市人逃离生活的一种向往,向往和自然融合,向往一种回归,向往祥和和宁静。无论是《原始森林—四川九寨沟》《瀑布上的森林—湘西》《原始森林—湘西》《山沟里的吊脚楼—湘西》(见图4)还是《荷塘水竹—常德花岩溪》等等都是表达艺术家对童年生活的生命感思和艺术情愫。



图3 晚归

进入刘狄洪画室,在满是油彩污渍的桌子上有各种画笔、创作用的刀具等,他用这些画笔和刀具完成他在野外写生时获得的丰富、广阔和深远的感受。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油画工作室是一个能给他带来安静思考和创作灵感的地方。他创作的艺术带有浓厚的个人情感,并且代表了经过中国社会大变迁的一代人的社会心理。

(二) 社会文化在绘画作品中的投射表达

作为一个高境界的艺术家,仅有艺术才华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具备对于人性、对于社会的很强的洞察力,遵从自己的真实感受,将眼中的景色或人物,融入自己的情感世界,利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在画布上呈现。

艺术作品的穿透力不仅仅在于视觉,更是对自然、社会的洞察与呼喊^[2]。竹林、荷塘、树木森林、吊脚楼系列作品在刘狄洪先生的创作题材中占据了重要的部分,艺术家用丰富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表达出思考的主题。《暴风雨来临之前》(见图5)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画面中大片的乌云,狂风大作,使得树叶大面积摆动变形,好像整个画面是活的,真的能够动起来。通过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自然景象,作者

隐喻表达在大事件面前人对于未知的世界表现出的恐惧和战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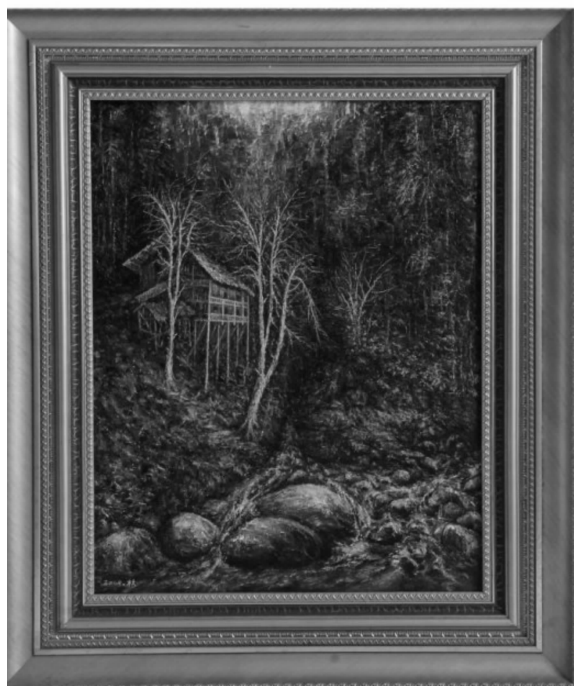


图4 山沟里的吊脚楼

他的系列油画作品,如《土家苗寨》《湘西景观》《原始森林》《深沟巨石》等,如同在时空中穿梭,就像世外桃源,让人神往。返璞归真的土家吊脚楼、参天茂密的千年古树、杂乱分布的大小不一的石头,充满对人与自然和谐的憧憬,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无奈。

二、刘狄洪油画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

在艺术上,刘狄洪把中国画的写意性运用在油画创作中,开辟了意向性浪漫主义写实写意油画新画风。先生40岁前是一位全国知名的中国山水画家,1983年后,他逐渐将重点转向油画创作。先生有着扎实的写实写意造型基础,也有较为全面的艺术修养。他的意向性写实写意的风景油画,是把油画的对景写生与传统中国山水画注意综合感受、整体把握的印象写生法结合起来。面对客观景物时,他并不完全拘泥于客观写实,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念和画面创造的需要做绝美的艺术处理,如《常德花岩溪一春》(见图6)。先生创造的苗寨吊脚楼系列油画,用小画笔勾线,完美表现出笔触、肌理的美感,同时,也注意画面空间以虚带实、以实引虚的建构,以意境和实景的完美结合来传情和表现美,如《山沟里的吊脚楼—湘西》《森林派出所—湘西》等。

观摩刘狄洪的珍品画作,如《金秋急流》《森林派出所》,能从它的一景、一物、一阁、一窗、一檐中观察到它的整体气势和变化。在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时,先生通过反复观察、反复思索、借鉴国内外经



图5 暴风雨到来之前



图6 常德花岩溪春

典,形成了独到的表现湘西北景观的手法,充满智慧地表达了新的符合美学、艺术规律的思想。可以说,他在强调中国绘画与西方艺术融合的同时,关注传统的思想内涵与现代延伸,如油画作品《沅江—常德》《新开的路》,对风景万物的光线、色彩细致入微的观察,已经不单单是写实派或印象派的绘画特点,而是一种大气深沉和凝练,而这正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的珍贵品质。

刘狄洪创作的大幅油画《宝石山在云雾中》《金秋急流》,中幅画《初雪》《春》,以及小幅画《晚归》《暴风雨来临之前》,生动地刻画出创作者的心路历程。他对整体画面的把握能力,不仅体现在小空间的艺术表达,更是展露在大画布上的自然景观叙事,他用油彩、光线等形象阐释了自己的感悟和创意。

在他创作的各系列油画艺术珍品中,通常在同一地点不同时间,多幅画面交替变换,如《河伏山庄》《春》,这些不同时节不同时间段的同一地点的作品,给予观者更生动的展现,仿佛能真实体会到此地点的季节变化、仿佛自己是真实的感受者和体验者。这一点和印象派大师莫奈不谋而合。

在创作过程中,画家有意或无意地重组客体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由物象向创作审美意象的转

换^[2]。可以说,刘狄洪先生的画中之“意”与情、景相融汇。他的风景油画格调优雅大气,充满诗情画意和思想表现力。无论是远处的山景、森林,还是近处的房屋、树木、鸟禽皆通过细心提炼和重组,将富于美感的元素恰到好处地融进画中。他用画笔描绘的自然是经过心灵整合的自然,从其画作中可看出他的内心世界和个中性情。在晚年,不顾年近七十的高龄数次深入湘西原始森林写生创作,透过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表现古木参天、深山密林、牧歌田园般的诗意审美。

刘狄洪先生用自己的实践探索中西两种文化审美意境的无限可能性,融入了自己的绘画语言,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个人品格特征的表达方式,在其油画作品中,对色彩语言的敏感和高超的驾驭能力均得到了彰显。

三、结束语

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理想而活着,而刘狄洪的理想就是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他用浑厚的笔触绘制斑斓的色彩,将深邃的人性理解融入自然,融入生活,创造了属于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和表达自然情感

和艺术思想的作品。如今,西方写实油画已经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超现实油画已与照片无异,而绘画和照片最重要的不同可能就在于绘画作者不仅仅是看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理解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而后用自己的创造去实现了什么^[2]。刘狄洪先生就是通过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情感,酣畅的用笔,实现了视觉的强烈的冲击力。

绘画是在个人独特品格的基础上符合社会文化的一种精神艺术。刘狄洪先生把稍纵即逝的现象加以处理,用画面直观地呈现出来,并转化成隐含的模式,从而作为思维表达的出口、心理意向的投射、未来行动的指南或警醒。

参考文献:

- [1]莫雷. 20世纪心理学名家名著[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
- [2]唐华伟. 当代油画:风景专辑[M]. 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许峻)

Painting Art and Psychological Expression

—the Psychological Express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Culture in Liu Dihong's Paintings

LIU Yong - jun

(Library,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45007, China)

Abstract: The art of painting is to reveal the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psychological process and nature by the visual language. The personal thinking is fully expressed with the picture. These thoughts are form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one's life with a variety of elements. Of course, these elements also make up the artist's unique spiritual world with the wisdom of social and cultural precipitation.

Key words: painting; art; psychological expression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新媒体时代两个舆论场的规制分析

刘志杰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开封 河南 475001)

摘要:首先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分析新媒体传播市场的负外部性,并由此导致的虚假信息、有害信息频频出现、缺乏社会责任等问题;其次,从政府失灵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对传播市场的过分干预所导致负面影响,如传统媒体传播信息角度单一、内容高度重合、公信力降低等带来舆论引导作用减弱等问题。文章研究认为,中国目前的两个舆论场是由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共同造成的,过分自由的信息传播市场常常会形成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舆论,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规制;相反地,政府干预过多的官方媒体则需要给予更多的市场自由和竞争激励。

关键词:新媒体;舆论;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16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83-04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社交媒体与自媒体的勃兴,打破了我国传媒产业市场格局,传统媒体不再是新闻产品的单一供给方,越来越多的传统意义上的非媒体进入媒体领域,大量的机构、企业和个人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工具向社会公众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闻信息,这些传播主体在内容生产时强调社交性,以获得更多的阅读量为目标,在网络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受众群体,从而聚合起新媒体舆论场。与此同时,传统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因为担负着政府宣传与舆论引导的职能,往往更多受政府意志影响,传播内容和角度与前者有很大不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两个舆论场在很多时候是对立的,舆论的对立带来了社会的割裂,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剧,分析两个舆论场的成因,缓和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当前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文献综述

“两个舆论场”最早由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先生提出,他认为中国有两个舆论场,一个是老百姓口头舆论场,一个是新闻媒体舆论场。^[1]但是,随着

新媒体的兴起,两个舆论场开始在媒体渠道选择上表现出明显差别,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逐渐形成了一个传统媒体舆论场,微博、微信、BBS等新兴媒体则逐渐形成了新媒体舆论场。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原来掌握于精英手中的媒介控制权逐渐分散,普通大众把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作为观点表达的重要途径。^[2]在利用网络传播信息的过程中,网络传播和传统的媒介传播逐渐形成两种对抗的力量,这一问题在我们国家尤其明显。^[3]有学者通过对比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后指出,新媒体时代中国出现了两个舆论场,网上讨论的议程和传统媒体讨论的议程有很大不同,两者之间的观点也有很大差别。^[4]也有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可能的原因,认为中国两种舆论之间的冲突和互动,对传统媒体的控制力带来挑战,传统媒体要报道政府希望的,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则倾向于市场化,报道民众喜欢看的。^[5]

新媒体舆论场与传统媒体舆论场的对抗一方面推动了普通民众观点表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于

收稿日期:2017-04-28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常态背景下河南传媒企业的互联网+战略研究”(2015BXW002)

作者简介:刘志杰(1979—),男,河南焦作人,管理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媒体经营与管理。

社会发展来说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6]在中国,网民常常诉诸于互联网和新媒体来解决自己遭遇到的问题和麻烦,但是他们并不是专业的新闻人士,所以传播的内容难免会存在偏激、不全面等问题,新媒体的兴起带来了舆论监管的新问题。^[7]科斯很早就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他认为思想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不应该有区别。与商品市场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其作为商品市场中的一种而存在,只是交易内容的差别。^[8]在传播市场出现的市场失灵问题上,田秋生认为,市场机制不能确保大众传媒成为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因为新闻产品存在很强的外部性问题,若新闻产品的外部性为正,则传媒企业理应从第三方获得相应的收益;若新闻产品的外部性为负,则传媒企业应承担相应的经济成本。然而,市场机制却无法把此类收益或成本纳入交易之中,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可产生正外部性的新闻产品价格偏高,以致生产诱因不足;而可产生负外部性的新闻产品价格偏低,以致生产泛滥。^[9]

在传媒产业市场失灵的问题上,查先进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入手,认为信息的传播失灵主要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要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这种“信息的市场失灵”^[10]。朱春阳先生也认为传媒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仅是靠市场选择的,也要由完善的规制措施来保证不至于偏离公共服务的轨道。^[11]然而,传媒市场或者说新闻市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是一个值得探讨问题,有学者认为,网民和传统媒体之间并非不可调和,只是因为传统媒体在履行导向功能时,常常是引导舆论而不是顺从舆论。^[12]政府以一种“强势传播”的姿态向社会公众发起猛攻,不注重社会公众的选择性心理机制,不考虑受众的信息需求,而只将自身宣传的需要作为传播的原始出发点。^[13]这种过度的政府干预,同样可能带来政府失灵,政府失灵导致的传播失灵与市场失灵叠加在一起,导致了中国传媒业的双重失灵。^[14]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出现的两个舆论场,为解决两个舆论场冲突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但从产品供给的角度分析新媒体市场失灵和传统媒体政府失灵的研究成果还比较欠缺,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冲突的舆论背后反映的是新闻供给的不合理,只有弄清新闻供给中存在的问题,才能通过经济手段对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进行合理的政府规制,使两个舆论场逐渐走向融合,使新闻媒体能够真正代表公众利益的观点——舆论。

二、新媒体新闻供给的市场失灵

新媒体正带领中国进入“众媒时代”^[15],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新媒体中找到自己的传播工具,个人社交媒体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新浪微博月活跃用户数(MAUs)增至3.13亿。微信及WeChat合并月活跃用户数达8.89亿。另一方面,随着算法推荐分发平台的崛起,以头条号、百家号、企鹅号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发展迅速,其中个人账号数量增加最为迅猛,从头条号发布数据来看,截至2016年12月,个人自媒体账号已经达到33万个,平均每月发布量将近20万篇。除此之外,一些音频媒体、视频媒体也在大量传播日常生活中的新闻事件。由于新媒体没有进入壁垒,加之为数众多,多数都在免费供给新闻信息,因此,新媒体的新闻市场几乎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供给方都存在着自身的利益,要么为自己所在的组织服务,要么通过争取更多的受众来获得广告或其他收益。总之,其传播的出发点是完全遵循市场的游戏规则——利益最大化。

但是,新媒体新闻产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却经常存在各式各样的“缺乏效率和公众精神”的问题,比如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常常出现虚假新闻、花边新闻、暴力语言等内容,特别是在重要舆情事件中,对公共话题进行标签化、娱乐化处理,致使该舆论场观点极端、言辞激烈,不仅不能从社会福祉角度出发做好社会守望,反而出现了谣言传播、恶搞严肃事件以及嘲讽社会等问题,不时挑起大众敏感神经,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对社会言论带来严重的精神污染。究其根本,则是由于其产品本身的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诚然,新闻产品是以传播信息从而影响思想和观点为主的,科斯曾提出思想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没有区别,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当思想用于交换成为一种商品时,其带来的社会影响是远远高于普通商品的,也就是说,其社会价值要高于本身价值。新闻产品的消费可以影响他人的行为,既可以怂恿坏的价值,也能鼓励好的价值,将人们的注意力导向低俗、琐碎、冷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非常巨大的。^[16]以“8·12”天津大爆炸为例,事件发生后,很多社交媒体传播谣言,声称爆炸带来的严重后果,致使民众恐慌不安;由此影响了人们的正常工作生活,其经济损失不可估量,但这些媒体却为此赚足了眼球。新媒体生产者生产不实信息或低俗新闻为自己带来了收益,产生的负面影响却由社会承担了。

我们看到,新媒体在高质量新闻产品供给上明显表现出生产不足的态势。这主要是因为市场机制本身不仅无法解决负的外部性,同样也无法解决正

外部性的问题。高质量的新闻产品的生产需要花费更高的成本,需要对事实的真相和价值作出明智的判断,但在新媒体环境下,免费几乎成为常态。由于信息产品是一种体验品,所以受众在阅读新闻之前无法判断其价值,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即使是高质量的产品如果采取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会导致需求下降,这样生产高质量新闻产品市场风险就很大,因为生产者生产了价值(其社会价值很高),自己却无法获得这种价值,所以生产动力不足。

三、传统媒体新闻供给的政府失灵

目前,传统媒体在我国依然是主流媒体,长期以来,由于传统媒体大多服务于当地政府,形成了鲜明的政府工作风格,特别是在一些突发事件面前,传统媒体报道滞后,新闻语言风格生硬,带有较强的行政辞令和官方色彩,有的媒体甚至在当地政府的授意下,对一些关系人民群众的重要事件采用瞒报或不报的方式,企图通过议程设置来淡化事件的影响力。这种情况,不仅完全违背了媒介作为社会公器为公众利益而发声的本质精神,也导致了大量新闻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

与新媒体不同的是,传统媒体所出现的问题恰恰处在问题的另一个极端——政府失灵。政府过多地干预和主导了新闻产品的供给,传统媒体在新闻供给时,优先考虑的是政府需求,其实质类似于市场垄断。在一个行政垄断的新闻市场中,生产者通常不关心市场究竟需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而是按照政府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这也会带来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在很多重大事件的报道中,传统媒体通常特别小心谨慎,往往采用新华社通稿报道从而导致内容雷同。此外,在关乎政府利益的事件报道中,传统媒体多采用官方消息发布的方式,不注意对公众声音的传达,单向度、居高临下的传播口吻,不能够平等地传达各方观点,被新媒体报道牵着鼻子走,显得特别被动。传统媒体所表现出的政府失灵在区域性媒体的表现尤为明显,由于各地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地方护主义,这对当地媒体的新闻报道形成很大制约,特别是面对那些对政府不利的公众新闻和社会新闻时,采用忽略的方式来处理,人为地造成信息传播不畅的市场后果。作为政府,自己也是特定的利益主体,也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并不是时刻统一的,有时候政府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众利益或社会利益,使新闻产品偏离公共性。

四、规制:两个舆论场的平衡

解决两个舆论场的问题,需要通过合理的规制

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问题。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两个舆论场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新媒体时代才有的,只是新媒体使民间舆论场有了新的阵地,舆论的背后仍然是社会各阶层所要表达的言论集合与民意汇集。即使是政府主办的传统媒体,在没有政府补贴、完全自负盈亏的情况下,因为追求商业利益,也会直接表达和新媒体相同的观点和言论,这就表明了,两个舆论场在渠道选择上并不是完全界限分明的,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17]这一讲话,反映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当前新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视。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重点是市场供给侧的改革,中国的新闻市场也亟须这样的改革。看似充分竞争、高度自由的新媒体新闻市场,其实并没有能够很好地提供人们需要的高质量新闻产品,有效的新闻供给不足导致无效的新闻供给过量,特别是在新闻产品边际成本基本为零的情况下,竞争度越高越容易分流受众,在经济利益的压力下,生产者缺乏动力去生产代表公众利益和社会福祉的高质量新闻产品。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规则面前,新媒体生产者总是倾向于优先考虑个人收益而不是社会收益,反过来说,如果有机会让社会承担成本,又何乐而不为呢?因此,没有必要的规制,单单依靠市场的调节新媒体生产者是不会把目标定位于公众利益的,政府需要通过经济、法律等手段对市场外部性予以矫正,用完善的制度来保障新媒体的健康发展,对产生负外部性的新闻产品予以罚款、限制甚至追究法律责任;对于能够产生正外部性的新闻产品要予以激励,通过补贴、资助、奖励等方法,引导新媒体生产符合公众利益的新闻产品。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政府应当鼓励竞争,给予其更多的市场自由,建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统一管理制度,为传统媒体松绑,让媒体真正成为一个多方意见表达的公共空间。对媒体的管理方面,把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结合起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需要一支过硬的新闻队伍,对市场、民意、政府、社会要有一个综合的把握,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在新闻生产上出现问题。对政府来说,媒体合理规制的复杂性主要是对社会效益的衡量,我国新闻传媒既要发挥新闻的导向功能,实现社会效益;又要承担经济上的创收任务,实现经济效益,这造成了规制

目标的双重性与实施的两难性。

新媒体舆论场与传统媒体舆论场尽管在许多方面对立,但两者并非不可调和,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上两者是一致的。解决两个舆论场冲突的问题,关键在于自由和规制之间的平衡,必需的自由和恰当的规制,能够使两个舆论场在公众利益上达到平衡。

参考文献:

- [1]陈芳.再谈“两个舆论场”:访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J].中国记者,2013(1):42-46.
- [2]Stockmann D, Luo T. Which Social Media Facilitate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China[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5(4):189-202.
- [3]Castells M.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Counter - Pow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1):238-266.
- [4]Luo Y. The Internet and Agenda Setting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on Media Coverage and Government Poli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4 (8):1289-1312.
- [5]Tang L, Sampson 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ss Media and the Internet in Non - democratic States: The Case of China[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2, 34(4):457-471.
- [6]Li Y Z, Zhang M 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System[J].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2014, 926-930:1902-1905.

- [7]Wu T, Huang H. New Topic of China's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in the New Media Era:Exposure by Internet[J]. 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1(7)3:60.
- [8]Coase R H. 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4, 64(2):384-391.
- [9]田秋生.新闻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市场失灵[J].当代传播,2011(2):14-16.
- [10]查先进,严亚兰.再论信息市场失灵与政策干预[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26(4):8-10.
- [11]朱春阳.传媒产业规制:背景演变、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29(3):170-175.
- [12]Rawnsley G D. The Media, Internet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Taylor & Francis,2006. Abingdon,118-135.
- [13]夏源.新媒体政府规制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2.
- [14]潘祥辉.论传播失灵、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的三角关系:一种信息经济学的考察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2):51-56.
- [15]祝华新.网络舆论生态的综合治理[J].新闻与写作,2016(7):1.
- [16][美]查尔斯·埃德温·贝克.媒体、市场与民主[M].冯建三,译.陈卫星,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2.
- [17]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19/c_1118102868.htm.

(责任编辑 吕志远)

Market Failure and Government Failure: the Regulation of Dual Opinion Fields in the New Media Era

LIU Zhi - ji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conomic theory, the paper explores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failure and government failure. On the one han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of the information spreading through new media, the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rumor, sedition, pornography and lack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also studies th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journalism due to excessive intervention by government, such as homogenization in contents and opinions, declining in public trust, as a result, the media's power of direction is decreasing.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situation of dual opinion fields in China is caus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market failure and government failure. Governments should regulate the freedom of opinion market with loosening the intervention in the official media, and encourage them to competition in free market.

Key words: new media; public opinion; market failure; government failure

期刊质量评价:期刊与学术环境的匹配

——以《科技进步与对策》为例

杨 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3)

摘要:期刊质量是办刊机构生存发展的基石,期刊质量与学术环境的匹配情况能反馈和影响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以《科技进步与对策》为样本,“知识共享”为主题,从文献累积数量和结构相似系数两个维度对比样本期刊质量是否匹配主流学术环境的发展。结果发现,《科技进步与对策》跟随学术发展的轨迹,甚至引导了学术发展的方向,但与整体的发展环境仍有差异,需要在求同存异的基准上进一步改善。

关键词:文献计量;期刊质量;结构相似系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17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87-05

期刊评价是图书情报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议题,浩繁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推动和丰富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出版科学、评价学等学科的发展。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期刊评价学术诉求和文献成果助力图书情报学在主流学科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1]在2017—2018年的CSSCI来源集刊和收录集刊中,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文献学的期刊排名、期刊来源较2014—2015年的版本有很大的变动,这一客观事实反映出在“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背景下,当前期刊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生存条件日趋激烈和严峻。如何有效地对期刊自身做出合理评价顺应大环境的发展趋势,如何有利地采取应对措施提高期刊内容“含金量”,成为了期刊谋求发展的关键。在充分强化被引量、载文量、下载量、H指数等文献计量指标的数据导向的评价环境下,本文从期刊的内容质量切入,以《科技进步与对策》为样本,选取“知识共享”为主题,从文献累积数量和结构相似系数等方面对比样本期刊质量是否匹配主流学术环境的发展,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一、文献综述

1. 环境匹配理论

环境决定论强调环境对个人、组织的绝对支配,

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助力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决定”的质疑。马克思主义认为,环境是外因,个人、组织自身是内因,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外因通过内因对事物产生重要影响,打破了环境决定论的绝对主义。环境决定论发展至今,衍生出企业管理中组织与环境的适配问题,^[2]在大数据技术繁荣的时代,“闭门造车”无异于“自取灭亡”,无论是公共管理部门、私人企业或者非营利性组织,都需要从外部“输入”各种适合组织发展的信息、资源、知识,通过内部的系统协调运作,“输出”产品、信息或者政策。^[3]因而,组织与生存环境的交互功能的协调性能充分影响组织的成长。同时,个人作为组织中的基本单元,个体与组织环境的匹配、个体与大环境的匹配等议题也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徐茜^[4]提出,人才所处地区的经济环境、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等对人才和环境的相容性有特殊的影响。张翼^[5]等人通过构建关于人与环境匹配的结构-过程模型,丰富了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学科内容。

期刊无论是作为一个组织整体或者是个体属性,都需要遵从“适者生存”的天然法则,否则就会

收稿日期:2017-05-12

作者简介:杨正(1994—),男,湖北汉川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献计量与行政改革。

被潜在竞争者和行业竞争者从已有的学术“市场”中取代和淘汰。同样,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期刊的生存发展需要适应与环境的交互,^[6]期刊发展的学术环境影响着期刊内容热点的选取,期刊的自我强化功能也能影响学术研究的热点选择。因此,从环境引导需求出发,在机会和威胁的大环境里,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扬长避短,^[7]突出期刊发展的社会效益,顺应时代发展的特色和趋势,引导学术发展的前进方向。本文选取这一视角,探究样本期刊与学术发展环境的自适应性,借此来评价样本期刊的发展现状,提出提高样本期刊质量的建议。

2. 文献计量与期刊评价

国际上,对期刊评价的指标、方法、影响因素等研究很多。韩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期刊评价方法不一,评价指标的权重各有侧重,^[8-9]相关研究也曾提出将国际化列为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10]同时也有学者强调纯粹的指标性检测的存在性值得怀疑。^[11]在国内,期刊评价侧重于利用文献指标等客观数据测量期刊的内容质量,例如:被引量、下载量、H指数、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等。^[12-15]当前,文献计量学蓬勃发展,文献计量工具功能日趋完善,知识图谱类的概念研究推进了图书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成熟。近五年,CSSCI收录的有关知识图谱的文献在数量上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也凸显出图书情报学逐渐从边缘走向了中心。知识图谱类文章主要是从研究机构、研究对象、研究热点等方面研究某一领域的前沿热点和知识基础,属于方法论的完善和补充。^[16-18]在实践中也存在着非文献计量的评价方法,即质性价值判断方法。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方法,结合质性学术价值判断进行分析研究,避免了文献计量与非文献计量之间的争论。

二、研究设计

以《科技进步与对策》为样本期刊,选取“知识共享”为主题,从文献累积数量和结构相似系数方面对比样本期刊质量是否匹配学术环境的发展。研究设计包括样本选择、主题确认、匹配维度等内容。

1. 样本选择

样本选择分为样本期刊和总体样本的选择。首先,选取《科技进步与对策》为样本期刊。《科技进步与对策》由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创办,是中文核心期刊。选取其作为样本期刊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1)《科技进步与对策》属于CSSCI收录的期刊,在内容质量上具有较高的水准。同时,其复合影响因子为1.521,综合影响因子为0.834(2016版),具有较好的学术影响力。(2)2017—2018年的CSSCI

来源集刊和收录集刊半月刊属性的期刊较少,而《科技进步与对策》属于半月刊,该刊出版文献量已达1.8万篇,选取其作为样本期刊可以保证文献数量的可观性和合理性。(3)样本期刊的选择与主题确认具有相关性。主题确认为“知识共享”,《科技进步与对策》设有专栏“知识科学与知识工程”,并且其刊用的主题与科技、创新相关,与研究主题契合。

总体样本的选取:在CSSCI数据库中,检索“主题”=“知识共享”,检索时间为2017年1月15日,检索到1506条记录,无失效记录,故将全部记录作为总体样本进行分析。

2. 主题确认

研究样本期刊和总体样本的匹配关系,在主题的选择中要满足两个主要条件。其一,主题的研究具有较长的时间限度,否则短期的期刊偏好无法满足样本比对的有效性,其科学性会严重不足;其二,样本期刊要对该主题具有充分和充足的研究成果,否则无法反映出该期刊的真实研究水平。

知识共享是指知识所有者与他人分享自身的知识,从而实现知识流在个体之间的运转。我国从知识经济时代跨入到了共享经济时代,“知识共享”成为该时代促进发展的研究热点。从总样本量和样本期刊中的时间跨度而言,主题“知识共享”满足上述两个条件。

3. 匹配维度

在既有文献中,利用文献计量方法绘制知识图谱分析某一热点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通常从该研究主题的文献逐年增长数量、热点主题的时区分布状况、知识图谱的聚类结果等层面展开。本文选取文献累积数量和结构相似系数等维度对期刊与学术环境的匹配作质量评论。

(1) 文献累积数量

文献累积数量是文献计量的外显特征,可以反映出该主题的研究热度和判断主题的衰老程度。通过文献累积的增长趋势判定该主题是否具有可研究的理论价值,通过比对样本期刊和总体样本的对数曲线图,可以判断两者在文献累积增长上的相似性和契合度。

(2) 结构相似系数

利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III总结出每年的文献计量指标,结合结构相似系数反映样本期刊中的某个热点议题在总体样本中是否占有相同的权重,以此反映出样本期刊的发展是否脱离研究趋势,或者跟随研究趋势,甚至引领研究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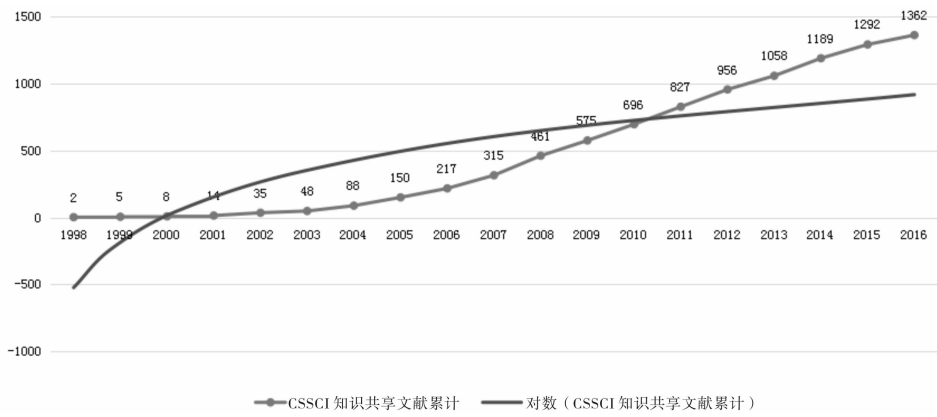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CSSCI数据库关于“知识共享”文献累计情况统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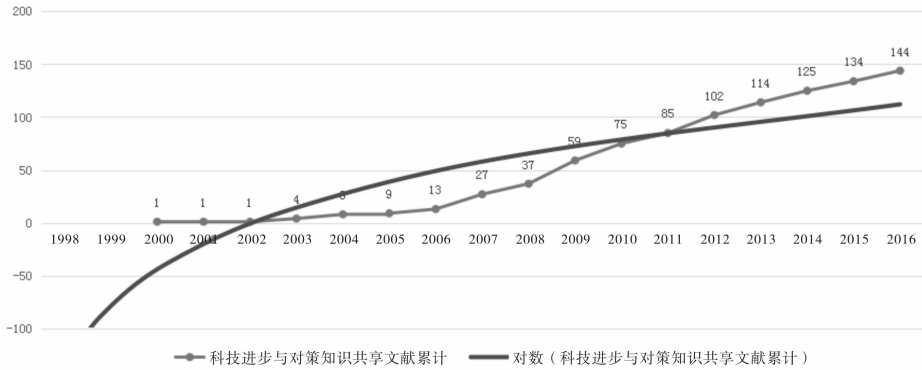


图2 《科技进步与对策》期刊中关于“知识共享”文献累计统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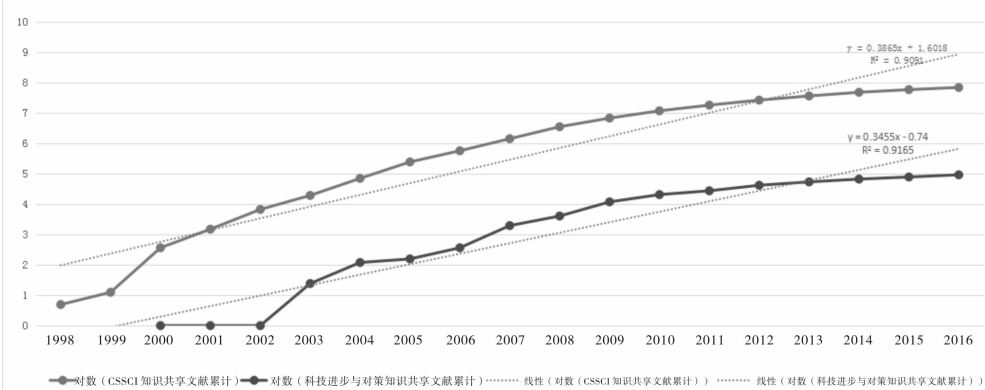


图3 CSSCI数据库与《科技进步与对策》期刊关于“知识共享”文献累计取对数趋势比较

三、结果分析

1. 文献累积情况

图1和图2表明,样本期刊和总体样本(去除了样本期刊的容量)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并且都是从2004年开始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这说明样本期刊和总体样本的论文录用趋势保持一致,因而外部显性结构特征满足匹配要求。两者同取对数,反映出的趋势如图3所示,将趋势图进行线性处理,得到两者的线性函数,并且两者构成的线性函数的拟合优度值 R^2 分别达到了为0.9091、0.9165。通过比较两者的斜率,可以发现总体样本的线性斜率为0.3865,样本期刊的线性斜率为0.3455,结合线性

函数的发展趋势,可以推断出样本期刊的发展趋近于总体样本的发展态势,并且逐年稳步趋近。因而,可以说明《科技进步与对策》选取的相关内容的论文与学术的总体发展在数量增速上保持着协同一致。

2. 结构相似系数

在众多研究知识网络结构的文献成果中,利用Jaccard系数、余弦相似性、网络局部特征值等指标和模型来对比网络结构的特征相似性,这些方法和研究的前提是强调对比双方具有某一同属性、特征、平台的特点,而本文研究对象包含总体样本量和样本期刊,属于“包含”的几何关系,因而以上研究方

法不具有适用性。结构相似系数关注的是网络中的某个节点,而不是注重分析网络整体的相似性或者结构特征,因而从节点层面消弭了整体层面研究的不合理性和伪科学性。结构相似系数 S 的计算公式为:

$$s_{ij} = \frac{\sum_n X_{in} X_{jn}}{\sqrt{\sum_n X_{in}^2} \sqrt{\sum_n X_{jn}^2}}$$

其中, X_{in} 表示项目 n 在网络 i 中的所占比重, X_{jn} 表示项目 n 在网络 j 中所占的比重,系数 S 的结果越接近于 1,表示相似性越高。^[19]

本文借鉴结构相似系数的算法理念,从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性两个方面探究样本期刊与总体样本的匹配系数。^[20-21] 在文献计量学中,词频和中心性都是衡量前沿热点的重要指标。词频表示该热点在研究领域中出现的频数,频数高则表示该热点关键词在研究中存在多次使用的概率;中心性则是表示节点网络结构的特征值,用以判定关键词节点在整体网络中的重要性。同时,由于样本期刊的数量值与总体样本数量值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利用词频计算相似系数不具有参考意义,因而采用中心性值来验证匹配程度。选取关键词“知识共享”,获取其在 2000—2016 年各年的中心性系数(见表 1)。

表 1 2000—2016 年各年中心性系数

年份	中心性(总样本 i)	中心性(样本期刊 j)
2000	0	0
2001	0	无
2002	0.19	无
2003	0.65	1.33
2004	0.79	0.19
2005	1.12	0
2006	0.93	1.31
2007	1.21	1.08
2008	1.07	1.21
2009	1.27	0.42
2010	0.63	0.34
2011	0.68	0.23
2012	1.11	0.49
2013	0.57	0.31
2014	1.13	0.12
2015	0.72	0.21
2016	0.89	0.73

注:样本期刊 2001 年、2002 年无数据,因此相似系数只核算 2003—2016 年的数据。

据计算,2003—2016 年的相似系数 S 为 0.771,接近于 1,属于合理范围。同时,选取局部时间区域的相似系数 S (2003—2009 年)为 0.7850, S (2010—2016 年)为 0.8658。通过对比,发现 2010—2016 年的相似系数比 2003—2009 年的相似系数高,反映出

《科技进步与对策》的办刊内容更趋近于学术发展的前沿。同时,中心性的年度数据表明,在热点主题分析模块所得出的论证结果得到了数据验证。

四、结论与建议

选取《科技进步与对策》为样本,选取“知识共享”为主题,运用文献计量软件 CiteSpaceIII,从文献累积数量、知识基础分布和结构相似系数方面对比样本期刊质量是否符合主流学术环境的发展进度。结果发现,样本期刊与总体样本的趋势走势较为接近,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在热点主题的比对中,样本期刊前期处于滞后,刊文内容落后于学术整体发展;发展至中期,样本期刊的内容质量逐渐跟随该领域的学术脚步;发展至后期,样本期刊的热点选取逐步引导学术的发展走向,实现了质的飞跃。根据知识基础的聚类结果,发现样本期刊与总体样本的研究关注点各有侧重,也反映出样本期刊办刊具有独特性和独立性;根据结构相似系数可以看出,样本期刊在“知识共享”领域的研究与学术发展环境相匹配,适应甚至引导学术的发展,因而“适者生存”。

尽管结论显示出《科技进步与对策》在学术发展环境中实属个中翘楚,但是在“互联网+新媒体”的时代环境下,竞争压力尤胜以往。因此,样本期刊要保持办刊质量上的优越性,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1) 文献累积数量的稳步增长。《科技进步与对策》作为 CSSCI 收录中的半月刊,拥有大量的优质论文的来源,同时也拥有丰富刊载的容量。因此,在利用办刊优势的同时,要注重办刊的责任意识,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刊载更多高质量、研究视角独特的相关文章。

(2) 在保持差异性的基础上紧跟前沿。期刊的生存之道在于办出特色,独特性是期刊发展的关键因素。《科技进步与对策》办刊以来,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和特色的基础上能紧跟时代脉搏。同时,样刊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办刊质量与总体发展仍有较大差距,从知识基础和结构相似系数可以反映出《科技进步与对策》在办刊质量层面仍有提升空间。因而,《科技进步与对策》需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办刊特色,挖掘学术前沿。

参考文献:

[1] 刘宇,卫军朝,杨柳. 国外期刊评价的知识图谱研究: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1940—2015 年)的计量分析[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1):35-46.
[2] 刘建国. 基于组织-环境匹配性的企业战略风险形成过

- 程[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1):104-107.
- [3] 徐双敏,李明强. 行政管理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 [4] 徐茜. 基于环境匹配的人才流动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167-170.
- [5] 张翼,樊耘,邵芳,等. 关于人与环境匹配的结构-过程模型[J]. 管理科学,2008(5):65-73.
- [6] 张惠. 科技期刊与出版环境的协调发展:基于生态学视野的分析[J]. 编辑学报,2010(4):291-294.
- [7] 郭玲,郭华,王会. 我国学术期刊出版环境的SWOT分析[J]. 出版发行研究,2010(10):62-64.
- [8] Sehee O. Suggestions of Improvements on the Current Academic Journal Evaluation System[J]. The Journal of the Korea Contents Association,2012,12(4):495-509.
- [9] Ingrid M. Renew or Cancel? Applying a Model for Objective Journal Evaluation[J]. Serials Review,2015,41(3):160-164.
- [10] Bonnevie - Nebelong E. Journal Citation Identity, Journal Citation Image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Methods for Journal Evaluation [J]. Sciento Metrics,2006,66(2):411-424.
- [11] Toby B. Multidimensional Journal Evaluation: Analyzing Scientific Periodicals beyond the Impact Factor[J].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2013. 62(3):245-246.
- [12] 王一华. 基于 IF(JCR)、IF(Scopus)、H指数、SJR值、SNIP值的期刊评价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1(16):144-148.
- [13] 彭爱东,于倩倩. h指数、g指数和累积影响因子在期刊评价中的相关性研究:以综合性社科期刊为例[J]. 情报科学,2012(11):1645-1651.
- [14] 刘宇,魏瑞斌,方向明. 国内期刊评价知识图谱研究:基于CSSCI(1998—2014年)的计量分析[J]. 图书与情报,2015(5):81-91.
- [15] 邱均平,李爱群,周明华,等.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的特色、做法与结果分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64-69.
- [16] 曹树金,吴育冰,韦景竹,等. 知识图谱研究的脉络、流派与趋势:基于SSCI与CSSCI期刊论文的计量与可视化[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5):16-34.
- [17] 肖明,邱小花,黄界,等. 知识图谱工具比较研究[J]. 图书馆杂志,2013(3):61-69.
- [18] 胡泽文,孙建军,武夷山. 国内知识图谱应用研究综述[J]. 图书情报工作,2013(3):131-137.
- [19] 殷宝庆,颜青. 居民文化消费结构变迁及其优化升级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 统计与决策,2014(23):117-119.
- [20] 邱均平,吕红. 近五年国际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前沿及其知识基础:基于17种外文期刊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 图书情报知识,2013(3):4-15.
- [21] 钟镇. 知识图谱分析方法的可靠性检验研究:以共词分析为例[J]. 科学学研究,2015(5):647-653.

(责任编辑 姚虹)

Quality Evaluation of Journals: Matching of Periodicals and Academic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YANG Zhe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60, China)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journal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running an organization, the matching of journal quality and academic environment can be a good feedback and influenc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journal. The paper, taking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as an sample, “knowledge sharing” as the theme, from two aspects: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literature and structural similarity coefficient, tests if the journal quality matches the development of mainstream academic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follows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he track, and even guides the direction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bu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s still different, it needs to improve on the basis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journal quality; structural similarity coefficient

电视主持人记忆力训练方法探析与实践

韩雁锋, 李慧芬

(安阳广播电视台, 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良好的记忆力是电视主持人基本的职业能力之一,成熟的电视主持人需要采用多种方式训练提升自己的记忆力。训练记忆力的方法包括:理解记忆,用词的意义来锁定词本身;多通道记忆,以情境体验帮助处理信息;情绪记忆,以积极的情感状态调动认知能力;读写记忆,以烂笔头促成好记性;形象记忆,把抽象的词汇变成具体化的形象;刺激记忆,以自我惩罚的方式强制性记忆。记忆力的训练是一项全身心投入的工程,电视主持人需要调动自身的全部感官相互协调才能实现。

关键词:电视主持人;理解记忆;情绪记忆;形象记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18

中图分类号:G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92-04

电视主持人是依靠语言进行表达的职业,丰富的文化底蕴、语言表达能力和形象亲和力是电视主持人最基本的素质。要形成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首先要求主持人记住主持词。因此,记忆力的重要性对于主持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应具有非凡的记忆能力。有经验的电视主持人不仅在备稿阶段就能快速将主持词背熟,在主持的所有阶段,其记忆力都应处在积极的运作状态。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许多年轻的主持人要么在主持时拿着台本,要么在播新闻时前面放着提词器,忽视了激活记忆的重要性,一旦遇到重要场合不能用台本,或者提词器出现故障,就可能出现忘词、卡壳现象而尴尬不已。因此,即使在技术发达的今天,记忆力依然是主持人不可忽视的基本职业能力。^[1-2]

马克思曾说,重要的不是理解记忆力的重要性,而是指出如何获得良好的记忆力。除了与生俱来的记忆能力外,许多优秀的电视主持人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达到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惊人效果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时间紧张、信息未知和公开表演等特征,电视主持人的记忆训练不同于其他职业的记忆力培养,要讲究独特的方法。依据工作经历和业内经验,笔者对电视主持人提高记忆力的基本方法

作简要的分析。

一、理解记忆:用词的意义锁定词本身

不管是听辨、认读,还是产生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具有一定意义的词都是中心环节。准确理解词的含义是言语交际顺利实现的基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记忆从根本上不是为了记住词本身,而是为了在表达中不损失意义。许多实验表明,学习有意义的词和已经理解的词比死记硬背词的音节效果要好得多,理解记忆效果好于机械记忆。因此,对于有经验的主持人而言,无论是节目前的备稿,还是在节目中的熟悉稿件,都应以理解词的意义和稿件的内涵为基础。就一篇稿子来讲,首先要清楚地了解其主旨与段落结构,明白每一部分起什么作用,各部分之间怎样相互联系,进而通过对稿件的含义和词的意义把握来锁定稿件中的词,这就是理解记忆的意义所在。湖南卫视著名新闻女主播、访谈类主持人张丹丹的经验足可证明理解记忆的有效性。按业界评价,张丹丹的记忆力在湖南卫视女主持人中排第一,无论是播新闻还是主持《背后的故事》,她从来都不用台本和提词器。十点钟直播新闻,她有时候九点半才到,在化妆间边化妆边看台本,十来分钟便能将台本记牢,在台上主持时几乎没

收稿日期:2017-05-05

作者简介:韩雁锋(1977—),男,河南安阳人,文学学士,一级播音员,安阳广播电视台新闻主持人,主要从事新闻节目主持和出镜报道工作。

有出过错。张丹丹自称,她的记忆力并非缘自天生,而是因为自己有心,每接触一篇稿子,她都要力求搞懂稿子的内在含义,分析稿子的背景,以及情感的产生与发展,最后能入境、入画,把“我”投入到稿子中去,做到物我交融。有了正确有效的理解记忆,就能很快背诵和叙述稿子内容。因此,提高记忆效果最好的办法,就要尽量使之转化成理解记忆。实质上,理解记忆不仅仅有助于通过意义锁定词汇,还能够增强记忆的弹性和回忆的灵活性。如果仅仅记住了词本身,而不理解词和稿件的含义,一旦记忆卡壳,很难再追忆成功。而理解记忆通过意义给词确定了位置,加上同一意义往往有几个词汇,忘词现象很容易得到弥补,而这是机械记忆达不到的效果。因此,对于电视主持人而言,运用理解记忆达到更好的背稿效果是行之有效的途径。^[3-4]

二、多通道记忆:以情境体验帮助处理信息

作为个体经验的标识、储存和再现的记忆,按照现代信息处理理论的解释,也是信息输入、储存和提取的过程。以此判断,记忆从来不单单是大脑的功能,而是人体所有感官都需要参与的信息处理过程。正是基于该理论认识,美国学者约翰逊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多通道记忆模型,发现记忆过程在横向水平结构上包括知觉性记忆系统和反映性记忆系统,在纵向结构上则包括监控系统 and 执行系统,人的认知记忆活动是这些系统相互作用、共同配合的结果。多通道记忆法能够动员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协同合作,共同接受和处理外来信息。由于各种感觉器官的介入,对信息产生立体化的印象,同时由于各感觉器官对于信息均留有“印痕”,某个感官出现记忆损失可由其他感觉补充,因而能够延长记忆时间,并在忘却时有效实现记忆的追忆。处于舞台表演中的电视主持人正处于多通道活动中,因而多通道记忆非常符合其职业习惯。以无厘头主持方式起家的谢娜就是多通道记忆的高手,在她主持的节目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她模仿名人惟妙惟肖或谈起某个场景活灵活现,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据说得益于她早期扎实的表演功底。谢娜在接受访谈时承认,自己良好的记忆力完全是当年北漂时被逼出来的。未成名前,她时常因为记不住台词而被导演刷下。痛定思痛,她从北漂的朋友那里借了一本《记忆大师》的教材进行研读,学习记忆方法,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充分利用身体的五官功能,调动身体各器官协同记忆。谢娜便利用自己的表演天赋来增强记忆,改变自己在记忆能力方面的不足,从此再也没有因为记不住台词而被导演批评,并且

做到了影、视、歌全面发展。一般而言,我们对声音的记忆、对画面的记忆往往较为深刻,在录制节目目前,多听、多看、多参与到与节目有关的前期采访和剪辑环节中去,让来自新闻或节目现场的视听元素留在脑海中,这样的多通道体验式记忆是最深最持久的。^[5]

三、情绪记忆:以积极的情感状态调动认知能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人的认知能力由理性认知因素和非理性认知状态共同组成,非理性认知状态虽然不直接用于认识认知对象,却影响着主体在认知活动中的态度和效率,即认知执行的效果。非理性认知状态包括人的情感、意志、信念和习惯等等,它们对理性因素起着激活、驱动和调节作用。对于电视主持人而言,其备稿和记忆活动有着紧张的时间限制,依靠非理性认知状态配合,保持良好的情感状态,做到情绪饱满、态度积极、意志坚定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稿件的记忆。如果无精打采、经常走神或有急躁颓废情绪,势必影响记忆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新闻稿和主持词本身包含着明显的情感倾向,这种情感的表达本身也是备稿记忆的要素,如果主持人自身情感状态较差,则不管稿件内容怎样惊心动魄,电视主持人说出来都像病中呻吟,那就破坏了稿件的表达效果。因此,在稿件记忆活动中,电视主持人一定要想办法进行自我情绪激发,做到情绪饱满、精神振奋。央视播音员欧阳夏丹长得不算漂亮,声音不算响亮,但她只要出现在屏幕上,就能够很快牵动观众的注意力,因为她的笑容始终明亮,感情始终充沛,快人快语、充满激情的主持风格,让她跻身最有观众缘的主播行列。据欧阳夏丹回忆,这固然和她的性格有关,也与其在《第一时间》所受的训练有关。《第一时间》安排主持人参加编前会,说自己的感受,通过主持人的发言掌握主持人的性格、说话的方式,写串词时以主持人的口吻和心理状态为参照,使主持人能够在播音时从容发挥。正是这种稿件的写作和准备契合播音员的感受,与播音员的情绪状态保持一致,降低了备稿记忆所需的精力付出。因此,电视主持人在备稿过程中,需要努力调动自己的情绪,达到心境一致性记忆的效果。稿件信息的情绪效价与主持人的心境一致时,稿件中的信息更容易被编码解码,也更容易得到储存。^[6]

四、读写记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明朝著名文学家张溥幼时记忆力较差,想要克服这个缺点。他尝试多次,发现抄写过的文章背诵得较为熟练,对文章内涵的领会也更透彻。他将自

己的书斋起名“七录书斋”，坚持不懈地抄书背书，终于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这就是古人所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渊源。许多人记得这句话，却没有分析过动笔对记忆力到底有什么好处。边读边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不会漏字。背诵或者阅读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一目十行，对内容一扫而过，单个的词汇很难在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写字则不同，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完成，很难漏字更难漏词。二是动笔记忆需要调动较多的感觉器官。眼睛、嘴巴、手的协调，需要集中注意力才能进行，不像默记或者速览时那样容易分神。更重要的是，多种感官的参与使得读写一遍效果等同看了好几遍。三是动笔帮助记忆。动笔可以形成清晰的语感，即用笔记录一遍，主持人对稿件的基本结构就已经比较熟悉了，熟悉的语感有助于主持人开展理解记忆。因此，主持人在识记一篇评论或出镜词的时候，最好是边读、边写、边记忆，即采用读写记忆法提高记忆效率。主持人在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主题性报道需要现场出镜，这个时候就要在短小时内快速记住一篇百字左右的出镜词。当编导为主持人备好一篇稿子，主持人应该立刻工整地抄写，千万不能草抄或字迹不清晰。在抄写时要看、要读，在写中读、在读中记，做到看中读，读中抄，抄中记。另外，主持人写串词或者出镜词时，不能满足于打腹稿，而是要坚持把它写出来。有的主持人喜欢打腹稿，看似打了好几遍，但是稿件始终无法转换为现实形态，由于眼睛看不见而显得不够充分。把腹稿写下来，再看上两遍，稿件似乎就印在心里了。因此，建议年轻的电视主持人在工作中不要偷懒，不要想走捷径，备稿时踏踏实实坐下来边读边写，把自己的所有感官都调动起来，这样看似费了时间、费了力气，但是可以增强记忆质量，保证记忆速度，提高了效率。

五、形象记忆：将抽象的语词转化为具体形象

形象记忆就是把主持串词中的词汇变成活生生的人或景象，变成生动而直观的体验，从而提升记忆效果。心理学家一般认为，人们在认识和记忆事物时，依抽象程度的不同效果也不一样。越是生动具体的事物，人们越容易把握，也更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随着抽象程度的提升，即离具体形象越远的事物，人们想要记住它，花费的精力就越大。事实证明，形象化的言语刺激比单纯的符号刺激在记忆中保持得更好。对于电视主持人而言，虽然每天可能要面对很多抽象的字符，但是总体来说，这些字符相比科学类理论类文本而言，往往涉及具体的事件和人物，以及很多生动活泼的表达。有意识地把词汇

表达的观念转化为具体生动的形象，有助于增强记忆效果。主持人在主持联欢晚会或者综艺节目时，串词往往写得非常优美，但是它不像新闻稿件那样有逻辑可循，有具体所指，记忆起来难度相对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想像记忆法，即把这些优美的词汇转化为具体的形象，可以降低其抽绎程度，方便记忆。比如在展现好日子时，想像过节的商场；在讲良好的自然环境时，想像蓝天、白云、小鸟和浪花；在讲幸福美满时，联想刚结婚的夫妻等等。通过将抽象的词汇形象化，主持人在主持时心中就不再是那些枯燥的词汇，而是美丽的画面了。这种形象记忆，不单单是有助于主持人记住词汇，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主持人抓住串词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准备再现作品中的形象，主持人就可以更好地把握串词中情感表达的分寸，而不会出现表达情感不温或者过火的问题。^[7]

六、刺激记忆：以自我惩罚换取记忆效果

刺激记忆的方法是强化记忆，即强迫自己把主持词记下来，不计条件不讲方法，完全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对于电视主持人而言，由于工作性质的要求，在其他记忆方法不起作用、不能完成记忆目标的时候，死记硬背、反复强化是不可回避的选择。这种刺激记忆的原理是反复输入和重复提取词汇，推动记忆的强化。系列记忆实验表明，相对于其他学习策略，学习过程中的重复提取对保持词汇和意义材料的长期记忆更具强化效应，并能产生更持久的意义学习。华少是浙江卫视主持人，主持风格机智、幽默，现场应变能力强。他先后主持过多档王牌综艺节目，而真正让他名扬全国的是在第一季《中国好声音》总决赛夜晚，他用47秒念完长达350字的广告词，他每秒钟7.44个字的神速令网友叹服，因此被誉为“中国好舌头”。他说强化记忆是表达神速的必由之路，否则根本没办法实现。强化记忆就是反复熟悉串词，把不熟悉的词反复阅读背诵下来。电视主持人有时候状态不好，串词很长时间记不下来，好几天也拿不下一个段子，自己练得着急，别人听着也着急。这种情况下别无他法，电视主持人只能施行刺激记忆的方法，哪个句子记不住，就反反复复地朗读，就像进行自我惩罚。心理学家指出，自我惩罚是增强记忆和改正错误的强硬手段。对于那些缺乏联系的语句或者是客观性知识，除了依靠机械的记忆和死记硬背，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伟大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机械记忆并不是说一点方法也不讲，主持人还可以利用一些技巧，如对比法、列举法等等，尽量找

到快速记忆和巩固记忆的诀窍。^[8]

七、结语

无提示状态下的记忆力,标志着一个主持人的成熟程度。笔者根据自身经历和业界经验列举了几种行之有效的记忆方法,这些方法有原理可循,实践证明效果明显。理解记忆是用词的意义来锁定词本身,表达和交际以意义为核心;多通道记忆是以情境体验的帮助处理信息,记忆是多感官协同合作的结果;情绪记忆以积极的情感状态调动认知能力,用非理性认知状态激活、驱动和调节理性认知因素;读写记忆是以烂笔头促成好记性,抄写是对记忆感官的深度开掘;形象记忆是把抽象的词汇变成具体化的形象,通过降低抽绎度来节约记忆成本;刺激记忆是以自我惩罚的方式强制性记忆,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记忆方法。电视主持人要了解自身的记忆特点,遵循记忆的规律,通过实践来选取适合自己的记忆方法。

参考文献:

- [1] 赵葆真. 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培养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关键[J]. 艺境,2001(1):30-32.
- [2] 董冰玉. 电视节目主持人职业能力的构建[J]. 视听纵横,2008(1):103-104.
- [3] 常宝儒. 词的理解、记忆和保持[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2):139-149.
- [4] 杨冰. 把“机械记忆”转化为“理解记忆”的探索[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S1):89-91.
- [5] 汪建新,周静. 多通道记忆模型(MEM)简评[J]. 心理科学,2004(2)441-442.
- [6] 王振宏,蒋长好. 情绪记忆的理论模型[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12-117.
- [7] 鄢忠秀,陶丹玉. 形象思维与词汇记忆[J]. 南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4):71-74.
- [8] 冯岩松. 论重复提取的长期记忆保持效应[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24-30.

(责任编辑 姚虹)

Analysis on TV Host Memory Training Method and Practice

HAN Yan - feng, LI Hui - fen

(Anyang Radio Station, Anyang, Henan 455000, China)

Abstract: Good memory is one of the basic professional skills to a television host,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needs to use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improve TV host memorizing ability. Memorizing training methods include: understanding memory, the meaning of a word can locate the word itself; Multi - channel memory, the situational experience helps process information; Emotional memory, a positive emotional state can mobilize cognitive ability; Read/write memory, writing down and reading out contribute to a good memory; Image memory, it can change abstract vocabulary into specific image; Stimulating memory, it is a mandatory memory in the form of punishment. Memorizing training is a dedicated project, all the TV hosts put lots of effort in this training.

Key words: TV host; understanding memory; emotional memory; image memory

《孟子》英译的再研究

何霖生

(湖州市外文学会,浙江湖州 313009)

摘要:本文旨在对包通法教授的《〈孟子〉译本精神构式比较研究》进行再研究。文章详细分析了包文所举之例证,质疑其研究手段——以功能派翻译目的论为评判标准,认为以此理论为标准去认定《孟子》英译之优劣有失客观公允,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关键词:《孟子》;目的论;再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19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096-06

由刘翌讲师和包通法教授合写的《〈孟子〉译本精神构式比较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是一篇以西方现代译论——翻译目的论为视角比较中国典籍《孟子》英译本的论文,笔者认为文中论点有牵强附会之处,有言不成立之嫌,有必要予以重新检视。为此,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愿与作者商榷,并求证于方家和广大读者。

为叙述方便,笔者按原文各部分的顺序依次展开,讨论其中涉及的种种翻译问题。

一、关于“引言”

《研究》一文引言中强调《孟子》“不仅在当时,即使在当今社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对《孟子》英译的研究不能只关注语义和文体等,只将其研究置于语言学和文学的问题框架内,也应将其研究转向文化与哲学思考的问题框架内,关注其精神构式和识度,这样才能给异域文化的读者带来东方古典文化之思、之智,为我国文化大战略服务”^{[1]70}。关注经典英译的文化和哲学思考层面很有道理,但细想之下,能给异域文化的读者送去东方古典文化之美的,只能是各个不同时期的《孟子》英文译本,而非那些针对译本的评论文章之功。我们之所以能认识莎士比亚,主要还得归功于朱生豪先生等致力于莎剧翻译的前贤们,而不是后人对于朱译本的评价。这样说并不否定翻译批评的意义,翻

译批评是需要的,真正有见地的翻译批评自然会得到肯定和认可,但文本翻译实践本身更为重要,而译者对经典文本的领悟是否准确到位则直接关系到译本的质量高下。

二、关于《孟子》英译文本

《研究》指出对《孟子》不同时期的各种英译本:“大多数研究或是关注小学层面的微观问题,很少有相关的研究专注于考量翻译就最大程度上接近原作的精神识度、思维构式、语言表征样式与精神格局同构性这一典籍翻译根本问题,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华典籍外译的本体性问题。经典翻译不光是意义与文体,更是人的思维本体、认识构式的传输。”^{[1]71}

此说有失偏颇。如前所述,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评论)是不同的两个方面。翻译研究落后于翻译实践的。就实践层面而言,一个译者在翻译经典著作时,若能关注小学层面的问题,心中装着“信达雅”,以精准的语言、适合的文体来表达原作的意义,也就能较为正确地传输原作的精神;就理论层面而言,翻译研究不能弃微观问题不顾而奢谈所谓的“宏观问题”,导致“言之无序”。意义与文体、及原作的精神本应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三、目的论识度与构式

《研究》于此部分以大段引文来介绍始于20世纪70年代“一种基于源语语篇和目标语语篇功能

收稿日期:2017-04-22

作者简介:何霖生(1947—),男,浙江湖州人,湖州市外文学会会员,研究员,研究方向: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关系的翻译批评模式”，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目的论，并认为“翻译要受目的的制约，任何形式的翻译都可以被视为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有结果的行为。翻译过程中的一切，包括译本的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对原作内容与形式的取舍、译者的翻译思想等，皆由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目的决定手段。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是受众——译文预期的接受者，对译文有着自己文化识度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171]那么，以“受众至上”为目的的翻译“目的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笔者思之良久，觉得其适用范围其实并不广。

或许影视娱乐片的翻译应以受众为上，以激起人们观看的欲望。而在更多的领域里，翻译甚至可以不考虑所谓的“受众”。如机器说明书的翻译，就不存在内容与形式的取舍问题。不管受众是何人，译者都得从头至尾“忠实”地翻译出来，否则机器或安装不成，或启动不了。再如药品说明书的翻译，不管受众对毒副作用是多么地讨厌，译者还得把它原原本本地译出来，因为人命关天。而且《研究》说：“根据目的论的三个原则，目的论不再把‘信’或‘忠实’作为首要的翻译标准。由于目的论是以预期目的来判断译文是否成功，预期目的又反映译文读者的要求，因此‘目的论’推崇翻译标准的多元化。”^[171]若一味推崇翻译标准的多元化，很多经典的翻译将产生多个版本而让人无所适从。

1954年3月29日，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英译本时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两段话，其理由是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的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随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按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回复，表示不同意删去。因为毛泽东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改。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此为毛泽东对其著作外译的态度，笔者以为这也是一个思想家对自己思想的态度。但若按照翻译目的论“忠实的程度在宏观上取决于翻译目的的要求，忠实规则要服从于目的规则”^[171]，那就得去问受众——国外的读者，而受众又有阶级属性的不同，有文化层次的不同，岂不是众口难调？

四、《孟子》译本精神构式对比研究

（一）《研究》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

《研究》中：“文化负载术语如何翻译构成了中

华典籍译文成功与否的一大关键要素。在《孟子》中，当然也不乏此类词语，如‘仁’‘天’‘道’‘气’‘君子’‘性善’‘四端’‘小人’等等，皆是承载儒家文化思想特有的知性术语。如何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是对译者能力的挑战，也是体现译者翻译思想和翻译态度的试金石。究竟对作者负责，关注文本知性格局和体系，还是把目标语读者的反映视为衡量译文的主要标准，都将左右译者的言语行为和行文样式。”^[172]

以上关于“文化负载词”的说法不够确切。如“道”是老子最先提出来，在老子的思想里“道”即是“气”。应当说这些词语并非为儒家所专有，否则百家又何以争鸣？至于“究竟对作者负责，关注文本知性格局和体系，还是把目标语读者的反映视为衡量译文的主要标准，都将左右译者的言语行为和行文样式”就显得奇怪了。《研究》给译者出了这样一道选择题，按照《研究》所持的翻译目的论立场，是希望译者能选择后者，即“把目标语读者的反映视为衡量译文的主要标准”，可问题是译文尚未问世，还在译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又如何能够知道“目标语读者的反映”呢？再者，译者工作时难道可不对原文作者负责，不关注原本吗？

关于理雅各、文库版和刘殿爵三译本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一文做了对比分析，且看《研究》对其所选译例的分析：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

James Legge: I understand words; I am skillful in nourishing my vast, flowing passion - nature.

Library: I am strong in analyzing others' speech and in cultivating my vast vital energy.

D. C. Lau: I have an insight into words. I am good at cultivating my 'flood-like ch'i'.

“文库版出于文理流畅之目的，将‘浩然之气’译为‘vast vital energy’把气当作是一种能量，采用了归化翻译的策略。但是文库的翻译是有问题的，‘energy’一词体现的是一种科学化、物理化的概念。会给读者留下什么感觉呢？西方读者本身就难理解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的真正内涵，而此处用energy只会起干扰作用，使读者认为作者在此是在做积蓄物理能量的exercises。”^[172]《研究》对文库版所译“浩然之气”中用energy一词的质问，似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上energy有四解：1 (U) the ability to put effort and enthusiasm into an activity, work, etc. 精力；活力；干

劲。2 energies (pl.)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effort that you use to do sth 精力; 力量。3 (U) a source of power, such as fuel, used for driving machines, providing heat, etc. 能源。4 (U) (*physics* 物) the ability of matter or RADIATION to work because of its mass, movement, electric charge, etc. 能; 能量。再看由中国学者独立研编的《英汉大词典》^{[2][6]2}的说法: 1. 活力, 干劲; (语言、文体等的) 生动有力。2. 精力; 能力; 力量。3. 能, 能量; 能源。不知为何《研究》仅只把 energy 当作是一种能量, 而对此词的其他意义视而不见? 还说“西方读者本身就难理解的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的真正内涵”。许渊冲先生在他的研究中告诉我们“据电子计算机统计, 英、法、德、俄、西等西方国家的语文之间的差异不大, 两种语文之间约有 90% 可以找到对等词, 而中文和英文之间的差距却大得多, 据统计只有 40%—50% 的对等词, 因此, 只研究西方文字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得出有重要国际意义的翻译理论。只有能进行中英互译的译者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3] 笔者对此说信以为是, 因 energy 的俄文对等词是 энергия; сила; мощность (活力; 精力; 气力; 力量), 而其复数形式在俄文中则表示斗争等活动中的精力、能力。应当说西方读者对 energy 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的真正内涵是并不难理解的。“刘殿爵对这一句的翻译体现原文译截然不同的精神识度, 他将‘气’采用了威妥玛拼音译法‘ch’i’, 可谓典型的 anti-translation, 张扬了中华文化精神的个性化术语, 传达了中华民族不同于西人的对人生的高扬浩然之精神追求, 实现了译文为读者保留它者精神格局的目的。”^{[1]73}《研究》对刘殿爵以 flood-like ch’i 译“浩然之气”十分赞赏, 其实, 要不是在其前已有所说明的话, 这个译法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英文版)^[4]中有这样的表述: Its most useful word was ch’i (air? Breath? Spirit?) which, being invisible, was most susceptible of “mystic” handling. 可见对以 ch’i 译“气”是应作出具体说明的。冯友兰先生是这样用英文表述“浩然之气”的: …if we turn to Mencius’ discussion on what he calls the *Hao Jan Chih Ch’i*, a term which I translate as the “Great Morale.” 有了这样的说明之后, 才进一步表达“我知言,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I know the right and wrong in speech, and I am proficient in cultivating my *Hao Jan Chih Ch’i*.^[5] 应当说冯先生的表述才是非常之到位的。

(二) 关于“性本善”的译本对比分析

例 1. 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

善, 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James Legge: The tendency of man’s nature to good is like the tendency of water to flow downwards. There are none but have this tendency to good, just as all water flows downwards.

Library: Human nature is always good, just as water always flows downwards. No human nature but is good, no water but flows downwards.

D. C. Lau: Human nature is good as water seeks low ground. There is no man who is not good; there is no water that does not flow downwards.

“这句话诠释的是孟子有名的‘性善论’的命题与人生规定。而在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东西方文明的界定是截然不同的。性善与性恶是东西方文明的重大差异之一, 东方文明崇尚人性本善, 后天应教化、发展这种善的本然; 而西方文明认为人性本恶, 人人生来有罪(sin), 所以要制定完备的法律制度来约束、规范人的行为(杨颖育, 2011)。孟子在此提倡的是人性本善, 是内在的善性, ‘善’是生来固有的, 亦是内修的结果, 而非外索的果实。身处东西方两种文明和不同时空维度上的三位译者, 对‘人性本善’翻译的差异, 就深刻地体现出了翻译目的对翻译的影响。理雅各把‘人性本善’译为‘The tendency of man’s nature to good’, 显然, 他把孟子提倡的人性本善误读成了人性向善。而刘殿爵的译文‘Human nature is good’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人性本善的识度。因为在西方千年以降的哲学范式中, be 是一个对主语属性的判断和表征, 这符合孟子人性本善的命题与识度。而文库版的译文‘Human nature is always good’虽也基本表达了原文的认识规定, 但与原文的认识构式不尽相同, 因为‘always’一词纯属画蛇添足。这词一加, 就改变了原文的认识构式, 等于在说, 人性一般是善的, 但有时候亦会不善, 这是典型的文学思维而非哲学思维。究其原因, 是对原文的哲学认识命题不甚了解的原因所致。而理雅各的误读是受西方文化原罪说的影响, 同时也与他的翻译目的和译文受众不可分开。由于其面向的是深受原罪说影响的西方传教士, 他的译文中也就难免带有原罪说的影子, 因而把原文解读成人性向善, 而非人性本善, 这是符合其翻译目的的。而刘译本的译者则志在传播、推广中国文化, 展现古老的东方文明、精神本体, 因而比较精确地再现了原文思想, 精神识度, 把孟子提倡的人性本善观准确的再现在译文中了。”^{[1]73-74}

以上分析中有观点错误的硬伤。“性善论”仅

是孟子的一家之言,同是儒家的荀子却是主张“性恶论”的。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6]分析《孟子·告子上》说过他(孟子)那个时候,关于人性的学说,除了他自己的学说之外,还另有三种学说。第一种是说人性既不善又不恶。第二种是说人性既可善又可恶(即人性内有善恶两种成分)。第三种是说有些人的人性善,有些人的人性恶;在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也有与此相关的论述:“孟子说人性善,……也就是说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他的确承认,也还有些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不适当控制,就会通向恶。”^[7]

人性中有通向恶的成分,换言之,也有通向善的成分。由此可见,理译之“The tendency of man’s nature to good.”真可算得是准确无误。孟子能言善辩,好用比喻,以水之流向来比喻人性之趋向。而与孟子论战的告子亦曾同样以水喻人性,“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7]144}。数千年前的古人尚能以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看待人性,使人不得不为之折服。此外,《研究》以为“Human nature is always good”中,always一词纯属画蛇添足,但以笔者之见,此词乃必不可少。少了它,读起来就没有一点韵味了。

(三)关于“恻隐之心”“我”之翻译

例2.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James Legge: The feeling of commiseration belongs to all men, so does that of shame and dislike; and that of reverence and respect; and that of approving and disapproving. The feeling of commiseration implies the principle of benevolence, that of shame and dislike, the principle of righteousness; that of reverence and respect, the principle of propriety; and that of approving and disapproving, the principle of knowledge.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and knowledge are not infused into us from without. We are certainly furnished with them. And a different view is simply owing to want of reflection.

Library: Compassion is a feeling shared by everyone, so is shame, so is respect, so is the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Compassion means benevolence, shame means righteousness, respect means decorum, and the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means wisdom. Be-

nevolence, righteousness, decorum, and wisdom are not conferred on me by others, they are in my essence. Only I have never sought to discover them in me.

D. C. Lau: The heart of compassion is possessed by all men alike; likewise the heart of shame, the heart of respect, and the heart of right and wrong. The heart of compassion pertains to benevolence, the heart of shame to dutifulness, the heart of respect to the observance of the rites, and the heart of right and wrong to wisdom. Benevolence, dutifulness, observance of the rites, and wisdom are not welded on to me from the outside; they are in me originally. Only this has never dawned on me.

“恻隐之心”一词“理雅各翻译成了‘feeling of commiseration’,在英语中,‘commiseration’表示‘a feeling of sympathy and sorrow for the misfortunes of others 同情、怜悯’,是一种感受、有强烈的基督教情结,是基督教义中常用词汇,但却无有原作的哲学命题识度。这样,用基督教语言来翻译《孟子》的相关命题,理雅各其实是试图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的仁爱思想巧妙地融合到一起。……相比之下,刘殿爵的译文关注了语言本体与思维同构这一认识论的问题,在微观上自觉贯彻这一方法论,关注原作的精神识度和认识构式,不尽句式工整简洁和原文句法丝丝入扣,而且把原文的精神观照诉诸于译文选词、句法和谋篇布局。如他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心’的哲学命题译为‘The heart of compassion is by all men alike; likewise the heart of shame, the heart of respect, and the heart of right and wrong.’,这就将原作中的认识构式在译文中得到充分体现。‘heart’就是原作的认识构式与精神识度。”^{[1]74}

笔者认为“恻隐”是指对遭难的人表示同情。一般而言,人总是有同情心的(铁石心肠者少数),这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什么“哲学命题”。仅凭“feeling of commiseration”就说理译有强烈的基督教情结,未免牵强附会,诚然,理作为传教士,其有基督教情结自不待言,但这并不证之于“commiseration”一词。笔者查阅了多本颇具权威性的词典(英英、英汉),均未见该词带有[宗]之标志。冯友兰先生在他的英文《中国哲学简史》中也是以“the feeling of commiseration”来表达“恻隐之心”的: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The feeling of commiser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human-heartedness. The feeling of shame and dislike is the beginning of righteousness. The feeling of modesty and yielding is the beginning of propriety. The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Man has these four beginnings, just as he has four limbs...

下面来看《研究》对“我”的指称的讨论：

“我”在上下语境中就是“我们”的代指，而非第一人称单数“我”。因为孟子在这里是与他学生讨论一般“人性”问题，不是他个人“性情”。把“我”理解为“我们”不仅是单、复数的差异，而是对当时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构式的误读，而如是英译更是显得突兀和不符合语意连贯逻辑。然而，遗憾的是，文库和刘译文为满足译文读者阅读流畅期待，皆未关注这一问题，按照现代汉语的指称与内涵翻译之；只有理译出于他翻译目的的需要：“为让来华传教士了解华人精神需求，更好完成上帝使命”，完整认识了这一社会精神构式和人文关系，并在语言层面关注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的三种译文看到这一点：

Legge: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and knowledge are not infused into us from without. We are certainly furnished with them. And a different view is simply owing to want of reflection.

Library: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decorum, and wisdom are not conferred on me by others, they are in my essence. Only I have never sought to discover them in me.

D. C. Lau: Benevolence, dutifulness, observance of the rites, and wisdom are not welded on to me from the outside; they are in me originally. Only this has never dawned on me.

如上《研究》在这个问题的说法含混不清，自相矛盾，令人莫衷一是。它先说：“因此，‘我’在上下语境中就是‘我们’的代指，而非单数‘我’。因为孟子在这里是与他学生讨论一般‘人性’问题，不是他个人‘性情’。”据此，“我”应理解成“我们”，英译就应是 we，而不是 I 了。可接着又说：“把‘我’理解为‘我们’不仅是单、复数的差异，而是对当时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构式的误读，而如是英译更是显得突兀和不符合语意连贯逻辑。”据此“我”又不能理解为“我们”，英译就只能用 I 了。可紧接着又批评了文库版和刘译文，而这两种译文正是把“我”译成了 I 的。《研究》所列的三种译文，认为理译最佳，因为“只有理译出于他翻译目的的需要，‘为让来华传教

士了解华人的精神需求，更好完成上帝使命’，完整认识了这一社会精神构式和人文关系，并在语言层面关注了这一问题”。华人的精神需求是什么？是要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要懂得仁义礼智。要在“寡欲”“内省”“养气”上下功夫。华人的这些精神需求和传教士所要完成的“上帝使命”又有何关系呢？不知作者所言何意。

(四)关于“In warfare”

例3.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James Legge: Opportunities of time vouchsafed by Heaven are not equal to advantages afforded by the Earth, and advantages afforded by the Earth are not equal to the union arising from the accord of Men.

Library: In warfare, the favorable weather is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topographical advantage, and the topographical advantage is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group morale.

D. C. Lau: Heaven's favorable weather is less important than Earth's advantageous terrain, and Earth's advantageous terrain is less important than human unity.

《研究》一文对上述三段译文分析如下：

“孟子在这里似乎主要是从军事方面来分析论述天时、地利、人和之间的关系，而实际上文章中孟子将该论点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体现的是孟子的政治主张，因而使其命题意义更具普遍性。这是孟子的深意、亦是本义；……而文库版的译文，出于文意翻译的目的，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句首加了个‘in warfare’，其所承载命题意义就相对狭义，没有孟子所要表达的一般意义。其实句首的‘in warfare’实属多余”。不知作者所谓“孟子在这里似乎主要是从军事方面来分析论述天时、地利、人和之间的关系，而实际上文章中孟子将该论点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体现的是孟子的政治主张，因而使其命题更具普遍性。这是孟子的深意、亦是本义”根据何在？当时中华大地正逐渐走向中央集权局面，因而兼并战争可谓各国所面临的头等大事，正是这种兼并战争给后来秦汉统一的封建王朝创造了条件。而孟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指出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而要“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据此，文库版译文中“in warfare”并非多余，而是必不可少的。

五、结论

如上所述，本文分析了《研究》一文中的译例，

并未看出《研究》明确指出三种版本的译者究竟采用了怎样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其实,这种研究意义颇值得置疑。翻译目的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可理译本《孟子》成书于1861年,几乎要相差百年之久;而刘译本则是在1963年译成《道德经》后,又花七年时间译成的。从时间上看,刘是来不及去理会“目的论”的;至于文库版《孟子》虽成书于1993年,但也未必会按照“目的论”的要求去翻译。而即使其是按照“目的论”要求翻译,若前两个译本未按这个要求,三者也就失去了比较的标准和意义。实际上,同样的内容由不同的译者来译,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译文,这是很自然的事,本用不着寻找什么理论根据,而任何高深的理论也未必解释得了翻译活动中的种种妙趣和差异。

潘文国教授指出:“这些年我们谈了那么多的理论,好的翻译反而更难见了,翻译理论里翻来覆去举的,都是前人的例子。语言学派细至毫厘的条分缕析,好像没能教会人怎么做翻译,更做不出好的翻译。文化学派谈翻译对译入语社会起的作用,洋洋洒洒,也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是对既有事实的观察和分析,却无法指导人具体怎么做翻译,因为翻译作品能否起影响、起什么样的影响,并不是当下做翻译的人能够事先确定的。其他种种理论似乎也是如此,说得再天花乱坠,对翻译实践起的作用却十分有限。

这个现象说得透彻一点,就是‘翻译学热闹了,翻译却不见了’。翻译理论研究成了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圈子里的人说得开心,但对翻译的影响却越来越小,真正在做翻译的人基本不把你当回事。”^[8]

潘先生的话值得我们深思,应当牢牢记取!

参考文献:

- [1] 刘翌,包通法.《孟子》译本精神构式比较研究[J].上海翻译,2015(2).
- [2] 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M].2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3] 许渊冲.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2012(4).
- [4]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5]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 [6]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7]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 [8] 潘文国.“看山看水”的启迪[J].上海翻译,2015(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 Re – study on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Mencius*

HE Lin – sheng

(Huzhou Associ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s, Huzhou, Zhejiang 31300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some remarks on the examples given by Prof. Bao Tongfa in his pape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pirituality Schemas of Three English Versions of Meng Zi*. It raises a query whether the Skopos theory should be a guideline when translating the Chinese classics. It holds that Prof. Bao’s study on the subject is somewhat lacking in objectivity. It is not just or fair in argument. His hasty conclusion from the Skopos theory seems unsound.

Key words: *Mencius*; Skopos theory; re – study

翻译应用理论与应用翻译实践

——以新闻翻译为例

史 芸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23)

摘 要: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及翻译所涉行业的逐渐增多,翻译理论复杂化及实践多样性的趋势日益显现,但学界对翻译核心问题的探索从未停止。同时,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加快,翻译已关乎国家发展战略。因此,切实解决翻译体系内的问题成为重点。作为核心范畴之一,厘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成为当下任何一个翻译分支学科的首要任务。本文拟从翻译应用理论与应用翻译实践之辩着手,以新闻翻译为例,探究翻译应用理论与应用翻译实践的契合。

关键词:翻译应用;理论;应用翻译;实践;新闻翻译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20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102-06

一、引言

随着中国逐渐走上国际舞台,翻译作为衔接中外的桥梁,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翻译不再仅被视为语言学或文学的附属学科,而是承担了输出文化、培养高质量翻译人才的艰巨任务,时刻面临挑战。同时,翻译学科也不断进行理论完善和实践创新。我国在十八大期间制定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部署,以合作共赢为发展目标,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紧跟国策,翻译在推进双边经济贸易合作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可见,翻译已从单纯的学科理论建设上升至理论与实践相契合,并同步发展。

现今学界翻译研究总体呈现派系分立,且各翻译学科分支之间互相难以融合,交叉性弱。同时,陆续有新的翻译派别体系建立,甚至有些新概念在提出伊始便模糊不清,属性不明,导致后期翻译研究难以为继,因此,当下翻译研究仍需牢牢抓住翻译本质核心问题进行探究,并结合时代发展对翻译进行共时性研究。

结合当下翻译学的发展,本文拟从翻译应用理论与应用翻译实践入手,探究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今学界应正确把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平衡,既要做到应用正确的翻译理论指导实践,也要在实践中总结理论,以便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二、翻译应用理论

从早期的佛经翻译至现在的各种翻译活动,学界孜孜以求的问题一直是何为翻译,各种翻译定义鳞次栉比,如:翻译是忠实通顺地将一种语言信息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翻译是一门艺术;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等诸如此类的定义。就其本质而言,翻译指涉信息在两种语言中的等值转换。当翻译被应用于具体翻译实例中进行考察时,便成为语言服务的一种重要形式,是通过各自介质的转换传达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符号信息的活动^{[1]19}。

(一)翻译应用理论的涵义

一般而言,对翻译本质的探究始源于翻译活动的开始。当译者试图通过某种手段在两种语言中传递等值信息时,翻译便由此而生。在此过程中,译者归纳总结翻译技巧与策略,便于指导翻译实践,以期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加之学者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加深,翻译研究不仅仅只是在语言层面进行思辨,其所涉文化、社会等因素均需

收稿日期:2017-04-20

作者简介:史芸(1990—),女,安徽阜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翻译。

考虑在内。

本文认为随着翻译活动日趋复杂化,各类翻译活动的重心难以把握,同时对翻译理论的理解与运用也相应变得困难,甚至有直接生搬硬套某一理论用以解释翻译实践的现象。依据当下翻译活动现状及对学者对翻译核心术语的重新思考,本文认为有必要重新强调翻译应用理论的概念。

纵观翻译史可知,翻译研究来源于应用中的实践,并在应用中得出理论。故而,翻译应用可兼指翻译理论的应用及以应用为目的的翻译实践,包含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而翻译应用理论指旨在以应用为导向的翻译理论,并以服务实践为导向。穆雷和邹兵在思考翻译理论现状及问题时,将翻译理论划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认为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的成果进行修正,从而使其间接地应用于翻译实践,而应用研究多来源于翻译实践活动经验的积累^{[1]20}。当下翻译研究的趋势多为应用型研究,即研究各种类型的翻译实践并进行理论完善,故而本文认为翻译应用理论的明确有助于把握翻译研究的重心,在翻译实践中树立标杆,以防翻译研究偏离重心,同时更好地理解翻译与应用的结合,并在理论与实践保持平衡。

不同于具有普适性的基础翻译理论,以应用为导向的翻译应用理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其产生就是为了某种特定的应用性,如随着字幕翻译的兴起,学界开启了对字幕翻译的研究,旨在应用于该类翻译的实践。此外,由于翻译活动所涉范围甚广,翻译文本体裁也从文学文本拓展至如新闻、广告、影视等各种应用型文本,翻译应用理论也可为应用型翻译提供理论支撑。

(二) 翻译应用理论的特征

承载着为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的目的,翻译应用理论表现出以下特点:

1. 针对性。当对某种翻译活动的研究上升至理论层面时,其理论则表现出特殊的针对性,如针对新闻翻译,其应用理论便专门探讨新闻翻译的策略、原则与技巧等,故而该翻译应用理论并不适用于政府公文、广告等的翻译。

2. 派生性。尽管翻译应用理论因其应用目的不同具有针对性,但翻译应用理论的生成是由基础理论派生而来,其翻译理论形成宗旨也同基础理论一样,旨在为信息传达提供理论框架。翻译应用理论体系在基础理论的架构基础上进行衍生。如基础翻译理论是对翻译基本问题进行探究,而应用理论体系则在基础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深化研究,如探究具

体翻译策略方法。

3. 离散性。由于翻译的应用范围愈加广泛,翻译所涉文体种类增多,以基础翻译理论为中心点,由此构建的翻译应用理论呈现发散式。且随着翻译研究与社会活动联系愈加紧密,翻译应用理论分支也更加细化,如随着国内外加强文化交流,贸易互通有无,便产生了如商务合同、法律文书等翻译,故而翻译应用理论呈发散式发展。但也因此使得翻译应用理论呈现离散分布,各分支理论之间互融性不强,交叉度不高。

三、应用翻译实践

(一) 应用翻译的涵义

随着翻译活动与社会实践的联系愈渐紧密,翻译对象的范围逐渐延伸至文学文本以外的其他文本类型,结合传统翻译理论,应用翻译研究便应运而生。但鉴于翻译活动所涉文本、体裁、主题过于宽泛及多样,学界对应用翻译的认识不尽相同。1972年J. Holmes首次建立翻译研究框架体系,将翻译分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后者包括译者培训、翻译辅助手段及翻译批评,但Holmes并未对应用翻译研究展开深入讨论。众所周知,应用翻译并不仅限于以上三种分类,更多与翻译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应被纳入应用翻译研究体系中。此外,学界对何为应用翻译也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应用翻译不仅仅是翻译的实际应用,而是“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用型翻译^{[2]1}”,特别区别于传达有较强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文学翻译^{[3]57}。应用翻译包括“科技、经贸、法律、媒体、旅游、广告等,以区别于文学、政治、外交、社科等翻译^{[4]1}”。韩子满认为除文学翻译之外所有以信息传达为主的文本翻译均应被纳入应用翻译之内^{[5]48-51},因此,传递信息与非文学性是定义应用翻译的核心关键,翻译目的及翻译文本类型是应用翻译研究应予以考虑的两大因素。

(二) 应用翻译的生成

不同于纯理论的建构,应用翻译的产生来源于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翻译被视为两种语言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通过翻译,意义的传达成为可能。随着翻译文本的多元化,学界开始提出翻译文体研究的概念,即结合文体学与翻译学,探究不同文体下的翻译等,如诗歌、散文、政治文体等的翻译研究。但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翻译研究的发展不仅仅只体现在文体方面的差异上,翻译已经渗入各行各业,如广告、科技、经贸等行业。因此,当前急需根据翻译的发展更新翻译术语,进一步完善翻译研究体

系。相对文体翻译,应用翻译的提法更加确切,范围更广,涉及翻译功能、翻译方式、翻译载体、翻译流程、翻译技术、翻译标准、译者素养等方面^[61]。基于Holmes的翻译研究框架体系,方梦之拓展并细化了应用翻译研究的分支体系,将其划分为6个部分,包括一般理论研究、文类研究、术语与术语库研究、本地化研究、翻译技术研究和翻译管理研究^[61]。

鉴于应用翻译将翻译与应用紧密结合,探究翻译研究的支点便落于学术与市场。隶属于翻译学科的应用翻译研究在自身发展时离不开理论支撑,既要符合传统翻译理论,又要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学科需要创新独特的应用翻译理论以便为实践服务。此外,应用翻译研究的发展也离不开其对市场的依附^{[7]72}。在当下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翻译的社会功能逐渐显现,并依据市场的需求调节翻译活动,市场是其得以发展的重要载体。如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对口译的需求逐渐增多,大型公司在重要商务合作会议中均需要专门聘请口译专业的学生进行同声传译,大大促进了口译行业的发展,各高校纷纷开设符合市场需求的口译课程,加强学生口译方面的训练,以便为市场输送专门型口译人才。同时,译界的专家学者也不断总结应用翻译教学经验,编写教材,更好地为应用翻译研究服务。

(三)应用翻译的表征

通过梳理国内应用翻译研究30年的成果,方梦之提出应用翻译研究总体体现出反应时代发展脉络、多角度研究和多途径研究的特点^{[8]22-27}。为了顺应时代发展,应用翻译必须时刻关注其翻译对象及翻译客体的变化,同时借鉴各学科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应用翻译渐成体系之后,翻译研究表现出以下特征:

翻译对象多样化。应用翻译之所以能形成体系,这与应用翻译所涉各种翻译对象有关。传统翻译研究只关注文学文本的翻译,但自从翻译的社会性凸显,并与各行各业紧密相关,翻译对象就不再仅囿于文学了,政治、金融、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均可见翻译的身影,因此翻译对象呈现多样性,并随着翻译所涉范围的扩大将持续拓展文本的类型。

翻译理论的系统化。随着应用翻译实践的发展,对理论的需求迫使学者思考如何归纳总结实践中的规律,在基本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专门的应用翻译研究理论,如方梦之的应用翻译理论分为宏观、中观与微观并对各自的下属分类进行探究,而同时学者对各种类型文本进行的理论探

究均可纳入上述三个层面,如林克难根据“信达雅”的翻译策略提出了适用于应用翻译实践的“看、易、写”的翻译思想,这可归属于中观理论层面的翻译研究^{[9]10-12}。

翻译资源的集约化。传统而言,文学文本译后以纸质形式保存以便出版或留档。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文本类别的特殊性,以文本形式保存的翻译材料需进行电子化处理,并按文本类别进行分类归档,建立语料库。此种方法有效整合资源,并为之后应用翻译研究提供研究材料。结合诸如AntConc、ParaConc等语料库研究软件,对多译本进行分析处理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随着应用翻译的发展,在进行应用翻译实践时便有法可存、有据可依。微观理论层面的翻译策略、技巧与方法便可用于指导应用翻译实践。

四、翻译应用理论与应用翻译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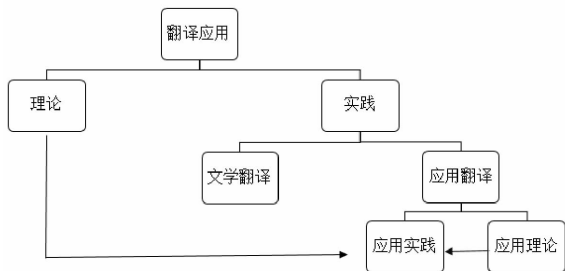
当应用(application)与翻译结合时,产生的并非仅仅是新的术语概念,相应生发出一系列与翻译有关但又与纯翻译有异的体系。翻译应用理论是与翻译基础理论相对而言,专门为应用而生的理论,而应用翻译实践则是位于应用翻译研究体系下的分支,二者各有独特的释义与表征,其辩证关系表现如下:

就其概念本质而言,翻译应用理论特指以应用为目的的翻译理论,其产生旨在应用。相反,应用翻译实践强调应用型文体的翻译活动,着眼点在翻译活动的实践性。此外,尽管应用翻译自成体系,有自身的针对性的理论作指导,但就二者的范围来说,翻译应用理论要远远大于应用翻译理论。翻译应用理论的产生旨在应用,而应用翻译理论却是为特定文本类型服务的理论,因此翻译应用理论可适用于文学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应用翻译研究,而应用翻译研究下的理论只能用于指导应用翻译实践。

就其来源而言,翻译应用理论主要来自基础理论的派生,辅以实践得来的理论,在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围绕具体应用问题进行建构,相较之下,应用翻译实践只能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提升。就二者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翻译应用理论为实践而生,而应用翻译实践的手段即为实践,通过实践进行应用翻译的研究与活动。翻译应用理论为翻译实践提供策略、方法等,而应用翻译实践则在应用型文本的翻译活动中促进翻译应用理论的补充与完善,同时受到翻译应用理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的双重指导,其关系图如下图所示:

五、翻译应用理论指导下的新闻翻译

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与时代的进步为翻译研



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平台。较之以前的翻译对象有限、翻译工具不足、译员水平不一等情况,翻译逐渐实现客体多样化、理论系统化、工具简易化、操作简单化。新媒体的产生及国际间互动的增强使得新闻成为快速互动的方式之一,相应地新闻翻译成为翻译热点,同时新闻翻译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因此译者必须以审慎的态度从事新闻翻译。如前所述,翻译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而翻译应用理论的产生旨在为应用实践服务,因此结合新闻的文体特征,本文试图探究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新闻翻译。

(一) 新闻的特点

作为典型的应用型文本,新闻主要以传达信息为目的,并以真实性、时效性为广大民众接受。作为获取国内或国际最新前沿动态的最快途径,新闻在文体方面与普通文体大不相同,其语言具有用词简洁、术语泛化、句法洗练、多用引语、多用修辞格等特点^{[3]288-292}。本文研究对象为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闻,新闻来源于中国日报双语对照板块。众所周知,从美国大选至上台执政,特朗普一直备受国内外民众的关注,各种媒体平台分别对总统的动态进行持续报道,《中国日报》作为中国权威机构发行的报纸,其真实性、可靠性不言而喻,同时双语板块选取的新闻素材基本来自国外权威报纸机构,如 BBC 等。

(二) 交际翻译理论

旨在应用于实践而产生的翻译理论的价值体现在具体指导翻译实践中。不同于传统直译与意译之辩,纽马克提出的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参考准则。交际翻译尽可能地使目的语读者中产生的效果与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相同,而语义翻译则力争表现原文的语义,译文也要尽可能地接近原文的语义和语法结构。相对语义翻译的过度翻译(overtranslate),交际翻译更加通顺简便、清楚直接,也更符合特定语境^{[10]39}。语义翻译集逐字翻译、直译和忠实翻译的优势,交际翻译集归化、意译和地道翻译的优势^{[11]1-2},但具体采用何种方法需要考虑多重因素。从文体层面来看,大部分

非文学文章、新闻、信息型文章和书籍、报告、科技型文章、广告等适合使用交际翻译法。新闻旨在传递信息,同时本文所选的双语新闻的目标读者一般为学习型读者,通过英汉对照可进行新闻翻译学习,因此,信息型文本、中国读者和提供资讯及学习材料这三个因素决定了交际翻译对本文所选研究对象的适用性。一方面,有关特朗普的新闻是国内民众近来的关注热点,但囿于读者外文水平层次不一,《中国日报》精选国外主流报纸新闻并加以翻译,便于及时传达资讯。另一方面,由于翻译涉及文化、语言、思维等各方面,要达到准确传达信息,使读者达到与原语读者具有同样的效果,译者在新闻翻译中应审慎处理。

(三) 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的新闻翻译研究

《中国日报》双语对照版新闻,原文一般来源于国外权威报纸机构,而中文版是由固定翻译团队所译,可基本保证译文的风格一致。通过对比研究,本文试图从标题、词汇及句子层面探究交际翻译对新闻翻译的指导。

1. 新闻标题

新闻包括标题、导语及主体。作为导入部分的新闻标题以简练醒目的文字概括新闻大意,且英文新闻倾向于使用短语结构作为标题,抑或用新闻的第一句作为标题,因此标题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读者的兴趣。

例 1: Donald Trump is reportedly experiencing “cabin fever” after his first month in the White House.

特朗普患上“幽居病”

对比原文与译文可知,二者在句子长度上相差甚远。译者在翻译时省略原文中多处信息,仅留下几个关键词翻译,这种翻译是为了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短小精悍的标题更能吸引读者去探究何为“幽居病”,继续关注新闻主体。

例 2: Trump’s baffling Sweden comment came from a Fox News segment

特朗普再度信口开河 这次惹怒的是瑞典

原文是一句完整的句子,翻译成中文时使用了两个并列句子,这不仅符合中文新闻标题的习惯,增加了信息量,同时也表明了该条信息的重点。原文标题陈述事实,而相应的中文标题添加了后半句,旨在表明由此次事件引发的后果。众所周知,自美国大选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因在公开场合发表犀利的言论饱受争议。此外,从“baffle”一词可看出原文对特朗普的态度,“信口开河”也指某人说话无凭无据,随意瞎编,二者可构成信息的对等,而增译的部

分则为了强调该事件产生的后果。

从以上译例可知,为了达到原文与译文对读者的效果等同,译者在进行标题翻译时,以交际翻译为准,更大范围地对原文进行调整,翻译时自由度更高,以便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2. 词汇翻译

鉴于中英文语言的差异,翻译时很难做到完全对等,因此翻译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对某些词汇进行特殊处理,或者通过增译或减译达到译文通顺。

例3: The President is apparently getting headaches and feeling frustrated that he cannot spend evenings dining at restaurants.

特朗普似乎感到头疼和压抑,他无法在晚上出去吃馆子了。

以上例句中如若将“spend evenings dining at restaurants”按照语义翻译应译为“花在饭店吃饭”,直接传达句法及语义信息,但译文中“吃馆子”即为出去吃饭之意,是地道的中文表达,此种译法过滤掉冗余信息,以简便的方式表达出原文意思,更加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例4: But while that handshake was fairly unremarkable, Mr Trudeau's expression before taking Mr Trump's hand provided an unmissable opportunity for Twitter's army of indefatigable mickey-takers.

这次握手十分平常,但是对无数坚持恶搞的推特网友来说,特朗普伸出手后特鲁多的表情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梗。

“梗”是现代汉语最新流行的网络语,而“opportunity”意为“机会”,二者的对应体现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变通处理。为了使两种语言传达效果等同,译者通过变译将原文中的某些词汇变成目的语最通俗适宜的表达。

相似的例句还有“Trump lounges around the WH in a bathrobe”被译为“特朗普在白宫穿着浴袍葛优瘫”。据此可知,在翻译时根据翻译目的和读者的不同,译者在进行词汇处理时,通过增译、减译、变译等手法进行翻译。

3. 句子结构

对两种语言句子特征的整体把握有助于译者在遣词造句中构建概念框架。在句子构成方面,英汉两种语言差异较大,汉语是典型的前缀式语言,而后缀式的英语常以附加从句的形式添加信息成分,因此,译者应根据两种语言的特征进行转换。

例5: Trump's original comments, made at a rally in Melbourne, Florida, seemed to suggest a security

incident involving immigrants in Sweden on Friday on par with terrorist attacks in Germany and France.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墨尔本市的一场集会上发表了这番言论。他的原话似乎在暗示瑞典17日发生了与移民问题有关的安全事件,其程度堪比德国和法国的恐怖袭击。

译文将原文松散的结构重组,变成意思完整的两个句子。译者厘清信息成分的重要性等级后,将原文中插入语成分提出组成单句,便于信息分层,有助于目的语读者阅读。类似的例句在新闻翻译中比较常见:

例6: Mr Ross represented Donald Trump when he found himself in financial trouble during the mismanagement of three of his failed Atlantic City casinos in the 1980s.

20世纪80年代,特朗普因大西洋城三家赌场管理不善陷入财政困境,罗斯曾协助他东山再起。

通过分析有关特朗普的新闻翻译,本文认为译者在保证信息准确传达的基础上,可对词汇、句式进行微量调整,以达到服务英语学习者的目的。加之,从中国日报双语板块的新闻可知,有关特朗普个人的新闻类型偏向软新闻,如“特朗普患上‘幽居症’”“特朗普V特鲁多美加首脑过招特朗普完败”,因此此类新闻翻译时可调度较大,并不需要像政论翻译那样准确无误。在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译者为了达到与原文读者的等同效果,对翻译客体进行特殊处理,从新闻标题至句子结构的调整均体现了交际翻译理论的适用性。但鉴于本文选材及分析的特殊性,本文论证了交际翻译理论对新闻翻译的指导,并不意味着新闻翻译只能用交际翻译理论,也并不意味着交际翻译排斥直译。甚至可说,在任何翻译中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并存,二者只是先后顺序的问题。

六、结语

不同于翻译基础理论,翻译应用理论是旨在以应用为目的构建的翻译理论,应用于具体翻译实践中,如对翻译本质探讨的理论归属于基础翻译研究,而对翻译策略及方法的研究可归属于翻译应用研究。与应用(文体)翻译理论相比,翻译应用理论所涉范围更广,而应用翻译实践则是不同类型文本进行实践的翻译活动。针对翻译活动的复杂性,翻译理论的多重功能逐渐显现:1. 提供理解翻译现象和活动的概念框架;2. 提供描述与解释翻译现象和活动的思维方式;3. 提供认识翻译现象和活动的价值观念^{[1]19}。在应用翻译实践中,翻译应用理论对其

影响是有形与无形并存的,不仅为其提供可供选择的翻译策略方法,并让译者从已有理论体系中整体把握翻译活动。本文以翻译应用理论中的交际翻译理论研究有关特朗普的新闻翻译,研究表明应用翻译实践中理论的不可或缺性,因此在当下应用翻译学科体系中需不断对翻译核心问题进行思考,促进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穆雷,邹兵. 翻译的定义及理论研究:现状、问题与思考[J]. 中国翻译,2015(5).
[2] 贾文波. 应用翻译功能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3] 方梦之. 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4] 林茂荪. 专业化、信息化、网络化及翻译理论:写在2003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召开之前[J]. 上海科技翻译,2003

(3).
[5] 韩子满. 应用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J]. 中国科技翻译,2005(4).
[6] 方梦之. 应用(文体)翻译学的内部体系[J]. 上海翻译,2014(2).
[7] 方梦之. 应用翻译研究的新起点[J]. 上海翻译,2013(3).
[8] 方梦之. 应用翻译研究30年(1980-2010)[J]. 上海翻译,2012(2).
[9] 林克难. 应用英语翻译呼唤理论指导[J]. 上海科技翻译,2003(3).
[10]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1.
[11] 原虹. 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J]. 中国科技翻译,2003(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On 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Applied Translation

——With a Case Study of News Translation

SHI Y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23, China)

Abstract: With increasing of market demands and the degree of involvement of translation in all walks of life, there is a great tendency to call for more complex theory and more diversified practice. However, research on the core issue of translation has never been stopped. Moreover, translation has been connected with our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the accelerating process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Hence, it is of most importance to deal with issues in translation disciplines. As a pair of core category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have raised extra attention in terms of relationship, which should be clarified.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applied translation with a case study of news transl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al application; theory; applied translation; practice; news translation

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公示语汉英翻译

宋 瑶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外国语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首先对公示语的概念、功能、语言特征进行阐述,继而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提出公示语英译的关键在于译者能否置身于翻译生态环境,全面考虑环境中的各个要素,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做到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最终产出准确、规范、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从而促进我国国际语言环境与人文环境建设的健康发展,提升各大城市的文明形象和软实力。

关键词:“翻译适应选择论”;公示语;汉英翻译;“三维转换”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21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108-04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交流日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来到中国投资、学习、工作、旅游,对他们而言,公示语是便捷有效的信息载体和交流工具,因此,准确、规范的公示语英译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关系到在华外宾的生活,也直接展现了城市的语言环境、人文环境、开放程度、整体素质和国际化形象等。

一、公示语

公示语(public signs)是指公开和面对公众,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生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其图形信息^{[1]13}。换言之,凡公示给公众、旅游者、海外宾客、驻华外籍人士、在外旅游经商的中国公民等,涉及食宿行游娱购行为与需求的基本公示文字信息,与标准图形标识配合使用的文字内容都在公示语研究范畴之内^{[2]99}。

作为一种应用文体,公示语具有以下功能^{[3]38-40}。

指示性——旨在向公众提供周到的信息服务,指示、引导公众找到目的地,了解某部门的服务或工作范围,而没有限制、强制之意,不要求公众采取行动。例如,存包处 Baggage Depository、自助银行 Self-service Bank、外币兑换 Foreign Exchange。

提示性——用提醒、警告的语气提示公众注意

提示内容,而非要求他们采取行动,通常语言客气温和。例如,已消毒 Sterilized、油漆未干 Wet Paint,车位已满 Occupied。

限制性——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对公众的行为提出限制、约束要求,使之采取相应行动。语言表达直接明了,而不会使其感到强硬、粗暴、无力。例如,排队等候 Stand in Line、凭票入场 Tickets Only、宾客止步 Staff Only。

强制性——以直白、强硬、没有商量余地的方式要求公众必须采取或不得采取某种行动。例如,未经许可车辆不得驶入 No Entry for Unauthorized Vehicles、未成年内严禁入内 No Minors Allowed、禁止摆卖 No Vendors。

作为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和呼唤型文本(vocative text)的结合体,并以呼唤功能为主的特殊文体,英语公示语简洁(concise)、规范(conventional)、统一(consistent)、醒目(conspicuous)、方便(convenient),并具有独特的语言特征^{[2]100}:语汇简单,避免使用生僻词汇、古语、俚语、术语等;大量使用祈使句和现在时态;仅使用实词、关键词和核心词汇,省略冠词、代词、助动词等虚词;大量使用名词、动词、动名词和结构简单、组合多样的名词短语、动词短语;采用国际通用或公众默认的缩略语;常伴随

收稿日期:2017-03-19

作者简介:宋瑶(1983—),女,河南郑州人,硕士,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商务英语、应用语言学。

醒目的图形标志共同使用。作为社会语言环境、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对外宣传与交流的重要方式,公示语在规范社会行为、促进对外交流、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

二、翻译适应选择论

2004年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哲学思想为基本原理,首次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的理念、实质、过程、原则、方法、译文评价标准进行了全新视角的诠释和解读。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译者置于翻译活动的中心,认为翻译就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cyclical alternations of the translator'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4]42}”;将翻译原则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其中翻译生态环境(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通的整体”^{[4]39},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此外,胡庚申教授提出了“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在“多维度的适应与适应性选择(multi-dimensional adaptation and adaptive selection)”的原则下,译者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5]50}。翻译过程中,译者只有置身于翻译生态环境,做到“多维”的适应和至少“三维”的选择转换,才能创造出“整合适应选择度”(the degree of holistic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高的佳译。

三、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本文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分析汉语公示语的英译,并对实例进行解析诠释,以期进一步深化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提升公示语英译质量,继而提升城市形象。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译者应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语言维(即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和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英语词汇有形态变化,汉语基本没有形态变化;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英语多被动,汉语多主动;英语多为前重心,汉语多为后重心;英语多省略,汉语多重复等。因此,汉英公示语在语言表达层面也存在明显差别。公示语英译的目的是为中国境内的外国人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从而实现公示语的指示、警示、限制、强制功能。因而,要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有效实

现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具备原语和译语的语言知识和运用能力,熟悉汉英公示语在结构和表达上的异同。在翻译时充分考虑整个翻译生态环境,全面掌握原文信息,对语言形式(即词汇、句法、修辞效果)、语言结构、语言表达合理地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从而使译文尽可能符合英语公示语的行文规范和表达习惯,力求准确再现原文的语言信息,避免词不达意,或语义错误。

一些公示语的误译现象是因为译者没有充分考虑翻译生态环境,未在语言维上进行合适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例如,将“收费处”(Cashier)错译为“Charge Office”,将“一次性用品”(Disposable Articles)错译为“A Time Sex Thing”,将“暂停收款”(Closed)错译为“Stop Cashier”,将“小心碰头(Mind your Head)”错译为“Attention to Your Head”。这些译文看似与原文逐字对应,实则是未在语言维上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而导致的机械翻译,不能准确表达原公示语的信息。

汉语公示语倾向于用动词,叙述呈动态祈使。英语公示语更倾向于用名词和物称表达法,叙述呈静态陈述^{[6]60}。对动态性较明显的汉语公示语“小心地滑”“水深危险,注意安全”“当心触电”进行英译时,译者若照搬原文的行文模式,将其逐字逐句译为“Slip Carefully”“Water is Deep, Notice your Safety”“Be Careful to Get an Electric Shock”的话,或词不达意,或译文冗长。可以将汉语动词结构转化为英语名词结构,依次译为“Caution: Wet Floor”“Danger: Deep Water”“Danger! High Voltage”。“Caution”和“Danger”突出了公示语的提示功能,引起受众的高度关注和警惕,“Wet Floor”“Deep Water”“High Voltage”说明了警示的危险因素。这里简明扼要、信息充分的译文体现出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恰当考虑和语言维上充分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同理,也可将汉语动词结构转化为英语介词结构,或者将其直接省略。如将“暂停使用”译为“Not in Use”,将“凭票入场”译为“Ticket Only”。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文化(包括历史传统、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等)交流传递的过程^{[4]176}。可见,文化语境是翻译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上和 content 上往往存在差异。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需要注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还需要关注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注重原语和译语文化内涵的

传递与阐释,使译文适应译语所属的文化系统。

就公示语英译而言,为了避免译文读者对译文产生意义和信息沟通上的误解,译者必须具备文化意识,对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差异(尤其是思维方式、心理、社会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高度敏感,在翻译过程中综合考量原语和译语所处的不同文化环境,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避免文化冲突。

例如,公交车和地铁上的公示语“老弱病残孕专座”被译为“Seats Reserved for the Old, Weak, Sick, Disabled and Pregnant”。译文在语言维上忠实原文,而在文化维上有悖于西方文化对“old”的认知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老”不仅意指年岁大,还具有阅历丰富、有威望、受尊崇之意;而在西方文化中“old”有老而无用、风烛残年之意。显然,译者未准确把握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译语文化因素,更未实现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若借用英文公示语将译文改为“Courtesy Seats”,则更符合受众的语言方式和文化习惯,更易为其所接受。

又如,我国一些公共场所标示有“禁止大声喧哗”之类的公示语。若将其译为“Noises are Prohibited”“Don't Make a Noise”“Please Keep Quiet”或“Thank You for Keeping Quiet”,在语言维上译文均正确无误,而在文化维上,前两则译文显得生硬粗暴、强制性较强,给受众以被呵斥之感;而后两个译文充分考虑到了英语语言文化中强调个人、民主的价值观,较委婉柔和,在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更易使受众欣然接受,“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

(三)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过程中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外,还需将适应性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注重原文中的交际意图能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4]137-138}。公示语的交际意图在于通过文字图片将指示、提示、限制、强制的信息传递给受众,因此其英译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就是译文对于受众而言是否具有与原文同样的交际效果,即译文读者能否理解和接受译文形式与内容的整体效果,产生与原语读者相同的交际效果。

中国文化注重形象思维,公示语措辞较为含蓄委婉,常使用骈文对仗与诗化修辞,以达到音韵美、视觉美和意象美等修辞效果;西方文化注重逻辑思维,公示语措辞简约明了,力求以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本质的信息内容,获得最佳效果。例如,旨在呼吁大家呵护草坪的中文公示语多为诗化表述:“小草微微笑,请您走便道”“小草有生命,足下请留情”

“保护绿地,留住绿意”等,这些表述符合中文读者追求形式美的审美需求,且具有提示的交际功能。若完全按照原文形式和内容将其译为“Little Grass is Smiling Slightly, Please Walk on the Pavement”“Little Grass Has Life, Please Watch Your Step”“Preserve Green Grass and Retain Green Color”,译文在语言维上看似达到了字面意义“对等”,实则还是逐字逐句的翻译,个别地方还存在机械翻译(如 smiling slightly);而在交际维上,上述译文并非“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而为冗长的“过度翻译”,不具备英文公示语语言简洁、语义明了的特征,更丧失了原文提示的交际效果,无法起到警示效果。若将其译为“I Greet You with a Smile and You Should Behave with a Style”,译文照顾到了原文的语言形式,尽可能还原了原文的音韵美,然而对提示交际意图的转达稍显不足。若译者置身于翻译生态环境中,综合考虑原文信息及其交际效果、英美国家的直线思维模式、译文受众的心理期待等因素,根据译语的语言规范和交际原则将原语信息进行调整、重组、改写,译为“Please Keep Off the Grass”或“Thank You for Keeping off the Grass”,则言简意赅,且能够直接有效地传递原文信息,起到应有的提示、感召的交际效果。而转换角度,将其译为“Please Give me a Chance to Grow”,则既保留了原文的语言形象和文化内涵,又以亲切、含蓄的方式于不经意间激起受众的怜惜之心,实现呵护草坪的交际意图,具有较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四) 各维度的有机融合和综合考量

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是译者置身于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行为。而公示语的英译,不是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单独体现,而是三个层面相互交织、互联互通的整体。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综合考虑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还应做到各维度的有机融合和综合考量,即熟知汉英公示语的语言特点、承载信息、功能意义,了解两种语言系统的文化、交际差异,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层面上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使译文所承载的信息、文化内涵、交际效果和原文所传达的保持一致,达到最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例如,鉴于酒驾的严重危害,我国已将其入罪。在高速公路和快速路上“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是常见的交通警示公示语,此公示语直接了当,语气庄重严肃,并使用修辞手段,将“一滴酒”和“两行泪”进行对比,加强了语篇的呼唤功能,劝诫司机不要酒后驾车。此公示语有着不同的译文。译文

“Don't Drive while Drinking.”(意为“不要一边喝酒,一边开车”)在语言维上所表达的信息与原文大相径庭,交际效果更无从谈起;译文“*One Drink of Alcohol on the Part of the Driver Can Result in Two Lines of Tears for His Family.*”在语言维上与原文逐字逐句对应,“*result in*”更阐释了“一滴酒”和“两行泪”的因果关系。而在交际维上此译文过长,不利于在高速公路或快速路行驶的司机逐词逐句阅读并推导其警示的交际功能;译文“*Drink and Drive Cost Your Life.*”在语言维上简洁明了地表达了原文语义,符合英语公示语的语篇特征,且具有音韵美(*drink*和*drive*押头韵)。在交际维上,词汇补偿的具体化手段将“一滴酒”和“司机”转换为具体的*drink*和*drive*的行为,较准确地表达了喝酒与驾车的行为关联。词汇补偿的概括化手段将“亲人两行泪”转化为“*Cost Your Life*”,在蕴含酒驾者和亲人悲伤语义的同时,更强化了“酒驾致人亡”的严重后果,更好地传达了其警示功能^{[7]73}。而笔者认为,译文“*You Drink, You Drive, You Die.*”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上进行了更好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具有更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首先,在语言维上译文使用了简短的主谓句式,运用了排比(*parallelism*)和渐进(*climax*)的修辞手法,准确传递了原文“酒驾害人害己”的语义,语气简洁有力、庄重严肃,符合英文公示语的文体特征。其次,在交际维上译文通过三个短句、六个单词缩短了受众的阅读时间,单词“*Die*”的使用传达出更为强烈的劝阻、警示的交际功能。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维上译文运用了仿拟

(*parody*)的修辞手段,以西方人所熟知的、凯撒大帝的豪情壮语“*I Came, I Saw, I Conquered.*”为蓝本,根据新的语境进行创造性的仿照、模拟,推陈出新创造出的译文表现力极强,给译语受众以似曾相识而又出乎意料之感,使之牢记酒驾的危害,印象深刻。

四、结语

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理论,笔者认为公示语英译的关键在于译者能否置身于翻译生态环境,全面考虑环境中的各个要素,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做到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最终产出准确、规范、“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从而促进我国国际语言环境与人文环境建设的健康发展,提升各大城市的文明形象和软实力。

参考文献:

- [1] 王颖,吕和发. 公示语汉英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 [2] 宋瑶. 公示语的特征及其汉译英中的误译分析[J]. 中州大学学报,2013(2).
- [3] 吕和发. 公示语的汉英翻译[J]. 中国科技翻译,2004(1).
- [4]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5] 胡庚申. 例示“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3).
- [6] 刘晓静.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域下的公示语英译研究[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 [7] 于增环. 论公示语生态翻译补偿[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C - E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Theory

SONG Yao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C - E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by facilitating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fter elaborating the definitions, functions,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of public signs, the author probes into the C - E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theory,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ranslation. Moreover,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in the course of C - E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translators are required to be guided by the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theory, as well as conduct three - 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i. 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so that the quality of public signs translation can be improved,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can be better, and the nation's international image can be enhanced.

Key words: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theory; public signs; C - E translation; three - 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全球化视野下手语翻译跨文化素养的培养

罗 强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特殊教育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 受益于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各国聋人群体的交往日益加深。但是, 不同国家、民族间手语的差异性给手语使用群体的顺畅交流造成困难, 也对专门为听障者服务的手语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实现沟通的目标, 不仅要实现信息真实传递、实现“信”的目标, 还要升华到“达”与“雅”的更高层次。因此, 手语翻译的培养, 不仅要掌握基本的本国本民族手语知识, 还应当去了解不同民族国家聋人文化与思维特性, 掌握不同文化背景下手语语言的差别, 培养手语翻译者的国际视野, 提升其跨文化素养, 完美实现无障碍交流的桥梁价值。

关键词: 全球化; 手语; 思维; 文化

DOI: 10. 13783/j. cnki. cn41 - 1275/g4. 2017. 03. 022

中图分类号: H026.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3715 (2017) 03 - 0112 - 05

手语作为听障人交流使用的一种语言, 同样具有民族性。在表示同一事物或现象时, 不同民族或国家的手语词汇往往会体现出民族或区域的差异。我们在对汉、藏以及美国、日本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手语中的数字词汇进行比较时发现, 这些词的差异充分体现了语言的民族性与不同文化的思维特性。

一、不同手语数字词的表述差异

作为语言中的核心词汇, 数字词在彰显语言的民族性方面极具代表性。数字类词语按照词语位数的不同, 可以分为个位数词语、两位数词语与多位数词语三种形式。这在汉、藏、美、日间手语比较中具有代表性, 它们之间既有相似之处, 也存在明显的不同。

(一) 个位数数字词的差异

























个位数指从“0”到“9”十个数字, 汉、藏、美、日聋人在表述这些词语的时候存在相似之处, 但也有些不同。这十个词又可以分为两类, 从“0”到“5”六个是一类, 这六个字的手语, 中国手语与藏族手语相似, 这五个数字中国手语表示如下:

“0”用一手五指捏成圆圈, 虎口朝内; “1”用一

手食指直立(或横立); “2”用一手食、中指直立(或横立); “3”用一手中、无名、小指直立(或横立)^{[1]839}; “4”用一手食、中、无名、小指直立(或横立); “5”用一手五指直立(或拇指直立, 食、中、无名、小指横伸)^{[1]840}。

在表示数字“3”时, 中、藏、日手语手势相同, 但美国手语则是伸出拇指, 食指和中指来表示。在表示数字“5”时, 中、藏、美手语手势相同, 而日语手语则是手心向内, 拇指向右平伸, 其余四指紧握于掌心。(见表1)。

表1 汉、藏、美、日手语个位数字词手势图

数字	0	1	2	3	4	5
中国手语						
藏语手语						
美国手语						
日本手语						

而“6”“7”“8”“9”四个数字的表述方式则存在一些差异: “6”在中国手语以伸出同一只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表示, 而藏语手语“6”仅使用一个大拇

收稿日期: 2017 - 03 - 07

基金项目: 2017年度中州大学科技创新项目“高等特殊教育政策与教育公平”(CXTD2017S1)

作者简介: 罗强(1975—), 男, 河南正阳人, 硕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教育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特殊教育及手语语言研究。

指表示。日本手语表示“6”要用两只手,先展开一只手的五指,表示“5”,再加另一只手的拇指,并列组合为数字“6”。数字“7”则在中国手语中是伸出同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表示,而藏语手语“7”伸出拇指与食指表示。日语手语则使用一手摊开表示“5”,另一手伸出两个手指表示“2”,然后将两个手指放在另一个手掌的掌心。组合表示数字“7”。“8”在中国手语以拇指、食指、中指同时伸出,表示“8”,藏语手语“8”伸出拇指食指与中指表示。“9”在中国手语单独伸出食指,并成弯钩状,表示“9”,而藏语手语“9”伸出拇指食指中指与无名指来表示。中国手语以一手食指与中指交叉表示“10”,日语用两手摊开比出两个五表示“10”(见表2)。

表2 中日手语个位数数字词手势图

数字	6	7	8	9
中国手语				
日本手语				

(二) 两位数数字词的表述

两位数指的是从“10”到“99”,共有九十个数,中国手语表示两位数时一般用单手独立表示。首先通过手指弯曲动作表示十位,再通过同一手的变化表示个位。如“10”为¹⁰、“20”为²⁰、“30”为³⁰、“40”为⁴⁰等,而藏族以及美、日手语对于两位数的表示要用双手,通过两只手的并列组合表示相应数字,如:藏语手语“10”的手势为¹⁰、“11”为¹¹、“12”为¹²、“14”为¹⁴、“20”为²⁰等。

(三) 多位数数字词的表述

多位数数字词主要有百、千、万和亿几个,对于多位数的表述,藏语以及美、日手语一般是通过双手的组合来表示。藏语手语“100”为左手伸出食指表示百位数“1”,右手食指和中指弯曲表示十位数和个位数上的“0”,打其他百位数手语时,右手不变,只通过左手的变化表示。“1000”为左手伸出食指表示千位数字,右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弯曲表示百位、十位和个位。“10000”也通过相似的表示方法,左手伸出食指表示千位数“1”,右手食指和中指和无名指弯曲表示百位数、十位数和个位数上的“0”。十万以上的数字则通过手形的三次组合表示,“100000”为¹⁰⁰⁰⁰⁰、“1000000”为¹⁰⁰⁰⁰⁰⁰等。而中国手语则根据汉字的象形性,使用同音借用、书空、仿字等方式来表述手语手势:“百”为右手食指直立,从左向右挥一下;“千”为一手食指书空“千”字;“万”为

一手食指书空,表示“万”字的横折钩部分;“亿”为左手拇指、食指成“亻”形,右手食指在左手旁书空“乙”字,仿“亿”字形。(见表3)

表3 汉藏多位数字词手势图

数字	百	千	万	亿
中国手语				
藏语手语				无
日语手语				

二、差异中的民族文化与思维因素


通过汉藏手语以及与国外相关手语对数字词汇不同表述方式比较,发现他们的手势存在明显的不同。数字词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他类的词汇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差异的存在彰显出语言的差异性,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并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其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语言的民族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差异。因此,手语的差异首先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其次是思维模式的差异。

(一) 文化因素的差异

文化是群体内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的总和,是群体成员行为的共同标准。因自然与人文环境不同,不同区域都有独特的、与其他文化迥然有别的文化形态。文化差异并不局限于国别,同一个国家内部,在不同区域的人群或者民族间,这种差异也同样存在。

中国手语使用者在表示数字词“10”的时候,会利用食指与中指交叉,构成“十”字形的方式来表示。而这个手势在日本手语中,表示的是扒手,如果中、日两个手语使用者在交流中使用这种手势,就会产生歧义,造成交流障碍,甚至纷争。

这种差异在同一国家内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手语使用者同样存在,中国手语的使用者大多都生活在汉语环境中,即便有些使用者不属于这个环境,但他们接受的手语教育,往往也处于这个环境影响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汉语对手语使用者的影响很深,其言行举止与表述方式都受到汉语言文化的影响。如维吾尔、哈萨克、壮、回族等与汉文化接触较多的手语使用者,他们的手语数字词表述方式与中国手语相同,他们的语文教育环境大多是学习汉语,这更加剧了汉文化对其思想的渗透。因此,在以手语表示数字时,如果全部使用数字不方便,比如在表示数字“10000”时,这些手语的使用者也会使用汉语手语的表述方式,充分利用汉语字形或其简化形式来表示多位数手语,通过汉语“万”的局部形体来表

示。同样表示数字“10000”，而藏语手语使用者由于自身文化环境相对独立性，受汉语言环境影响较少，其在用手语表示该词时，往往会按照其民族自身习惯的表示方法，通过双手的组合成形。


文化对手语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词汇的表述方式上，在词汇系统完整性上也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各文化区域内生活条件与生活方式不同，不同民族的手语数字词数量存在着差异。例如在藏语手语中就没有出现“亿”这个手语数字。

上述的这些差异彰显了文化对手语使用者的影响，文化作为民族印记深深地烙在文化传承者的内心深处，在文化交际中，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受这种文化的影响。不同的文化传承者继承不同的文化习性，养成了不同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表述方式，形成具有明显差异的手语文化特性。但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这些差异对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手语使用者的交流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

（二）思维模式的差异

思维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在生产实践活动刺激与作用下，人脑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产物，具有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来观察客观世界和反映自身思想的能力。不同的民族由于生活环境与文明程度的不同，就会形成该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比如西方民族善于线性思维，东方民族重于逻辑思维。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使得后人在发展中往往需要继承传统，并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进行创新与发展。这种文化传承模式形成汉民族善于总结，喜欢“以史为镜”，重视理性分析的特点，但也存在着空间意识较弱，形象思维能力不强的内敛式思维特点。而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正好与汉民族相反，他们的空间、形象思维能力较强，而抽象概括能力与汉民族相比较弱。“藏、汉两族大学生思维方式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与汉族大学生相比，藏族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呈现了较多的变化性和较少的联系性和矛盾性”^{[3]128}。

不仅健听人群中存在这种差异，在手语使用者中这种思维差异同样存在。研究结果表明：在汉文化聋人团体表示数字词语的时候，充分利用汉文化中注重抽象的特点，选取简洁有效的方式来交流；而美日以及藏民族手语使用者充分发挥他们擅长线性思维、形象思维的特征。汉族手语使用者在表示这些词汇是往往会利用汉字的二维平面组合的优势，使手势表述更加简洁直观，如“八”和“十”就直接用文字的象形手势来表示，或者利用汉字的整体或局

部构造的书空来表示，如“千”“万”和“亿”的手势为：，都是汉字的字形或者汉字的局部形体表示。而美国手语、日式手语甚至藏语手语使用群体在表示这些数字词语时，明显与其自身民族的线性思维方式结合，以直观可见为主要交际原则，通过两只手分别组合，表示不同数字的直接线性组合排列来直观地表示相应的数字手势。

三、跨文化素养培养途径

不同民族、国家手语的差异性，体现出手语使用群体的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对手语使用状态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国家、各民族间的聋人群体交流也呈现出频繁与深入的趋势。与此同时，交流过程中不同民族与国家手语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流不便更凸显出来。特别是在一些国际性的手语交流会议中，不同的手语表述方式混杂使用，由于没有足够的优秀的手语翻译，严重影响到会议的质量，凸显出国际化背景下聋人群体跨文化手语交流的困境，也对手语翻译人员文化素养的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要摒弃传统的教学思维与模式，建立符合国际化潮流的新的培养方向与目标。要解决不同民族或国家间的手语交流障碍不能一蹴而就，要遵循人才培养的规律，循序渐进地提升手语翻译队伍的跨文化素养。因为跨文化的学习不是仅仅靠背诵不同文化背景的手语词汇那么简单，而是要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与思维习惯有所了解，能够自由转换，才能实现不同手语间的无障碍交流。

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之中，并反映该民族的信仰和情感，不同个国家或民族在语言上都有自己的特质。手语的使用者同样存在这种问题，因此，在手语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时，不仅要学习手语知识，还应当充分认识到，只有语言知识，没有广泛的相关文化知识，不能熟练地进行不同手语间的沟通，掌握其语法结构特点与表达习惯以及深厚的异域文化知识，也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手语翻译人才。

为了更好地培养出优秀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手语翻译人才，适应当前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国际潮流，必须在教学与实践中进行深入改革，培养符合社会需要，具有国际水准的高质量手语翻译人才队伍。

（一）改革课程体系，增加跨文化手语内容

提升手语翻译人才的培养质量，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课程设置。时代在发展，社会对专业人才

的要求也在不停的发展,手语翻译属于为聋人交流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当前培养其跨文化手语交际能力是重点。而跨文化手语翻译的培养,除了要靠个人自我提升外,更主要的是对传统的手语翻译课程体系进行改革,通过构建符合当前实际需求的课程体系,提升手语翻译者跨文化翻译素养。为此,手语翻译课程体系的建设和要有明确培养目标,并根据目标设置符合实际需求的课程体系。

1. 完善课程设置

当前我国的手语翻译培养模式仍然延续传统的教育模式,课程设置不甚合理,课程侧重于手语理论学习,轻视专业训练;实训中仅仅强调中国手语学习,轻视跨文化手语能力培养,使得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因此,应当根据当前国内、国际交流的实际情况,重视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问题,在课程体系改革中,要开阔视野,拓宽思路,按需设课,对课程体系大胆改革,对手语教育资源进行系统整合,积极开发能契合当代聋人沟通需求的课程,增加跨文化手语理论与实践课程。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必修课、选修课与自修课等课程体系,通过构建合理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手语课程教学体系,使手语学习者能够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2. 优化教学活动

手语翻译专业作为一个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在课程活动方式上要充分运用开放性、立体性、综合性与实践性的教育手段。要革新传统教育管理上以教师为主导,以讲授为中心,以教室为主阵地,以传授理论为宗旨的教学模式。应该结合教育实际,对教学过程进行改革,坚持以课堂手语学习为主体,增加以跨文化性质为主的社团活动、专业技能训练、系列讲座、社会实践活动为支撑的课程教学模式,构建符合手语教育实际的“一体两翼”课程教学体系,最大程度地激发手语专业学生对手语学习的兴趣,使学生在这些活动课程中能够开阔视野,增强跨文化素养,提升学生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手语翻译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样需要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教师回归教学。手语翻译队伍素养的高低关键在于教育,而教育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专业素养。在当前对跨文化手语翻译极大需求的前提下,从教人员不仅要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而且应当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知识,以实现专业技能与跨文化知识间的相互协调,从而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和多元文化人才的培养模

式。^{[4]189}

当前,手语翻译教育队伍中教育者自身素养也良莠不齐,有一些是接受过特殊教育训练的专业教师,但更多的是没有经过专门特殊教育培养的教师和一些原本从事普通教育的教师,这些人本身对手语认识就存在种种不足,知识结构存在着偏差,更缺乏国际视野。许多教师在手语教学中往往不能按照手语的规律来开展教学,对于教育学生如何按照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特殊群体的习惯高质量地传递出他们所要表达的信息也不太了解。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到手语翻译队伍综合素养的形成,阻滞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有些院校为了突出为聋人服务、尊重聋人,促进手语翻译队伍对聋人文化更直观、深刻了解的目的,积极聘请聋人教师进入手语翻译教学队伍。这种做法出发点是好的,也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聋人教师在手语教学中有自己的优势:本身就属于手语族,对手语的理解比较透彻,对聋文化更是有自己直观的感受。他们作为手语课程的教师,能够通过与聋人群体的直接交流,进行思想与文化碰撞,促进手语翻译对聋文化的更直观了解。

但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困境。当前,我国聋人高等教育多为艺术类的专业教育,毕业于这些院校的聋人是当前高校聋人教师队伍的主流,他们对于从事教育教学所需要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存在着很大的结构缺陷,影响了教育的质量。因此,不能仅仅将引入聋人教师进教室作为面子工程,对外宣称有多么的尊重聋人,有多少聋人教师,不能以引进为最终目的,一引了之,后续的管理也要跟上,要进一步加强他们跨文化素养的培训与再教育,提升他们的教育教学能力。

(三) 拓宽手语翻译国际视野的培养渠道

提高师资队伍的质量,可以提升教育的质量,但对于要培养跨文化手语翻译队伍来说,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要摆脱现存的制度障碍,积极突破传统,大胆与不同国家、民族的手语使用者交流合作,采用“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对手语翻译学习者进行培育,提升他们跨文化素养。学习一种文化,最便捷、成效最快的方式就是学习者主动“走出去”,深入到要学习的文化环境中去。根据我国当前的教育实际,可以通过互派留学生、交流互换、推荐学习能力强的手语翻译学生留学等方式,加强手语翻译人员对不同文化真实的、直观性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另外是“请进来”,请国内、外手语翻译

从业者或者知名聋人到学校作为学校的客座教授,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手语翻译人员进行有关国内、外文化培训与教学,帮助翻译人员了解多元文化习俗、民族传统以及手语翻译技能。

以上这几种方式,可以有效促进手语翻译人员提升文化素养,加深对外文化的了解,强化手语翻译队伍国际视野,并熟练掌握不同文化间手语的规律与转换技能。以丰富的文化知识,娴熟的手语技能帮助不同区域手语使用者相互顺畅沟通,为聋人群体在全球化潮流下充分展示才能,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共享社会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提供有效渠道。手语翻译者也能在帮助聋人实现梦想的同时,展现自己的文化素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四、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各国聋人群体日益突破旧有的区域限制,积极走出去,与民族内、国内甚至国际间的交流频率加快。但在交流中,手语的差异性对聋人顺畅交流造成困难,阻碍沟通。这些困难如果由聋人群体自己去解决,去慢慢消理解也可以,但是效率极低。因此,

培养面向为聋人服务的高素养手语翻译人才迫在眉睫,而高素养手语翻译的标志不是仅能够准确翻译本文化内部的手语语言,不仅要掌握本文化内基本的手语词汇与文化知识,还要适应国际化的需要,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能熟练地进行不同手语间的沟通,掌握其语法结构特点与表达习惯,有深厚的异域文化素质,为聋人沟通的国际化时代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参考文献:

- [1] 中国聋人协会. 中国手语[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 [2] 国际助残与自治区残联. 藏语手语词典[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
- [3] 陈晓慧,方明,罗平. 藏汉大学生思维方式发展特点的比较研究[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126-129.
- [4] 祖婉慧. 加强翻译课程建设培养多元文化人才[J]. 前沿,2014(1):188-189.

(责任编辑 许峻)

Cultivating the Training of Sign Langu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LUO Qiang

(College of Special Educa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deaf groups in various countries exchange actively. The sign languages are different because of nations and countries, so the deaf cannot communicate smoothly, and this also gives the higher requirements to the hearing to translate sign languag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unication, not only needs to achieve faithfulness, but also the higher level of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So in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cultivation, we need both basic knowledge of sign language and the deaf culture in other countrie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sign language; thinking; culture

优化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环境的对策思考

王宏源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商学院, 郑州 451150)

摘要: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优化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意义重大。要准确把握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铸魂”作用,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坚持党的理论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立德树人,激励高校大学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大学生;环境优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23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117-04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社会思潮纷纭激荡,优化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引导广大学生统一思想认识、维护和谐稳定的任务越来越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铸魂”作用,着眼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复杂形势

(一)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发展新阶段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坚持深化改革,优化结构,保持了科学快速发展的态势。人才培养质量不断优化,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教育部2016年4月7日发布的首份《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指出,2015年全国在校生规模达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2852所,位居世界第二;毛入学率40%,高于全球平均水

平。^[1]但也应该看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发展不足和瓶颈比较突出,总体上还不能很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创新思路理念,创新方式方法,不断优化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以工作的新成效促进全面加快高等教育的新发展。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复杂形势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复杂的情况,西方敌对势力处心积虑地企图用西方的政治理念、制度模式和价值观改变中国。同时,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思想认识问题与现实社会问题相互影响,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集中呈现、相互叠加,各种力量、思潮,以及一些“异见分子”与境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妄图从内部搞乱中国。特别是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把青年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作为重点对象,把高校作为渗透的重要领域,利用各种敏感时间和话题,插手炒作社会热点和涉及大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制造矛盾纷争。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以多种形式作掩护,通过公益慈善、学术交流、联合研究、捐资助学等推销西方政治和价值观念,拉拢腐

收稿日期:2017-05-03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优化河南省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发展环境研究”(172400410173)

作者简介:王宏源(1975—),男,河南唐河人,博士,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商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及思想政治教育。

蚀所谓“精英”，扶持草根异见分子；一些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出现范围扩大化、组织周密化、手段现代化、渠道多样化等特点，与我国争夺阵地、争夺青年、争夺人心。我国高校处于意识形态领域前沿，切实巩固并坚守高校这一意识形态领域重地，进一步优化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加迫切。

(三)有效掌控互联网舆论主导权面临严峻考验

目前，我国网站近400万家，网民约6.3亿多人，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制高点和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习惯于从网上获取信息，一些网络大V编造政治谣言、虚假信息，一些异见分子肆意攻击主流思想观点，持续传播和鼓吹西方价值观，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恶意炒作，这些负面信息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带来巨大的冲击，加大了教育引导工作的难度。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量政治谣言、错误言论、虚假信息贬损国家民族，歪曲党史国史，攻击党和政府，这些带有戾气的歪理邪说，直接冲击和扰乱了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可以说，在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随手表发表和获取信息的互联网时代，不能有效应对互联网，我们高校阵地就有失守的危险。能否掌握互联网舆论主动权和话语权，是一个关键点。能否应用好互联网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教育，优化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占领教育引导的阵地和制高点，更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二、准确把握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

(一)秉持爱国主义，但政治参与意识弱化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更加频繁地交融、交流、交锋，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碰撞、竞争，高校大学生面临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国际敌对势力与我国争夺下一代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广大学生拥护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热爱祖国、热爱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同时，高校大学生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政治热情不高等问题，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度加大。

(二)认同传统美德，但价值取向多元

随着我国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益明显，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高校大学生广泛认同传统美德，有着

较为明确的是非、善恶、美丑判断标准，热心助人、自立自强，见义勇为。但也存在着价值取向多元，道德评判标准多样等现象，呈现出矛盾性特点。社会上一些庸俗的风气给在校大学生的思想带来冲击，市场经济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腐蚀。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价值观扭曲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在大学生中存在，先人后己，无私奉献等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有所淡化。

(三)进取意识强烈，但功利思想突出

当今大学生大多属于90后，他们观念新，信息量大。主体意识强，个性张扬，思想多元化倾向明显。成长、成才意识非常强烈，具有较强的开放意识和竞争意识。时代感、时尚感较强，掌握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欲望和能力较强。但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急功近利、一朝成名、相互攀比等浮躁心态，缺乏勤劳朴素、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品质。一些大学生的自我意识、自主意识较强，喜欢自我，但也出现了片面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需求的现象，身体素质下降，心理抗压、抗挫折能力降低。

(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薄弱环节，积极面与消极面共生

高校大学生思想行为主流积极健康，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普及和运用，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注重利益、批判和感性标准，而较少使用道德、建设和理性标准。一些教育部门和高校领导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认识不够，办法不多。高校大学生管理工作与形势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效果亟待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有待加强。面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教育对象的新特点，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的主导地位，切实加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三、优化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切实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践

大学生处在身心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对他们的一生影响很大。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基本遵循。要紧紧围绕“三个倡导”，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宣传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断提高广大学生的知晓率、认同度。高等院校可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接受

习惯,把中央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精神融入到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贯穿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内化为自觉意识,外化为自觉行动。二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文化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蕴藏着丰富而宝贵的思想道德财富。要通过开展普及活动、组织论坛讲座等形式,增加高校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学生。鼓励高校大学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传统和现代发展,自觉继承和践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三要加强诚信意识和行为教育。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道德基础。当代大学生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希望,应该在修业的同时加强修身,培养他们的诚信品质,激励他们的诚信意识,防止知识水准与道德水准严重失衡。要把诚信教育融入到教书育人的各个环节,融入到课堂教学的各个方面,融入到学生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之中。^[2]要建立健全监测机制、评价机制和惩戒机制,把大学生在就业择业、助学贷款等方面的诚信情况逐步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效引导价值取向。

(二)切实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一要改进教学环节。加强和改进课堂教学,推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教学体系向信仰体系转化。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方法手段,善于运用贴近学生的话语表达,善于借助先进技术手段和时代元素,把理论教育、能力培养和价值引导有机统一起来,增强教育效果。要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课讲好、讲活、讲出效果,既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办”,既讲“是什么”,又讲“为什么”。要继续开展诸如“精彩一课”和“优秀课程”等的评选工作,组织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择优推广计划”等项目,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单独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果奖,并纳入教学成果奖统一管理。要加强实践教学,各高校可按照中央要求,从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相应学分开开展实践教学。二要加强教学机构建设。成立专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机构,负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实施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选拔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懂管理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

教师,承担教学科研责任。三要加强保障制度建设。加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的经费投入,进一步完善教学管理制度。根据我国实际,高等院校可按照每学分18学时的要求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以每班100名左右学生组织开展教学活动,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课时。

(三)切实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引导工作

大学不仅要有大楼和大师,更要有大爱。目前,一些高校大学生面对不同程度的学业压力、经济压力、就业压力,思想上存在诸多困惑,亟需正确教育引导。一要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完善信息会商和研判等制度,坚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加强督查督导,维护高校稳定。二要开展无邪教校园创建活动。认真落实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精神,把教育学生与服务学生结合起来,深入细致地做好教育引导工作,进一步推进抵御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协调机制建设。三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文化创意、文体娱乐、科技学术等文化娱乐活动,大力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培育良好校风学风。进一步加强对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和校园网的管理,决不允许传播任何错误思想观点。四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社团的作用。着力打造活动品牌,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让校园文化丰富活跃,让大学生生活多姿多彩。五要大力营造关爱学生的校园氛围。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加强心理疏导。学校的制度、服务,以及教师的言行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处处体现对学生的关爱,积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包容奉献、积极向上的心理素质,让学生的个性、智慧、想象力和创新力得到充分发挥。六要着力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要进一步加强高校就业创业教育,引导广大毕业生切实转变就业观念,积极到城乡基层、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就业。高校课程设置要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现人才培养、社会需求与就业的良性互动。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为他们提供好扶持政策和优质服务。

(四)切实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高校教师是大学生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一要加强政工干部队伍建设。大力选拔优秀人才从事学校党政团工作。专兼结合,配足配齐配强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坚持把能力素质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使思想理论干部在

笔头上、理论上、口才上全面发展,具备综合素质。树立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从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中培养更多的思想理论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学术带头人。二要加强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高等院校要合理核定专任教师编制,按相应要求配备足够数量的专职辅导员。鼓励专职辅导员国内外业务进修和在职攻读学位,并将其纳入学校教师培训计划,享受学校有关鼓励政策。^[3]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应的职称评聘标准,健全思想政治辅导员职级晋升制度。可以考虑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单列指标、单设标准,单独评审思想政治辅导员职称,从而切实解决好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职称评聘问题。三要加强专任教师队伍建设。既要按要求配备较高质量和足够数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要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完善培养培训体系,通过骨干研修、全员培训等多种途径,落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养规划,不断加强高校社科理论队伍特别是中青年理论队伍建设。^[4]

(五)切实加强校园互联网络管理

近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数据挖掘、资本渗透、煽动传播等途径,利用互联网络平台不断动摇青年学生理想信念,左右青年学生价值取向,误导青年学生思想观念,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和重视。一要开办一批贴近大学生学习生活的网络名站名栏。立足校园网站建设,着力培育一批导向正确、影响力广的网络名师,有效开展网上舆论引导和思想疏导。二要积极搭建新媒体教育服务平台。推进校园微信

公众号、校务微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博客、思想政治辅导员博客等网络新媒体建设,扩大校园网络文化的育人覆盖面,努力打造示范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网站、网络互动社区和学生主题教育网站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力。三要提升运用网络新媒体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校园网、手机报、微博等多种渠道,全面加强校园思想政治教育网建设,通过网络掌握大学生思想状况,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有效应对突发性舆论事件。四要加强网络法治建设。不断强化网上言行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工具。发挥高校人才荟萃的优势,建立一支释放正能量的强大网军。

参考文献:

- [1] 张太平. 深化认识 把握形势 提升水平 加强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J]. 内蒙古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2010(10): 4-8.
- [2] 赵素萍. 切实把高校党建工作任务落到实处[J]. 河南教育, 2014(3): 26-28.
- [3] 赵素萍. 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J]. 河南教育, 2015(3): 20-23.
- [4] 彭扬, 李忠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体系建设格局、现状与建议[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5(3): 71-75.

(责任编辑 赵冰)

Reflections on Optimizing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New Period

WANG Hong - yuan

(School of Business,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Zhengzhou 451150, China)

Abstract: Now, we are facing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us, it becomes significant to optimize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 we should grasp the statu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make full use of “casting soul”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onstantly consolidate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dhere to this principle, that is to put our party’s theories into our classroom, our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nto students’ minds. So we can encourage the major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two hundred years” goal, to study harder and to achieve the Chinese dream—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our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environmental optimization

网络思潮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影响探析

秦素玲

(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 郑州 450002)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和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社会思潮冲击着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本文剖析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探讨网络思潮对高校意识形态正引导的必要性,提出应对网络思潮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性的对策。认为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网络思潮,以校园文化为载体优化意识形态教育环境,利用多种手段创新教育方式,建立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机制,巩固高校网络思潮主流阵地,切实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关键词:网络思潮;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24

中图分类号:G647;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121-04

高校是传播和引领先进思想的重要场所,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社会转型的升级,网络社会思潮已经充斥在高校学生的生活中,由于网络信息的开放性,其中不乏有各种负面信息,影响高校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挑战。

一、加强网络思潮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正引导的必要性

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形式是社会思潮,是在特定的时期内,某一阶层对当时政治情况的反映。这种思潮具有一定的社会存在基础,具有当时时代背景下特定的思想政治理论核心,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与某些社会心理之间还具有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作用。^[1]网络思潮是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网民的急剧增长尤为凸显的一种社会思潮。随着我国各领域扩大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网络思潮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判断。

(一)网络思潮消极面影响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到

来,各种社会思潮充斥在网络、博客、论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事件以调侃、笑话、捕风捉影的形式在网络上传播,各种复杂的信息交汇在一起,大学生无法判断其真伪,使其价值判断出现误差或迷惑。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着重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应该不断加强,通过改进方法手段、内容形式,推进理念思路创新,增强高校思想管理工作的实效性和时代感。特别是在高校思想文化、校园安全管理等方面要加强管理,进一步规范,为大学生的成长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2]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把握网络特点和学生思想发展规律,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在思想培养方面的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在个人发展上是德才兼备,在成长方面是全面发展,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敌对势力散播不实言论瓦解师生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西方敌对势力是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最大的威胁,其利用网络的隐蔽性和传播广泛的特点开展了

收稿日期:2017-05-03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就业创业项目“‘互联网+’条件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JYB2016002)

作者简介:秦素玲(1978—),女,河南新乡人,硕士,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创业就业指导工作。

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渗透,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地位,歪曲中国革命和建设,歪曲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创造,政治上宣扬多党制、经济上宣扬私有化、思想上宣扬新自由主义,致使部分师生理想信念淡漠,爱国主义缺失,思想道德缺位。网络负面信息和思潮主要在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方面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丑化和诋毁民族英雄,如改写历史人物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的真实背景,扭曲雷锋同志乐于助人的光辉事迹,使大学生民族自豪感被压制,个人发展中的精神形象被扭曲。更加多元化的价值观形态,使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弱化。高校大学生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也关系到中华民族文明的兴衰和民族命运的方向。大学教育阶段是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时期,在此时期他们对国家政治、道德文明有极大的兴趣和需求,网络上大量繁杂的信息容易使他们产生迷茫和困惑,会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的教育,进行正面引导,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指导地位。

(三)加强网络思潮传递正能量是实现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

网络在信息传播方式上具有及时、便捷、互动性强等优势,借助网络平台能够及时高效地对广大高校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引导,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同时网络负面信息和各种社会思潮也会干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通过对比社会思潮与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可以看出,网络方式在管理上缺少对信息的审核,网络的开放性也成为各种信息最理想的传播途径,负面信息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对抗主流信息,混淆信息资源,与正义理性的发展理念背道而驰,严重干扰了我国主流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通过建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舆情监控,筛选、过滤和甄别网络思潮,可以净化网络空间,维护国家社会安全。

二、当前网络思潮传播特征及其影响

通过网络问卷、现场座谈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查,回收有效的调查问卷300份,对网络传播特征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一)网络思潮的内容复杂多样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7.1亿人,互联网的普及率也达到了51.7%。互联网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思潮相互碰撞的虚拟场

所。网络思潮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在内容上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哲学、伦理等领域,在交流方式上,运用微信、微博、网站等网络媒介,发挥其方便快捷的功能。在调查的学生中,93.7%的学生利用网站、论坛等进行娱乐交流;66%的学生利用网络查找信息、浏览新闻;72.3%的学生把网络当成通讯工具。说明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思潮正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交流方式和价值判断。

(二)网络思潮的多元化弱化主流意识形态

主流社会思潮和非主流社会思潮的差别在于是否与我国意识形态相适应,当前网络思潮的意识形态是主流社会思潮和非主流社会思潮相互交织,共同存在。对主流网络思潮和非主流网络思潮的关注程度,76.1%的学生认为网络信息与言论可信,51.6%的学生认为主流网络思潮和非主流网络思潮都可接受,47.2%的学生认为主流网络思潮对自身的影响较大。由此可见,大学生通过网络接收到纷繁复杂的信息,并产生了多种价值取向,也深深影响了其自身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针对目前出现的中美、中韩关系等问题,在价值取向上大学生表达强烈的爱国主义,但在具体的表达方式上容易采取极端行为。如果西方国家掌握了互联网的话语权,则会趁机利用网络构建新的意识形态的霸权,在网络上大量鼓吹西方的价值观,尤其是非主流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

(三)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成为道德塑造的不利因素

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对网络信息的确信性与准确性、合法性与合理性、健康信息与垃圾信息等的判断还不准确。不良信息与思潮以各种形式和途径蔓延,加之网络监督、过滤与管控机制还不完善,缺乏“慎独”意识,在缺乏自我约束和自我管控的情况下,极易引发道德缺失。“泛娱乐化”言论的恶搞,以通俗性、大众化、娱乐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的传播,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学生的道德塑造和价值判断。^[3] 调查结果显示,93.1%的学生认为网络道德与传统道德相比,更加需要增强自律意识,加强道德监管与规范。

(四)大学生自主意识的增强推动了网络思潮的传播

高校学生思想活跃,自主意识强,当网络快速发展到自媒体阶段,大学生的自我主体意识被充分激活,表现出强烈表达自我主体意识的愿望,希望通过自我表达方式彰显自我价值。一方面,大学生容易

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诱导;另一方面,当网络信息到来时,他们会快速做出反应,有利推动网络信息的传播。针对网络言行的调查显示,82.4%的学生看到自身认同的网络言论就会表示赞同并转发。可见,网络为师生提供了自由、互动、平等的相互交流和发布信息的平台,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大学生自我表现表达的方式更加直观,并且可以通过自媒体及朋友圈快速传播。

三、目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自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面临新挑战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领导权和话语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各种文化思潮与价值观念快速汇聚于高校,一些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非主流社会思潮通过网络在高校内频繁传播,再加上当今部分高校教师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导致新时期的大学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信念缺失、政治信仰淡漠等意识形态边缘化的思想特点。

(二)网络意识形态思潮影响大学生的政治心理

全球信息化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信息甄别的难度增加。学历越高的网民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高,网络已成为大学生工作、生活和娱乐的第二世界。社会上各种违背正常规范的现象,对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影响显著,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的影响,对正确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是直接的,这些威胁和挑战都是影响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判断的负面因素。因此,应该深刻认识到网络媒体发展的双面性,网络为我们提供自由、开放、快捷的工作方式的同时,其管控较难的特点也应该时刻引起警惕,在日趋复杂、形式多样的网络意识形态争论形成的时代,争论的新动向不断向政治事件转移,通过事件的政治化,对大学生的政治心理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网络文化霸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造成威胁

目前,网络发展的速度十分迅速,美国在利用网络空间上具有技术先发优势,这使得网络空间也存在着“霸权主义”文化。西方国家试图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强加于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网络电影、网络文化产品、言论引领等多种形式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他们批判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优越性,打

着民主的幌子抨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严重破坏了开放、共享、自由等互联网文化精髓。如果网络思潮带有明显的文化霸权烙印,必然会排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承担的主要职能是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以及文化的创新与传承,必须加强网络空间管理秩序,用中华文明为底蕴的传统文化做基础,为网络文化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四、应对网络思潮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性的对策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网络思潮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中起着凝聚共识、价值引导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凝炼而形成的。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意识形态教育。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提高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科研与教学中的指导地位,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质量,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武装高校师生的头脑。二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实现文化素养和理想信念两大教育理念结合,以及爱国情感和政治思想两大教育理念结合。三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贯穿高校教学教育活动的始终。加强日常教育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入,将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导作用。

(二)以校园文化为载体优化意识形态教育环境

校园文化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潜在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校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将意识形态与校园文化相融合,可以说是强有力的整合与指导。构建校园物质文化育人环境,以文化人,一方面需要构建校园物质文化。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培养目标、发展方向等对校园进行规划,充分利用校园名人塑像、假山小湖等美化环境,增添人文景观。另一方面构建校园精神文化育人体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志愿服务、典型引路、道德讲堂、道德论坛、思想教育、专业教育等多种教育活动,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寓教于乐。把握大学生的心理规律和

兴趣爱好,大力开展积极向上、健康有益并为大学生所接受的多元化文化活动,全方面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三) 建立高校网络思潮主流阵地

搭建网络交流平台构建新媒体阵地,要加强主流网络思潮的传播和治理,完善网络道德规范。一是注重高校网络思潮文化传播的内容,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借助网络平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主动维护主流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地位,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二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否定改革开放等错误思潮进行批判和斗争,发挥正义感和积极性。三是在网络教育中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培养大学生的道德选择能力,有针对性补充社会伦理道德知识和传授道德规范,在过程中寻找价值观的认同。根据大学生实际,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阵地相结合,占领大学生灵魂教育指导的主阵地,将大学生带入我国主流价值观的正确道路。

(四) 利用多种手段创新教育方式

据统计,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重说教、轻实践的现象,未达到入脑、入耳、入心的目标要求,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课普遍反映不佳。由此可见,高校意识形态的教育内容和话语表达有待提高,要改变教条化模式。在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的同时,也要不断增加宣传内容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加强互联网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建设。学生层面,可以增加互动、网站主题教育、学术教育,以及微信微

博和客户端的“两微一端”建设,通过这些大学生喜欢并愿意接受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五) 建立健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机制

学术讨论无禁区,网络传播有纪律。保障网络思潮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正能量,需要建立网络思潮传播的“防火墙”。一是加强高校网络及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教育师生不信、不传非法信息和意识形态领域反动、负面信息。二是建立网络与意识形态安全防范工作队伍,实施“网格化”管理。充分发挥网络维护技术人员、网络安全信息员、网络舆情监控突击队的作用,对校园网络空间信息进行筛选、监控和舆论正向引导。三是建立法制化体系。国家已将网络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高校应努力构建高效的实施体系,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惩处。通过逐步建立严密的法制监督体系,从法律层面加强信息传播的监管水平。

参考文献:

- [1]梅荣政.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 [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EB/OL].(2017-02-27)[2017-04-28].http://www.gov.cn/xinwen/2017-02/27/content_5182502.htm.
- [3]高世杰.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几点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16(5):40-43.

(责任编辑 姚虹)

Analysis on Ideological Influence of Network Security Trend in the Universities

QIN Su - ling

(Institute of Tobacco, College of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network, the social network ideology challenges the ideology secur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ideology security problem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network ideology and how to improve the work of ideology secur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garding the Marxism as the guid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the main theme, the campus culture as the carrier, we will definitely construct a secure college ideology mechanism.

Key words: network ideolog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y security; solution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指导下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研究

孙穗¹, 王莹姝²

(1. 广西财经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南宁 530003; 2.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监察审计室, 郑州 450044)

摘要:高校是意识形态阵地的最前沿,网络舆情引导工作至关重要。随着“互联网+”“融媒体”时代的到来,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倒逼舆情引导的思维方式和理念发生变化。在新形势下,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深刻把握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在中国共产党原有新闻舆论观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为高校新闻宣传工作和舆情引导工作提供重要理论支持。在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指导下,高校要与时俱进,把握时代发展的规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网络舆情引导队伍的建设,注重新旧媒体的融合发展,全面健全舆情引导机制。

关键词:习近平新闻舆论观;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3.02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7)03-0125-04

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讲话、报告、致辞、批示等方式就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形成了他独特的新闻宣传舆论观。特别是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的“8·19”讲话和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2·19”讲话是指导做好新形势下党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为高校新闻宣传工作和舆情引导工作提供重要理论指导。^[1]在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指导下,高校要与时俱进,把握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监控与引导,全面健全机制建设。

一、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理论阐述

(一)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理论继承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新闻宣传和舆论思想发展而来的。这些宝贵思想结晶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内涵十分丰富: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思想,最早指出新闻宣传工作首要的原则是要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体现党性原则,党的领导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把握好舆论宣传关。邓小平的舆论监督重要

思想,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根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强调舆论引导要注重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其新闻宣传群众观中还特别强调要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引导群众和扩大群众的监督。随着时代的变迁,舆论引导工作的重心逐渐从舆论监督转为舆论导向,特别是随着网络新兴媒体的兴起,舆论引导工作的地位更是上升到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江泽民的舆论导向观提出了党的新闻单位要发挥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和鼓舞人的四大作用,指出了检验舆论引导正确与否的“五个有利于”的客观标准,强调了新时期新闻工作者爱岗敬业、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严谨细致、勇于创新的六种优良工作作风。胡锦涛的舆论引导新思维提出了加强舆论引导能力的“五个必须”和“三个贴近”,在充分考虑到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舆论引导要讲求艺术、注重方式方法,并明确指出要发挥不同媒体的优势,构建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舆论引导新格局。以上这些理论观点

收稿日期:2017-05-09

基金项目:2016年度广西财经学院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课题“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指导下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研究”(2016SZA01);2016年度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重点课题“自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网络舆论正向引导机制研究——以微信平台、微博为例”(2016MSZ019);广西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建设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孙穗(1987—),女,山东泰安人,硕士,广西财经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传媒。

是适应媒体传播规律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逐步演进的,也是习近平新闻舆论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理论创新

随着“互联网+”和“微时代”的到来,当今社会的舆论环境已经发生巨变,网络舆论新常态逐渐凸显。当前的舆情引导工作面对的不再是单一的纸媒时代,而是飞速发展的融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变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流动,这些变化都驱使着舆情引导的思维方式和理念的变化。在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新特点,在原有理论上不断创新。首先,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提出了“党媒姓党”的三个要点,这是秉承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也是最根本的党性原则,明确指出任何新闻宣传工作都要讲求正确的舆论导向,舆论宣传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坚持正确的立场和是非把握,其对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的关系也有了更新的阐释;^[2] 第二,习近平新闻舆论观中首次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力主尊重和遵循新闻、传播、舆论等规律,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和现代传播体系,特别提出“九个创新”和“两个增强”,即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三,习近平新闻舆论观中也对新闻舆论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转作风、改文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此外,习近平新闻舆论观还全面阐述了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将其理论观点的创新升华为“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48字工作方针,基本确定了新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调。以上这些都体现出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思维创新和理论创新,也为新形势下高校的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新形势下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现实诉求

(一) 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需要

在信息开放、自由的“互联网+”时代,各种理论和思潮可以在网络上交融、交锋和碰撞,这不仅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肩负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3]但是近几年高校却出现了不少意识形态乱象,2014年11月13日《辽宁日报》刊发的《老

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信》一文,尖锐地指出极少部分高校教师在课堂上牢骚失控,并不断抹黑中国,该文迅速火爆网络,也引起了更多人对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和思索。高校学生由于涉世未深,容易轻信网络言论,容易受到境内外不法分子教唆挑拨,甚至发表不当言论、做出有悖于社会主流道德的事情;也有部分高校教师由于受到极端思潮的影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在课堂上发表一些不当言论,误导了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和群体认知。因此,加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刻不容缓,做好舆情引导工作势在必行。高校的学生和教师都要培养政治意识,提高忧患意识,增强主体意识,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政治、讲党性、讲立场。从意识形态的全局工作来看,高校有义务也有责任做好这项工作,及时消除大学生在思想认识上的疑虑和误区,引导高校教师理性发声,在“大思政”格局下全面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做到与时俱进、敢于创新、勇于突破。在新形势下,做好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前提就是要及时了解高校师生网络舆情的动向并提前做好准备,充分把握高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导权和主动权。

(二) 提升高校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需要

随着融媒体和自媒体的发展,网络信息可以借助不同的媒体平台和各种新兴的即时工具迅速向外传播,并发展成为无限共享的信息。由于高校学生所接受的网络信息大都是零星的、碎片化和浅层次的,加之其社会阅历浅、实践经验薄、甄别判断能力有限,他们对这些网络信息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偏差和盲目性,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而不是主动参与,更不用说提出质疑和进行考证。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中并没有开设此类课程,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大都是来自生活经验,缺少系统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导致个体在面对社会热点人物评论、热点舆论事件时,表现出来的网络媒介素养水平差别很大,有些学生被一些负面言论或者事件的表象所迷惑,通过微信朋友圈、微博爆料台等疯狂传播,甚至表达不成熟、非理性的观点。与此同时,由于高校学生工作者使用网络媒介的技术条件有限,获取网络信息的宽度和广度有限,严重缺乏对高校学生的有效引导,在遇到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时候只能采取回避、删帖等方式进行“冷处理”。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学生仅凭个人的理解和浅显的社会经验去感知网络信息的可信度,而不是通过接受科学的指导和系统的学习来获得媒介素质,自然不能很好地利用网络媒介表达理性的声

音和抵御不良信息的侵蚀。面对网络媒介素养师资队伍欠缺、高校学生媒介素养普遍偏低的情况,加强学生工作队伍的建设与培训,加强对高校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教育及认知能力的培养,规范高校校园网络舆情的传播途径和方式,是做好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关键所在。^[4]

(三) 维护校园和社会安全稳定的需要

近几年,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对校园主流意识形态的预测和网络舆论的有效疏导,不仅是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同时也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举措。众所周知,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95后”大学生甚至是“00后”大学生,他们获取信息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各种网络热点和微博大V的评论都能迅速引发大学生的关注和热议。与此同时,伴随着他们的成长而兴起的自媒体,具有多样化、平民化和普泛化的特点,这就使得“自我声音的表达”成为一种趋势。加之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以及约束机制的缺位,使得高校学生的网络言论过度自由,甚至剑走偏锋,来自学校、社会等各方观点的汇集发酵使得网络舆论往往向极端化、偏激化发展,进而酝酿极端化舆论。^[5]由高校学生引发的网络群体事件甚至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事件屡见不鲜,如湖南大学17名研究生违规转学案、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投毒案等迅速传播到社会网站,并上升为公众事件,引发社会的极大关注和讨论;校园网贷导致大学生自杀事件、高校学生信息泄露造成社会诈骗事件等引发的网络舆论高潮将高校推向风口浪尖。这些恶性事件不仅严重威胁着校园的和谐稳定,也为社会安全增添了不稳定的因素。在这种形势下,高校的危机公关需要迅速准确地做出反应,网络舆情的引导工作也要提升引导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及时回应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会实践乃至影视剧作品、舆论热议中所遇到的真实困惑,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和期待。高校面对的不再只是学生和家,需要担负更重的社会责任。

三、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指导下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的构建

(一) 坚持正确的高校舆论导向,壮大校园主流思想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核心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即“党媒姓党”的基本原则,在其48字工作方针中提出的“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可谓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基本工作方针。高校必须有大局意识,秉承为学生服务的宗旨,将党性原则贯穿到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方

面面,高校党委和各级党组织对这项工作要有绝对的主导权,其工作成效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一是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网络舆情氛围,积极主动地利用新媒体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展示主流社会的良好形象,维护健康的校园形象,引导广大师生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将高校营造成弘扬主旋律的舆论阵地。二是构建权威专业的校园网络舆论引导平台,丰富高校校园的官方主干网站,积极关注校园热点问题。针对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或议题,撰写有深度、有说服力、易理解的时评文章,善于将文件语言转化为学术语言,做好高校舆情工作的动态监控。通过校园网主页新闻、政务公开、学生网络社区探讨等多种形式开展舆情引导,将网络舆情引导工作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结合起来。三是充分发挥高校学生党支部、共青团组织、学生社团等机构的作用,充分利用学生团体畅通普通大学生诉求表达的渠道,保护其合理表达舆情的权利,培养优秀党员、学生干部学网、懂网、用网,做好网络舆情监测的排头兵,构建学生干部与普通学生之间的理性宽容的对话机制,从末端上做好舆情疏导工作。

(二) 加强高校网络舆情队伍建设,培养学生阵地意识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重点在于民心的认可和民意的认同,在其48字工作方针中提出的“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正是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主要目标。高校是社会科学文化的高地,是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正向的引导能够促进大学生心智的成熟,有利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因此,高校要加强网络舆情队伍的建设,发挥这支队伍的正向引导作用。一是注重网络舆情的监测分析,对于网络上具有突发性和非理性特征的校园舆情事件,要做好跟踪防控,在24小时内控制好网络舆情的发展,并做好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措施;充分发挥学校各级党组织对网络舆情管理的主体引导作用,组建一支业务精通、经验丰富的网络舆情管理队伍,将思想政治工作者、学生干部以及心理教育、应急事件管理和舆情管理的专家学者充实进来,^[6]构建行之有效的高校网络舆情责任机制。二是注重“意见领袖”的培养,培养一批有思想、有主见、够活跃、懂传播且具有政治敏感性和一定学生影响力的“学生意见领袖”,打造一支包括高校领导、辅导员和优秀学生干部在内的网评队伍,及时抢占传播阵地,把握好网络舆情发展的导向,使这项工作

的开展有正气、有底气、有立场。三是注重打造全媒型、专家型、创新型融媒体工作队伍,统筹抓好理论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校园文化建设、新闻宣传舆论引导、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7]提高校园网的公信力和引导力。高校要秉承“三贴近”原则,积极整合校园网站资源,开发设计学生感兴趣的喜闻乐见的新模块,增强校园网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注重新旧媒体的融合发展,健全舆情引导机制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创新在于其遵从时代发展的规律,强调了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澄清谬误、明辨是非”,明确了“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视野格局,并且首次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的理论观点。目前,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等取代传统的校园贴吧、QQ空间,逐渐成为校园网络舆论新兴阵地,大学生更加注重张扬自我和个性成长,其多元化、普及化的特点使得网络舆情的监测更难把控。在此形势下,高校更要在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指导下紧跟时代步伐,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环境育人,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一是用好新媒体资源,创新舆论宣传的内容、形式、手段、机制、题材等,重点发展校园微信公众号、校园网络微视频等,紧跟网络最新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把握先机,从网络信息的收集反馈、分析甄别,到网络信息的预警、应急处置等,全方位构建舆情引导机制。二是搭建融媒体平台,既要发挥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又要注重新兴媒体的即时性和

多样性。当出现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时,高校应该及时通过校园网首页、校报校刊等澄清事实,秉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向广大师生做好解释工作,引导学生走出舆论误区,探索高校“中央厨房”新闻舆论宣传模式,通过“线上报道”引领“线下舆论”。同时要特别注重发挥微博、微信、微视频、微电影、校园网、手机客户端,即“四微一网一端”的引领功能,健全传播体系,打破壁垒促进渠道融合,全面提升舆情引导能力,在融媒体条件下推动高校舆情工作的新优势。

参考文献:

- [1] 郑保卫. 习近平新闻宣传舆论观的形成背景及理论创新[J]. 当代传播, 2016(4): 27-33.
- [2] 丁柏铨.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观研究论纲[J]. 中国出版, 2016(8): 3-10.
- [3] 中文杰. 当前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性路径[J].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16(4): 35-41.
- [4] 何健. 高校大学生网络舆情特征与管理对策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5.
- [5] 胡明辉, 蒋红艳. 加强大学校园网络舆论引导的重要性及策略[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4): 450-455.
- [6] 祝苏东, 李礼建, 陈少平. 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的研判分析及启示[J]. 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6): 5-9.
- [7] 苏寄宛, 张加春, 黄存金. 把握“三个着力”实现“三个确保”: 高校新闻舆论工作的几点思考[J]. 北京教育: 高教版, 2016(5): 31-32.

(责任编辑 姚虹)

Research on the Universit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uide Mechanism of Xi Jinping's Journalistic Public Ideology

SUN Sui¹, WANG Ying-shu²

(1.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ning 530003, China;

2.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fic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guide work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s essential. With the “Internet +” and “Convergence Media” era, the guide work of universit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They changes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work philosophy of the guide work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journalistic public ideolog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grasp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We must adhere to the correct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and strengthen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eam constructi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of old and new media development. Finally, we must fully improve th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mechanism.

Key words: Xi Jinping's journalistic public ideolog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uide mechanism